

【第十卷】

武汉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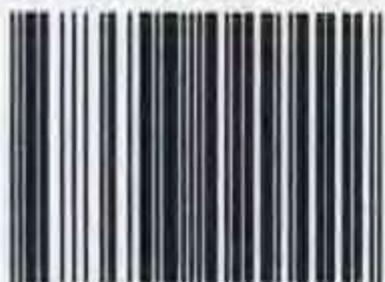
夏
絀
琴
全
集

夏子
琴
琴





ISBN 7-5430-2942-1



9 787543 029422 >

ISBN7-5430-2942-1/ I·418

定价：(10卷) 48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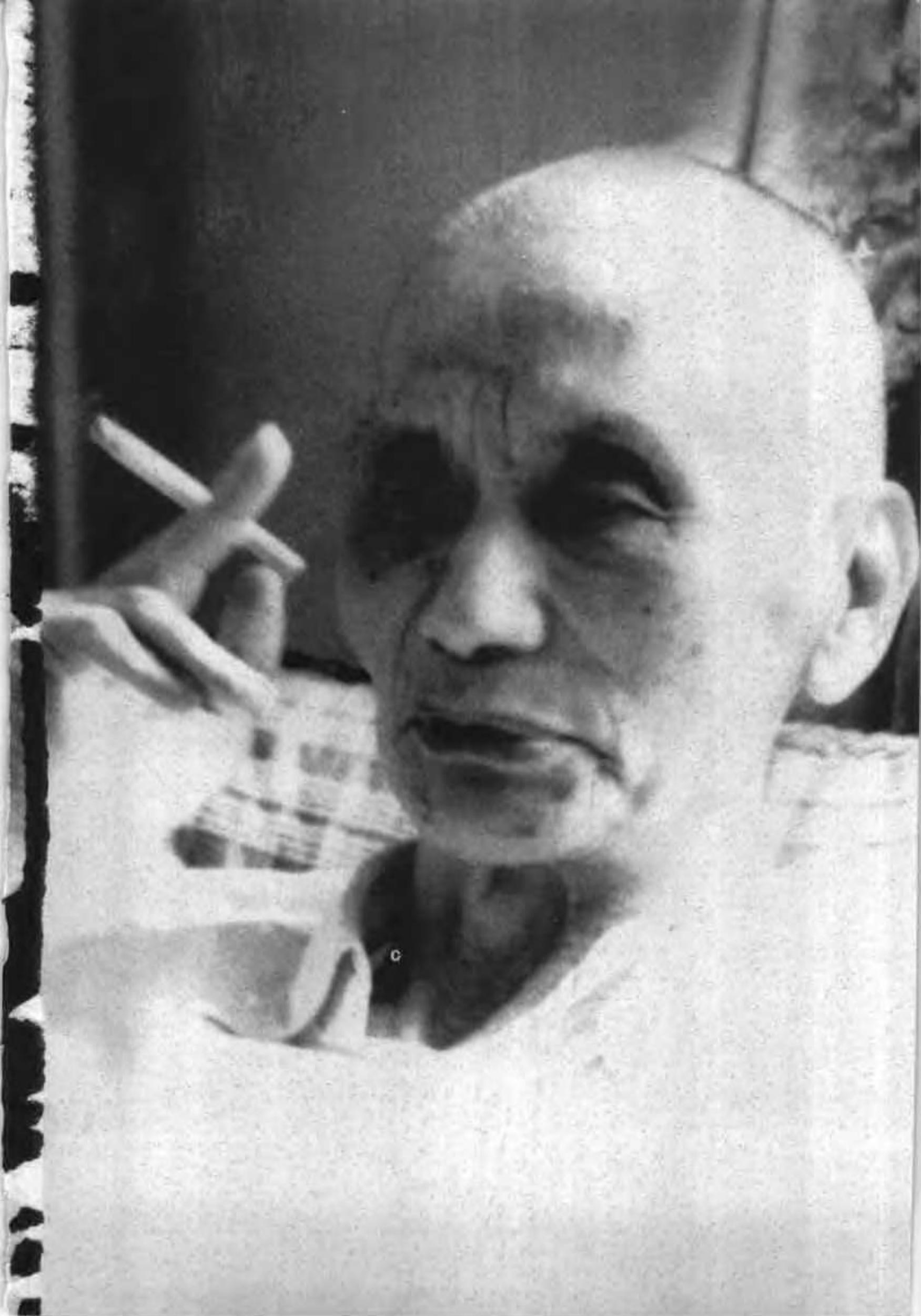
聂绀弩全集

第十卷

运动档案

附录

武汉出版社



有一兵佩刀
押赴市曹，内一
无二刻，求杀我！
遂从至刑所，正刀
转而大赞曰：“
写到这里，家里孩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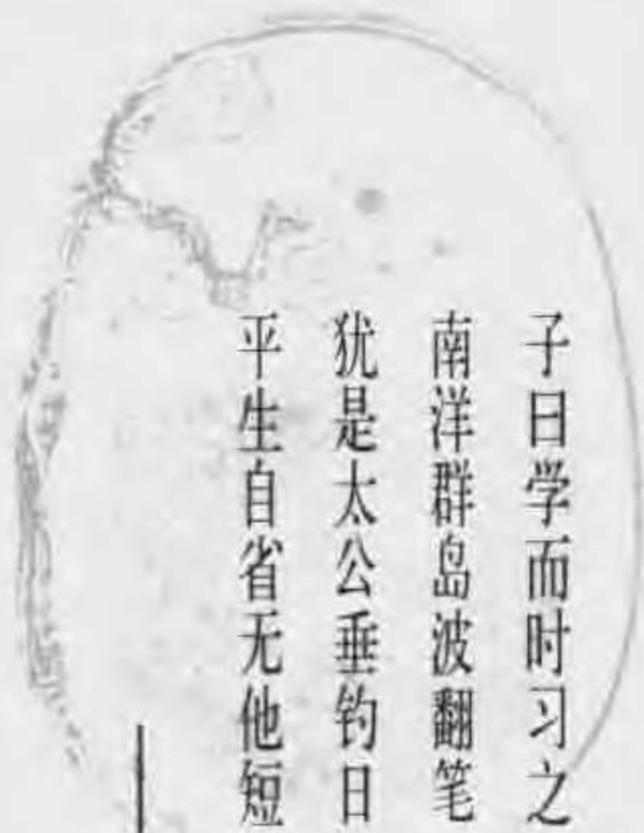
言呢？新社会的孩子，
带到县衙门去看审
佳概初我

编者弁言

本卷由运动档案和附录两部分组成。

运动档案收录作者在1954年至1957年几次运动中的部分检查交代材料。这些材料是作者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清理档案时发还的。其中的《楹房杂记》已编入回忆文集《脚印》（见第4卷）；其余均未发表。为保持文献材料的真实性，尽量原文照录，错漏之处以〔 〕更正或补全。作者删改之处照录，并以“编者注”简要说明。办案人员所加的横线保留，其他符号以“编者注”说明。

附录部分辑录了《聂绀弩著作书目》、《聂绀弩名号录》、《聂绀弩生平年表》和《篇目笔画索引》，供读者阅读、研究时使用。编者参阅了王存诚整理的有关资料和费万龙、许豪炯编《聂绀弩著译系年（1930—1985）》。舒芜、彭燕郊、王存诚、朱正等审订了这部分内容。



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七年痴。
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
犹是太公垂钓日，早非亚子献章时。
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

——
聂绀弩自寿诗「八十一」

夏衍全集

责任编辑 邹德清
书籍装帧 吴涛

第一卷 杂文（上）

第六卷 小说 剧本

第二卷 杂文（中）

第七卷 古典小说论

第三卷 杂文（下） 文艺散论

第八卷 语言文字论 译文

第四卷 散文

第九卷 序跋 书信

第五卷 旧体诗词 新诗

第十卷 运动档案 附录

目 录

运 动 档 案

个人主义初步检查(1954年5月22日)	(3)
历史交代(1955年6月25日)	(6)
一、参加革命工作以前	(6)
二、在日本的时候	(7)
三、上海时期以及和康泽的来往的终始	(8)
四、和谷正纲、卓衡之的来往	(15)
五、和曾养甫的来往	(17)
六、见过一次张道藩	(19)
七、从重庆出来的路上	(21)
八、在香港的一件事	(22)
九、整个略历及在香港的几件事	(24)
历史补充(1955年6月26日)	(31)
历史材料重写(1955年)	(34)
一、胡风问题	(34)

二、康泽问题	(40)
三、谷正纲问题	(43)
四、张道藩问题	(44)
五、曾养甫问题	(46)
六、从重庆到香港的经过	(47)
七、姜斌问题	(51)
补充材料(1955年7月20日)	(58)
历史交代再补充(1955年7月25日)	(69)
一、从东京到上海	(69)
二、和康泽来往部分的补充	(74)
三、在桂林	(78)
四、重庆一事	(85)
五、从重庆到香港	(87)
六、又一次到香港	(92)
致陈克寒、戈矛的信(1955年9月10日)	(107)
我和反革命的关系及其危害性(1955年12月)	(113)
三十万字和猖狂发言(1955年)	(137)
和姜斌在香港	(142)
曹和江(1955年)	(153)
两个鬼影(1955年)	(158)
叫回来为什么不回来?	(162)
在香港时的“阔”和贪污	(164)
在香港和哪些人来往	(166)
在党内关系的不正常	(168)
王国和政策(1955年)	(182)

检讨(1955年12月)	(191)
追溯我和康、谷的关系(1955年12月29日)	(204)
愿意或能够做什么工作	(209)
致党支部的信(1956年2月)	(212)
对于反省的看法	(215)
对支部大会决定的意见(1956年5月24日)	(226)
关于黄若海(1955年6月26日)	(236)
关于彭燕郊(1955年6月26日)	(237)
关于周颖的发言	(239)
关于周颖的发言稿	(247)
关于冯雪峰(1957年8月17日)	(253)
关于到矿业学院去(1957年8月17日)	(259)
关于陈企霞(1957年8月18日)	(261)
关于和社内几人的来往(1957年8月18日)	(263)
关于和某些人来往(1957年9月23日)	(268)
关于宗派主义(1957年)	(277)
检讨(1957年11月10日)	(283)
一、我和王任叔同志的关系问题	(283)
二、在二编室的工作问题	(289)
三、替周颖改文章问题	(296)
四、结论	(301)
五、附录	(304)
甲 在反右中写的残稿三页	
乙 在检讨中写的废稿四页	
最后全面检查材料(1957年11月28日)	(309)

一、言行	(309)
二、思想	(311)
三、改造	(316)
从改组派说到画册	(320)

附 录

附录一 聂绀弩著作书目	(329)
附录二 聂绀弩名号录	(333)
附录三 聂绀弩生平年表	(335)
附录四 篇目笔画索引	(454)
后记	(487)

运 动 档 案

个人主义初步检查

(1954年5月22日)

一、从来没有领袖欲、首长欲、权位野心之类。更没有用欺世盗名的手段或其他阴谋诡计在党内党外捞一把的行为或思想。刚刚相反，倒是怕当首长之类^①，怕做行政工作，尤其是领导工作。具体事实是曾因不愿做中南艺术学院院长及中南文联主席或副主席，而到北京来，现在对部分领导工作也感到若干苦恼。因此，宗派、山头、小王国之类的行为或思想，也从来不曾有过。

二、从来没有怀才不遇、大才小用之类的感觉，但并不等于说完全没有认为某某同志的地位太超过于他的能力或资历的思想，即并不等于无论何时完全不和别人相比。不过这相比只觉得他太高，而不是觉得自己太低。而且这种思想，一下子就过去了。

三、因为太没有某种欲望之类吧，另一种个人的东西就抬起头来：对自己要求低，律己不严，对政治关心不够。这表现为两种情况：一，自由主义，总觉得自己把自己安顿不好，这里

^① 文中下划线为办案人员所加的着重线，下同。

那里都不合适。总想当职业作家，写点小文章，或专门学习马列主义。因此，生活散漫，工作不够紧张，组织性纪律性差，对领导不主动接近，请示报告执行得不严格，领导工作方面有若干自满情况，业务钻研限于极狭小的范围，这些都曾造成工作上的损失。二，自得自满、沾沾自喜。因为自己幼年失学，走入社会时又毫无凭藉，阅读和写作能力都是自学来的，自己又还有写点小文章的一技之长，不免自得自满。再加上在文坛上的时间不短的包袱。新近又对于古典文学（主要是《水浒》）有了一点半点的理解，更形成一种自高自大、沾沾自喜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多少影响了工作，影响了和领导、和其他同志之间的关系，影响了集体领导。

四、这种个人的东西怎样来的呢？其一，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未进过学校，没有集体生活的习惯。其二，卅多年在社会上独来独往的经历。其三，最初接触到的新文化书籍是无政府主义的，不免还有若干残余影响。其四，思想水平极低的一种作家生活。其五，虽有廿年党龄，却因为在白区做文化工作，未过长期的党的生活，在解放前，也未直接受到严格的党的教育。其六，旧书和旧文人（才子、名士之类）的积习的影响。

五、目前还有某些心理上的矛盾：一方面决心把工作搞好，把集体领导搞好，逐渐克服自己的一些弱点。但有一个弱点还很难克服：想当职业作家或专研马列主义。尤其是近来很多人写文章提倡小品文，触到我的痒处，真有跃跃欲试之感。我觉得这种想法，固然有个人成分，但也不完全是个人的。

六、这种检查太粗略、太浅、太笼统，或者还不中肯、不全面，又未举具体事例，但负责是没有虚伪之处，整党时曾有较

详细书面检讨,约万余字,存我社人事科,必要时可调看。

一九五四、五、廿

历史交代

(1955年6月25日)

一、参加革命工作以前

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二，我是国民党员。二四至二五，约半年多时间，我在黄埔军校当学生。二五下半年至二七上半年，我在苏联中山大学当学生。二七下半年至二八年上半年，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当训育员（约半年时间）。这一段经历造成我以后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因为留过苏，在苏联所受的教育，虽然在当时没有发生作用，但回国后逐渐发生了作用，使我有走向革命方面来的可能；因为在国民党有七八年历史，使我在参加了革命之后，还和国民党的反动分子没有一刀两断地断绝关系，其中主要的〔是〕留苏的和伪中央党校的。

二八年上半年至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这个时期，都在伪中央通讯社当编辑。这一段经历给我以后的影响较小。

我的报告，侧重于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关系方面。

二、在日本的时候

九一八以后差不多年底到东京，在那里参加左联。来往的人，除了胡风、何定华、王达夫以外，没有什么别人，因为是个新环境，认识的人不多。有一个值得说说：杨玉清，现在在台湾。左联支部议好，用一个什么学术或时事研究会的名义（名义记不起了），约几个人开开座谈会，争取他们。里面有一个杨玉清，另外一个陈建晨（女）。陈建晨和我的老婆有来往，曾经住在一块儿。我先也碰见过。杨玉清是这回才认识的，他和胡风、何定华、王达夫似乎都很熟。这个人也是湖北人，后来知道他和张之本有较深的关系。当时的印象，他是个极滑头的人，满口漂亮话，辩证法也懂，革命也赞成，只是要他动一下却很难。标准的国民党式的官僚。同他开过一次会，推他做组长召集会，他就表示宁可退出这个会。还和他个别谈过一次话，记得谈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他大骂郭而推崇顾颉刚。我对郭的古史和甲骨文的研究是很喜欢的，因此，几乎谈不下去。那会，似乎只开过一次。不久，我们就被捕了。我们被押解回国之后，他还在东京。以后，抗战期间还在重庆碰到过他，没有来往。

在东京的时候，收到孟十还的信。孟十还是留苏同学，在一个宿舍里住过，所以相当熟。他和我，在学校是被一部分人认为不问政治的文学家。他这时候在浙江图书馆做事，来信说，他在林柏生办的《中华日报》出了一个文学性的旬刊，名《十日文学》，希望我写点稿。并附了几期刊物来。我看他的

刊物，态度还好，就寄过几篇短文给他。那些稿子现在记不起了，大概意见很不成熟而态度又很“左”的。这是我后来回到上海能到《中华日报》编[副]刊《动向》的张本。

以上这个阶段，何定华同志当能证明。

三、上海时期以及和康泽的来往的终始

回到上海，第一件事是认识了吴奚如，是在一个同乡孙铁人家里认识的。孙铁人是我的启蒙老师，是老国民党，参加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是个从很穷很封建也很下贱的家庭里出来的，我的父亲开过大烟馆，而且很早就死了。读过几年私塾和半私塾似的高小之后，就完全失学了。我之所以能到外面来，完全是孙的力量。他自己是个老腐败，大烟鬼，属于旧式才子之类的人物，连三民主义是什么恐怕也不知道。这时候，在上海当寓公。吴奚如也是同一个城里的人，但以前不认识。只听说他在大革命时代的武汉，曾活跃过。后来在河南坐了几年牢，出来了，刚到上海不久。

回到上海这年年底前不久，孟十还到上海来了。他说他想离开杭州，到上海来专搞翻译，先来看看有法子生活没有。这回他似乎没有找到什么法子，两三天就回去了。后来上海来，是向《译文》投稿投上了的时候。但他却给我[找]到一个生活的路子。这两三天中，他去会过林柏生，林柏生请他和我吃饭。林柏生也是留苏同学，但很不熟。他之所以也请我吃饭，主要的恐怕是陪孟十还，当然因为看过我在《十日文学》上写过稿子。请我的话是孟十还说的，到林柏生家里去也是他带

的。吃饭的时候，林柏生说《中华日报》要改版，要请一个编副刊的，问我有没有人介绍。我问要像什么样的人。他说像我这样就行。孟十还说，何必转弯抹角，就说要请他好了。林说，怕他不干。孟说，他反正没事，有什么不干？我说，恐怕很难编。照上海的风气看来，编稀松了没人要看；编尖锐了于报纸有妨碍。林说，不怕，现在汪先生（精卫）当行政院长，稍为左点没有关系。《十日文学》（此处文旁有办案人员提要：“编《十日文学》”——编者注）虽未太叫座，态度已经不右了，可以作为新副刊的标准。我回来报告左联，问可不可以编。左联讨论后，认为可以。第二年（三四）三月一日开始编《动向》。主要的作者都是左联的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大概编了七个月，连汪精卫也受不住国民党的攻击，就停掉了。当然也因为《动向》给报纸打开销路的任务也完成了。

林柏生的态度，起初很好，说什么都听；带叶紫作助编，鲁迅文章另算稿费，出大众语专刊，介绍星期专论（曾介绍过杜国庠和胡风的文章作专论）等等；稿费也按月发。后两个月态度很坏，不见面，什么都推掉，不发稿费，以致见面时常吵嘴。我和他除了这种雇用关系以外，没有其他关系。

胡风说，穆木天因为《动向》请客未请穆，送报也未送而很生气，不给《动向》写稿，就是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周扬同志当可作证。

吴奚如经常和我有来往。不知什么时候，他已接上党的关系了，是军事方面的。三五年二三月间，他介绍我入党。入党式是在一个不知什么人家里举行的。除吴外，在场的有一个

“老李”，另外一个胖子。老李不知名字，胖子连姓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后来又在别处碰头过两三次。胖子后来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碰见过。老李瘦、黑、不高，口音像下江人，似乎是军委什么的，除在上海外，未在别处碰见过。入党时，老李给我很多指示，现在只记得一种，要多看理论书。

入党后不到一个月，老李说要派我到四川康泽那里去做工作。康泽那时作伪参谋团的政训处长。康泽也是留苏同学，在莫斯科时也不熟，在回国的船上才开始谈话。回南京后，同在伪中央党务学校做训育员。我调伪中央通讯社后，不久，康泽也调伪中央训练部了，两人同住一个宿舍有几个月之久。这关系，我对吴奚如谈起过，所以老李要派我到康那里去。说是“要尽量利用国民党关系，要打入他们内部去。”（此处文旁有办案人员提要：“任务”——编者注）我的任务是关于“军事情报方面的”，等我打进去了，再派人和我联系。我告诉老李，我和康泽确有较一般关系为深的关系，但那时因为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经常接触到思想问题，我知道他要走法西斯的路，他知道我要走革命的路的。我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康泽曾写信给《十日文学》转给我，叫到我那里去，他那时在江西。我非常露骨和坚决地回绝了他，我说，我还读不懂《我的奋斗》，完全不理解这样的人，叫我怎能和那作者之类的人共事呢？因此，打进他那里去希望不大。老李说，不要紧，只要你觉得他不会把你押起来，不妨去试试，不成功就回来。这样，我就到四川去了。事先当然用电报和康取得了联系。

见着他是在成都。头一天，请我到馆子里吃饭，有一个姓张的什么人（当时介绍过，现在记不起了，反正是穿军装的）在

座，谈了一些不相干的话。分手时，他叫副官招呼我到 he 家里去住几天。他说他很忙，在家里比较容易抽时间和我畅谈。但在他家里他也没什么时间，早晨五六点，客厅里的人就满了，晚上一两点才回来或者不回来，白天不在家吃饭。住了四五天吧，谈过两次话。

一次晚上一两点，他回来，问我的来意。我说我想做点事，在上海混不出什么名堂来。他问，做什么事。我说既然下决心做事，就一切从头来起，过去的什么都丢掉，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连那些年轻时的幻想也丢掉？我说当然，否则也不下决心来了。他说到我下面做事？我说最好。他说我们现在是朋友，一做事就公事公办。这里是军事机关，要求严格，性质严重，决不能想，某人是我的朋友，出点小事不要紧。我说我知道。他说这是跟你说得好玩的，我这边的工作于你太不合适。我说我说过，什么都可以。他说应该想到我不是不关心你的，你写的文章和编的报，不是完全不知道；两年前你给我的信也还记得，没有人那样写信给我的。我说那是过去的事。他说我也以为是这样，这样才可以谈。既然来了，应该想办法，不过也不是马上就可想好。休息几天，我从各方面考虑考虑。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不带什么感情的，跟从前在南京时的谈话情况很不相同。使我感到，一、他对我已有一定看法；二、似乎完全知道来意；三，门禁森严；四，打得进去也不能施展；五，随时可以变脸。我甚至疑是已经变脸了，把我软禁着的。但另一方面也想到，他也只能这样。

在南京时，特别是在同一个宿舍时，半年多时间，差不多每晚都谈很久，他有什么事都和我商量。就当时的现状说，两个

都是不满分子。他说我将来一定会当共产党的。他说他也赞成共产主义,但要有真正的共产党,现在这些杀人放火的共匪都是应该消灭的。他说现在没有出路的人多,不必共产主义,随便插个什么旗子都会有人来,都可以反蒋。他等有点政治资本了是要插旗子的。对我个人,他时时表示敬佩,认为没有碰到过我这只笔,约定无论什么情况之下都做朋友。后来他到蒋介石那里当侍从什么了,每次蒋来开会总是他提皮包。蒋进会场之后,他就来找我聊天。我笑他提皮包,他也笑说,当识英雄于未遇时。我是以这样一种关系来找他的。

第二次是在他家里的最后一天,吃午饭的时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在家吃午饭。他说,那天晚上疲倦得很,没有对你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我说没有。他说那就好。你的事,我们不能随便解决,先来个步骤,作个长远打算。把老婆接来,住在我家里,专门用一两年功,读书,做学问,要看什么书就看什么,绝对自由,只要可以找到的书我都替你找。不过看了,有时跟我谈谈,让我也跟着学点。经过这一个时期,一方面你成为学问家了,不会再想找什么小事做,自己会飞掉;二方面要做什么,只要我能出力,都跟你找。你不知道,我想有这样一个人能跟我讲点学问上的事,不知想了好久。不管里面的某些话有没有真实性,我想,这样的意思一定有:一,试探;二,关门。说不定还想长期软禁。我说,你把问题看得这么大,叫人一下子难以回答。这需要考虑考虑,因为既然如此,何必累你,我来找你并不一定是为了生活。他说这是我想留你的如意算盘,你当然可以考虑。住在这里很不便吧,我曾叫周蒸然(伪党校学生,现充什么委员之类)来陪你玩,他来过吧。我说

来过，也玩了几个地方。他说既然熟了一点，就不必住在这里，我给你在青年会找了间房，搬去那里随便些。考虑好了给我个通知。这样我又搬到青年会。

第一次谈话已报告上海方面，回信来说，相机撤退。我通知他，问可以不可以介绍到什么大学去教书。我没有直接说不接受他的提议，怕他翻脸。几天没有回信。一天他派人来叫我去，说大学事要费周折，问我是不是想回上海。没有等我回答又说，回上海吧。我明天飞重庆以后又到武汉去，恰好一路。我叫我的小车子明天送你到重庆，我在重庆给你准备到武汉的事。到了重庆，他叫坐他们的差船到万县，叫他的一个大队长给我在万县买船票到武汉，到了武汉，再找他拿到上海的旅费。——照他所布置的做了，也无法不这样。后来分析，他为什么用这种递解似的办法呢？怕我出事，一出事就与他有关。

在上海的这一段，再没有什么这种关系了。让我把和康泽的以后的来往也在这里讲讲吧。

八一三之后，我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到武汉。和宋之的、马彦祥、贺绿汀、塞克[他]们一道。先到南京，队长马彦祥原以为在南京很有办法弄路费的，谁知不行，和平时不同了。只中山文化教育馆捐了一百元，一二十个人望着走不动。队委会、马、宋、我，商量叫我去找康泽。一打听，他在南京，找着了，他一面摇头，一面还是写了两百元捐款。

以上是为公事，前面一段，现在只知道吴奚如可以证明，老李和胖子都不知怎样了，又不知道名字。后面一段，宋之的可以证明。

以下还有两三次，是没有任务的。

在武汉，孟十还来找我，说康泽找我有话说。孟十还自上海分手后就未见了，不知怎么找着我的。在上海时，他还以进步姿态出现，到武汉后，大概和康泽接上关系了吧，开始变坏，以后就和我没有来往了。他引我去见到康泽之后，他就走了。康泽请我到一家馆子里去喝酒，看样子像有什么事，很沉闷。说，他也许要去带兵，如果当了民族英雄，希望我写篇文章纪念他。这次较详的谈话，在香港时，康泽被俘之后，曾写在一篇《记康泽》的文章里，发表在《野草》上。（文旁有办案人员批语：“关系不浅”——编者注）

一天，在商务印书馆看见陈列台上有《说文诂林》。在上海时，讨论大众语之后，我曾对文字学一度有很高的兴趣，久想有这一部书，可是要百把块，买不起。这时想起，看康泽前几天谈话的那情况，要是敲他一点小竹杠，不会不答应。我去找他，他果然答应了，叫他的什么秘书用什么图书馆的名义去买。这时是夜晚，决定第二天去办。第二天我没去，过了好几天才去他那里把书拿回来。

这一段来往，当时跟吴奚如谈起过，那时他是周总理的秘书，但也并非正式谈。他不是正式领导我，我也没有别的领导，这情况继续到周总理介绍我到新四军去为止。

最后是在重庆。（文旁有办案人员提要：“在重庆”——编者注）老婆从北温泉来，为她们慈幼院有事要找康泽，大概是为慈幼院的庙产之类的问题，想侵占庙产的人是康泽吃得住的。老婆是伪党校学生，和康泽也很熟。她认为我一路去，效果要大些。我就同她去了。一去，他正准备出门，在门口谈了几句话，约我们第二天去吃午饭。第二天去了，还有另一个姓

吴的失业军官在座。那是他找来陪我们的，那个人和我同乡。主要的是他们谈话，他和老婆谈，和吴谈。和老婆谈的不记得了，和吴谈的，和我单独谈的几句，都写在《记康泽》里。

以后没有来往。这一段，现在只有老婆能证明。

在武汉和重庆的这两段，完全没有必要，无论是他或别人找我去，也完全可以谢绝。但当时认为既在抗战期间，既要公开存在，只要不涉及政治，来往一下也不要紧。不用说，事先未向党请示，事后也未汇报，至少未正式汇报。但也没有故意隐瞒过这关系。周总理、徐冰同志及其他搞文艺的党内同志知道的人也很多。我还公开发过两篇文章，在桂林时的《时间的启示》（《沉吟》）；在香港的《记康泽》（《野草》），前者是记在成都的那一段的，后者是记整个交往。（文旁有办案人员批语：“与康关系不浅”——编者注。）

四、和谷正纲、卓衡之的来往

从新四军出来，在金华，和荃麟、葛琴、骆耕漠几位同志住在一起，即“东南战线社”，骆、邵都是搞《东南战线》的。这时候，《东南战线》被迫停刊，他们商量有没有法子挽回。我在那里，就想到我是不是可以去找谷正纲。谷正纲也是留苏的。在伪党校时，他是训育主任。关系不算太好，但我也还是可以去找的。这样，我和荃麟同志到方岩去找他——他是伪三战区政治部主任及浙赣两省党部的什么；方岩是伪浙省机关的地方。到了方岩，邵和我先找到了一个旅馆，他在旅馆等，我一个人去找，我就找着了。他一看见我很惊异，问我从哪里来；我

说“从新四军来”。他说“我知道，什么不好搞，偏要搞共产党。”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并且现在离开了。他说“预备怎样呢？”我说“还没有办法。”他说“到上饶去。”我说“搞什么呢？”他说“住在那里，生活我负责。”我说“等真无办法了再讲吧。现在我还可以搞刊物。《东南战线》我有熟人。”他说“原来是来谈《东南战线》的？共产党的刊物，没有什么好的。”我说“他们不是共产党，不过言论有时左一些。”他说“跟你一样。”我说“究竟哪些文章不好，叫他们以后不发表那种文章。”他说“朋友，要钱用可以开口，他从皮夹里拿出一札票子给我（三十元），这样的事不谈吧！我看你落魄得很，还是搞别的吧。”正说，别人来催他走。他说他带我到金华去。我不好说外面还有人等，就跟他走了。荃麟等我不回，跑到他那里去问，听说一路走了，也就自己回来了。回来我们又商量：再去找他，另出一个刊物，完全由我搞，态度尽量改变一些。这回是在上饶，跟他缠了一个多钟头。他说“还说不是共产党，完全一套共产党法：无孔不入！那么，不许登载新四军方面的任何东西，不许公开拥护共产党，你去办着试试。”我说没有登记证。他说“要什么登记证？你到图书审查处去对钱万镛说我允许了就行了。”我说“你写封信为凭。”他说“没有那种办法。你去说，他会问我的，我说有这事就行了。”这样，就回来办《文化战士》。出了两期。他还是通知钱万镛（审查官，也是伪党校毕业），停了。以后就没有来往。

这是到金华找印刷关系的那一次，回新四军后，曾对陈毅同志谈起过。第二次是离开新四军到重庆去，住在金华找交通关系，还是住在老地方。一天，骆耕漠同志到屯溪去开了什么

会，回来说，你认识卓衡之这个人么？我说认识，他的老婆和我的老婆同学，在南京时有来往。他说他现在在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作书记长，我们一道开会，谈起你，似乎很关切。你不是找交通关系么？他一两天上重庆，你搭他的车子去。第二天我就到屯溪，他招待我住在旅馆里，请我吃饭，很客气。谈到搭车，他说是一个小车子，挤不下了。次晨，在旅馆接到他一封信：绝早启行，不惊扰，不能带你走，很抱歉。送上补助旅费一百元。几年以后，胜利之后，他从南京到重庆料理他弟弟的丧事，我的老婆在劳协做事（我在《商务日报》，不住在一处），他要把两个小侄子托在劳协过几天，我在劳协碰到过他一次。此外别无来往。

在金华这一段，荃麟、葛琴、骆耕漠等同志均可证明。

五、和曾养甫的来往

在桂林，不跟什么反革命有来往。桂林并没有留苏的和伪党校的人似的。留苏中，我熟的是那些在莫斯科一直是国民党的那批人，叛徒托匪之类，一个也不熟。

在桂林主要的是编《力报》副刊。在金华时，请荃麟同志去，他不去，让我去的。后来他才去当过一个时期的主笔，葛琴也去助编和主编过副刊。这是个私营报纸。老板名张稚琴，安徽人，光华毕业，在南京做过伪财部科员，抗战时在湖南省府做过张治中下面的秘书。长沙大火时，他押运几卡车[物]资到桂林，中途贪污了一部分，因此有了一点钱，在桂林办报。并没有后台，却装着有后台的样子，最初就装着是张治中叫他

办的。无所谓政治立场态度，却不完全跟国民党一样，也不用什么国民党的人，主笔编辑说点有限的进步的话也可以。这样，这报就比国民党的报要好些。这也是他的资本。他拿着这个资本向国民党钻，和当地的、和过路的有点什么的人勾勾搭搭，主要的是勾钱，借报勾钱，勾钱养报。大概有时也有点效，否则报会出不下去的。但一直也未把报卖掉，主要的大概是没有人出能满足他的代价。这些都与我无关，这里只说一次与我有关的。皖南事变之后，桂林的空气转变，许多文化人都走了，荃麟他们刚到不久，还没有大关系，我搞了一年多，要走才好，正打算到重庆去。正在这时候，张稚琴勾来了一个关系，曾养甫。忘记曾养甫为什么过桂林，总之被他勾上了。这回不是偷偷摸摸小搞，还引曾养甫到编辑部来参观，找编辑部的人谈话，戚戚察察，搞了好几天。不知他们背后搞什么鬼，说曾养甫要请我去当私人秘书。我不认识曾，只在张哀求编辑出席跟曾养甫谈话之后（编辑没有人愿见什么要人），跟大家一齐坐了一下，彼此都未谈什么。怎会打起我的主意来了？张极力劝驾，似乎我去了于他的报有很多好处。我想跟什么人当什么私人秘书呢？但他有交通关系（他是搞交通的），可以利用他的关系到重庆。那时候，交通是经常成问题的，我又总没有钱做路费，而且自己走，怕路上出危险，路上出危险比任何住久了的地方更坏。因此，答应下来，准备到了重庆溜掉。我坐的车子是柴油车，车上负责的人名刘炎，是个什么少将，曾已早坐飞机走了。到重庆见到他，才正式和他谈话，谈了几句也听不出什么道理。后来他说，他要到昆明去修滇缅路，要我跟他去。不过还有些时间耽搁，叫我到北温泉去看老婆，等走的日

期确定了通知我。又叫我把进城来可能住的地址告诉他。这样，我就从他那里出来了。不料把这件事和周总理一谈，周总理倒说可以跟他去，说他比康泽草包，容易搞；也还有点欧美资产阶级的派头。我问有什么意思没有，周说没有多大意思，不能存什么幻想。跟他到处去跑跑，于写作上应该有用。我说这样就没有什么去头。以后，他通知我，派车子到文协来接我，我都没有理他。后来回桂林，张稚琴又请我去编副刊。那报还是那样，并未被曾买去，不知何故。曾为什么要我去当秘书，至今还是不明白。

这一件事至整个在桂林期间的情况，荃麟、葛琴两同志均可证明。

六、见过一次张道藩

第一次在重庆，时间很短，大概两三个月，因为经常轰炸，在北温泉的时候多，从曾养甫那里出来以后，没有和什么人来往。

第二次在重庆，除了和康泽有过一次来往，前面已经谈到过以外，还见过一次张道藩。刚到的时候，没有任何收入，生活很成问题。好像是和雪峰同志一道碰着韩侍桁，他热心地说是要替我想办法，当然是说在国民党底下想。他说的办法之一，是到文化运动委员会去拿那专门救济外来作家的那笔什么钱，每月两千元，白送。这事我也知道，茅盾、雪峰、以群就是拿那笔钱的。两千元这时已经很少，但比没有还是好些。主持这事的是张道藩，我和他在南京时会见过，没有交谈，也就是

毫无关系。韩说他和他的关系也不够，只能到他底下去说，底下是胡一贯、李辰冬、王进珊等。他说他去找李辰冬，叫我去找王进珊。不知他去找过李没有。我去找过王，他是伪党校学生，在校时就和我很不错的。这回找，不在家，留下住址。过几天，他来找我了。我问他是不是可以在张道藩那里讲点话。他问什么事，我跟他提起。他说这件事很容易，大概一说就成。我问为什么容易。他说本来是照顾左翼作家的，别人不会进行，又没有一定额数，两千块谁也看不起。反正得失无所谓，我去作，我提着试试。过了好久，他又来找，说是成功了。请我去谈一次话就发表。我同他去，见到张道藩，谈话时间不长，他好像和我很熟的样子，问这问那，主要的是问我和茅盾们几位作家熟不熟。我说熟。他说很好。随后就说请我替李辰冬主编的那个刊物（名字不记得了）写稿子，也拉一点别人的稿子。再就是说我以前不是国民党员么，在外面流浪了多年了。下文好像要说入党之类，但没有说下去，大概怕当面造成僵局，只说希望取得联系。再就是把李辰冬找来，介绍了，说我答应写稿，叫他和我说谈。李辰冬就跟我谈，问我准备写一些什么稿，住在什么地方，那笔钱寄到哪里等等。似乎还送了一本什么他著的书之类，记不清是什么名字。这样就走了。以后什么稿子也未给他，也未代他拉什么稿子。除了不知什么时候，那文化运动委员会照例请那几位拿钱的作家聚会，我和大家去过一次以外，再未去过。两千块钱寄到老婆处，好像寄到过年为止，半年光景，以后似乎都取消了。

这件事不知雪峰同志记不记得一点。

七、从重庆出来的路上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从重庆出来，打算到香港去，走到汉口就没有路费了。住在一个小时同学郭曙南的地方，是个运输行，名“天南公司”。这郭曙南原在重庆市政府当科长，胜利后，就回到武汉做生意，替商人运货。我因为没有钱，同时因为夫妇关系已经弄得很坏（老婆先去香港），不愿很快就到香港，就回故乡去卖一栋破房子。卖的钱是谷子的期票，一下拿不到手，只好回到武汉等谷子到期和运到武汉卖了再说。但不敢久在武汉住。我是湖北人，武汉总有些认得的人，时局紧张，怕出危险。想起长沙有一个留苏同学，名胡建文，在南京时很熟，我之所以能离开南京，是得他许多鼓励的，那时候他比我进步。在重庆时也碰到过，他在嘉定硝盐局当科员。这时候在湖南伪建设厅当主任秘书（现在在矿业学院教俄文），不如到他那里住些时。同时也还有点别的想法，他在官场里混，说不定有点钱，可以叫他拿出来到香港去办刊物，《野草》在香港复刊，经济情况很坏，我是知道的；那时又不知什么时候解放，有点钱还是有用的。到了长沙，住在他家里，他说他没有钱，要看李毓九有没有，不过他很吝啬，也没有什么长远打算的。李毓九是留苏同学，德文翻译。南京以后就没有来往。现在是伪建设厅长。我问可不可以不惊动他。他说没有关系，他是个老官僚，无所谓。他常谈到你，印象很好。过了几天，李毓九来看我，谈到我到哪里去的问题，我表示要到上海搞文化。他叫我留在湖南，说听说我一向生活过得很不好，他可以

想法了让我把生活过得好些。兵荒马乱，不要东跑西跑了。我表示也可以，因为我还想住几天。过了些时，叫我到他厅里去玩，参观几间房子。打算请我作经济委员，并且跟我进行到湖南大学去教书。再过几天，经济委员发表了。起初我以为是他厅里的，及至发表，才知道是省里的。我想不妙，知道的人多，说不定会出什么问题的。又听说湖南大学已经有学生来找我表示欢迎，湖大的事也将要成功了。那时正将过年，我的谷票的期也快到了，我就推说去武汉过年了再来，到武汉去了。在长沙过了一个多月。过了年，我到香港去了。走后，郭曙南及别的同乡，为了我的原故，被捕了一次。

这件事没有党内同志证明。与这事有关的，胡建文在矿业学院，郭曙南在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当参事，是民革。

八、在香港的一件事

离开武汉，是和一个名陈良屏的一起到广州的。这陈，是同乡，很早就认识。在上海时，他在伪政府社会局当科员，对于我们是同情的。这时候，他在当伪湖北省党部委员。我住在武汉，也靠他跟我打听一点风声。过了年，他要到广州去替程潜活动选举，一定要我同他走，意思是他不在武汉，没有人通风报信，住着是很危险的。我就同他走了。在走之前，他说介绍去会一个人，那人对现状是不满的，有点进步思想，你可以去和他谈谈。这人名戴经尘，做过伪标准局长，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谈过一回，也没有接触什么问题，也看不出有什么进步思想，倒觉得有点老奸巨猾似的。谈过就走了。到广州后和

陈也分手了。这陈，据说掩护过很多同志，解放时立过功，历史交代了，现在在山西汾阳中学教书。

四九年，在香港马路上碰到戴经尘，邀我到咖啡店去坐，谈了一通他如何早不满意国民党，做了一些什么反蒋反陈之类的事。谈来谈去，听出他属于官僚资本家之类的人，不过是较小的，受到大官僚资本的排挤，所以对国民党当权派有些不满。谈过之后，他表示要竭尽力量投效革命，但是和国民党的关系不算太好，不能在政治上有所施展，是不是在经济文化方面能找到什么出路。那时候，国民党在香港找关系的人很多，其中也有对于我们有用的。我把这事向潘汉年、夏衍两同志谈起。潘汉年同志分析了一下，说没有什么用，但也不妨谈谈。那时候，不知是在酝酿出一个报纸还是要把《华商报》继续出下去，总之是与出一个报纸有关的事，叫他拿钱出来办报。我把这事告诉他，他很高兴，用请客方式请了几个人，有夏衍、萨空了、刘尊棋、胡希明几位。谈的时候，他的意思似乎不很透澈，好像钱也有限，又计较个人名义之类。当场当然没有结果，事后也不知是为他的态度还是根本改变计划，不出报了，以后就没有谈了。这时候，《周末报》正在酝酿出版，没有登记押金（港例每个刊物出版，登记时要一笔押金，《周末报》原名《星期报》，因为押金是别人的，发生了问题），我介绍他和《周末报》主持人胡希明谈，他拿了不知一千二千出来给《周末报》做押金了。以后我就回国了。再到香港后，也碰到过他。我劝他回国（因为张执一同志曾提起叫他回国），他说他的孩子正生一种不能动的病，等他好转一点了回去。我看他是推诿，以后没有找他。再以后听胡希明说，他到南美洲去了。

这件事，请客的一段，夏衍同志当记得。给《周末报》出押金事，胡希明知道。胡在广州文史馆当副馆长。

第二次到香港去时，张执一同志对我讲，碰到曹振武，叫他回来，没有事。张执一同志在我的故乡很久，知道我和曹振武有同乡关系。曹是何成濬下面的人，在武汉历史很久。他的弟弟曹勛，也是个国民党军官，解放成都或重庆时有点功，那时在重庆。到了香港，我就照张执一同志告诉我的地方去找曹振武，他答应回国。但迟迟不行。我去催他，他说他心里没有依靠，现在正在想法子跟董必武通信，等他的信来了就回去。他和董老三十年前有过关系，我早知道。他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正失学，要我介绍回国学习。我介绍到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去了。再过些时，又去问他。他非常苦闷。说董老的信没有来，六十几岁了，不能劳动，不能学习，回国怎么办呢？我说不会要他做肉体劳动，学习大家都要学习的，搞惯了一样。如果不放心，立点功回去。他说武昌起义立了大功，现在都不要了，还说什么呢？我看他有点乱扯，总是不敢回国，就放弃了。

关于要曹振武回国事，可问张执一同志。两个女儿的事，崔嵬同志知道。

九、整个略历及在香港的几件事

在东京，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三三年五六月，最后三个月是坐牢。活动情况见前。

在上海，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三七年八月。

参加左联活动。刚到上海时参加过一时的反帝活动。

三四年三月起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九(?)月停刊。

以后参加新文字运动和救国运动，曾一度被举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委员。

主要的在《太白》上写稿。

参加一次鲁迅、胡风、欧阳山、周文、萧军等的刊物《海燕》。出两期停。

搞过一个《热风》，出两期停。

三五年三月入党。最初，主要的与吴奚如联系，以后，转文委方面，与雪峰、周文两同志联系，直到离开上海。

中间到过四川一次，见前。三六年送丁玲同志到西安去过一次。

关于入党赴川事，现在只有吴奚如可证明，后一节关系，雪峰同志可证明。

三七年九月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到汉口。不久，老婆也从上海到了武汉。演剧队北上，我因不会演戏，又不会写剧本，未随去。送老婆回故乡。约至年底，我替《七月》写了几篇文章。见到康泽也是这时候。三八年一二月，随艾青、田间、李又燃、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同到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到不久，临汾撤退，随丁玲同志的服务团到西安，又随丁玲到延安，再回武汉，好像已是夏天。这一段时间，艾青、丁玲两同志及吴奚如均可证明。

回武汉后又回故乡去过一次，约一个月。再出来，就由周总理介绍到新四军去了。

从上海出来，半年多将近一年，没有正式组织关系。正式关系，从周总理的介绍信，说我是正式党员开始。

三八年八月(月份记不清)到新四军,先作政治部宣教部科员,后调服务团创作委员,最后作军部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至三九年底,离开。这一段时间,徐平羽同志可证明。

在金华住了半年以上。都和荃麟、葛琴两同志住在一起。和谷正纲及卓衡之的来往已见前。此外,就是编了两期《文化战士》,为《刀与笔》(万湜斯编)、《浙江妇女》(葛琴编)写稿。这一段时间荃麟、葛琴两[同]志可证明。在金华,未带正式组织关系,不好带。

四〇年四五月到桂林,至四三年某月均在桂林,中间四一年到重庆去过一次,约三个月。在桂林期间,除编《力报》副刊外,就是参加《野草》工作,主要的是写稿。最后约半年失业。失业期间,在远方书店编了两期《山水文丛》,帮助骆宾基编了两期《文学报》,自己出了一本小册子《早醒记》。

组织关系,由新四军通知八路军办事处。最初由夏衍同志和我个别联系。夏衍同志赴港后,一时无正式联系。最后一段时间由李亚群同志个别联系。

这个时期,一般情况荃麟同志可证明,组织关系,夏衍、李亚群同志可证明。

四三年某月到重庆,直到四七年十月才离开。

四四年在私立建川中学当教员。和朱希同志一道。这时期由朱希同志搞钱,出版了两期《艺文志》小刊物。后即被迫停。

四五年六月给《真报》编副刊。编了三四期。胜利后停。

胜利后,原桂林《力报》张稚琴办一刊物名《客观》,储安平主编。我编“附页”,即八开的一面。出到四五期,储发表了一

篇捧蒋的文章,我和张、储两人吵嘴,骂储,把储骂垮了。后改由吴世昌主编。吴不知是什么人,好像和储是一路的。刊物没出好久(六七八期?)他们都离开重庆复员了。

四六年某月,进《商务日报》编副刊。《商务日报》有一个时期态度极坏,后来不知怎么变得较好了。总编辑陈国良,到过延安,不知是否党员。现在在上海方面工作。

这年九十月改进《新民报》编副刊。编到第二年三月,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兵占据编辑部,要《新民报》为副刊某稿登报道歉一月,撤换副刊编辑。乃离职。

四五月至西南学院教书。至七月,和孟超同志一道。这学院下期被迫停办。

在这期间,起初是和徐冰同志发生联系,他并说桂林方面有电报,说我走得太急迫,未把组织关系搞好就走了,叫我有机会就到他那里去。我以为这就是组织关系了,经常把我的动态去汇报。一次,民盟拉我拉得很急,我去问他可不可参加,要得到组织指示。他说他和我不是组织关系,幸而周总理在座,说没有问题。后来叫何其芳同志和我个别联系,联系到我在《新民报》的时候。后来办事处被迫撤退,关系断了,一直到在香港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徐冰、何其芳、朱希、孟超等同志都可证明一部分。

十月底至四八年三月初,是从重庆到香港路途中。从重庆到万县等船,花了十多天;从万县到宜昌等船,花去几天,到武汉时,已花去二十来天。在故乡过了个把月,在长沙过了一个多月,余时在武汉。这一段时间无党内同志证明。

四八年三月至四九年六月在香港。正式参加组织生活，以群小组长、天翼、力杨、适夷、天佐、夏超等同组。（此处文旁有办案人员打的“？”号——编者注）

主要的工作是给《野草》写稿。

这一段，荃麟同志可证明。

四九年六月回国。参加文代会，赴东北参观，等分配工作，到武汉，从武汉再回到香港，大概是年底了。在香港过旧年。

再到香港，是张执一同志派去的。那时刚开国，全国尚有许多地方未解放，张执一同志是中南[局]统战部长，正需要大批到敌军里面去作策动反正工作的人。问我有这样的人。我[说]没有。纪念鲁迅先生那天，我发言了，报上登出来。过了几天，有一个人来找我，名姜斌，是在桂林认识的，搞些不干不净的生意，又些江湖之类的人，[我]向来不大理他的。碰到了，想起他似乎有什么关系。一谈，他正在搞什么私营航运之类的事，看看要搞不下去了，表示要立功，以后好作干部。问他有什么关系，他说他认识彭孟緝，是台北警备司令。他和他很熟，替彭搞过走私生意的，我把这事反映给张执一同志，他就派我跟他到香港去。到了香港，起初是他和彭通讯，后来谈到要到台湾去，过了许久，彭给他寄入境证来了。大约三四月间才去，到了之后来过信，表示见着了，谈得还好。后来许久未来信。过了两个多月吧，他回来了。他说，因为从武汉出发时，是跟陈嘉庚一路到广州的，一路张扬太大，在香港又停得太久，台湾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了。彭起初招待他，后来看风声不好，就把他押起来，最后用命令驱逐他出境，但其实是放他走，那时候台湾出境比入境更困难。那驱逐令他带在身边，给

我看过。据他说，台湾人人思动，防制极严，个个怕死。如果攻台湾，就很有办法；叫他们自己搞什么却不敢。这事，在他去前回复，都曾向香港一个作对台工作的钱同志汇报过，他们也当面联系过（钱不知名，和《大公报》严广澍同志都是作对台工作的，严知道他），也曾写信给张执一同志。姜斌回港后，非常丧气，功没立成，国内的生意本来是买空卖空性质的，早垮了，还背了一身债，怕回国。就跟他的外甥（一个做海员的）到九龙木屋（贫民窟）去住了。我那时刚进《文汇报》，正忙着，这个人觉得反正无关重要，没有理。他除了有时来要点零用钱外，也很少来。一直到我离开香港，他还在那里。这件事，张执一和那位钱同志可以证明。

忘记了哪一个月进《文汇报》，做到五一年三月回国。在《文汇报》工作时及回国手续，都犯了错误，曾受过党的处分，党委员会有材料。这段时间，张铁生同志可证明。

在《文汇报》后期，介绍了一个邵慎之进去。邵是在桂林《力报》同过事的，是个进步青年。后来搞《新闻日报》（胜利后的一段时间是个不好的报），解放时在青岛，参加民盟。他是民盟关系到香港去的，在找到关系之前碰到我，说起他过去在平江是党员，逃出来后，别的人都死了，找不到关系，也无人证明。问现在有没有较有意义的工作。我问他还认识谁，他说认识严广澍，严比较知道他的历史。我就替他找严广澍同志。严和他谈得很好，叫他不要去找民盟，就做对国民党的工作，公开与国民党的人来往，其中对象之一，现在记得的是姚克。做了一些时，他的生活不能维持，化名投稿的收入常常不够。后来严广澍同志和我商量，让他进《文汇报》。

组织关系,最初以为时间很短的,又系个别活动,未带。进《文汇报》时才把关系调去。

五一年三月回国,直到现在。

五五年六月廿五日

历史补充

(1955年6月26日)

一

关于和康泽的部分还有遗漏：

从万县到武汉，在一个管查鸦片的机关找着他，他给了一百块钱我回上海。临行，问我在上海的生活情况能不能维持，我说勉强可维持。他问每[月]需用多少。我说五六十元。我说不一定，至少有三四十元。他说你留个地址给我，我以后给你每月寄三十元。我把同乡孙铁人的通讯处留给他了。他过了很久，寄过一次六十元。以后未寄。

抗战时在武汉的时期，在那次和他在馆子里谈话之后，曾收到他派人送来的一百元。

二

有一个王镜清，是伪中央党校学生，向来没有来往。四九年到武汉，他来找我，说他解放前在什[么]大学教书，现在正在著什么书，以前发表过什么文章之类。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他是个反革命，二八年作过国民党湖北省委员，我是知道的。但我不知道对这种[人]应该怎么办。我去问潘梓年同志，潘说叫他自己想办法。我告诉他。他说已经想好了，到第一纱厂去当职员，如秘书之类。那边已说好了，只要有一封介绍信，要我写。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不认识也行。我写给他了。但信拿去未生效。后来王镜清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被镇压了。

三

同乡有一个刘辅珩，小时候认识，大革命时代，曾在故乡积极参加工作，后来在武汉当小学教员。落后自然落后，但人还正直，有些正义感的。抗战开始后，我曾在故乡碰见他，他正在活动做区长什么的，打算为地方做点事。故乡沦陷时，他正在当区长，带着地方部队打游击。我的老婆起初就在他们那里。及至我一次到重庆的时候，听见同乡说，他去当汉奸去了。我大吃一惊，仔细一了解，是国民党军队吃他们那个小队伍，他带着队伍去投新四军，新四军把他扣留起来，把队伍也解决了。他后来不知怎么逃出来，国民党又要捉他，逃来逃去，结果做了汉奸。我把这情况反映给周总理，周总理打电报去查问，回电说误会了，并作过检讨。四九年在武汉碰到张执一同志时，他还对我说，那时低估了刘辅珩，造成误会。这件事，刘辅珩本人当然有责任，但我总觉得心里过不去。因为他之投新四军也多少因为我在那里面。因此，五三年，他被捕了。他家里人通知我，我曾写信给张执一同志提起过去那回事，意思是希望切实了解，与一般反革命案应该多少有点不

同。后来刘被放出来了，并参加了工作，不知是不是我写了信的缘故。

四

在桂林的时候，有一个投稿的青年，名李石锋，生活很困难，我接济过他。后来知道他家里很有钱，是自流井人。四七年初，从重庆到他家里去过一次。离开重庆的时候，曾经向他借过部分路费。五四年上半年，他从四川来，希望给他找工作，没有给他找。过了几天，看见北京没有办法，叫我介绍他到重庆文联去做通俗工作。我问他历史上有没有问题，他说早已交代了，到那里当然要材料看。我给他写信给任白戈、邵子南两同志，说明历史他自己负责，并借路费给他回重庆去了。后来听说他的历史果然有问题。再后来不知怎样了。

五五年六月廿六日

历史材料重写

(1955年)

一、胡风问题

胡风是三一年底或三二年初在东京认识的。那时我刚从南京逃出来，想参加革命，周颖说她认识两个搞革命的，一个何定华，一个胡风，可以给我介绍。过了些时，何定华来了，她就介绍。何也谈到胡风，说我既然搞文学，可以找他谈谈。一天何又来，说约好胡风在家里等，我们去看他。我就和何到郊外一个什么地方去看了他。我谈了些过去的经历和在南京出走的情况及想参加革命的志愿等等。他谈了一些什么，不记得了。过了些时，他来找我，说左联要我写点材料，打算吸收我。我写了，过几天交给他了。再过几天，他来说，上海左联说我写的材料不好。我听了很失望，以为不吸收我了。过了些时，不知是来通知我开会还是做什么事，我很奇怪，不是不吸收我吗？他说已经吸收了。在左联开过一两次会，记得有尹康；还有一个什么人不记得了，因为以后没有看见他，也未见他写文

章，何定华也许还记得。据说以前还有卢森堡和别的什么人。怎样提起搞“新兴文化研究会”，一点也不记得了，但总是胡风提起的。大概因为左联人不多，也不容易吸收人，所以搞这么一个会，范围可以广些。但吸收的人也有限，除了原来那几个人，增加的只有周颖、陈建晨、杨玉清三个。陈、杨两人，特别是杨，带着很大的勉强性，敷衍面子似地参加了一两次。这时候，似乎已经在出版油印刊物《文化之光》了。当然也是胡风主动的。第一期名《文化斗争》，大概四五月出版的，因为有谈五四的文章。这刊物主要的是他、我、何的文章，是否还有别人的，不记得了。由周、何、我三人写钢版，何不知从何处拿来一部油印机，由我和周夜晚偷印的。第一期谈五四的文章有他一篇我一篇，我其实并不懂得分析五四，前不久不知在何处看过一篇分析的文章，记着了几个要点，可说完全是“曝”来的。他的似乎和我的意见有些不同，他把两篇反复地看了几次，最后说没有不同才发表。此外还有我一首诗，是写读过胡愈之的莫斯科游记的感想的。出版了之后，社联方面（主要人物名漆宪章、汪孝达）也出版了一个刊物，名字叫什么不记得了，好像是专为批评《文化斗争》而出的，首先是攻击胡风的分析五四的文章，其次也说我的诗不好。什么理由，现在一点也不记得。胡风就主张答辩，于是就一来一往，打笔仗。忘记了打了几次。那方面来信说派人来和我们谈。约会谈过。那方面是汪孝达，这方面是我和何。谈得无结果。谈的些什么，为什么无结果，现在都不记得了；何定华情况熟悉，我原是听他的。刊物出了两期，因为日本警察已知道了，不能继续出下去，就改名出。被警察发现的事有何根据，我也不知道。改名出了一

期或两期，就停止了。刊物的群众反映不好，理由就是打笔仗，革命力量自己不统一。为了这事，胡风曾回上海过一次，后来好像还派楼适夷到东京去过一次，也似乎并未解决。

三三年三月，我和周颖被捕，关在早稻田拘留所。关了一个星期，周颖被放出来了，因为她是女的，优待她。大概是周颖或她的朋友去看我，听她们说，才知道同时被捕了許多人，胡、何、王达夫（他是后到东京的，也参加新兴文化研究会，和胡、何很熟，我以前不认识）以及社联方面的人更多。关了一个月以后才问，大约问了三四次，起初是问经历，后一两次才是关于东京的事。我到东京不久，不懂日本话，不出去活动，知道的事情很少，认识的人也很少。警察也知道这一点，问的多是胡、何何时到我这里来的事，很简单。关了三个月，和大家一道被押送回国了。

在上海三年，起初是左联关系，他来领导，我编《动向》，他来发表意见，我有什么问题须向组织反映的也是向他说。我和他、周扬、韩起、杨潮、叶紫、吴奚如、周钢鸣、任白戈等都开过会，有的是小组，有的是理论组。有个时期，我跑光华大学的小组关系，周而复、田间、蒋弼、苏灵扬等。都是他来通知的。但他在左联担任什么职务、什么时候撤销了，这些事都不知道。恐怕这中间有他已经撤销了职务，他还在领导我的事也说不定。从《动向》请客的时候起，他就说穆木天不满意我，后来又说穆造他的谣，说穆的被捕是他告密的等等。大概从撤销职务起，他不时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对，主要的是集中在田汉、周扬同志，说他们对鲁迅的态度不好。而田汉有时刺鲁迅一下之类，鲁迅自己也常表不满，也是事实。左联内部情形、文坛

的情形我也知道得很少，接近的人不多，也无法分辨他的话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三五年初，以鲁迅为首，和他、萧军、萧红、周文等人办了一个刊物：《海燕》。由我跑印刷校对之类的事。这刊物出了两期，因发行人住址问题，内部则因萧军不满意他的问题而停刊了。萧军为什么不满意他，记不得了。他以后也常说萧军的坏话，说鲁迅很不满萧，想写文章骂萧。但说过这话之后，鲁迅发表过一篇《三月的租界》，是帮萧的，不知什么道理。这类的琐事不必写下去了吧。

“八一三”之后，我先到汉口，他后去。碰见之后，他说要在汉出版《七月》，要我写稿。我写了《人与鲁迅》、《母亲们》、《游吕菊芬》等几篇文章。不久我就和艾青、田间、二萧（指萧军、萧红——编者注）、端木等人到临汾、西安等处去跑了一通。回来又在《七月》上发表了《延安的虱子》、《寂寞的故乡》、《怀南京》等几篇文章，随后我就到新四军去了。在里面接到过他的一封信，说我的故乡被炸，周颖母女下落不明。忘记了接到另外的信没有。也忘记了我给过他什么信——照理我应该回信给他，请他打听周颖消息。三九年从新四军出来，在金华曾给他信，请他问周总理调我是为什么，因为不便和总理通讯。他回信说是他请调的，调我出来编《七月》大众版。我寄给他一篇稿子《夜戏》。

四一年我到重庆，正是他要到香港去的时候，他要我接着编《七月》。但他因为怕在路上发生问题，不敢告诉书店他到香港我继续编的事，甚至到了香港也不写信来把问题讲清楚，以致我无凭证向书店交涉。那时是重庆“五三”、“五四”大轰

炸，书店不知搬到什么乡下去了，街上店铺也都关了门，也无法交涉。再，他的那些作者我一个不认识，他一个也未介绍，又都四散地住在乡下，不容易找，找不到一个人商量。我自己又正在闹家庭问题，烦恼之极，想回桂林去，没有给他编，以致国民党借口过期，把登记证吊销了。其实如果知道编的人是我不是他，也会吊销的。因为这件事，他对我长期地怀恨。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从香港回桂林，我也在桂林。我跟远方书店编了两期《山水文丛》，拉了他的稿子，有一集是以他的文章为书名的：《死人复活的时候》。他曾经打算出个刊物，好像要在张煌的出版社出版，记不清楚。拉我写稿，但刊物未出成，也不知何故。他又曾和茅盾、巴金等搞个《抗战文学大系》之类，找我去负责杂文部分，虽然是大家找的，我以为是他推荐的，但这事也未搞成。后来他到重庆去了，我和骆宾基替远方书店编了两期《文学报》，主要是骆搞的，找他供给稿子，他写了一篇《为祖国为人生》的发刊词，我心里动了一下：怎么为人生？但未穷追下去，用了。他似乎还供给过别人的稿子，记不清楚。

四四年我在重庆搞一个小刊物《艺文志》，找他写稿，他说我晓得你的刊物是什么性质、立场？怎能写稿呢？翻脸不认人的样子。我跟他吵了一架。其实他也正在准备搞《希望》，前不久还曾叫我写稿子。以这件事为基础，加上他剥削伍禾到不近人情的程度，再加上些别的什么小事，正好骆宾基也很讨厌他，我们就约好不理他。大概是四五年上半年，《希望》创刊号出版的时候，我就和他不讲话，不来往，一直到四九年开文代会的时候，一共四年多。当然，这不是说和他在思想上已经划

清界限了。

五二年我住到文学出版社来了之后，他到北京来住在文化部的時候，隔几天总来找我聊聊，或者一块儿吃吃喝喝。意见不同时就抬抬小杠，我觉得他一向那种居高临下、瞧不起人的气氛少了好多，感情上比以前少了一些别扭。这里面除了我在调查施耐庵材料时，接到他谈我们夫妇问题的两封信，我也回过他一封信以外，没有文字来往。

五三年下半年他搬到北京来住了许久之后，我因为离婚之后，矛盾很多，想找人谈谈周颖，才到他家里去。一直到他在文、作主席团扩大联会上发言前几天，一年光景，我到 he 家里去过十几次。一次是去询问他和庄涵的关系，一次是同何剑重、舒芜一道，他骂舒芜混蛋，把舒芜赶出来，我同何也一道出来了。有时我同别人一道，如萧军、骆宾基、伍禾都各有一次。到那里去，都是闲聊，他本来喜欢臧否人物，我也一向随便说话，这里面倒有相投的地方，一点也不懂里面有什么政治问题。他说雪峰怕事不敢说真话，任叔的能力于外交界肯放他走可见，我都以为他说的有客观真实性，而不懂得是恶意的挑拨。有一次他说，现在只有老聂敢和我来往。现在想起来，应当是有作用的。一次开过宪法座谈会后，我和他到他家里，他对梅志说：老聂现在有工作权休息权了（因宪法上有条文）。当时我只当开玩笑。现在想起来，这是说我有，他们没有，是不是什么心理的流露呢？一次他谈文艺界的情况，如“五把刀子”部分的举例之类，我觉得不满得有点过分了，不免有点警觉，因问他对于整个政治的看法，他满口肯定，一致赞颂，我又没有疑心了。

和他这几年的来往，整个都错，最错的是把高饶事件的机密泄漏给他了。把他看成一个朋友，把朋友看得和政治一样重要，玩忽政治，不知死活，什么都不在乎，谈高兴了什么都谈。我一辈子犯过几次这种错误，不过这回最严重罢了。至于是不是和他有政治关系，我已经坚决地明确地表示过：没有。第一，我原只知道他思想上有问题，也没有以为思想整个是反动的，明白这一点，是看了他的《意见》并仔细研究了之后，更不知道他是政治的反革命。第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正式的政治组织，我没有看见他的全部材料；我倒希望他是有的，这可以在我和他的关系和政治关系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因为从他口里，从一切有关材料里，一定可证明那个里面没有我。第三，我也泄密给舒芜了，这有什么政治关系呢？哦，我现在什么都觉得难说，要是舒芜也有什么问题，我就更跳在黄河洗不清了！

二、康泽问题

康泽是留苏同学，在莫斯科没有讲过话。在回国的船上才开始讲话。讲话之后，对我表示很钦佩。但我跟他的意见不同：他崇拜戴季陶，我刚好反对。到南京后，他先进伪党校去作训育员，我后进去，相差一个月光景。他常和[我]接近，凡有关文字的事就找我帮忙。这是二七年下半年的事。二八年上半年，我离开伪党校，到伪中央社。几个月之后，他也离开了，到伪中央训练部当干事，和我住在一个宿舍，大约三个月到半年光景。每天晚上差不多都要聊几句天才睡。他那时也

有些反蒋情绪,但也反对共产党。我认为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没有什么可比的。他说那就需要真正的共产党,现在这种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则是应该消灭的。后来他离开那里了,似乎有一个时期不见。大约一年左右,他给蒋当侍从参谋去了。蒋到伪中央党部去开会,他常在一路,当在外面等散会的时候,有时来找[我]聊聊。

三一年“九一八”之后,我因搞反日运动,弄得从南京逃出来。他似乎也已作旁的什么官去了。三三年六七月,我从日本回上海,曾接到他一封信,叫我到南昌去。我回信说,希特勒的书我没有看懂,所以我不能来。三五年,他在川任伪参谋团政训处长。党要我打进他的范围里去。我把这关系向党讲清楚,认为不很容易。党认为不妨试试,打不进去就回来。我因为有那么一封露骨的信给他,不好再和他通讯,尤其是说要到他那里去做事,就找另一同学也在伪党校同事的唐健飞(当时伪实业部司长),叫他写信去问我可不可以到四川去做事。回信说可以。我就到成都去找他,在他家里住了个把礼拜,谈过两回话。第一次,他说他不是完全不了解我的近况,有些文章他也看过一下,要安插我,不好轻率从事,让他考虑下子。因为时间太晚,没有再谈下去。我认为他已经知道我的来意,关门很紧,戒备森严,即使打得进去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便不想进攻了。党本来说是试探性质,只说到位置高低不要计较。其实,如果我有斗争经验,会考虑这种问题,不图短期收效,做特务在所不惜,那还是可以打进去的。这一层,党也没有跟我说,我也没有想到。第二次谈话,他叫我住在他那里,专门用功读书,一切由他供应,把读了的书对他讲讲。其实现在回

想,这也是很好的条件,只要答应下来,就算过了打进去的第一关,并可由此而接近他,取得他的信任。但当时只认为他不信任,既不信任,以后的事就无法做。表示不愿累他私人,没有答应。这时候,他就叫我搬到外面住。住了几天,他叫人找我去,说他要飞重庆转武汉,我如回上海,可坐他的小汽车到重庆找他,他给我办路上的手续。这样我就和他的保镖和参谋副官之类,一共四人坐小车到重庆。到了重庆,他叫我随他的一个驻在万县的大队长曹勛到万县,再由万县到武汉找他,他给我办由武汉到上海的手续。到了武汉,他给我到上海的路费,临别并问我在上海的生活情况,说以后要给我按月寄卅元,以后也真寄过一次六十元。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我随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由上海到内地去。到了南京,全队约二十来人没有路费到汉口。马彦祥、宋之的、陈凝秋等和我开队伍会议,他们知道我和康泽有关系,打听他在南京,叫我去找他捐钱。找到了,他一面写条子,一面摇头,捐了二百元。作了路费。

三八年,我由临汾回武汉,他叫人找我。我去见他,他请我到馆子里去喝酒,说他恐怕有机会当民族英雄,如果那样,希望我写篇文章纪念他。过了几天,他派人送一百元给我。又过了些时,我在书店看见一部《说文诂林》,想买无钱,就去找他,叫他买了送给我。他答应叫人去买。过了两三天,估计他已买好了,就去他那里拿回来了。

四四年在重庆,周颖从北温泉慈幼院来,说有事要找他,叫我陪她去。我们到他门口,他正要出门,约我们第二天到他家吃午饭。我们第二天去了,我曾对他谈,劝他不要当特务头

子,如《记康泽》里所记的。以后再没有找他。

这个关系,党派我去的事吴奚如可证明;找他捐钱,马彦祥、宋之的可证明;在重庆找他,周颖可证明。汉口一段,无人证明,只有他自己和我以前写的文章作证明。

三、谷正纲问题

三九年我从新四军到金华,正碰着《东南战线》被禁。《东南战线》的骆耕漠、邵荃麟谈这问题的时候,我也在座,才知道主张禁止的是谷正纲,主权也在他手里。我说我认识他,从前在伪党校当训育员的时候,他是副主任。他们就叫我去找他说情,看可不可挽回,并问禁止是什么理由。他如指出哪些不对,我们以后就不那样做。于是我就同荃麟同志到方岩去找他,到了方岩,荃麟在旅馆里,我到他那里去。见着了。提起《东南战线》,他就不高兴,说那是共产党的刊物,根本谈不上哪些对哪些不对,总之不能出版。我问何以见得一定是共产党的刊物,他说连陈毅的文章都有。我说以后不登某些人的文章,你认为哪之类的话不对,以后也不说行不行?他说也不行。正说时,他的司机催他上金华,他就叫我同他坐车到金华。到了金华,我就下车,他说他晚上要到上饶去。我回到《东南战线》,晚上荃麟同志也回来了,一同谈这件事。骆说,我们另出一个刊物,叫我再去找他,只要他允许登记。编辑人是我,刊名《文化战士》,当时都决定了。第二天我到上饶去找他,提起我要编个刊物,跟《东南战线》的态度不一样,可不可以登记。他说你编也一样,还不是共产党刊物。共产党就是这

样,无孔不入,什么关系都利用。我说我不是共产党,不过在新四军呆过,其实《东南战线》也不一定是共产党,不过大家有点左倾。他说你若不是共产党,你就到上饶来。我说来做什么呢?他说来住着再说,生活我负责。我说我还没有到生活都要你负责的程度,到了那时再说吧,现在还可以办刊物,让我办得试试,办出来,你看还是共产党的再禁也不迟。他说在哪家书店。我说生活。他说不行,生活就是共产党的。我说总要个书店办这事的,别的书店不肯有什么办法呢?他说不要生活发行,不登公开拥护共产党的文章,只谈抗战,你去办试试。我说登记问题?他说没有什么登记问题,你去对审查处说我准许出的就行了。我叫他写封信为凭。他说没有这种办法,你去说了,他会来问的。又说要记住不能乱来。不好好地,下次就不见面了。又笑着说,什么人都好缠,就是共产党难缠。这样,我回金华出版了《文化战士》,编辑发行都由我,生活总经售。但出了两期还是禁止了。(现在想起,第二期第一篇文章是我写的骂汪精卫的,谷曾是汪派,[第]三战区曾禁止开反汪大会。刊物禁止大概是这理由。)骆、邵又叫我到上饶去找他,我又去过,他到重庆去了。在传达室留下话:有一个留俄学生,从新四军来的,自称是谷主任的同学,叫他再不要来,云云。

这件事,荃麟同志可全部证明。

四、张道藩问题

四三年底或四四年初,我到重庆不久,在雪峰同志处碰见韩侍桁(我和他是在重庆认识的,不熟),不知怎么谈起,他说

我没有一点收入,应该想点办法。张道藩那里有个什么刊物的特约撰述名义,是专门为几个外面来的作家而设,不要写稿,每月两千块钱,茅盾、雪峰、以群、胡风等都有一份,何不去进行试试?他说他可以去替我问问。又问我认不认识王进珊,王可以向张道藩去讲。恰巧我认识,他就把王的住处告诉我,叫我去找王。这件事很合乎我:白拿钱,又不是他里面的正式什么,又是跟茅盾他们一起。我以为韩会替我进行,但过了许久没有消息,当然他不过一时高兴说说,并没有真去进行。我想王进珊从前很熟,他是伪党校学生,因为爱好一点文艺之类,和我相当接近,何不自己去找找?我就去找,不在家,留下地址给他了。过了几天,王来找我,我跟他谈这件事。他说,照他看,这件事很容易,因为是专为你们这种作家而设,没有人会争。他愿意去向张谈。又过了些时,他来说张答应了,不过要请你去见见面。我就同他到文化运动委员会见张,张和我接谈,谈的一些普通应酬话。后来他问我过去是不是国民党。我说是,不过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因为不会搞政治才改行的。他说我在党外也流浪了多年了。好像要我重新入党,但未直说。我说这么件事还有条件的?这倒没有准备,那就不谈它吧。他连忙说没有条件,不过偶然记起我过去像是党员。那些事以后再谈。说到这里,他喊李辰冬来介绍了,并说我答应给他们写稿,请我作特约撰述。然后叫我写个收件地址给李,李又给了一本他们的刊物(什么名字不记得)。这样就出来了。以后在苏联大使馆什么鸡尾酒会上看见他一次,他请特约撰述,和大家一起去过一次。钱是寄给周颖的,大约到四四年底就停止了。

这件事，韩侍桁可证明提起的事，王进珊可证明进行经过，雪峰同志可证明一同去吃过一顿饭，周颖可证明收到钱。

五、曾养甫问题

四一年二三月，新四军遭国民党袭击之后，全国形势突显紧张，桂林文化界有些人到香港去了。我也觉得应该换个地方，到香港或重庆去。但一则没有路费，二则怕路上出问题。这时曾养甫不知因什么事过桂林，也不知怎样和《力报》老板张稚琴接上头了，张引他到编辑部参观，并召编辑部同人和他见面，坐了一会儿。看样子，张似乎在拉曾作《力报》的经济后台。过了一两天，张对我说，曾想请我去当他的私人秘书，并且怂恿我去。我从来没有想当什么人的私人秘书，要是肯做这样的事，在国民党何处不可以混，还在《力报》这种小报纸编副刊？但我也常有一种不纯洁的心理，想利用人家一下，占人家一点小便宜之类，这正是我吃大亏的地方。我想，答应去，则到重庆的交通工具、路费、安全问题都可解决。到了重庆，不去，他不见得把我有办法，反正不图下回。这样就到曾的旅馆去见过一次。张告诉他我答应去。他表示高兴，但没有正式谈做私人秘书之类，一直到后来，也没有直接谈这句话。他就对张说叫我跟一个姓刘名炎的坐柴油车去。

到了重庆，车是一直开到他家的。见着他，他叫我先去看看老婆孩子，过些时再来。我出来，大概很快就见着周总理，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赞成我去，并给我分析曾的为人和关系等等，说他是草包，容易对付，对人也能信任等等。我问对我

们有没有什么用处，他说对组织没有什么用处。这样我就决定不去。再去见曾，想跟他谈去不去的问题，恰巧那天是苏日协定公布的日子，他拿报给我看，说苏联是帝国主义。我说苏联不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含义是什么等等。他说我是共产党意见。我说凡是正确一点的意见就认为是共产党，那就很难办事的。看来你那边的事不很容易做，我想还是不去的好，免得将来发生问题。他向我道歉，叫我不要介意，他并不是说我是共产党。这样我就出来了。以后他叫人来找我，我也没有去，也没有看见来找的人。

关于在桂林的那一段，荃麟或葛琴同志都可以证明。在重庆的一段，周总理、徐冰同志当可证明。我没有去，当时文协的人还传为笑谈。说人家把汽车开到门口，找我去做事，找不到我的人。

六、从重庆到香港的经过

这一段经过必须先叙一件完全与政治无关的事，才比较容易了解。

从四六年下半年开始，我和杲向真这位女同志（现在国棉二厂）闹男女关系，彼此有夫有妻，当然感情纠纷和人事纠纷闹了许久。四七年九十月间，我实在重庆呆不下去了，一方面特务报纸《新华时报》造了许多谣，另一方面西南学院也被迫停办，我没有职业了。但是还舍不得分手，幻想找一个没有什么熟人、没有人干涉的地方去过一些时。分手的时候，约定如有法在什么地方生活，她就会来。

到了武汉，住在以同乡郭曙南为经理的“天南公司”（运输行），同乡刘辅珩在里面当出纳，曾昶陔当文牍。郭原在重庆伪市府当科长，是小学同学。刘、曾在抗战初期都在汉口七小，武汉沦陷前回故乡，日寇来时，就在乡下搞游击，周颖还在里面过过。后来刘去投新四军，发生误会，就逃到城里参加伪组织去了。这回才又碰见。我本打算在武汉只作短时间停留，香港虽不愿去（因为和杲的关系无法继续且羞于见周颖和别的同志）也只好去。但刘、曹谈起故乡情况，说我原以为炸掉了的房子还在。我原想搞一点钱到什么地方去和杲过生活，就动念去卖房子。他们说故乡的房子差不多炸光了，少得很，一定容易卖。这时候是曹勛在当县长。曹是小时同学，又在黄埔同队，一向对我很好。三五年我从重庆回上海时，康泽叫我和他一同到万县，他曾在万县公园和我谈过一些心曲，表示愿意革命，但因自己是叛徒，党已不要他。不过他将来如果较有力量，还是要革命的。抗战期间，他不知在故乡干什么（周颖知道），也不知为什么和新四军谈判，他曾提出找我来解决（我听周颖说的）。周颖因为带着孩子在乡下拖不下去，要到大后方去，也曾得到他的帮助。有这些历史情况，我认为我回故乡卖房子，正因为他在做县长，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同曾昶陔一同回去。到了故乡，和曾都住在曾的妹夫王书田家里，王以前不认识。在故乡看见过曹勛、伪县府秘书蔡治人、副秘书长汪镜秋、伪县党部许作宾，以及当时在城里开乡议会的乡下的小时同学陈绍平、王楷三等等，都没有作过什么深切的谈话。曹勛曾约我到他那里去玩，好像有什么话谈，我看他没有什么觉悟，比在万县时还差，没有和他谈下去，就走了。房子差不多

二十来天才卖掉,卖掉之后我就走了。

到武汉后,接到杲的信,说同丈夫到成都《西方日报》去了(她原来在红十字医院当护士)。我看见信后又痛苦又气愤,她原说要坚决离婚的。这时我有了点钱,就乘飞机到重庆,赶到成都。到了成都,她就跟我转到重庆。到了重庆临上船东下时她又坚决要回成都。我以为这样分手就完了,及至我到武汉,又接到她的信,还是要出来,不过有病进了医院。我一面写信给她,劝她出来,说等她出医院;一面又觉得“天南公[司]”来往的人太杂,怕出问题,想起胡建文在长沙,可以到他那里去过些时。如果他有钱,搞一点钱,和自己卖了房子的钱合起来到上海去搞出版社,如果[杲]不来就到香港去搞。胡是留苏同学,在南京时曾整天骂自己、骂小资产阶级不敢革命。这对我曾有过很多启发,我在南京搞反日活动是受了他的影响的。抗战时他在盐务方面搞工作,好像是在三台当硝磺局长,胜利前后在重庆碰见过。我认为在混小官的人中间,他还算有点头脑的。他这时在湖南伪建设厅任副主任秘书。厅长是李毓九。李也是留苏同学,以前并不很熟。在莫斯科时他常喊我托尔斯泰,三五年在成都时请我吃过一顿饭,此后毫无来往,已十多年不见了。

到了长沙胡家,一谈起,他说他没有钱,穷得很。并说李有钱,不过很小气,但对我有好印象,说不定肯拿出来。我不愿找李。胡说找不找他搞钱没有关系,来了见见他无妨。后来胡就对李讲我到了。不知是他来找我还是我去找他(这点记不清了),见了面。过了几天,段梦晖来找我,大概是胡碰见了告诉的。他是湖南《中央日报》社长。当我在南京《新京日报》编副

刊时，段是《新京日报》总编辑。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在南京发表停止一切内战、联苏联共联工农共同抗日的文章，就是在那副刊上。他是很同情我的搞法的。抗战期间在桂林碰到过他，我最后离开桂林，没有证件，是带着他的证章到重庆的。这回是他来找我，和我到江边去看了一回雪景，他并指给我看，说红军从前攻长沙时到过什么地方。过了几天，李请我，也请他。李提起说和他共同把我留在长沙，他也同意了，并说他的力量很小，只能有两百万。又说湖南《中央日报》和南京的没有关系，叫我不要怕。后来李说给我进行经济委员的名义，不要办公开会。再过些时说已经发表了。不知怎么谈起湖南大学，李想起说，可以到湖南大学去教书。我说我跟湖大校长黎锦熙不对，他反对新文字，我们打过笔墨官司的。李说那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去教新文字。我跟你去进行。我实在谈不上和李有什么关系，很奇怪他为什么这么卖力。我看他是个官僚，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性。

这时候，呆来的事已经绝望了，经济委员是伪省府下的（不是厅的），我怕张搞得太大出问题，卖房子的一部分钱也快到期了，我不愿再留在长沙，就借口到武汉去过新年，走掉了。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

长沙这一段，现在只有胡建文（现在矿业学院）可以证明，因为从头到尾都住在他家。其次是段梦晖，现在不知在武汉还是长沙。

回武汉后，过了年，卖房子的一部分钱还没有来。湖北伪省党部委员陈良屏（同乡，在上海时，他在伪市府当科员或办事员，曾和我在一块儿住过）来跟我说，再住下去，会发生危

险，叫我赶快到香港去。他那时要替程潜到广州去活动伪选，就带强迫性地拉我和他一同走了。

我走之后，汉口“天南公司”的郭、刘、曾及其他（我知道得不清楚）京山人约十来个，一齐被捕，因为我在那里住过的缘故。关了一些时候，才花钱买出来。

这一段经历，杲向真（党员）、张先畴（党员，中宣部）、胡建文、段梦晖、郭曙南、刘辅珩、陈良屏（汾阳中学）各可证明一部分。

七、姜斌问题

四〇年下半年在桂林《力报》编副刊时，认识伪军校第六分校教官冯济华。是以同乡关系来找的。认识之后，他介绍认识他们的政治部主任张某，都是在报馆认识的。那时他们正在和《力报》老板张稚琴商谈顶买《力报》事，希望我帮忙，请我到他们学校里去玩过一次。冯济华说他们学校想请我去当教官，这是说报纸交易如果弄成了的话。但我若愿意，成不成都无所谓。我说我是弄文学的，不懂军事政治且性不惯拘束，不能去。他说并不要真去上课，有时去讲讲话就行。我说连那样的话也不会讲。我问他为什么想起这事，他说也不止对我一人，同时请张老板和总编辑欧阳敏讷去做什么。其实这话也从张老板那里风闻过一下，以为报纸买卖事不干己，没有留意。过了些时，冯来，说要发表了，我的可先发表。我一惊。一面叫不要发表，一面找张老板谈。他也正为这事踌躇。他以为报卖了还可以交给他办，现在看来，人家发表三个名义就是首先要

拿这个位子。我就劝他不要卖，要卖也要卖给一个比较开明的关系。报没有卖成，自然三个人的名义也没有搞成。以后，有时在街上碰见冯，有时他也来找我聊天。忘记过了多久，又因冯而认识姜斌，但最初的印象记不起了。姜也是湖北人，搞生意（运输之类），搞青红帮，与军政党界无关。这样认识之后，也不过有时在街上碰见，有时一同上上茶馆，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前后不过几个月，四一年三月左右，我上重庆去了。

这年七八月，我又从重庆回桂林。起初也碰见过冯，后来就不大看见了。姜斌也不大看见，但还是看见过的，因为他曾问我认不认识吕国桢（珍？）。我不认识。他说也是湖北人，前几天来过桂林，他曾给他介绍女朋友。这是我后来想起找他到台湾去的张本。

一直到四二年某月，我已经快离开《力报》了，管子芳到报馆找我。我问他怎知道我的地方，他说是冯告诉他的。管是我在参加革命以前在南京见过一面的，怎样看见的忘记了。抗战初期，因为到一个叫竟陵栈的客栈找别的同乡，碰见他一两次，可说与他毫无关系。这回他来，请我到 he 家里去玩，他家离编辑部很近。我同报馆一个姓刘的去过一次。后来他把他带来的一个女的引到报馆找老板娘打牌，又来过一两次。不久我就离开《力报》了，住在和原地相反的方向，没有和他来往。一次他到我住的地方来，要借一千块钱，我借给他了。过了些时，我找他还钱，去过两次，他都没有还。以后好像就离开桂林了。

就在这时候，冯来找我，说黄潮来了，请我到旅馆去玩。这人也是在南京看见过的，不熟。他的老婆是我的同乡，他是沔阳人。我觉得去去也没有什么关系，就去了。闲聊的时候，他

说请我介绍几个文化人，他请客。我替他请了几个人。过了两天，他走了。

四三年大概上半年，我离开了桂林。

从这时起，到四九年十月下旬止，共六年多时间，不知他们在哪里。绝未见面或通讯。

这样一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在我这面看，就是同乡关系，一般社会关系，毫无政治意义。

实际情况也许不同，可能他们都是特务，我被特务做了工作，包围了。例如冯，或者早就以我为对象，或者因破坏了《力报》顶卖的事因而恨我，以我为对象，而我姜做帮手，也是很合理的。但即使现在回顾过去，也很[难]说有一定的特务痕迹。当然，我的政治警觉是很低的。至于管、黄，也许都是特务，但都不在桂林工作，管大概是为一个女的到桂林来躲避什么的，黄大概是借会李济深为名到都市上来玩一阵。

这个关系的直接证人，现在是很难找到了。《力报》买卖事，不知葛琴还记不记得，她那时还在《力报》，并看见过冯。伪军分校要发表三个名义的对象之一的欧阳敏讷，现在也许在湖南什么机关。石联星那时和我很接近或者应说亲密，她也认识姜、冯，虽然不一定能证明什么。此外，从表面上看我有什么不正当的政治行为，反对进步，拥护反动，破坏或压制进步运动的行为言论，我想，除葛琴、联星外，荃麟、夏衍、孟超、秦似、伍禾、骆宾基等，都是党员，那时都在桂林，应可证明。

四九年十月，我从北京到武汉。姜斌在汉口作航运生意，听说我到了，来看我，请我吃了一顿饭。那时我听说需要一批

和国民党军队有关系的人过去做策反工作，我就找了几个，人家都不愿去。后来想到姜斌似乎说过认识一个吕国楨，现在台湾任什么军官，他或者可以到台湾去。找他来谈，他说他不但认识吕，还认识彭孟緝，是台北警备司令，关系还较与吕为深，曾和他共同搞过走私生意，他去做这工作有点把握。这样，我就写信去问张执一同志，该怎么办？写信的时候忽然想起，文艺学院事，潘梓年同志正说未酝酿好，还有问题。香港那地方我比较熟，何不和姜斌一同到香港去？他去台湾，我在香港和他联系，比别人联系或者会方便一些。过些时回来，文艺学院的事大概也酝酿好了。我把这意思写给张执一同志，他同意。临行，张执一同志叫一个同志和我谈谈，谈话的要点，有两点还记得。一，是以后和他联系；二，是到广州某处找孟超同志谈一下。其他的不记得了。后来把这位同志的姓名也忘记了。到广州后找孟超同志，在招待所一打听，他已离开那地方了。到了香港，姜就和彭孟緝通讯，第一封说他从内地到港了，想在港找生路。第二封说他在和人家开馆子（那时他真在和人家酝酿开馆子）。第三封说他要到台湾去。不久，彭给他寄入境证来了，大概距到港一个多月光景。但他没有马上去。一面和他的外甥——一个参加海员工会、在轮船上当工人、这时失业了的人，名字忘记了——介绍的几个人开馆子，一面派他的外甥到武汉他的“长江航运局”去搞钱。跟他开馆子的都不是什么有钱的人，自己出钱，自己当厨房、管账，当堂官，整天守在那里的小商人，上海方面的人多，其中一个，后来到“大新公司”当店员去了。馆子一个月就垮了，外甥回去一个钱没搞到，他想碰到什么逃亡分子有钱的搞生意，七搞八

搞，拖到三四月才去（海南岛解放前不久）。

在这期间，中南区那位同志（现在忘记姓名了的）带信来给我，叫我回武汉，我因为这件事还未开始，没有回去。另外就是有一个在武汉新认识的国民党军官陈义明逃到香港去了，三四个人一路，找到了姜斌，表示也要到台湾去。姜来找我。我向张铁生同志反映，张派一个姓钱的同志来找我谈，我介绍陈义明和他谈。谈的内容是他们愿意到台湾去做策反工作，要我们供给路费。但态度则是敲竹杠，要挟，因为他们知道姜斌要到台湾去找谁这件事——在武汉我因为要找人做这种工作才认识的。钱同志表示这种工作在自愿，只能补助一点路费。谈过几次。结果怎样，我不知道，大概是补助了他们的路费。还有一件事是在桂林见过的那管子芳也逃到香港来了，他找我介绍一个姓卢的少年回国考武大，我跟他写了介绍信。

姜斌到台后，曾来过两次信。说他见到过什么人，情况还好。一些空泛的话。我也回过他一次信，也只能写几句空泛的话。这时候才有点觉得如果事情成功，如何联系？但只想到这里为止，并没有开动脑筋想办法。大约六月中旬，姜从台回港了。据他说，因为那边已经有人知道他去的用意，有些风声，彭孟缉用驱逐出境的办法把他送回香港了。驱逐令我看见过，在他身边。他说彭有意反正，如果攻台湾的话，可以起义。但要他们自己搞什么，则因为牵制太严，没有可能。又说吕国祯也见过，胆小，不敢谈什么。我叫他写报告，他写过一次，很空泛；退给他了，叫他重写，还是很空泛。我认为他不会写，也就算了。他去台前后，都和那位钱同志谈过话。钱同志可能看过他的证件——入境证、驱逐令之类；至少看过他的报告，这一

点还记得，因为他也说写得不好。我问姜是否回国，他说国内他的什么都完了，欠了一身债，回国要坐牢，不愿回国。我也因为要进文汇报，反正不能即时同他回国，就随他去了。不久，他就和他的外甥住到贫民窟里去了。我进了文汇报之后，张执一同志来电叫我和他回国。我回信说我的关系已调到华南来了，在文汇报工作。当然也谈到姜斌的事，没有谈他回国与否。张回信说，不知我的关系调了，没有谈姜。

另一件事，桂林认识的冯济华也逃到港了，到《文汇报》找我。我因为一位做公安工作的林务农同志曾对我说要找这之类的人写材料，我介绍他和林见面，写过两三次材料。林说他觉悟不高，后来没有要他写了。

姜斌问题的全部经过大致如此。

我的问题的症结大概也在于此。

其初我总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和反革命字样发生关系。雪峰同志一再说我的问题严重，甚至说到逮捕字样，越说我越不明白，我究竟做了什么呢！现在明白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是从这个问题闹起来的。

首先，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写材料写到这里以前，完全没有想到。以为这样的事，本来是某种人干的，本来不能期其必成，那种人本来回不回来无所谓，也本来包括他不回来的成分的。没有想到这样的事尽管如此，我一参加在内，一不小心，对于我就会很严重，使我处于一个极端嫌疑的境地。只要稍为想到一点，事情也不会这样。

其次，我如果是个会做工作、有经验、规规矩矩、一板一眼的工作者，这事也不会变得严重。不幸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实际

斗争，根本不知道工作怎么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完全没有组织纪律观念，加以被胜利冲昏头脑，得意忘形，以为张执一同志和我很熟，不会对我不了解，于是工作情况一点也没有汇报，连后来在武汉看见他了本来打算汇报一下的，也看见没有提起，以为可以不提，也没有提。组织完全不了解这事的过程，管这事的人不能不惊奇，党内竟有这样的工作者！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留心一查，其实也不必留心，这儿那儿看出我和国民党有些不易理解的关系，特别是我的故乡一些被镇压的反革命，他们不免都要加油加醋地扳扯我一下，以为可以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这样一来，就恍然大悟，原来是个反革命，那就什么都可以理解了。我的问题，我以为是这样引起来的。

我的行为是与党不相容的。岂但与我党不相容，也与任何什么都不相容。但这是今天回过头去看的理解，当我从那头走来的时候，我并不是这样感到的，否则也不会有这种行为了。它和我的其他的行为却不是怎么不相容的，我其他许多行为，也一样不能为组织纪律所许。和国民党的来往不用说，就党内关系谈吧，四九年党本来派我到出版总署工作，我因为怕坐办公厅，怕做行政工作，就写了一封信给胡愈之同志，不去了。从香港回来，香港组织本来说叫我还回去一次，我也答应了。但我想，一切事都已完毕，还回去做什么呢？没有回去。后来香港组织反映回国，说我欺骗组织，我才知道我犯了这么大罪。我到北京来也不是事先经过组织同意的。进了文学出版社之后，关系许久调不来，后来才明白，谁也不知我的关系在什么地方。如是等等联系起来看，它也并非没有规律可寻，不过这回闯的祸特别大罢了。

补充材料

(1955年7月20日)

反省了许多天,最近才反省出一点道理来了,我发现我才是真正的胡风分子,比任何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一些。我有讨厌他的一面,有不愿给他工作的一面,我不认识《希望》时代的那些人,有几年不来往不讲话,写过文章骂他,这些都是事实,但比之于我是真正的胡风分子来,都是小事。我整个的文学活动,几乎都和胡风分不开(不是说胡风和我分不开)。首先认识的左翼文人就是胡风;在上海左联时代,来领导的主要的也是胡风;和我来往的一些人,如吴奚如、周文、宋之的、田间、孟十还、雪苇等等,也都和胡风有来往;和鲁迅先生的关系,主要地也是通过胡风;办刊物在一块儿;喊口号在一块儿;写文章了先给他看,听取他的意见修改;大小事都找他商量。夫妇吵架也找他调解;他写的文章总是认为是对的(多数场合其实未看或未看懂,他和周扬同志打笔墨官司的文章,到现在还未看懂);如是等等,继续了很多年。我是盲目地崇拜胡风,是胡风的精神上的俘虏。在二十多年中,我一定散布了许多胡风的影响;没有一个时期,真正在精神上可以完全除开胡风的,包括和他不讲话的那几年。我似乎并未走进文坛,走进的

只是胡风派，额角上似乎雕得有“胡风派”三个字。在文坛里面，在我所熟识的同志中间，我热爱过雪峰（主要的是出《乡风与市风》那一段时间）、丁玲（主要的是出《我在霞村的时候》那一段）的文章，从荃麟那里感到过同志间的感情的温暖（主要的是在北京这一段），但这么久，觉得真正高出于我的，却只有一个胡风。在理论方面打出了缺口，感情方面来弥补上了；在感情方面打出了缺口，时间久的关系又来弥补上了。明知他的理论是错的，甚至是反党的，但这只是理性方面的问题（其实也未完全解决），感性方面并未解决，即未从自己的具体研究来认出他的错误；下意识里面还隐藏着一个“胡风何至如此！”的思想。还不但如此，在思想上有好几点是和胡风的思想一致的，对于古典文学和民间形式的虚无主义态度，我在胡风发表文章之前几年就有了，我在上海时就写过一篇《新形式的探求》来对抗旧形式的利用这口号，结果挨了鲁迅先生一顿臭骂（似乎在《为连环图画辩护》那篇文章里），还在《作家》上发表过一篇攻击《世界文库》介绍中国旧文学的文章。那之后《世界文库》就宣称改版，其实是垮台了（对古典文学的看法，我是最近两三年从具体研究中，从列宁和毛主席关于文化遗产的指示中，才逐渐改变过来的）。对于世界观的问题，一向也以为不重要，在桂林时，写过一篇《怀曹白》（收在《沉吟》里），为曹白的“杨可中”辩护，攻击柏山，其实就是为胡风辩护（这一问题，在香港时，看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才有所认识，正式表示是在《华商报》发表的一篇《从萧军想起的》，收在《二鸦杂文》里）。此外，普及与提高，五四的领导思想，在看到毛主席的指示之前，也同意胡风的说法，不过未发表文章，而看了毛主席

的指示，也不是一下子就明白过来的。因此，人家说胡风不好，我想是因为不理解胡风；人家说胡风的理论错误，我总觉得胡风也还有对的地方，而且他是“深刻的错误”；甚至自己和他辩论，自己有理由，写文章骂他，认为抓住他的要害了，但下意识里还以为，他还有更充分的理由未说出吧！他不是这样吧。自以为早已和他在思想上分家了，其实没有。解放后的这段时间特别是到他家里去的原因，上次交代已作过一些分析，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则是我不能分析的一些盲目性的东西，好像他对我有什么吸力似的。幼年得到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印象，最初发生的影响是最大的影响，假如要分析，此时还只能说，大概因为他是最初以左翼文人对我发生影响的缘故。真正看出胡风理论问题，对我说，是下过一点苦功的。看出之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样无常识、无理性而且集反动思想之大成——和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胡秋原、杜衡、俞平伯以及厨川白村，都有相同之处而又比那些人都狡猾和凶恶。写这些话，不过表示一点点小进步，在我都很困难；并非想拿来和二十几年来的胡风分子抵消。

现在作补充交代。

一、关于高饶问题。他证实了高饶问题之后，问属于什么性质。我说是篡夺党权政权，高想取刘而代之。问题揭露之后，高曾企图自杀。我并联系贝利亚，认为这种野心家真不可理解。他认为在这时候出这样的事真不幸，给美蒋造谣的机会。但野心家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为了权力，什么都做得出。此外大概还谈了一些关于高的品质向来就有些不好的传说之类的话。也有他说的，也有我说的，现在记不

起了。

二、很久以来，胡风认为和毛主席谈一次话，问题就可以解决。我跟他的看法相反，认为他所说的文艺问题，如果周总理、胡乔木、周扬、乔冠华、林默涵等同志都不理解，那就太难理解，说不定毛主席也不理解。他不应当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身上，而是自己好好检查一下思想。谈到毛主席说他的理论是反党的之后，我又一次指出，如果毛主席不说什么，人民日报不会登舒、林那些文章。他的希望落了空，应该检查自己。他说他搞了几十年文艺，就只有这点所信，在自己发现他是错的之前，还只能守住它。林、何他们的文章也许是对的，但还未变成我的所信。老也老了，怎能说我还未信的话呢？我说，从他的话听来，他基本上已经动摇了。如果这样，那就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情绪意气之类，不愿低头。他说不是，他的理论没有错。

三、关于庄涌问题。庄涌是我在重庆认识的。我同荃麟夫妇、骆宾基住在文协宿舍，是四五年夏天。一天，庄涌去找我，自我介绍之后，说有一个人要出个周刊，请我编副刊，问我干不干。我说对那人和刊物性质都不了解。他说保证政治态度是会好的，随便发表什么文章都可以。我说要看看刊物，他约我第二期开始去编。第一期出版，我看在当时的情况下还算可以，就给编了。这刊物名《真报》，办报人名赵则诚。据庄涌说原在《大公报》当编辑，因和王芸生的意见不合离开了。但庄涌也和赵不很熟，认识也没有好久。这刊物虽名周刊，其实是报纸形式，赵编一二版，庄编三版，我编四版。出了四五期，胜利了，赵的钱没有了，据说靠一个什么做生意的人借钱给他，

一胜利，生意垮了。这赵，后来进了解放区，发表过一篇《与王芸生谈大公报》的文章，谈起他在《大公报》时和王的不同的意见。后来在哈尔滨搞《生活报》。四九年我到东北去参观碰见过他，正准备进张如心那大学去教书。后来听说被捕过，再后来不知怎样了。就在重庆的那时期，我和庄涌也有些接触，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异状，属于搞进步文学的那类人。胜利后，他比赵先离开重庆，说要回家搞钱到上海去办刊物。解放后，我在香港接到他一封信，说他在上海某中学教书，问有没有办法让他到香港去。我没有回信。前年，在社里又接到他的信，说北大一个女生听过我的报告，写信给他谈起，知道我在北京；他自己则在什么大学，因半年未让他开课，他闲得无聊，问可不可以到我社来工作，并说他正和北大那女生恋爱，希望能帮助他到北京。我和适夷同志商量，适夷也看过他的什么作品，有印象，说可以让他来。于是社里就去信他的学校问可不可以调，如果可以，请把材料寄来看看。过了很久，那里回信说可以调，但材料不能寄，要候调成了才行。我也没有管，不知去办了调的手续没有。这事拖了许久，谁也没有留心。突然一天，他来了，带着他学校的介绍信，但没有调令，不合手续。我问他为什么不等调令？他说不知道要什么手续，连学校人事处也没有谈起。我问适夷可以不可以让他进社，适夷考虑一下说，既然来了就留下吧，手续以后补。起初几天，我和他还有点小接触，一同吃饭和散步之类，觉得他谈话跟以前不同，东一句西一句，尽往无聊无意思的方面说，一句正经话也没有。再过几天，就觉得他似乎躲避和我接触。我反正也没事要和他接触，也就算了。他的事情发生后，我才想起那些都不是没有

道理的。他被捕后,使我奇怪的是他那里有胡风的信。从不认识庄涌的时候起,胡风如果谈到庄涌,总是讲坏话的。庄涌这面,记不起谈到过胡风。怎么胡风会有信给他呢?有一天,我到胡风家里问他同庄涌有什么来往。他说庄涌到东北去是他介绍的。我说你不是说庄涌这个人不好的么?他说我觉得这个人不纯,旁的也像没有什么。梅志说,在上海时,一天到菜市去买菜,碰到他,他在什么中学,离我们家很近,以后就常到家来,说话恍恍惚惚,不伦不类,不知什么道理。去东北后,常有信来,有时也回他的信,只是觉得他写的信,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似的。胡风说,到东北去了之后,曾来过北京一次,也来过我们家里,头偏在一边,不讲话,讲话躲躲闪闪,好像有点神经失常。我说,庄涌是个反革命,参加过还乡团,在地方上有血债,到社后,曾写信给社骂毛主席,现在被捕了。胡风说,这个混蛋,我们被他骗了这么久。这真想不到。以后是共同分析他过去的言论行动,想明白他从什么时候起变坏的,这么搞还有些什么政治目的等等,说来说去,说不出什么道理来。梅志说,他本来在上海教书还教得不坏,却死缠住要想法子离开。原来是想逃走。胡风认为他写信骂主席,是因为急于要被捕,不被捕大概精神上受不住了。反革命分子大概都有些疯狂性的。我去找胡风,是为想多知道一点关于庄涌的情形,但是是在相信胡风、爱护胡风的基础之上的。

以上是关键性问题的补充,以下是前一次未谈到的。

一、他住在《人民日报》的时候,我去找过他一次。一去,他准备回上海去了,路翎在替他收拾东西。他说请我去吃饭。三个人出来,路上,路翎说有事,走了。我和他到东安市场五芳

斋去吃饭。谈了些什么话，一点也记不起。

陈克寒同志说过：“不要记流水账！”谁愿意记流水账呢？把关键问题一交代，岂不省事。问题是到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关键性问题。那问题又如此重要，弄到用电报叫我回来，向群众宣布停职反省，重新审查我的历史，如果还不交代，就是我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寻死路。我有什么要回避的呢，早已丧失立场了。相信他超过相信任何文艺工作的党内同志；明知他的理论是反党的，还同他来往，还泄漏党内秘密给他；把和他的来往看做一个完全私人关系，把私人关系放在党的关系之上，已经足够了。我一贯地随便讲话，一贯地不分党内党外，什么话会一定不跟他说，什么事一定会不替他做呢？而且他有意，我无意，随便一句什么话，他都能得到很多东西，他一定已经得到很多东西去了。把这件事认为是政治事件，认为和反革命的斗争，认为给自己医病，把脏东西一次洗清楚了重新做人，所有这些，我都想到了，困难的是个实际问题，究竟有什么呢，一点也想不起来。我以为凡是严重问题，一定是很容易想起的；需要再三想的，一定不合乎要求。但是没有办法，请允许我记点流水账吧，让我用这办法来挤我自己，让我挤出了看能不能发现问题，能不能以此为线索而发现问题，希望同志们能帮助我从这中间发现问题。决不是用这办法来搪塞抵赖，蒙混过关，比什么都清楚，混不过去的；更决不想替胡风殉葬。如果这中间还没有是我应该交代的，我愿意继续反省，随时想起随时交代；如果我还有余生，我愿意我的余生永远反省（如果反省作广义解释，这件事够我一辈子反省的），随时想起随时交代。目前，还只能用记流水账的办法也

就是排队的办法来一点点地挤我自己，主要的是想挤出我在什么时候对他讲了什么话，同时也回忆他的某些动作表情，看那些是和什么话相联系，帮助我回忆在他的什么话之前之后，可能讲了什么，真正讲了什么；而且尽量和有关的地点人物联系起来。下面继续一些流水账。

二、关于雪峰同志。胡风住在文化部时，到我处谈起雪峰、丁玲两同志如果肯出力支持他，他的问题早可解决。但雪峰同志只想利用他打周扬同志，却不肯帮他的忙解决问题，而他不肯做这工具的。又说雪峰为了地位，一句真话不敢讲，怕周扬和乔木怕得要命。其实他不应该怕，他可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的。我虽然说他思想里有腐朽的东西，却没有追问他的话有什么根据。他的话是对我有影响的。我曾经为这暗自苦恼过。因为从别处也听到过什么周扬派、雪峰派之类的话，好像蒋天佐同志离社时，他自己还是别人就说过这件事是排挤周扬派之类的话。我想，万一真有这样的事，是很可痛心的。对胡风的诗，我一向以为比他的论文还难懂。他的什么乐章，我看过《安魂曲》，有许多意见，但也有一点好印象：分量重。雪峰同志一次谈到《安魂曲》在庆祝的时候想起死人，不合人情。我当时也觉得如此。后来想，不一定对。孤儿成年结婚时，寡母会想起他的父亲如果看见这情景该多高兴呀，因而流出泪来。我以为我想的不错。一次在胡风家里谈起，他认为我想的对。我说这道理不深，雪峰应懂得。他说他哪里不懂，不敢说罢了。新版《红楼梦》的工作错误受了批评，雪峰同志用社的名义发表了一封检讨式的信，又叫我在专家们面前作了检讨，《文艺报》又发表了一篇介绍《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这些做

法，二编室的思想都未搞通，我也未搞通。这之前，雪峰同志请俞平伯到社来商讨版本问题，送他一部影印大本《屈原集注》，我也认为太客气。关于俞平伯，早有许多传说，其中有他是乔木同志的老师，乔木同志曾到他家里去看他，他经常和乔木同志通讯等等。一天在胡风家里，我说雪峰怎对俞平伯这么客气，好像是怕他。他为什么怕俞平伯呢？是不是因为俞同乔木有关系呢？他当然同意，这正是他的看法。批评《文艺报》的事发生之后到他家的那一次，我也说雪峰怕俞平伯，出了事。他说雪峰犯了许多错误，不信你去翻他论《水浒》的文章，一定有问题。又说，这回是大家犯了错误，拿雪峰作牺牲来搪塞上面。这，我可完全知道是他看错了，不过未和他争论，等他说完就走了。听了他这次的谈话和在扩大会上的发言，开始对胡风的信任发生了动摇。他那攻击《文艺报》的发言内容，因已在他家里听过粗略，所以印象很深。躺在床上想，他的发言其实是些吹毛求疵，他自己倒刚刚是从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出发的。这样才开始仔细想他的一些所谓理论（以前没有想过），才觉得问题实在不少。以后又用了一点功，才看出他的完全反动来。

三、关于任叔同志。一天，在他家里，他说，听说王任叔要到你们那里去了。我说，是，大概不久就来了。你理解他么？我们也真需要有个能力强的人来整顿一下。听说在抗战时，他在上海对青年起过很大作用；在印尼时，印尼党人对他敬佩得不得了，认为印尼党如果有一个巴人就好多了。他说，很容易明白，现在外交这么重要，人才这么少，放他来搞出版！我说，他对文学有修养吧。梅志说，小说我看过，不好。我说，理论

呢？胡风说，他懂什么理论，一本书，《新文艺》不要，他强迫人家要。雪峰看他在党里有地位，硬把他拉来，是错误的。

四、有骆宾基在场的两次谈话。一次在骆家，我到文学研究所作了关于《水浒》的报告回来，说：作报告真有好处，可以把某些不明确的明确，未曾想到的想到，不好的东西不讲。他说是这样。不过《水浒》有什么好报告的呢？人物都是概念的。这时候，我已逐渐形成我对《水浒》的看法，我说《水浒》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大影响。他说，研究过去的东西，切忌主观主义，要以历史还历史。我说他就是以现在要求历史。他不同意，但忘记说了些什么话。又说，突然推崇起什么古典来，把古人抬得高高的；对现在的人却尽力压。古人好做，今人难做。我大概说过今人尤以胡风为最难做之类的话。一次在他家，晚上，大概以庄涌为话题谈起，都认为人真复杂，庄涌这样的人，怎知道是这么凶恶的反革命呢？骆说他自己在东北坐牢的时候，跟一个特务在一个屋子里，很久不知道。旧社会的恶鬼真多，小说都表现不出也写不完。胡风说是呀，我们对旧社会的发掘不够，旧社会还有很多东西可写。我说问题是不知该怎么写。他说能怎么写就怎么写。

五、有郑效洵在场的一次。三个人在东四馆子里吃饭，郑谈起某人的德才，那时正在评级评薪。他问什么德才。我说评级评薪要以德和才为标准。他说貌呢？我们都不懂。他说选亲不是要才德貌三者兼备么？

写到这里，无论抓住了要点没有，已经完全可以看出一件事：这样事件之后，我到 he 那里说这说那，那样事件之后，我又到那里说这说那，即使他花钱雇一个情报员，也未必有我这样

好。不但这样，还从他那里满载一套恶意的政治挑拨、破坏、诽谤以及别的胡风观点而归。有的完全无所感觉，有所感觉的也不认为是政治问题，不反映给党，不找党内同志共同分析。甘心受他的影响，让他的影响和自己本有的自高自大结合起来，扩大开去，反映在对于工作和对同志的态度中，反映在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中。特别是对于雪峰、任叔同志的不尊重，是与他的影响有关的；对雪峰同志对俞平伯的态度的看法更直接变成了胡风看法。我是胡风观点的支持者，胡风“政策”的执行者。我有什么立场，是什么党员！我是真正的胡风分子！这真可怕，我怎么是这样的呢！

此外，我的排队法，想起有别人在场（黄源、伍禾、萧军、吕荧）和没有别人在场的一些事，想不起什么，是一些真正的流水账，就不记了。

五四、六、二〇^①

^① 此处所写年月当有误，从开头“反省了许多天”一语看来，本文暂定为1955年7月20日所写。

历史交代再补充

(1955年7月25日)

一、从东京到上海

在东京出版的油印刊物，先名《文化斗争》，出过两期，大概是被日本刑事发现了，改名《文化之光》。原来是谁取的名，好像是大家想的，我也提过意见。改名好像是胡风想的。何以知道被刑事发现了，现在记不起来。这刊物是在我同周颖住的地方我们两人在夜晚印的。油印机是何定华拿来的。何同我们两人都写过钢板，胡风和王达夫写过没有，不记得。王好像是后来参加的。他以前什么时候在东京，回国过了一个时候才再去。刊物的出版者名义是“新兴文化研究会”，也是临时大家想的。记不起有“书记局”字样。

被捕的时候天刚亮，大概四五个刑事一路，从橱里搜去几十本剩下的刊物。其他的日文书和中文书很少，后来也没有提。拘留的地方好像是“早稻田留置场”。说“好像是”，是因为确实没有看见过这几个字的印象，而是我在里面想写的题目是“在早稻田留置场”。过了一个月才问，起初是问过去经历籍贯，为什么到日本，以后才问在日本做了一些什么。关于在

日本的事，都属于一些有凭有据、无可抵赖的事。而可以抵赖的，说不知道，也就不问了。问了四次左右。本来很简单，范围也不大，不必问这么多次。因为问的人（忘记姓名）中国话不好，我的日本话不好，浪费了一些时间。在问的当中没有提一个日本人的姓名，他们拿的材料中也没有看到一个日本人的姓名，他们的手写稿，我也看不懂。押解出境时，从东京上火车是一个刑事跟一个，押我的姓青田，押周颖的姓上条。四个人坐在一处。但车开后，也不完全照这秩序，谈话比较随便。开车的时候，漆宪章还在车门口对月台上送行和看热闹的中国人讲了几句（用中国话）告别的话，是刑事一面禁止他一面讲的。到了长崎（或神户）上船，印象不深，好像是一个个上去的。当中一条跳板，船上的人在那头，刑事和我们站在这头。走过去一个人，岸上就喊一句什么，船上应一句什么。上船之后比较自由，虽然也有人（便衣）在旁边监视，但没有和我们打过交道。在船上开过一次同学会之类，介绍认识，唱歌，说笑话等等，也没有人干涉。上岸时似乎很自由很乱，似乎没有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交代之类，也没有看见谁坐汽车跑，不过胡风一上岸就不见了。过了一两天吧，他到大白鸣钟附近我们住的客栈里来，疲倦之极，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那时候，我们正打算用“留日归国华侨代表团”的名义发表一篇宣言，由漆宪章或汪孝达起草了，给我看，我看文字很差，就叫胡风写一篇，急于要用。但跟他这么说，他也要睡，那么说，也睡着了。好像几天没有睡，以后也没有看见他那疲倦过。宣言是他睡了一觉之后，半夜里写的。忘记了在客栈里住了几天，反正时间很短；忘记了我们当时负责的人是谁，也不知怎样和国民党接上

关系了，我们就搬到外滩一个“广东同乡会”之类的地方去住，每天发伙食钱（或开[伙]食？）。这关系是孙科系统下面的，不知是否与中山文化教育馆有关。这个关系要求我们解散，到什么地方去，它可以发路费。虽然后来有些人是由它发路费回乡去的，但团体还保持了很久。我就以那团体为根据，参加了好久“上反”的活动。大概“上反”来跟我们接头，叫派一个代表去开什么会，我被派去参加。在那会议上成立另一个团体，我被推为什么，以后又代表那个团体去参加另外会议或当主席等等。转来转去，一个人就代表四五个团体，并且终于把最初那个团体忘记了。它什么时候变得没有了的，一点也记不起。现在回想，连当时所代表的那些团体的名字也忘记了。只有两个要点还记得，一个是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出席有胡风发言的那个欢迎会就是。另一是拥护或反对亚木土母德会议（内容现在也忘了），一天白天在静安寺路一个咖啡厅开一个公开会议，我当主席。我一去，除了来开会的人约二十来个之外，还有五六个包打听。一面宣布开会，包打听一面干涉，使这会议只能草草了事，没有结果。在那一阵子碰见的一些人大家都少有真名实姓，以后又不大碰见，只记得后来知道名字的张企程是一同开过会的。另一个冯叔陶也像是那时候认识的。这种会，有时可以公开开的，当然是种外围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为什么缘故，没有人通知了，也就无法参加了。（此处文旁有办案人员打的“？”号——编者注）大概“上反”以后也停止活动了。关于刚到上海时的情况，周颖可能比我还记得清楚一些。我们有一次在住宿的那“广东同乡会”招待新闻记者，是她当主席。他[她]和一同回国的人熟识的多。

现在谈谈孟十还。提起来,也不知道他什么。他是东北人,原在哈尔滨学过俄文。在苏联和他在一个大宿舍住过。他从何处去,以什么关系去,都不知道。我是在广州考送的。他也和我一样,在苏联以不问政治爱好文学著名,但我很少和他讲话。他回国的时候可能比我早一些,我回到南京,似乎他已不在南京了。他起初好像在上海伪中央社当编辑,那时南京的伪中央社还未成立,成立之后,上海社就撤销了。上海那个伪中央社什么来历,我不知道。以后在伪浙江省府图书馆做什么——馆长或馆员,怎样进去的不知道。所有这些时间我都和他没有来往。关系开始于他给《中华日报》编《十日文学》,不知怎么打听到了我的通讯处,给我寄刊物并约我写稿。我看他的刊物很左,那时候并不懂什么理论,总以为左就好,就寄稿子给他。回上海后,他就写信给我,把《十日文学》给我编,每月可拿卅元编费。我初到上海的生活是靠这解决的。三三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到过上海一次,以前讲过了。三四年某月才正式离开杭州,到上海来专搞翻译。他似乎一直都住在环龙路一家俄菜馆的亭子间里。他向《译文》投稿,凑巧那期《译文》许多稿子被审查官扣了,几乎出不成版,就把他译的《五月的夜》几万字全部登出来了。他一下子拿了很多稿费,自动要请客,主要的想请鲁迅,怕鲁迅不来,要先向鲁迅打听来不来。忘记是我写信还是转托胡风去问,鲁迅答应来。他就请鲁、胡、黄源、叶紫、何封、我们夫妇。这以后就经常替《译文》译东西。他原来是在《论语》投稿的。在《译文》发表文章之后,《太白》要出版,要摆一批投稿人名单,陈望道叫我拉他,但以后不能给《论语》写稿。他答应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去杂志公司编

《作家》，这时候他已和我不大来往，和萧军很接近，《作家》稿子事实上萧军看的多。这时候他似乎不住在那俄菜馆里而在国民党的朱霁青家里。他和朱的关系很深。也许是同乡，曾在《论语》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朱的文章，把朱吹得很了不起。在《作家》出版之前不久，忘记在什么路上走（反正是英界，我们经常总是住在法界），碰见他，他说他就住在附近，邀我去看他的住处。一去，房子很阔气，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是朱的房子。以后除了在鲁迅丧事时碰见他，记不起还见过。抗战开始后在武汉碰见他，曾一同去见康泽，他提起要办刊物，希望我写稿子。我答应出了看。过了几天，听说康泽找他办的。原来如此。但刊物什么名字，何时出版，什么内容，我一点也不知道，根本一期也未见过。以后就不知他在干什么，也没听见讲过。

怎样认识刘雪苇的呢？鲁迅死后不久，一家小书店（东方什么公司，从前发行过《海燕》的）要我替他编个刊物，《热风》。出了一期，有一个投稿的在书店留一篇稿子和约会的信。稿子是谈文艺理论的。我向来以为文艺理论高不可及，对搞理论的人都肃然起敬。看看稿子，觉得不错，就照他的约会和他见面，即于一定时间在那书店见面。一见，是个青年，自称姓孙名雪苇，从贵州来，要参加文学工作，不得其门，而现在已穷得没有饭吃了。我一时也想不出办法，就叫他校对《热风》，跑印刷所，把书店讲好给我五块编辑费给他（讲好每千字稿费一元，编辑费五元，销两千以上加多少，三千以上加多少），并用他一篇较长的稿子。但那刊物只出了两期就禁止了，他的生活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我就叫他到我家里去吃饭。这样认识并和他有了来往。并在我那里认识了胡风、何封等人。不，不是

这样。情景有点近似,但不是在鲁迅死后,而是在以前。因为在鲁迅丧事中,他也曾找胡风借一块钱,胡风没有借,下午碰见我,我给了他五元。他说他已一天多未吃饭了。那么,我是在送丁玲到西安去之前就已认识他了。我从西安回上海一下车就参加鲁迅丧礼。但那时候我未编刊物,怎会因为投稿之类的事而认识呢?简直记不起来。那《热风》好像两期都是他在校对和跑印刷所。和他认识了之后,除了很长一个时期经常到我家去吃饭以外,没有什么可记的。到了后来,他说有几个同乡学生来了,可以帮助他一点,比较少来,并且和那几个青年请我们夫妇到那青年们住的地方去吃过一次饭,是环龙路一带一个朝北的三层楼、门前有小院有铁门的房子,但里面陈设很简陋,也未雇人,请客的菜是他们自己搞的。三四个青年吧,名字一个也不记得。再不久,他说他要和那些人回贵州,大概其实就是到延安去了。他和胡风另外有无来往,不知道。

二、和康泽来往部分的补充

从上海到重庆去找康泽,是事先取得了他的同意的。这同意不是直接取得的,是通过一个名唐健飞的转询的。我因为写过那次拒绝他的信,转不过弯来,所以托唐。唐也是留苏同学,一同回国,一同任伪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这时作实业部司长。一向很关心我的。我写信给唐说,我现在想到康那里去找工作,不知他的意下如何,请你打电报去问问。他回信说,已经打电报去了。再过些时来信说,康表示同意。这样我才去的。唐[是]湖南人,法政学校学生。现已死。我写过一篇《怀

南京》，里面的人物就是他。

到四川去的事，胡风知道。我和吴奚如那时以为胡风是党员，但没有问过他。胡风告诉鲁迅，鲁迅请我和胡风在梁园吃过一顿饭，席间只问何时启行，未及其他。

到了武汉，住在曹振武家里，大约三五天。曹那时作武汉行营（或绥靖公署）什么长，大约如副官长之类。家在汉口东山里。

到了重庆，驻在临江门附近一个旅馆里。到过伪政训处一两次，和伪副处长（名字不记得）见过，他说康招呼过他，如有这么一个人来，请给他找车子到处都去。请我在旅馆等几天，有便车就通知我。从那里出来，在门口碰见一个熟人，名张屈光，是南京电车上卖票的，在我编的《新京日报》副刊上投过稿，我在南京搞“南京文艺青年反日会”，有他参加。他这时在伪政训处的什么训练班当学员。他看见我了，问明来意并住处，跟我到旅馆去玩，后来并带了几个同学来玩，名字一个也记不起了。此外，他还带过两个重庆本地搞话剧的人来玩，是两弟兄，姓屈，名字不记得。和所有这些人，谈的尽是文学话剧之类。

在旅馆住了十多天，后来坐伪政训处的大卡车到成都。车上由伪副处长指定一个科员或办事员（忘记姓名）招呼我。车子一直开到伪政训处成都驻地内面。

在成都住的那些日子里，和周蒸然玩过望江楼及诸葛、杜甫古迹；和周到过一次“伪侍从室”，里面应该有些熟人，为那几个熟人面去的，但现在记不起名字来了，只记得萧赞育和李毓九，都是侍从室秘书。一去，只碰见李毓九。李毓九当天晚

上就请客，在座的有萧赞育。应当还有别的什么人，想不起来了。没有康泽。此外，在康泽那儿还碰见一个名朱鄂的，湖北人，很年青，是参谋之类。为什么记得这个人，因为他是下面就要谈到的曹勛的小姨夫，他在曹勛那里听见谈到过我，碰见我了就跟我扳这点关系。我好像就是和这朱鄂一同回重庆的，记不准确，只记得有康泽的保镖，一个大胖子，另外一个矮小的参谋或副官，名姓都忘记了。

到了重庆，康泽把我交给他的别动队大队长之后，我就同那大队长离开伪政训处了。那大队长名曹勛，是我小时候的同学，在（此处文旁有办案人员批语：“与曹开始”——编者注）黄埔时同队。大概小时候读书天资比他高一点吧，他一向都佩服我，爱护我。在大革命时代，他做什么军官，我不知道，我在苏联。武汉政府失败之后，他和他的哥哥振武一同逃到上海，住了很久。后来到南京去进过什么“自新”班。就在那进“自新”班的时候（大约二九至三〇年），他曾对我透露过一点内心的痛苦，说小时候没有学会一种职业，以致现在无法生活，非跑到南京来不可之类的话。这回碰着之后，就一同住在一个旅馆里。他笑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找工作，在上海感到生活成问题。他不信，他说人没有一点觉悟则已，如果有了，非万不得已，不会自己钻进这国民党来的。他如果在上海时可以卖文章，也不会来。他劝我放心，说他不是康派他来试探我的，康要为难我，用不着派他试探。康都不为难我，他和我小时候的朋友，还会怎样呢？我还是害怕他有试探之意，不敢对他谈什么。我说我虽不是完全为了生活，但生活也是个大问题。我小时候就希望成为一个文学家，希望能游天下名山大川（这是小

时和他谈过的),借些机会到处跑跑。我也不满现状,但我也有点自知之明,只能写点文章。他说这就是不愿谈,那就不谈吧,就没有谈下去了。第二天,在朱鄂家里吃过一顿饭。再记不起有别的什么事了。

在万县住了三四天,都是在“大队长室”支的行军床。记得的事:和曹勛下围棋;曹勛一次吃饭因为菜太坏,大发脾气,把伙夫叫来罚跪,骂了好久;大队部的军需方建(同乡)在馆子里请了一桌酒,除我外都是大队部的人,名姓一个也不记得。

一天,他同我到公园去玩。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同我坐在一个亭子里谈话。这回不是谈我而是谈他。他说他总不能忘情革命,总想什么时候做出点革命的事情来,不过现在没有力量。但有一个顾虑,共产党对于叛徒是深恶痛绝的,就是做了什么事也不算数,他们也不要。并且说,不但他一个人的情况如此,和他一路的徐会之、韩潜的情况也是如此,徐、韩是和他一路“自新”的。具体的话当然不记得,大意如此,态度也很恳切。我还怕他是试探的,想把话岔开,但他一再钉在这个问题上。我一面避免与我有关的话,一面当作一个普通问题谈了几点意见。现在记得的:一,做了事,人家一定不要,还当作原来看待,这想法本身不合理。真要做事,只应问做不做,不必问要不要。二,要做事,一点凭藉没有固然不行,一定要到某种程度了才能做的想法也有问题。应该经常注意一切的机会,只要是好事就做,大事应该是从小事做起的。我已经说得太露骨,正在提心吊胆地,他还要问哪些是小事,怎样注意机会,我坚决不跟他谈了。第二天我走了,搭的商船。分手之后,我又后悔。既然肯让我走,他说的话当是诚意,如果我告

诉他可以帮他一点什么忙，那后果不知将是怎样？这段经过，到上海后曾向吴奚如及老李反映过，无下文。三九、四〇年间，他不知在故乡一带做什么事，不知和新四军什么事开谈判，他提议找我来解决，据说新四军方面曾电皖南调我。但我不知道，想是已经离开了。这事是后来听老婆说的，想张执一同志还可能记得。他之所以提议找我来解决，说不定就是因为我知道他这点复杂的心理过程。

和康泽的这一段，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后来他寄六十元到上海给我，只有汇票，写明什么机关汇来，无信。我也未写信给他。

三、在桂林

四〇年下半年在桂林认识一个冯济华，湖北天门人，伪军校第六分校教官。为什么认识了这个人呢？《力报》老板张稚琴常在外面勾关系，常常穷得要卖报。这回勾来伪军校第六分校，一边要买，一边要卖。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伪分校派来接洽的是一个姓张的政治部主任（单名，但忘记了，湖南人）和这冯济华。伪军校不知出多少钱给张稚琴，改组报纸办法是派张稚琴为少将顾问，欧阳敏讷为什么，我为上校教官。就是说把社长、总编辑、副刊编辑三个要点一齐拿掉。我听见这消息，极力在张稚琴面前反对，欧阳也反对，并说就是真要卖，也应找个较好的关系，不要卖给伪分校。张稚琴其实也未必真肯卖，卖到连他自己也没有份，他还是不愿意的。因此报未卖成。就在这过程中，冯济华有一天在营业部问：听说你们这里

有一位聂先生。刚巧我到那儿去了，别人告诉他就是我。他就自我介绍，扳同乡，并说我的故乡的某些人他都认识。这样就认识了。我的这种关系多，一向麻痹大意惯了，不料这次真正碰到了祸根。这冯济华起初是到《力报》接洽事情，后来就变成跟我讲交情，常来找我聊天。介绍那姓张的主任和我认识，两个还请我到他们伪分校去玩，我推辞不掉，就去过一次。由冯济华来和我一道，忘记了是坐什么车子去的，也许是他们的校车，也许是黄包车。地址是南门外。一去，首先伪分校主任黄杰出来招待，没有谈几句话，就到那姓张的地方，无话可谈，就在操场里转了一转，下了一盘围棋，就回城里来了。过了几天，冯济华来说，伪分校要请我当教官。我说我怎能当教官呢？军事是不懂的，三民主义一套也讲不来的，难道要讲文学么？他说大家都知道，并不要上课，挂个名就行。我说那算什么呢？也没有正面表示干不下。他们这样做，并非为了我，而是想给我一点好处，促成《力报》买卖问题早日解决，即我在中间替他们讲点好话。以前我没有怎么留意这件事，这时候才找张稚琴正式谈，知道他们要张稚琴当什么，我当什么。我不怕失业而怕被这种军事性质的机关网住了不容易逃掉。我向张稚琴表示反对，认为对文化、对他个人都没有好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反对发生了力量，总之买卖没有成功，因之教官什么的，以后也没有提了。

这件事过去之后，冯济华有时还来找我，不过不谈伪分校，不谈教官之类，只讲同乡关系，讲我发表的文章，当然谈不出什么道理，但态度还像是诚恳的。我是不是完全没有警觉，认为他可能是特务之类呢？也考虑过一下，没有想出什么道理

来。桂林那个地方有些特殊，文化界一般地对这一问题的警觉不高，国民党对于文化的控制也不算太严，如果太严，桂林就不能成为所谓文化城的。好像以前什么时候，曾经有过不少特务，分为“中央”和地方两派，两派时常冲突，以后所谓“中央”派就没有了。当然这是道听途说，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也不知道。因之在桂林说注意特务，主要的地方方面即桂系的，但也未听说谁是特务，做了什么事之类，文化界也似乎并未出过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自己麻痹大意惯了，当然想不出什么道理。至于他是国民党，则简直没有考虑。我的社会关系几乎都是国民党，在抗战的那种情况下，要和一个国民党都不来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未听见说不可同任何国民党来往。不过冯济华这关系还有点不同，其他的国民党关系，都是在参加革命之前早就有了的，而这个关系则是新发展的。而这一发展刚刚使我后来犯了罪。

忘记了最初的情况，冯济华带来一个名姜斌的人来见我。姜斌是汉阳人，在武汉很久，也认识我的一些同乡，并且听见讲过我。据我的了解，他是搞生意的，同时又不是规规矩矩搞生意，而又搞青红帮。这主要的是听见他们说的，他们有时也谈谈生意之类的话。冯济华说过姜斌在南县时是“大哥”，姜斌有时也谈到“向大哥”（向松坡，湖北青红帮，那时大概在桂林）。但也不完全是听他们说。有一次我大概从文化供应社进城，姜斌从城内出来，在丽君路碰见了，他说到我公司去玩玩，就在离此不远的地方。我跟他去，在丽君路南边不远的地方，有一间在我看来是很不错的房子，大概等于上海的所谓三楼三底，前面还有院子。从后门进去的，似乎没有招牌，或者有，我

忘记了。里面堆得有木头钉的箱子似的货。我只在那当中的厅房里坐了坐，两边的房子里是干什么的不知道。那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男男女女，看样子是些做生意的，大概一面做生意，一面又在那里住家。他们喊姜斌作姜经理，又说哪一家的货怎么样了之类的话。因此，我以为他是搞生意的。但究竟搞什么生意还是不知道，也没有问过他，对于此事我一向不留心。但后来又似乎觉得他和什么生意也没有关系，有时候穷得不像搞生意的人，不知是他根本和那公司没有关系，还是后来离开了，还是那公司根本垮了。现在想起来，姜斌有许多可疑之处：一，时穷时富；二，没有固定住处，时而旅馆，时而青年会，另外则不知住在何处；三，他不搞军队，不搞国民党，不混差事，却对湖北的一些国民党军官都似乎很熟（姜、冯两人都似乎只谈湖北人，交往的也只限于湖北人，别省人似乎不大认识）。但当时却没有想到，反而觉得他与党政军都没有关系，比别人还可靠些。

就这样，冯、姜，有时一个，有时两个，有时来找我，有时碰着，谈点无聊的闲话，坐坐茶馆、看看电影的时候也有。很奇怪，为什么能跟他们来往呢？他们什么也不懂，谈话也彼此搭不上腔的，有什么趣味呢？现在追起根来，大概因为我本有落后、堕落、腐朽的一面，甚至是主要的一面，不过参加革命、做文化工作以来，被克服着，变成潜在的东西。一有机会，又冒出一点头来。我和故乡的一些小人物来往，很喜欢听他们讲些家庭、社会、生活上的琐事，那些东西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美其名曰理解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其实是自己有和他们相同之点。和冯、姜的来往交谈之所以成为可能，除了政治上的麻痹

之外，我还只能作这样的解释。但这也是现在集中起来谈这个事，好像过从很密，其实在当时因为时间很长，倒不怎么觉得。我倒是经常和骆宾基、秦似、伍禾这些人的过从要密得多。

在和姜斌来往的过程中，最要紧的有这样一件事：

伪分校要请我当教官就是他告诉我的。我之所以极力反对，就是怕被伪分校把我网住了，一网住，这种军事性质的机关，很难逃掉。只好连根反对，使它什么名义也不发表。（此段文字原被作者删去——编者注）

认识了冯济华，不知过了多久，又认识了一个姜斌。忘记了最初是怎样认识的，总之是冯济华介绍的。姜斌是汉阳人，在武汉很久，也认识我的一些同乡，并且听见讲过我。这样，他们就有时来找我，有时在街上碰着，一块儿喝茶，看电影，谈闲话。有什么可谈的呢？他们什么也不懂，谈不上腔。无非谈些无聊的话。姜斌谈他过去大革命时代在武汉市党部青年部当过干事，部长是恽代英。这算是最有意思的。渐渐我知姜斌是搞生意的，搞什么生意不知道，搞青红帮，一种不清不楚的人。因此也没有怎么理他。不意出了这样一件事情：忘记了是怎么回事。（此段以上文字原被作者删去——编者注）大概是石联星跟我谈起，新中国剧社要演戏，没有演出费，几乎不能开伙。姜斌听见了（石也原来认识姜），表示他可以想办法找钱。石就去对新中国[剧社]讲，新中国[剧社]就约姜斌去谈，不知怎样，由姜斌去搞了点钱，演了一次戏。这个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我都不知道。我没有参加。姜斌和新中国[剧社]之所[以]接上头，是不是由石的关系，也记不清楚，要问问石。如果姜斌是特务之类，他帮新中国[剧社]搞演出费，当然别有用

意。但我当时没有这样想，反而觉得他还热心戏剧运动，对他有些好感。（此段以下文字原被作者删去——编者注）在演出时的剧场里，姜斌同冯济华介绍我认识一个钱鹏飞，湖北天门人。后来我知道他在车站什么检查哨当哨长，应当是特务，常常避着他，没有和他来往。

关于姜斌还记得一个事。有一次他问我认不认识吕国珍[祯]。我不认识。他说吕国珍[祯]也是湖北人，现在当团长，前几天到桂林来玩，他跟他介绍了一个女学生。这是我后来想起找他到台湾去的因子。

以上是第一次在桂林时候的事。

第二次到桂林，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石联星在那里。这件事周总理也知道，曾把周颖找来劝解，叫她要么离婚，要么好好共同生活，不要吵。她答应不吵。但一碰见总是吵，整夜整夜地吵，没法再在一块儿生活，因此到桂林去。

第二次在桂林的时期，没有什么姜斌的印象，好像他已不在桂林了。冯济华起初看见过，也像有很长一个时期不见，不知是不是进城了还是到别处去了。一直到我快离开力报的时候，才再看见他。

在快离开力报的时候，还碰见另外一个人，也是湖北人，国民党军官，名管子芳。从前在南京时见过一次，没有来往。抗战初期，在汉口一个小客栈名叫竟陵栈的地方碰见过一两次。我到竟陵栈去找另外的同乡汪镜秋玩，他也住在那里，这样碰见，也没有来往。四二年某月，他带着一个女的到力报来找我。忘记了怎样找的情形，只记得最初就是他已经在观音山即离力报编辑部不远的地方租得了房子，和艾芜同一个村子，他

请我到 he 那里去玩过，并有力报经理部的一个同事刘竹青一路，他来找我是先看见刘的。他从哪里来，本来做什么，来干什么，都不知道。好像一向在两湖交界一带的地方搞游击式的武装，这时候垮了，要到桂林来住。现在在准备买地皮盖一间房子。托刘竹青替他打听哪里有地皮。这之后，他又曾带那女的来力报找张稚琴的老婆打牌。过了不久，张稚琴不知找到什么关系，那关系的条件大概是首先不要我编副刊，我就离开力报，搬到丽君路和余所亚一块儿住。那管子芳又来找我过一两次，其中一次是向我借一千块钱，说过两三天就还。我那时刚离开力报，结算了一两个月的薪水和稿费，有一千多块钱，想到他有钱，又明知我失业，不会不还，就借给他了。谁知他借了竟不还。过了许久，我到观音山去讨过两次。头一次还住在老地方，第二次是离老地方不远的新房子里。结果他没有还，不知多久，他离开了。他认识冯济华，应当有来往，但想不起他曾跟冯在一起的印象。

有一天，冯济华来说：黄潮来了，住在大华，请你去玩。黄潮也是湖北人，国民党军官，早在南京见过，一向没有来往——以后也没有来往。这时候当师长，不知是有事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玩的；他的部队在哪里，番号是什么，也许当时谈到过，现在记不起了。同冯一道到黄潮那里去，怎么玩，谈了些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有一件事因为是有行为的，虽然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这回反省把它搜出来了。黄潮说，桂林是个文化城，有些什么文化人，介绍认识认识，以后留意他们的著作。（此处加着重线的文字旁办案人员标有三个“○”——编者注）我说我就是文化人，看看我就行了。冯说聂先生认识的

人很多,你请客,叫他约几个人来谈谈。黄说可以招待一下,规模不要太大。抗战以来,我把对国民党的斗争的复杂性当作和缓了,和国民党的关系一直没有斩断而当作私人关系来理解。在桂林的这个阶段,根本麻痹得没有任何立场,不但旧关系没有斩断,还发展了冯济华之类的新关系。不但忘记了自己是党员,并且忘记了是个普通文化工作者。我一点也没有考虑,就给他约了几个人。那时候我和宋云彬、骆宾基、秦似、孟超、伍禾、葛琴、余所亚(在这些名字旁办案人员标有两个“○”——编者注)过从较密,大概约的不出这些人。现在记不起究竟有谁,只记得有宋云彬,因为跟他坐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黄潮讲了几句客气话或者还讲了一点前方抗战的情况,替自己吹嘘了一阵,现在记不起了。反正毫无意思。以后没有别人讲话。现在写到这里,简直不能忍受,不知当时何以毫无感觉。这性质应该是很严重的,危险性也可能是很大的,别的不说,我总以我的力量去帮助国民党拉了文化界的关系。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提起这件事,连我和国民党来往的事一起,党内也一直没有对我提起。只要一个人提一下,我的警觉性或者会因之而提高,我以后的罪过可能因之而不犯。党把我的政治水准看得好高,何等信任我,我却把这意思辜负了!黄潮大概只过了两三天就走了。

四、重庆一事

我到离重庆二十里的私立建川中学去教书,是同乡查可恩介绍的,这人现在在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工作。那时他在

兵役署当秘书。这是一位陈年老八股，说不定现在还在遗恨没有生在满清可以考秀才举人。我经常没有地方吃饭，有时跑到他家里去吃吃。他也欢迎我去，他会写字，恐怕在替几个“阔人”代笔，因此，找到他门上诗古文词的课题很多，我去了，他就拿出来请我提意见，有时还请我跟他代笔。他看我没有职业，问我当不当中学教员，因为他的一个同事下学期要到那所学校去兼校长。这学校董事长就是程泽润（伪兵役署长）。凡是私立中学大概都有这之类的董事长，不过这个中学是个很落后的中学。我是个出奇的不热心找职业的人，从来没有主动地找过职业，都是别人找我，替我找，不需我费什么力才去。既然这么方便，那就去。一个学期快终了，周颖写信给我，说张民权到山上去过，问我在干什么，她说在教私中。张说为什么干这个，可以想办法到复旦去。他说他找邵力子对章益说说就行了。他回重庆后又写信给周颖，说邵满口答应，一定可以成功。周颖叫我进城时，去问问张民权，看究竟进行得怎样了。放了假或快放假的时候，我去找张民权。他也是留苏同学，还是在南京时见过的，这时候在三青团当什么处长之类。到他家里见着了。他说章益早已答应，还没寄聘书给你么？他说他当天就可以碰见邵，可以再问问他。又说对了，你也可以去，下午举行一个留俄同学聚餐会（此处文旁办案人员标有一个“○”——编者注），我们可以当面问邵，当面解决。我说我不认识邵，也不愿直接和他谈这件事。他说不要我直接谈，他悄悄地问一声就行。劝我去参加那聚餐会。我也没有考虑，晚上就同他去了。一去，大约有三四十人，邵力子、康泽和一个据说帝俄时代就在俄国的老头子。下面认识的也有，现在记不准

确，记得的是孟十还、白瑜；似乎没有谷正纲兄弟。这不要紧，问题是不认识的人很多，那些不认识的，大概都是叛徒特务之类，里面好像有解中杰(?)、卜士畸这种名字。这些人当他们分散着的时候，我实在没有什么印象，现在一集中，印象深极了：都是反革命，“留俄同学”是个反革命集团。我在那儿坐立不安，不终席就逃走了。我写过一篇《兔先生的发言》，部分是从这儿来的。以后再没有和张民权来往，复旦的事也再也没有问了。

五、从重庆到香港

四七年从重庆到香港。之所以迟到这个时候才离开重庆，在路上走了很久，以及一定要回家卖房子，后来又到湖南去。真正的原因，是一件完全与政治无关的私事。从四五年下半年起，我在重庆和一个女同志谈恋爱。彼此都有爱人，夫妇关系都不好，对方又都不肯离婚。这事纠缠了很久，闹得香港许多同志都知道，邵荃麟同志尤为清楚。因此我不愿离开重庆，不愿到香港。等到重庆的特务报纸《新华时报》每天在本埠版用头条大题登出我的谣言新闻，说我是中共重庆总负责人、如何与香港函电往还之类，我才离开。离开之后，一路上充满了种种非政治的也不实际的幻想，想有什么方法能和她结合，能让她也离开重庆，能在什么地方过一个时期，即使是一个时期也好，非万不得已，不到香港去，因为老婆在那里。

回故乡卖房子是件偶然的事，早以为房子已经完全炸光了，并且为那房子的被炸还写过一篇文章，及到了武汉，听见

一谈，大部还是完整的。这使我一喜，因为可以卖一点钱，到什么地方（其实没有这地方），延缓到香港去的日子。刚巧在故乡做县长的是曹勛，曹勛和我有万县公园的那一段谈话；跟新四军谈判说要找我来解决；我的老婆从沦陷区逃出去，他帮过不小的忙，（此处文旁办案人员标有一个“○”——编者注）如是等等，我以为曹勛不会害我。这样我才回去。

回乡是和“天南公司”一个文牒曾昶陔同去的。这人抗战前在汉口第七小学当事务员，抗战初期在家里，没有事，老婆当小学教员。以后我不知道，似乎是和刘辅珩一道搞游击队，一路被误会而终于跑到伪政权那边去了的。我以为他是个旧世界的小人物，落后，什么本事又没有，身体又坏，是个多余的人。为什么要和他一路，因我久不回乡，故乡熟人不多，他不去，我会找不到住处，也没有人进行卖房子。回乡后，住在王书田家里。这人是曾昶陔的妹夫，我原不认识，只认识他的父亲。他这时候没有做事，以前在曹勛下面做过事。

本来打算房子如果卖不动就早点走，一打听，有卖掉希望（后来卖给开面馆的姓常的了），就停了二十多天光景。在这些日子中，碰见过曹勛、秘书蔡治人、副秘书长汪镜秋、国民党部书记许作宾。那时刚开过伪县参议会，有些乡下来开会的还没有回去，认识的有陈绍平、王楷三，这些人都是高小同学。另外还有一个以前不认识的人，王瑞亭，是伪“督察长”，因为我的一个亲戚的女儿，曾经因为自己家里养不活了，说给我做女儿，抗战初期曾送来我家里过过一些时，故乡沦陷时，我的老婆照顾不了，又送回去了。后来嫁给这王瑞亭。这人已四五十岁，那女孩不过二十光景，显然带强迫性质的。此外也碰到

几个原来不认识、未曾谈什么、后来也记不起名字的人。和那些人可说常常碰见，曹勛和王瑞亭都曾请过我。但都没有谈什么与政治有关的话。曹勛一次约我晚上到他那里去，好像要谈点什么，但去了之后，他谈了一回怎样和新四军打仗以及他做官怎么不要钱之类，我看他的觉悟还没有以前高，没有久留。伪参议员陈绍平在城里时曾悄悄告诉我，八路军里面如何好，他有个儿子或侄子参加那里工作，写信回来讲起。他估计两年之内全国就要解放。我有几十年未见他，不知他为人如何，也不知他讲这些话有没有什么意思，没有表示意见。

房子卖掉了就走了。

后来四八年底或四九年初，曹勛到香港去找过我，问我有无办法可想，我说他连做俘虏的资格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就走了。（此处文旁办案人员标有两个“○”——编者注）汪镜秋也去找过我，住了些时也走了。我曾叫曹勛要尽力找机会为革命服务。自己带军队就起义，有机会就鼓动别人起义。好像解放成都时他曾有点功劳，后来在重庆，故乡去提他提过三次才提走。需要提三次，可见是有过功的。汪镜秋是小时同学中天资最高的，十一二岁就被称为“圣人”。二十岁同我一路到南洋，我当小学教员，他当中学教员，其实我们自己都是小学生。我写过一篇小说《在新加坡上岸》，是写他和我到南洋去的情景的，既非地主，也无权势，是靠替别人办公文（秘书之类）为生的。落后当然落后，在故乡的一群人中间，还算有点旧学问。我曾想替他找点抄写校对之类的工作，介绍给陆诒、周而复两人谈过话，无法可想。我又曾叫他看点书，什么也看不懂。这才想到他真是另一世界的人，隔我们隔得太

远了。

在长沙的时候也还遇见过别的人，其中有关系的是段梦晖，伪湖南《中央日报》社长。“九一八”以前，他在南京《新京日报》当编辑，我曾代编过那报纸的副刊，所以认识。我就是在那报纸的副刊《雨花》写左倾文章，搞反日运动，弄得弃职逃走的，这件事他知道得清清楚楚。四三年上半年吧，在桂林街上碰见他，他从重庆回湖南，路过桂林，邀我到旅馆里去玩。谈了一阵闲话之后，他笑说，究竟现在讲合作，没有捉你。我说为什么捉我。他说因为你是共产党。我说我是什么共产党！他说你谈话的词汇都是共产党的。他举出好几个，现在记不清，只有一个“三青团”，据说一般都说“三民主义青年团”。我那时正准备到重庆去（第二次），问他路上要不要护照。他说有一个证章就行。但我失业很久，连机关证章也没有。他就把他的证章摘下来给我了，只说到了不要忘记毁掉，那上面的号码是第一号，人家一看就晓得是谁的。这回在长沙李毓九处碰见，李对他说，我们来把老聂留住吧。他说好，你留一多半，我留一少半。我说《中央日报》谁敢去。他说不要紧，湖南《中央日报》与南京《中央日报》毫无关系，态度也不相同。再说，不要你写文章，我们也不敢用你的文章，不过要是你能留在长沙，我那边可用个名义送你二百万（约合现币二百元？）。国民党的事情，不要太认真了。说了这话不久，我去找他玩，并不是去要钱或问这事的。他说，来了正好，他就下一个条子：“约×××写长篇小说一篇预支稿费二百万”，叫人去拿来给我了。写到这里觉得又在拿人家的钱，为什么不曾觉得可耻呢？大概是被另一面的行为所蒙蔽了，例如，如果我肯通过国民党

的关系到湖南大学去教书，则月入省经委会四百[万]，如这里二百[万]，加上湖大的薪水，将近千万。哪里去找这样的事！但是我没有干。在长沙拿了钱的只此一处，李毓九那里不记得拿过，因为那名义发表不久。

还碰见一个白瑜，也是留苏同学。在长沙做什么不知道。那真是“碰见”，在马路上走，他喊我。他说我们给你正进行湖大去教书，这回不要又跑了，像复旦那回一样，弄成了找不着人！我说这回不跑。就谈了这几句话。我才知复旦的事曾经“弄成”过，复旦和湖大的事都与他有关。此外在伪建[设]厅还见到过几个人，一黎胡子，不知名，黎锦熙的弟弟。一夏某，湖南人。这两人以前不认识，都是“经济委员”。一贝零峰，北方人、留苏同学，不很熟，从无直接来往，也是“经委”。一张凤楼，广东人，张文之子，伪建[设]厅科长。以前不认识。一董贞煊，四川人，留德，与留苏中的留德的一批人很熟。做什么公司（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副经理，也可说从无直接来往。再想不起见过什么人。段梦暉解放后曾任中南新闻出版局新闻处长，现在大概在武汉或长沙。张凤楼现任广东木材公司经理。余人不详。

在武汉还碰见过两个同乡：吴鲁滨和金亦吾。这两个人是我十多年来酝酿着要写的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就因为题材太旧，写出来不知有没有意思，所以没有写。他们在旧世界也是很卑下的人物，有许多“佚事”流传众口。吴鲁滨是小时同学，多年不见。四五年，他从湖北到重庆，曾在北[温]泉慈幼院住过一个时期，因为他的女儿在里面当教员。他的女儿去那里当教员，是周颖的关系，周颖在故乡认识她。吴鲁滨在里面好像

住了很久，我总要隔一两个月才去一次，好像去了两三次他还住在那里。碰着他照例没有话好谈，甚至他找我争论什么问题，我也不和他争论。在北温泉他就找我谈他反对男女平等。后来不知怎么到重庆去了，也很长的时间找不到事。他是黄埔一期，就因为品行不端，在国民党，在黄埔系，也很少人理他。我同周颖到康泽那里去吃饭，他也在那里。以后，徐会之、曹振武、曹勛到重庆，才又把他带回湖北（这一次，我也看见二曹，和曹勛在澡堂里洗过一回澡。没有谈什么与政治有关的问题。他这时候，跟从前在万县的态度有些不同了，我觉得，好像不很满意新四军，但也没有谈什么具体的话）。这时候，他在伪市参议会当秘书。除了他有时到天南公司来看有没有人打牌以外，我和他没有来往。我正是因为天南公司常有这样的人来，所以决心到长沙去的。金亦吾，小时不熟，他的年纪小几岁；是在广州才熟识的，那时〔是〕东征以后，北伐以前。在南京时也在一块儿玩过。我离开南京之后，就和他没有来往。抗战初期，我住在汉口一个小学里打疟疾，躺在床上发烧，糊里糊涂觉得金亦吾去看过我，坐了一下就走了。他那时从江西到四川去，路过武汉。一直到这时候，我从长沙回武汉才再碰见。他似乎没有事，在康泽的什么机关挂名拿钱过日子。也是他有时候来玩才碰见，另外没有来往。

六、又一次到香港

四九年，我在北京等候分配工作，和在中南区工作的林路同志住在一起（现在的文化部西楼），他再三劝诱我到武汉去，

我一时为他所动，就由他到潘梓年同志那里去讲了，一路到武汉。到了武汉，我到“天南公司”去过。公司已经停业，楼下住的解放军，经理郭曙南到四川去了，只有原来当出纳的刘辅珩在楼上看房子。因为纪念鲁迅讲了一次话，报上登出来了，一些熟人知道我到了武汉。一天，刘辅珩告诉我说姜斌来找我，要请我吃饭。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搞航运，在三官殿码头那里搞一个“长江航运局”，有一只或两只船在走。过了一两天，姜斌真地来了，请我到黄陂路一家四川馆去吃饭，还有一个名张运汉的人作陪。这张运汉从前在郭曙南家里碰见过几次，没有来往。他自己是学医的，好像在什么军事机关（军政部？）里当过医官，这时候在中山大道设有一个医务所。我正想打补针，问他有没有鹿茸素之类的针药，他说有，叫我去打。过了一两天，我到那里去打针，碰见一个不认识的人，他介绍是陈义明，当过什么师长的。我没听见说过，也没有留意。

我到武汉之先，原说过搞文联或大学教授之类的工作，及至发表，是中原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我最怕做行政工作，尤其怕当首长，尤其怕当站在群众面前的首长；我的生活习惯太随便，怎能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呢？但分配工作的是赵毅敏同志，初次见面，不好说得。去就去吧，把自己改造一下也好。一去，不料院里还有问题，下面不愿意原院长崔嵬同志走。潘梓年同志告诉我，这件事事先没有酝酿好，决定得太匆促，以致出了问题。那就崔当第一院长，你当第二院长，过一个时期再说吧。就在这时候，好像是林路同志带话给我，说张执一同志说，聂来了很好，[他]有许多旧关系，可以叫他们到敌军里

面去做工作。这时候，派了大批的人出去，还在到处搜求这样的人，这事我是知道的，我的同乡郭曙南到四川去了，陈良屏到湖南广西去了，还有人写信到乡下去找一个姓王的来到台湾去，因为他的弟弟在台湾警备司令部当参谋长。我听见这话一喜，从来未真正为党做过什么事，想不到这种旧关系，今天还有大用处。我去问张执一同志，他说是这样。他正在和邝林同志谈这之类的事，好像邝林同志说，成不成无所谓，顶多不过花一笔路费。这些话鼓舞我，我就出来去找这种关系。但是一找，原来我的这种关系也并不多，有几个张执一同志知道的关系已经派出去了。曾在路上碰到过一个吕魁文，在府东一路开碾米厂，从前在南京时，知道他和方子樵关系很好，我去找他，他说和方许多年来就没有关系了。再去找张运汉，他过去在军事机关混过的，可能有些关系，他说也有些关系，但程度不够，他的摊子（医务所）也摔不开。我就问他知道谁和谁有关系。他替我开了一张单子，大概六七个人，也有关在牢里的，里面有陈义明，钱鹏飞。陈义明的什么关系现在忘记了，钱鹏飞是广西方面的。钱这人在桂林认识，怎样认识的记不起了，大概是冯济华介绍的。起初不知他做什么，后来曾养甫过桂林，看见他到曾那里去，才知道他是车站检查哨长。后来又知道这检查哨属于伪军委会运输检查处，处长曾养甫，副处长戴笠。那么他总是特务之类，就处处避着他，没有和他来往。经张运汉提起，才知他也在武汉。我把张运汉开的单子送给张执一同志，一面又找陈义明谈，他说他和谁的关系都断绝了好久，不愿意去。搞了好几天，一事无成！心里有点不服气，才想起找姜斌。和他在江汉路一家咖啡店里谈。先问他的生意情况，他

说不好，欠债很多，已经被人告到法院甩了。我说私人企业不会有出路的，应该在政治上找出路。他说不得其门，前些时公安局把他抓去过，说他是特务，后来搞清楚不是，放他出来了。这样怎会有政治出路呢？我说应该找机会立功，立的功劳大，以前的来历不明的地方都可一笔勾销。就这样谈起，一直谈到他和哪些敌军将有关系，[问]我记得他和吕国珍[祯]有关系，可不可以去对他们做些工作。他说他不止和吕国珍，还和彭孟緝有关系，和彭的关系还深些，曾跟他合伙做过走私生意。彭现在是台北警备司令。他又说这件事关系重大，让我前前后后仔细想想再作决定。就是去，汉口的摊子也要好好交代一下。这次的话谈到这里，分手的时候，我叫他去找钱鹏飞，问他愿不愿做这种事。过了一两天，他来回信说他决定去。钱也愿意去。在写报告给张执一同志的时候，突然想起，既然我在艺术学院势成僵局，何不趁此到香港去过一个时期，等酝酿好了或者不进艺术学院也没有关系了再回来。因此在报告上说，如果同意姜到台湾去，可不可以我到香港去，以便和他取得联系，以免暴露其他关系。张执一同志回示同意。这样我就引姜和钱去见张执一同志。钱到广西去的事，后来因军事发展很快，没有去成。

临走的时候，张执一同志叫另一同志（忘记姓名）跟我谈过几句话，主要的是说以后跟他通讯，到了广州，到什么地方去找孟超同志谈谈。但到广州时，孟已回武汉，未见着。在轮渡码头上，张执一同志对我说，赵部长说准假一个月，我也同意了。其实那时候火车不通，一路坐汽车去，每到一处都停留两三天，在广州停的时间更多，到香港已经过了二十几天。

到了香港，起初他和彭孟缉通讯，通过两次信之后，提起要到台湾去，要彭给他寄入境证来。那些信，他都给我看过。首先他说他从内地出来了，到了香港，准备在这里呆下去，但还没有想到呆下去的办法。以下是关于彭孟缉的家庭琐事，即向太太、老太太请安问好之类。彭回信说听说他到了香港，很高兴，望他在香港若想到了呆下去的办法之后通知他。第二封信说他在开馆子，不知能否维持。彭没有回信。第三封信说馆子要垮了，在香港呆不下去了，可不可以到台湾去，如果可以，请彭给他一张入境证。不久，入境证就寄来，大概一个月的光景。依我的看法，彭孟缉这样容易给他入境证，不是不知道他要去的用意，更不是骗他去了加害于他，而正是欢迎他的这用意。顶坏的猜测，也只不过想他去了，了解一点大陆上的情况。因此，我劝他赶快去。他推说等他的外甥从国内来了再走。前几天他叫他的外甥回武汉搞钱，主要地是想把那什么“长江航运局”一齐交给那副经理，随便给他一点钱算了。过几天，外甥来了，一个钱未弄到。副经理说他的东西全部不要还欠人家多少债。我又催他去，他还有顾虑，怕进去了出不来。台湾出境比入境更困难，老百姓要有一万块台币保证金保证出去了一定回来才肯放走，而台币高于港币很多。他说这种事本来有生命危险，还可靠靠彭孟缉；若出不来，危险性就更大，可能彭也管不了他。我只能说彭既然和你的关系好，总会有法子让你出来的。但这话不能完全解除他的顾虑。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点拖的理由是他没有说的。他到了香港，碰见许多逃出去的人，主要的是湖北人，那些人有的有点钱，有的冒充有钱，找他一起做生意。他想借别人的钱，碰上一件意外财喜，以为将来之

计,他本来是这种人。但那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究竟搞了一些什么事,我不知道。他和那些人来往,我是不参与的,为的是怕人看出他和我有关系。他有时也跟我谈谈,我除了谈他空想以外,随即把那些事也忘了。我随时催他去,他一再拖,拖到三四月间,解放海南岛前不久,他大概一切幻想都破灭了,才决心到台湾去。他到了之后,来过两封信,第一封说平安到达,碰见过什么人;第二封说谈得很融洽。这些信都来[得]很迟,中间的距离很远。他的通讯处是北投旅馆一个什么人转。我回过他一封信。大概两个月光景,他回香港来了。一见,他说差一点回不来,是彭孟缉用驱逐出境的办法放他出来的。(此处文旁办案人员划有两条竖线“||”——编者注)他把驱逐令给我看,大意是说他形迹可疑,勒令出境。他说他看过彭,也见过吕国珍[祯](要塞司令),还见过一个什么师长。吕国珍[祯]怕得要死,不敢接触这个问题。彭孟缉说这样严重的问题不能随[便]乱谈。后来又表示,限制得太严,不攻台湾,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个师长对他很客气,态度很好,没有什么具体表示。他说的自然比较详细,现在记不清楚了。他说本来还可过些时,但从武汉逃出来的人太多,那些人有的到了台湾,有的在香港,知道他的关系,在外面乱传,风声吹到彭孟缉那里去了,彭不敢再留他,就把他驱逐了。最后是否见过彭,记不清楚。我叫他写个报告,他写了,我看不好,叫他重写,重写了,还是不好,他当然不会写。究竟是我又退给他了,还是寄给张执一同志了,记不清楚。他的经过、驱逐令、报告,他都直接跟那位钱同志谈过看过。后来我叫他回国,他表示回国没有办法,功没立成,出路还是没有,原有的东西没有了,欠了一

身债。如果他是特务之类，自然更不敢回。我想在新中国，像他这种人实在也无法可想，事实上也无法强制，我正忙于到《文汇报》去，也没有注意这件事。他就和他的外甥到九龙一个什么山地的木屋里住去了。起初卖衣服，卖笔，卖表，后来就自己或叫他的外甥找我要零用钱。等我回国的时候，已好久不通音讯。

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从头到尾都是错的。就我个人立场说，当时在武汉把这关系交出去了，不跟他到香港去，便什么事也没有。就工作说，首先没有调查研究。姜斌这个人究竟是商人、流氓还是特务呢？如果把这弄明确（当时公安局就有些材料），对于工作也会有些帮助。其次，对于各种可能性毫无估计：他到了香港不去怎么办呢？去了不回来怎么办呢？事情讲成功了怎么办，不成功又怎么办呢？回香港了不回国又怎么办呢？所有这些都是必然包括在这问题里的，但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没有向组织提出。其三，是时间的估计，无论组织或我，都以为是很快的，其中固然有被他拖了的时间，但实际所需也决不可能是一两个月。其四，是没有建立一种汇报制度，规定多少时候要汇报一次，如何汇报。他到台湾去了如何和他联系，如遇紧急情况如何办理等等，都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这是他在台湾的时候我想起的。如果我是个有工作经验的，知道怎样工作的，有组织纪律观念的，也不会有什么問題。比如说，除了按期汇报之外，把他写给彭孟缉的信抄下来，彭写给他的信、驱逐令，他的两次信和两次报告，拿到手里，送到上级等等。倒霉的是我没有这样做，也没有想到这样做。（此处文旁办案人员划有两条竖线“||”——编者注）不知写过一两

次信回国没有，可能一次也没有写过。写过的一两次又大概不但简略而且写的对象不对。记得一次是写给方方同志，那是因为别的事提起的；一次是给张执一同志。刚刚把约好了和某一位同志通讯的事完全忘记了，连姓名都忘记了。这次反省才记起这事，但姓名还是记不起来。但也许是刚到香港给他写过一次信，他没有回信，后来才忘记的。我接到组织上两次信，一次由一位姓吴的同志带给我的，说叫我回去主持另一工作（大概指文联），我因为那时候姜斌还未去，这时回去不免空跑了一趟，而我又以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所以没有回去。不知写过回信没有。后来一次是姜斌去了，接到叫我回去的信，说叫两人都回去。我一则因姜已去了，丢不下；二则已酝酿进《文汇报》，关系已调到华南来了。我写信给张执一同志说关系已经调了。他回信说他不知道，表示歉意。以后就没有接到信了。总之，我几乎完全没有向组织汇报工作，也一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回国之后，本来打算向张执一同志汇报一下的，但看见他碰见[我]几次，一次也没有提起，以为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主动地向他提起。几个月前，张执一同志托社里一个女同志（他们在跳舞中认识的）带信给我，叫我打电话找他，说不定是要谈谈这问题。我听见带信人说是找我玩，我因为不喜欢跳舞，也没有时间，简直没有找他。这次反省，才想到这件事里面包含着许多问题，而主要的是组织对我的工作一点也不了解，我既没有好好汇报，当然也无从了解。不知什么人、什么组织里面是像我这样工作法，不知何所恃而不把工作交代清楚，这是我现在完全无以自解的。幸而还有一位钱同志知道一点，至少知道姜斌是到过台湾的，否则任何一点都

无法说清。

和姜斌这件事有关的还有几件事要谈谈。

一、到香港约莫一个多月以后，因为粤汉路畅通了，武汉有许多国民党军官逃到香港去了。里面就有前面提到过的陈义明。陈义明在武汉时，我跟他谈过话，他知道我在香港干什么，也认识姜斌。到了香港之后，他就找到姜斌（姜住在旅馆里），表示也愿参加这工作，他在台湾有些什么什么关系。而且不止他一个人，跟他一路的还有三个人（三个人的名字忘记了）。姜斌来找我，我去跟他们谈，可以说，他们的态度基本上都是很不好的，就是他们恃其可以破坏我们的事，借此要挟，敲一笔竹杠。这事当然我不能解决。我就去找张铁生同志，叫他介绍有关的人和我谈谈，张就介绍了那位钱同志。钱表示，这种人当然没有诚意做什么工作，但也不能得罪，除了怕他破坏、给他一点钱封他的嘴巴外，他们本身也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真有用的。他愿和他们谈。我就介绍他们见面，让他们谈。起初是他们四个人一路，后来是陈义明代表，大概谈了这么三四次，中心内容是钱，他们要几千块港币。后来谈到补助他们一点路费，每人几十块。但究竟补助了没有，以及补助多少，我都不知道，因为后来我就不参加谈话了。后来姜斌说，在台湾还碰见过，没有工作，穷得要死。看见姜斌了就跑，不敢交谈。

二、过了些时，前面提到过的管子芳也去了。姜斌把我的住处告诉他了，不知是何用意。他到我的地方来了两次，第一次来除说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之外，说卢朴安的老婆要找我。我问找我做什么，他说他不知道。卢朴安是什么人呢？是在汉口

开客栈“竟陵栈”的老板，抗战初期，我到竟陵栈去玩过几回，认识他；也在那里看见过管子芳。四八年初，我和陈良屏从汉口到广州，卢朴安从中途上车（好像是从坪石），和陈良屏谈过一些不相干的话（忘记了谈的什么，大概是同乡熟人之间的应酬），不知在什么地方下去了。从陈良屏口中知道他在坪石什么地方搞煤矿。此外，别无交往，也不知道好几年来究竟在搞什么。至于他的老婆，自然也见过的，但连话也没有说过，等于并不认识，找我干吗呢？过了几天，管子芳果然引那个女的和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来了，说是她的儿子要到武汉考武汉大学，没有人介绍，怕报不上名，特为从广东来找我介绍的。本来可以拒绝，但没有拒绝，写了一封（没有衔名的信封信纸）给徐懋庸同志的信（那青年的名字忘记了）。我本有一种无论什么青年都应赶快离开那腐朽的家庭的想法，这时候还有想和管子芳谈谈，看他能不能替我们做点什么工作的意思，所以就写了。现在想起来，这是个极大的错误。问题倒不在卢朴安的底细我不清楚，而在这件事可能根本是假的，管子芳用这个女的来骗一封信，换一个坏分子混进国内或混进武大去搞什么鬼。越想这个可能性越大。但我当时并没想到我的一封信有这么大的作用，那时由港回国似乎是很自由的。那管子芳以后没有来找我。

三、进了《文汇报》之后，前面提过的那冯济华到报馆来找我。他也是从武汉逃去的。他说他在武汉挑土，在香港也在挑土（做泥瓦小工），看样子是真的，他比别人都狼狈得多。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只要不挑土。前一些时，我在大干印刷厂吴经理处碰见还是“东征”的时候在海丰认识的林务农，他说他

在做公安工作，如有可做这种工作的，可以介绍给他。他需要的正是冯济华这种人。我问冯愿不愿做革命工作，他说愿意，那是求之不得的。我就约定林务农和他见面，谈好了，叫他写材料，即写有些什么反革命从国内逃来做什么活动，从香港回国去要做什么活动之类。写了两三次，便不要他写了。据林说，他的觉悟性不高。他后来又来找过我，我没有理他。

以下谈谈在《文汇报》的经过。

《文汇报》创刊的时候是以民革的姿态出现的，由徐铸成主持，梅龚彬等当主笔。后来大家都回国，徐铸成就找张稚琴当总经理。张在桂林时大概和李济深拉过一点关系，因此算是代表李济深的。以前曾由孙师毅、冯英子当过总编辑，都是和张稚琴关系较好的，但不知为什么，都没有干好久就不干了。我到《文汇报》去的时候总编辑是刘火子。我怎么进去的呢？张稚琴一回找我谈，说《文汇报》陷于僵局很久。主要的是态度在当时香港情况之下过左，像党报一样，因此限制了本身的发展，销路突不过一万，因之就作用小而赤字大。也因之使某些想靠拢民革的工商界之类不敢投资而赤字（约十余万港币）无法弥补。其次是编辑部和经理部不团结，彼此视若路人，思想感情不能交流。总经理不能过问编辑部任何事情。此外他还说了些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具体琐事，现在忘记了。他对我谈这事，当然是希望我进去，打通经、编两部关系，尤其是打通他和当时香港工委负责人张铁生同志的关系。他认为经、编两部不合作这件事是和张铁生同志对他的态度有关的。这时候，徐铸成也在香港，对《文汇报》的看法大致跟张稚琴一样。我并不要进《文汇报》去。但我把这事前后想了一下：一，态度太

左和销路不好是公认的。二，张稚琴完全是个旧式人物，编辑部靠拢党的青年当然看不起他。但既然是民革报纸，就应对代表民革的人搞好统战关系。三，张铁生同志我不熟，但以前听到的印象是很古板，甚至他爱人自杀而死也与他的古板有关。那么，他多听了青年同志们话而和张稚琴关系不好，是很可能的。那么，如果我进去，可能把这些关系搞好。一方面我和张稚琴熟，比较好讲话，二方面我是党员，和党可以沟通，三方面我在文化界和新闻界都搞了很久，青年们也不会歧视我。既然如此，既然《文汇报》的情况严重，僵局又可能因我而打开，又何不去试试？因为过广州时见过方方同志，就把这事写了一封信给方，信里提出了我对报刊和对张稚琴的看法，说我进去，应该可以有些希望。方方同志带信来说，他同意，叫我以总主笔的名义进去，任务是搞好关系。这之后，张铁生同志叫司马文森来找我到张铁生家里去谈，主要的问这件[事]发生的经过，我就这样告诉他了。在态度上似乎有些不满意，但有什么具体表示却记不清楚了。我也没有留意。进去了几天之后，有了一些观感，又写了一封信（内容记不起了），大致是以前的信的分析的补充，请铁生同志转给方方同志。铁生同志看了那封信，对我说，政治上是正确的，但不必寄了，有事我们来商量。我同意了。他一再说政治上是正确的，其实当是说具体情况之类，有没有彻底了解的地方。如果当时领会这意思，就可以深谈下去。但我没有领会，满足于这半截肯定的话，以为他都说正确，大概真是正确了。编辑部同人，除了刘火子以前见过，不很熟以外，别人一个也不认识。所谓团结，当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搞好[的]。在他们看，我是张稚琴的人（其实这

时候也真不自觉地做了张稚琴的工具),在我看,他们有成见,因此关系都是表面的。这时候,徐铸成要回国,他们就要我写一个改版计划,由徐带到广州给饶彰风同志。我拟了,他们都说很好,临时决定三个人都到广州去会饶彰风同志谈谈。到了广州,给饶看了,饶也认为很好,应该这么办。我问,如果张铁生同志不同意呢?他说,你可以和他谈,看他究竟有什么意见!我说如果改版必须更动人的时候,统战部可不可以给以方便?他说可以。所谓改版计划,就是借版面改动把态度改动,使较适合于香港一般读者。同时也可把不适合做什么工作的人加以调配。改版后来还是实现了,不过没有调动人。我把计划拿回香港给铁生同志看,他看了说,你这是开刀,是什么改版计划!我们召集个会谈谈。他就召集会,出席[的有]:他,我,黄作梅,吴荻舟,张洪道等。吴荻舟同志说,改版计划全部错的,《文汇报》的问题全该张稚琴负责,编辑部的人谁也没有错,谁也不能换。华南局和统战部不明了实际情况,尽管同意也还要讨论。我举出编辑部某些人不团结的琐事,都是张、徐说的。吴说根本没有这些事,都是张稚琴[编]造的。我就谈到《文汇报》究竟是不是民革的报?张铁生同志说,不是,是党报,不过用民革这个公开名义。会开到这里为止。会后我想,特别是铁生同志明确说是党报,就把我以前所想统战问题之类全部都推翻了。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发现:一,根本没有经、编两部不团结,不过张稚琴跟编辑部的人不团结;但也不是跟任何人不团结,而是跟党不团结。如果不是他的人,如果不是由他的权力弄来的,党派任何人来,他也会不团结。二,进一步说,也不是和党不团结,而是要脱离党的领导,使报

变为他私人的报，像桂林《力报》一样，便于他今天勾搭这个，明天勾搭那个，甚至整个出卖。三，张稚琴在报馆不但是多余的人（铁生同志说他连钱也没有找到一个），而且不除掉他，《文汇报》的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我把这些意见反映给吴、张两同志，他们同意。不知是不是因我提出要撤掉张稚琴之故，总之以后进行的是怎么除掉他，也终于把他除掉了。我还做了一件事，把原来跟张稚琴走的余鸿翔（后来的总经理，原经理）说服，使他也站在党这一边了，给后来除张造成了某些方便——不必找另外陌生人来当总经理。除掉张稚琴之后，改版、团结、赤字（除掉应由张稚琴负责的外，只几万港币）问题都迎刃而解，内部达到空前团结。写这一段，固然是交代，同时也是辩护：我尽管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立场，容易被钻空子，被利用，但只要有人提醒，还是可以改变，可以做一点事的。我现在还不明白：何以方方、饶彰风、徐铸成，甚至张铁生都曾以为我的看法是对的或政治上是对的。可见一件事要弄清楚真难！这件事只写到这里，与这有关的其他的事，已经有了材料，不再提了。

在武汉先后介绍几个人。一个名申娟，即前面提到过的给我做过女儿的那女孩子，曾被迫嫁给一个四五十岁的反革命，四九年流落武汉，我介绍给张执一同志，张给她找到一个保姆工作，在什么地方带孩子，现已另行结婚，生活过得还好。一名蔡季眉，曾在伪政权下面做过工。我看他是个肯向上的青年，当他去考《大刚报》校对的时候，我对该报张若达提了一下，考取了。现在在《长江日报》当校对组长，历史交代了，工作成绩极好。一名孙阳初，曾在国民党下面财务机关做过办事

员之类,会写字。介绍到民众乐园当录事,工作不错。另一名郑崇贞,前面提到过的曹昶咳的老婆,介绍到民众乐园卖票。水准低,工作情况不明。

五五、七、二五

致陈克寒、戈矛的信^{*}

(1955年9月10日)

克寒
戈矛 同志：

戈矛同志来，说我的材料交代得不清楚，要重新写过。怎么不清楚呢？戈矛同志说，例如和康泽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那样一种关系要说得有政治关系，是不可理解的。因此那材料不真实——凡真实的东西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如果我说那是政治关系或有政治关系，就什么都可理解了。而且我想，我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那么，为了贪图问题早解决，我似乎可以说是有政治关系的。只有一点：我坚信党不容许我把本来没有做过的事说是做了的。

那些材料是不是不可理解呢？有些是不可理解。把材料和具体的人、他的历史，他的发展过程，心理状态，以及他的其他的方面孤立起来看，确实不可理解。那么，就康泽这问题分

* 陈克寒(1917—1980)：浙江慈溪人，建国后历任新华社社长、出版总署副署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戈矛(1915—1989)：山东莘县人，原名徐光霄，建国后历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

析分析看：

第一次，党派我到 he 那里去做工作，就是钻他的空子，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乘敌之隙的可能性”。利用他还讲私人关系，可能不会害我。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

第二次，为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筹路费，虽然不是党的事情，也算是公家的事，找他捐款。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又在抗战刚开始的时期，更有把握他不会害我。

问题是以后在武汉，在重庆的几次，没有公事，完全是私事，甚至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事，为什么去了呢？

入党以前，我做了八年国民党，所有的社会关系也都是国民党。这就是说，我既然参加革命，就应当比别人须要用更多力量割断这些反革命关系。但一路走来都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问题。以为这种关系自然会断绝，而且事实上已经断绝了，是要我去接上才接上的。接着就是抗战来了，两党关系有了变化，个人对这变化应取什么态度毫无理解，以为就可以随便来往了。再就以为我是公开身份和他们来往，并非以党员身份，应当没有关系。最使我忘其所以的是这些关系，除了有时利用一下以外，在党内没有人非难或阻止。相反地是在金华，邵荃麟、骆耕漠同志叫我去找谷正纲；骆又带信给我叫我去找卓衡之；在重庆，周总理听说我要去曾养甫那里去，还替我分析曾之为人，认为他比康泽草包；康泽这关系，周总理、徐冰同[志]又都知道。

入党以后，长期没有组织关系（找康泽也都在这种时候，这不能使问题有所改变，但是事实）。四〇年在桂林由夏衍同志联系时才正式缴党费，夏走后，直到四五年年底由何其芳同志

联系时才又缴党费，四七年在香港才正式参加小组生活，开始读马列主义的书。长期地独来独往，自生自灭，不求长进，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党员，也没有争取做，关于党员应遵一些什么，一无所知。许多关于党的事是到北京后才知道的，连党章也是在北京才看到的。这自然落后得出奇，但也是事实，应该当作关于我的一个条件看的。

我的人党，只是一种朦胧的政治要求。既非劳动人民出身，又没有身受过什么压迫，没有参加过实际革命斗争，又未钻研过革命理论，因之就并没有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对人民的应有的爱和对阶[级]敌人的憎恨，可说是很缺乏的。加上组织关系是上述的那回事，加上在反革命阵营混得那么久，就使我许多年来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个人主义，不关心政治，超政治、超党派，旁观或者像别人说我的“浮生若梦”、“玩世不恭”等等。这些东西，可以是第三种人，可以是国民党，可以是无政府主义，可以是这几种东西的混合物，只是不是共产党员。最糟的是许多年来，一点也没有觉悟到我这种精神状态是与党根本不相容的。甚至读了马列主义的书之后，一点也没有掌握书的精神来检查自己，也就是对那些书一无所获。我这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恐怕不是单靠自己的力量所能接触到它的根基的。

如果把我的这些具体情况参考一下，我和康泽没有政治关系，应当比较容易理解。

反过来说，如果我和康泽有政治关系，是不是一切都可理解呢？我看也有不可理解的地方。他是特务头子，如果我和他有政治关系，首先就是说我是特务。如果我是特务，那么：

一、这个特务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南京发表文章并向请

愿学生散发传单，主张停止一切内战（这两个字在当时南京都是违禁的），联苏联共联合工农共同抗日，以致被当局要抓而逃走了。

二、二十多年来一直骂国民党。现在看来，没有立场，没有思想性，语意不够明确甚至思想错误的地方都是有的，但骂总是一直骂过来的。而且在解放战争前夕的重庆，像《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一文，不但骂反动统治，还歌颂瑞金的不屈的人民，在当时能发表的范围总算是最大限度；像《论白华》总算指名骂蒋介石，再没不明确之处了。这种文章何止一两篇。这些事也是这个特务干的。

三、这个特务从来不骂共产党。岂但不骂，还以极大热情欢迎解放军渡江（《一九四九，四，二一，夜》），热烈地歌颂土改（《血书》），其余跟反动派斗争的文章且不谈。作为党员，我羞愧得要死，经常感到辱没了这个光荣和称号；但作为特务就完全不能理解了。

四、这个特务在重庆《新民报》编副刊，编得警备司令部派一连人把编辑部占领了，要报馆登报道歉（头条前）一个月，立即撵走编辑。

五、这个特务在四七年重庆“六一”大捕人的时候，被拿着名单点名索捕，不过捕人的方面犯了一点错误，幸而漏网了——同时漏网的也还有，孟超就是一个。

六、这个特务在漏网之后，被特务报纸《新华时报》在本埠栏用头条大字标题，说他是共产党负责人，还把许多“活动情况”，都登载出来，一连几天如此。

七、这个特务不隐瞒他的特务关系，相反地几乎逢人便讲。

讲得周总理、徐冰同志以及凡和他接近过的同志都知道。今天引起怀疑，追本穷源，是这个不知政治斗争为何物的傻瓜自己说的。

这样一个特务，难道就没有丝毫不可理解的地方？从前苏联驱逐史特朗出境，说她是美帝特务。我看过一两篇她的文章，觉得有点不可理解。现在苏联宣布她不是，撤销过去的决定，我就理解了。

我现在面临的难题，倒不是说明不是特务，虽然也不一定能好好说明；而是如何说明我是。在这[次]反省期间，不时有些胡思乱想，其中之一，就是违反党的意旨，不实事求是，贪图容易理解、容易解决问题，把没有的说成有，说我是特务或和康泽有别的什么政治关系。结果会怎样呢？结果会是更没有办法。在大会上听见人家坦白过：加入一种组织，和什么人联系，叫他做什么，他做了什么等等。那么，我说我是特务，至少也应该讲这一套。但是我参加过什么组织，它叫什么名字呢？里面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人（除康泽以外），谁和我联系，叫我做过什么，我做过什么呢？要把一无所知的东西编成能自圆其说的一套，该要多大本事？而且光是能自圆其说就行么？跟那真名字、真人真事完全不符行吗？当然不行。结果是再说一套……我对克寒同志说“不知伊于胡底”，就是这意思。我将被认为隐瞒、抗拒、狡猾、怙恶不悛……不知伊于胡底！

这时候我觉得有向组织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有必要：

我没有重新加入过国民党，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内任何系统的特务组织、特务性的以及其他什么性质的组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发现了足以证明我参加过那种组织的材料，都甘愿不

当作历史问题而当作现行问题处理。

敬祝！

聂绀弩 五五、九、十

又：

关于材料，我要重写，正好趁此把自己重新掘发一次。但这几天头痛得很，眼睛也发生问题，送上的这封信，就写了三四天。那么，星期六不能交稿。

预先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如果说它会和以前写的矛盾而发现问题，也一定是枝节而又枝节的。基本问题，决不会有所变更。

绀弩同日

我和反革命的关系及其危害性

(1955年12月)

先交代事实：

其一，和康泽。康泽和我在莫斯科同学。在我自己还是国民党的时期——二七年到二九年，在南京同过事，还在一个宿舍里住过一个时期，私人关系很好，主要的是他认为我有写作能力。三一年我因为在“九一八”事件之后，参加反日运(动)，主张停止内战，联苏联共，共同抗日，国民党要抓[我]，[我]逃出了南京，也就脱离了国民党。但三二年年底光景，我还在日本写过信给康泽，暗示叫他寄钱我做路费回国。他也寄过。三三年我从日本回国，在上海时，他从南昌写信给我，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听说他已经是特务头子了，回信说，我不搞法西斯工作，没有去。三五年，我入了党，党派我到四川去找他，打进他的机关——“参谋团政训处”去。我去了。他大概因为我曾拒绝过他，现在又自己去找他，引起怀疑，同时他虽然不知道我入了党没有，但总是搞进步文化工作的，就不让我打进去。但私人关系并未破裂，临别问我在上海的生活情况，说以后给我寄点钱。事后也真寄过一次钱。抗战开始后几天，我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由上海转移到内地，到了南京，队就没有

钱走动了。队的负责人马彦祥、宋之的，知道我和康泽有私人关系，叫我去找他捐钱。我去找他捐了两百块钱。三八年在汉口，他叫人找到他那里去，说他要去带兵，很可能死掉，如果死了，希望我把他当作一个民族英雄，写篇文章纪念他。这之后，他派人送了一百元钱给我。过了些时，我看一部大部头的书，是我久想要的《说文诂林》，却买不起，去找他叫他买了送给我。他照办了。四四年在重庆，老婆在北温泉办慈幼院，因为院里的事要找康泽，要我和她一同去，我和她去了。他和老婆谈过之后，特为拉在旁边问说，几年不见，对他有何观感。我讽示他不要当特务头子，他连忙否认说是外人中伤。我觉得我尽管和他私人关系不错，他究竟是特务头子，是[操]生杀大权的人，我对他的可说的话已到了极致，他既否认，即无诚意谈这问题，我当然不能谈下去了。四八年在香港，听说他被俘了，我写了一篇文章《记康泽》。谈到这篇文章，很容易想到是他约我在他死后写篇文章纪念他的那件事。但我写文章的时候倒真是把这件事忘记了，只想到暴露他的一些丑态。但效果却恰好相反。我特意加强写他说如果当了民族英雄，希望我写文章纪念他的一段情景，本是表示他怕死，好像死已经临头，而结果也未带兵，更没有[死]，所以可笑。而看过了那篇文章的同志，有人认为是纪念性的，把他写成一个真的民族英雄一样了。这，我也不争。我的问题是整个的，不在这一枝一节。

其二，和谷正纲。和谷正纲是留苏同学，回国后，[我]在伪中央党务学校当训育员时，他是训育处副主任。我离开南京后，和他没有任何来往。三九年我从新四军出来，住在东南战线社，正值《东南战线》被迫停刊。《东南战线》的负责同志骆

耕漠、邵荃麟等开会讨论这件事，看有什么挽回之法。关于这件事的权力，操在三战区政训处主任谷正纲手里，不打通这个关系，连为什么被禁都不明白。我说我认识谷，他们就叫我去找谷。我就和邵荃麟同志一同到方岩去找。到后，先开了旅馆，邵在旅馆等，我去谷在方岩的机关找谷。一去，见着了。谈到《东南战线》时，他就说，你原来是为这件事来的，那没有可谈的。那是共产党的刊物。我说不是。那里面的人我认识，有点左倾，但不是共产党。他说，还不是，连新四军的人的文章都登出来了，又签名拥护过共产党（指的什么现在不记得）。我说现在共同抗日，他们看见某种文章，某种主张不错，反正都是抗日的。这就是左倾的表现？是不是叫他们以后不要这样左，可以让刊物出下去。他说不行。这时候，他正要上金华，叫我和他同车回金华去，我因为还要和他缠一下，就和他去了。在车上他说我是共产党，我说不是，并说他的看法不对。凡是搞点文化的，左倾的，非国民党的都看成「帮」共产党的忙。缠了从方岩到金华的时间，大概点把钟，谈到刊物时他就拒绝谈，扭头去向同车的另一个姓吴的谈。最后他向姓吴的说，你看这就是受了高级训练的真正共产党，然后又向我说，说笑话的，不要认真。到了金华，我就下车和他分手了。邵荃麟同志在旅馆里到了一定时间，看我没有回去，就到那地方去问，门房告诉他说同谷一道走了，他就自己回金华了。晚上，骆、邵，还有别人，我们开会研究，我把谈话的详细经过（现在当然不记得了）报告了，大家认为这次去是有收获的，因为知道了刊物被禁的原因。研究的结果是骆提出一个办法，叫我再去找谷，说我自己出一个刊物，请他允许。刊物里不登新四军

的人的文章，不发表公开拥护共产党的文件。我说很少希望，因为他明知是《东南战线》的替身。大家说不妨试试。我又一个人到上饶去找他。找到了，向他提出我要编刊物的事，他当然不允许。我就在那里跟他磨菇了大概一两点钟，中间有别人来会他，我曾出去过一次。磨菇的结果就是不发表新四军著名人[士]的文章，不公开拥护共产党，不在生活书店出版，出得试试。这样就回来了。大家认为是大获全胜，就计划出《文化战士》，印上“编者兼发行人聂绀弩，生活书店总经售”（而不是出版发行字样）。但出了两期，还是被禁了。大家叫我再到上饶去找他。我去，他到重庆去了。他知道我会去找他的，留下话在门房：“有一个从新四军来的留俄学生，自称是谷主任同学，常在金、上跑来跑去，他再来时，叫他不要来了。”意思是再来就要不客气了。和谷正纲来往的全部经过如此。前后两次大概在一块儿有三四个钟头之久，当然谈了一些话，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新四军来；他问在新四军干什么，我说当服务团团员。他问为什么去呢？我说为什么不去呢？别处没有人要我。他曾叫我到上饶去住，给我解决生活。我说等我的生活真是山穷水尽的时候再讲。再是他再三问吴大焜是不是共产党（好像吴已被关在上饶了），我说吴是资产阶级，喜欢瞎出风头（其实对吴我一点不[了]解），最后一次甚至笑问：“毛泽东是不是共产党？”他有一点最和别的国民党不同，就是从头到尾不断地骂共产党，具体的话也记不清。在上饶一面答应准我出刊物，一面就骂共产党最无耻，无孔不入！接着又说，别多心，我[不]是骂你。他是我碰见的国民党中的最顽固的一个。我没有给他谈什么新四军的事，他试探地问什么的什么的时候

我就岔开。他说我是受过高级训练的，也包括没有回答他的话而言。这段经过，后来回新四军和陈毅同志谈过。

其三，和曾养甫。四一年，新四军军部被国民党袭击之后，桂林空气紧张，文化工作者纷纷离去。我也想离开到重庆去。那时我在《力报》编副刊。曾养甫过桂林，到编辑部参观，编辑部的人和他相见（邵荃麟同志是否见过，不记得，葛琴同志在座），谈过几句话，他就走了。事后，《力报》老板张稚琴对我讲，曾想请我去当私人秘书，问我干不干。我想利用他的交通关系到重庆（因为自己找关系，一则很少机会，二则要钱，三则路上说不定会出问题），就答应干。曾离桂时就叫我等一个名刘炎的押来的柴油车去重庆。过了几天，那车子来了。我坐那车到了重庆。到后，把这事对周总理谈，说我坐曾的车子来的，曾要我给他当私人秘书，我不想去。周总理说可以去。曾这个人，是宋子文系统，有些欧美资产阶级思想，和蒋系的人还有些不同，对人也好，能信任人，同时也很草包，比康泽容易搞。他快要去当滇缅路督办，正好去跑一趟。我问对党有没有什么作用。总理说没有。我就决定不去。我去见曾，恰巧那天报上刊载苏日协定成功的消息。他对我说，你看苏联和日本订立协定了，还说苏联不是帝国主义。我看了一下报，也不懂这协定的真实意义，但苏联不是帝国主义这事我还可说几句，我就讲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什么，苏联是什么，当然不同，这协定恐怕还有什么意义我们没有了解。他说我是共产党的意见。我正好借这事下台，就说，既然稍有不同都是共产党的意见，看来你那边的事很难办的，那就不去了吧。他道歉说他说话太快。没谈几句我就走了。后来他到滇缅路去时，曾派车到

文协来接我，我躲开了。文协还传为笑谈，认为我不负责或吊而郎当之类。我后来又和周总理谈这后面的经过，周总理笑了笑，说他当然不懂什么是帝国主义，也没有说我不去对不对。

其四，和张道藩。四三年下半年，在雪峰同志的住处碰见韩侍桁、姚蓬子。这两个人都是叛徒，这时都是书店老板。我过去都不认识，都是在雪峰同志住处认识的。雪峰同志住在姚蓬子的书店里。不知怎么谈起，他们看我没有职业，韩侍桁就说要想办法。所谓想办法，当然是指在国民党底下想办法。雪峰同志当时也在座，好像还说过应该想个办法这么一句话。又像说过之后，提着棍子出去了。记不很清楚，雪峰同志自然更不记得了。想什么办法呢？就是在张道藩所主持的文化运动委员会拿一笔用某刊物（刊名不记得，也许就叫《文化运动》）特约名义的“稿费”。这个名义是专为对从外地来的作家而设的，名为稿费，其实并不要写稿，如果写稿，另给真正稿费。茅盾及冯乃超、以群、雪峰等同志都是特约。韩侍桁说他去替我进行这事，去找李辰冬或王进珊去对张道藩讲，并说第二天就去。但过了许久杳无消息。韩也不过一时高兴这么说说，当然没有真去进行。我想，李辰冬虽不认识，王进珊却是认识的，何不自己去找。就打听王的住处，去找王。王原是伪党务学校学生。一找，他不在家，就留下住址（文协）给他，叫他找我。过了几天，王来了，我跟他提起这事，他很赞成，并说很容易成功，因为一则钱少，二则是一种特殊资格的进步作家，所以从来没有人进行，并且说张道藩还有想多拉几个装装门面之意。不知过了多久，王进珊又来找我，说事情成功了，张道藩约我去谈谈，我就同他去了。张道藩原来当我在伪中央社时，见过

一两面，没有接近过。一见面他就像很熟似地问了一些生活上的情况，欢迎我作特约，希望多写文章等等。后来他说你在（国民）党外流浪了多年了吧，还没厌倦么？他说过一次，我岔开。转了个弯他又回到这儿，我说这件事还有条件的么，那就该考虑一下。他连忙说没有条件没有条件，不过记起你原是党员，随便说说，那就以后再谈吧。他就叫李辰冬进来介绍见面，叫我和李办一下手续，李就把我引到他办公处，叫我写了一个收件地址，送了一份最近一期的那刊物和李自著的谈《红楼梦》的书。这样就分手了。以后只在苏联大使馆的什么鸡尾酒会碰见过一次张道藩，我出他进，打了一下招呼；另外是他请全体特约，我也去了。这件事动议是四三年，成功则在四四年。事先事后，都和徐冰同志谈过，事后的一次，他还说笑话要我请客。不过他说过和我的关系不是组织关系，也就不必提了。

其五，和张民权。张民权也是留苏同学，在我之后当过伪中央政治学校（原名“党务”）的训育员。在重庆时是三青团的什么处长。一直没有来往。四四年某月，他到〔我〕老婆的慈幼院去看他的儿子，问我在干什么，知道我在教私立中学，说为什么教中学，我可以找邵力子给他进行到复旦去。老婆写信给我，叫我有工夫去看看张民权。我过了许久才去，一见张，他说已经成功了，校长章益说已在叫人找你接头。我说我连影子也不知道。他叫我去问邵力子，我说我不认识他。他说今晚有个聚餐会，他是要去的，我可问问他。接着说，那会你也可以去，都是留俄同学，我给你出餐费算是招待你。我也没有考虑，到时候就去了。一去，看见里面尽是托匪特务叛徒之类，

邵力子和康泽高高在上。我才想到留俄同学会原来是这么一个东西，而感到很不舒服。散席时先走了，没有等张民权问邵的事，以后也没有和张来往，也没有回复旦的事。后来听说章益找不着我，但又有说因为有人不赞成，没有继续找。究竟怎样我也不明白。

其六，和曹勛。和一个名叫曹勛的反革命有私人来往。（这句话原被作者删去——编者注）这个人和我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在黄埔时是同期同队。四七年，我从重庆到香港，路过汉口，向同乡问起故乡情况，知道我原有的——栋房还在，因而想起回乡去卖掉那个房子。为什么想到卖房子呢？因为我的老婆在香港，我不愿到香港。我和老婆好多年来感情不好，她又不肯离婚。这时候，我在重庆搞过一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离重庆时约定彼此怎么想法子搞一点钱后到上海或什么地方去同居。故乡既然还有房子，正好去把它卖一点钱。那时解放战争已经打起来了，到处都很紧张。我之所以敢于回家，是因为曹勛在故乡当县长，我估计他不会害我。卖房子所费的时间大概二十多天，和曹勛来往不止一次，也到伪县政府去过。他知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呢？我想他是知道的。我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在故乡一带照顾过我的老婆，那时候他就知道我在新四军。但这次见面，一点关于政治的事都没有谈。房子卖掉之后，我就走了。四八年末，他到香港去找我，问我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没有办法，只有碰着机会就立功，这样他就走了。

其七，和李毓九、段梦晖。在故乡卖掉房子之后，并没有立刻离开汉口，因为大部分房款是限期的，不是现款，需要等，同

时又等四川方面的男女关系的消息。但因为时局紧张,又不敢在汉口久住。有一个名胡建文的也是莫斯科同学,在长沙伪建设厅当秘书,当然也是反革命,不过不是什么大反革命。我想到他那里去住些时,同时也看他有没有钱。我已经有一点钱了,如果他那里又可搞一部分,就可以到上海去搞出版社。在他那里住了一两天,他大概对我住在他家里这件事负不起责,就告诉伪厅长李毓九了。李也是莫斯科同学,但没有什么私人关系,据胡建文说,他对我观感不坏。他听见之后,就到胡家来找我,表示要挽留我在长沙住下去。不知怎么,胡又把这事告诉伪湖南《中央日报》社长段梦暉了,段也来找我。李和段商量如何留我在长沙。李说聘我当经济委员,每月可有四百万干薪,不要做事的;段说他报馆可以每月白给我二百万。补说一句,段是从前我在南京时的《新京日报》的总编辑,我带编过那报纸的副刊,我写的反日文章都是那副刊上发表的,闯祸闯得不能不逃走,也是在那副刊上。抗战期间,在桂林碰见过他。谈过几句话之后,就说我是共产党,因为我说话的词汇都是共产党的,劝我留神。同时我把他的伪湖南《中央日报》社长的证章带到重庆去了。他和我的关系就是如此。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解放后当过中南新闻出版局的新闻处长。现在不知在何处。过了一个多月,伪经济委员的名义发表了,伪湖南《中央日报》用特约写一篇小说(事实上不要写的)的名义送一个月的“稿费”,李毓九还在替我进行到湖南大学去教书,似乎成功了,听说湖南有学生在打听我的住处,要来欢迎。我到长沙原只找个短期的隐蔽处,并不敢久住。伪经济委员,我原以为是伪建设厅的,及至发表时,却是伪省政府的。加上要到

湖大去,我觉得张扬太大,怕出问题。而这时房款的限期已快到了,四川方面的消息无希望已经确定了。我就借口到汉口去过年,离开长沙走了。

其八,和姜斌。抗战期间,在桂林认识一个名姜斌的,湖北同乡,是个搞青红帮又做买空卖空投机生意的角色。四九年开国之后,我到武汉去工作,他在搞私营航运,其实自己也没有资本,东挪西骗的玩意儿。解放后还坐过一次牢。他说因为人民政府以为他是特务,及到查清楚不是,就放出来了。这样一个人,听说我到了武汉,来找我,见过一次。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出在我听说这时候正需要派人到敌军里去做策反工作。而中南统战部长张执一同志还对人讲,我有这种旧关系。我听见了,活动了一阵,也没有找到人。记起姜斌从前谈过他和一个什么国民党军官有关系,找他一谈,谈出他和伪台北卫戍司令彭孟緝有私交。我动员他去,他也表示愿意去。并说钱鹏飞也和桂系方面有关,可以到广西方面去。我叫他去约钱——钱在桂林当过伪军委会的什么检查哨长,在桂林时曾在姜斌那里见过,没有来往——一面去和张执一同志谈,张执一同志叫我约他们和他会会面,会而之后,决定姜到台湾去,钱到衡阳去。我向张执一同志谈,我可不可以和姜斌到香港,以后和姜斌联系,因为台湾直接和内地联系不易。张执一同志同意这意见,就派我和他同到香港。钱后来因衡阳解放了,没有去。补说一句,为什么介绍这样的人呢?因为做这种工作总是这之类的人。临行是说叫我过一个月就回来,但路上就走了半个多月,到了香港,姜和彭孟緝通讯搞入境证就花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又没有立刻去,因为碰见认识的做生意的人(我不认

识),人家拉他搞生意,他想骗人家拿钱,自己不拿或少拿钱做生意,耽擱了许多时候。五〇年一月到香港,四月中才去台湾。到台湾后先后来了两封信,第一封信说他到了,会见了什么人,第二封信说他谈过什么话,结果很好。我也回了他一封信,叫他加紧进行。六月中旬他从台湾回香港来了。他说最初彭表示很好,只要解放[军]攻台湾,他可以起义。只是监视严密,别的事难办。准备把他[姜]留在台湾。后来因为有了风声——因为粤汉路通了车之后,许多反革命由武汉逃港,知道姜斌的事,通知台湾方面了。彭孟缉怕出大问题,就用一个“形迹可疑”的罪名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是故意把他送走,因为普通人出境要一万块台币押金。他也把驱逐令给我看过。我叫他写报告,他写了,我看很空洞,叫他再写,再写也不行,就没有叫他写了。这时候我正准备进《文汇报》,时间一拖就忽视了。我曾叫他回国,他说他在武汉的船也没有了,还欠许多债,回国要坐牢,他不回去了。可是在香港也无法生活,和他的一个外甥,以前做过海员的,住进香港的贫民窟木屋里去了。以后因为不能开伙,曾向我拿过钱。这件事从头到尾简略地说就是如此。但我除了写过一次简单信给张执一同志之外,不曾汇报过,后来回武汉,本拟向他汇报的,看他没有问,自己又不好意思提,就连口头汇报也没有作。姜斌写的信,驱逐令,报告,也没有留着为证。但驱逐令和报告,在港的一位专做对台工作的钱同志看过,姜去台前、回港后都和他谈过话。他没有说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是他,这件事简直完全没有组织上的人可以证明。这件事中间还附带有些旁的问题,其一,是组织上两次叫我回去,我都没有回去。一次叫人带来一个纸条

子,那时姜斌还没有去台湾,我以为这件事毫无结果,丢下了不好。第二次张执一同志给我一信,那时我已经进《文汇报》了,我回信说,我的关系已转到华南来了,是否还需要回来呢?他回信说他不知道,既然如此,就不必回来。其二,是有一个名叫陈义明的,原来不认识,过去是国民党军官。在武汉活动人做策反工作时,有人介绍。我和他谈,他推说没有办法。这时候逃到香港来了,找到姜斌,约我谈话,表示愿意参加到台湾去的工作,但语气之间却是要挟,即你们的事我知道,你不给我到台湾的路费,我就去揭穿。而他同行的还有三个人。我把这件事向组织反映,组织派那位钱同志和他谈,结果也大概补助了他们的路费。其三,有一个名管子芳的,也是国民党,从前我在南京时就看见过,抗战初期在武汉时也见过,没有来往。在桂林时,他曾到桂林住过一个时期,有过几次来往。这时候也通过姜斌找到我,引一个原在汉口开栈房的卢朴安的老婆和儿子来,说那儿子要去投考武汉大学,请我介绍,我给写了介绍信。其四,到香港去的时候,张执一同志对我说,可以叫曹振武回来,他没有问题,并把他的地址告诉我。曹振武是参加辛亥起义的老国民党,是同乡的前辈,即曹勳的哥哥。我到港后去找到他。他表示愿意回国,但精神上没有依靠。正在想法和董必武同志通讯,如果董老说他可以回去他就回去。他有两个女儿,其实是曹勳的女儿,要求回国学习,我介绍她们进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去了。

其九,和胡风。和胡风是三二年上半年在东京认识的。先认识方瀚(现名何定华),是老婆介绍的。后由方引到胡风住处和他会面。那时胡风是左联支书,也原是为加入左联才找他

的。会着之后，他问了一些我原在南京的情况。事后，他叫方瀚通知我写历史材料，我写给他了。后来好像又谈过一次话，大概是关于文艺问题的。他说我写的材料送到上海批去了。过了许久，到了计划出刊物时，他告诉我已被通过为左联盟员。这之后就是出刊物《文化之光》，时间大概是五月，因为头一期就是谈五四，他写了一篇，我写了一篇。出版之后，他的一篇受到社联的出版物的批评。他很气愤，就商量给以回答。他回答了，我也写了文章。但是什么问题，我写了什么文章，什么内容，现在忘得干干净净了。接着社联又回答，我们又回答，就引起所谓论战。刊物大概出了四期，他主张不出了，理由似乎是日本警视厅已经知道了。根据什么迹象，现在记不起来了。大概与出刊物同时搞什么“新兴文化研究会”[有关]，他说左联名义太红，用这名义可以吸收些人。但也没有吸收多少人，除了他，我，方，周颖，王达夫之外，就只有一个杨玉清，一个陈建晨，这两个人都是国民党，参加得很勉强。这研究会似乎只开过一次会，后来也冷下去了。整个在东京期间，胡风的历史，胡风除了跟我来往的活动，胡风和什么日本人来往，我都不知道。胡风从来不谈他的历史，问他，他只说那有什么可谈的呢？只从方瀚口中知道他在大革命时代加入过党。另外他自然早认识杨玉清。还有就是小林多喜二死时，他表示愤恨和惋惜，好像认识。再，他和方瀚谈话时，彼此都像对日本文化界如筑地小剧场之类很熟悉。好像认识里面一两个演员。但那名字却不晓得。我是一句日本话也不会说，一个日本人不认识的。三三年三月夫妇同时被捕，被捕后一星期，把周颖放出去了，说因为她是女的，她放出之后来看我，告诉我别人

连胡风也于同日被捕。关了三个月，审讯了三四次，于六月上旬被押送出境，在车上碰见胡风及其余几十个人。胡风在路上讲过几次他被打的情况，说他不能忍受了的时候，就浑身一松，刑事看见，以为他要死了，就停止打。除此之外不记得他谈过别的。关于审讯什么事的事，一点印象也没有。到上海一上岸，好像他就不见了，没有和大家住在一块儿。但一两天之后到旅馆来过，用集体名义发表的一个反日宣言是他起草的。他来时疲倦极了，一倒床就睡着，要他写文章把他搬起来，他又倒在这头睡着了。好像几天几夜未睡，不知什么缘故。后来就是[在]陈良屏家里见面，我到上海后，最初同住的是陈。提起这人，他是我的同乡，在上海社会局当办事员或科员之类。据我所知，他和胡风并不认识，是因为胡风到他家里去找我才认识的。胡风在上海的住址，我从来就不知道，一向更没有想到陈会知道并和他另有来往。陈的材料说自己 and 胡风有关系并到胡家去帮忙什么，真是怪事。我原以为陈因为自己是留用人员之类，写材料时以为胡风是了不起的人物拉个“革命”关系以自负，现在取消这种想法。胡、陈两人我都不敢担保。过了不知多久，胡风来说跟我接上了左联关系，以后左联这个关系就是胡风来领导，另外就是所参加的什么委员会或小组的负责人。但胡风在左联任什么职务，什么时候撤销了工作，我都不知道，以后很长的时期，我都以为他对我是左联领导者。不但这，就是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事，也很晚才知道，这一点印象很深。我快写完第二篇小说的时候，说写完了请他先看看，他叫我寄到中山文化教育馆去。这时才告诉我他在那里面，而我写那小说是到上海一年以上了。并且仿佛不很久，他

就不在那里面了。但他说左联的人这个怎样却很早。究竟起于何时不记得，只记得说穆木天怪我编《动向》时请客把他漏掉了，送报也漏掉了，却是三四年三四月间，因为编《动向》是从三月开始的。他经常说周扬、田汉、夏衍等反对鲁迅，具体事实忘记了，其中可信的材料之一是田汉动不动就攻击一下鲁迅。再就是说周扬同志不高兴他，是因为他写了骂第三种人的文章。我不很理解文坛情况，当时只奇怪，第三种人为什么不能骂呢？现在也奇怪，骂第三种人周扬同志为什么会不高兴呢？他就用这些办法在我身上培养一些宗派情绪。我也不大能接触到什么别人，当然上他的圈套，以致两个口号论战时，经过他的发动，写了一篇说国防文学口号不如民族革命大众文学口号好的文章，犯了鲁迅先生所指出过的错误。在上海的一段时间的情况如此。他不谈自己，我以为他深湛；不告诉住处，我以为组织性的事应当如此。现在想来却是别有所在的。抗战发生后在武汉的一段，我来来往往停留得不多，和他来往也不多，到武昌他的住处一次，碰见鹿地正在他家里，他们用日语谈话，我不懂，不知谈些什么。其间就是我替他编的《七月》写了几篇文章。三九年从皖南出来，在金华曾写过信给他，叫他问周总理调我出来做什么，是否有什么急需赶到的事，因为当时情况，我不能直接（写）信给总理。他回信说是他请总理调的，去编《七月》大众版。我看是这么件事，就没急于赶到重庆去。四一年我从桂林到重庆，正值他要到香港去，叫我接编《七月》，把登记证和几个作家地址交给我就走了。稿子一篇也没有，那些作家一个也不认识，又彼此住得非常远，动辄几十百把里路，他又没有告诉书店说明交给我编的这事，

也没有介绍我给书店,而那时长期大轰炸,书店又不知搬到哪里去了。因为这些条件,《七月》出不出来,后来因为延期太久,国民党把登记证吊销了。就为这件事,他说[我]断送了《七月》,说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对我不怎么好了。四二年都在桂林时期,没有什么可说的,起初我编了两期《山水文丛》,一期是以他的文章为书名的——《死人复活的时候》。他曾和茅盾、巴金等人计划编抗战文学大系,曾约我看选杂文方面稿子,但计划未实现。此外他在好几篇文章里不指名地骂过我,什么文章记不起了。他在桂林时期,住在胡危舟家里,在张煌的出版社出东西,这都是问题人物。而南天出版也不知什么人拿钱出来的。在这期间,我写过一篇《胡风的水准》,是帮他的忙,讽刺郭沫若的;一篇胡风自传的后记,是带着怀念的感情的。两篇都写于四一年以前。四三年我到重庆,他早到重庆了,没有来往,不过偶在文协碰见。他的家(赖家桥)我就没有去过。四四年某夜,听说他来了,住在第三厅,我冒雨摸夜路去找他,冯乃超同志正和他在谈话,我告诉胡风我要编一个刊物,请他支持。他摆起好像他是组织的面孔,斥责似地说了许多难听的话,我跟他吵了一架。这之后,我和骆宾基约好不理他,不跟他讲话,一直到四九年到北京来开文代会的时候。所以他的《希望》里没有我的文章,他出版的书我也没有看。这中间,他曾在编后记之类的捎带地讽刺过我几次,我写过一篇《论申公豹》骂他,后来在香港又写一篇《鱼水篇》,是指名批评他的。在北京的这一段,是他住在文化部的时候,常来找我。现在看来他是来拉拢联络的,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他搬到北京来住之后,我反而去找他。到他家里一共十几次。前后谈

话，记不清楚，也无法一一写出。大致说来：一，他说舒芜揭发路翎的文章全是造谣。二，他说雪峰同志和丁玲本来可以支持他，因为怕事而不敢；他则因为不愿做他们的工具，也不愿意受他们的支持。说雪峰同志拉任叔同志到社来是错误。三，说任叔同志能力不行，假如行，外交界需人正殷不会放他走。任叔同志的论稿是强迫新文艺出版的。有一次，我和舒芜、何剑薰三人到他家里，他对舒芜说我这地方不许浑蛋来，把我们三个都赶出来了。有一次对他泄漏了高饶事件的党的机要秘密。

我和反革命的关系不止这些，这是比较严重的，有代表性的。支部大会中有人问，这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呢？写交代材料，也有同志问，和他们其中特别是康泽有没有政治关系？关于这，我早已向党表示过态度：

如果发现了足以证明我重新加入过国民党及其任何组织，和这些反革命有任[何]组织关系，或者自首过，出卖过什么人等等，在任何时候发现，都不当作历史问题而当作现行问题处理。

这些人中最易被疑为有组织关系的是康泽，他是特务头子，和我的关系时间也较久，来往也不止一次。现在我知道组织已掌握了充分材料，特别是关于康泽的，有我意想不到的东西。别的也可推知。但我还是可以说，任何时候发现上述的那种材料，当作现行犯，甘罪无词。不是说那些材料会和我的交代毫无出人，但无论有什么出人，基本问题是不变的。

和反革命的这些来往，有的是被派去的，有的是事先或事

后组织知道的,有的是党的领导或党的先进知道的,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我从这些和反革命的关系中,确实检查出我自己的反革命根性出来了。这些关系,对政治关系而言,都是私人性质,我和其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政治关系,其中如曾养甫,张道藩,连私人关系也谈不上,不过在社会上鬼混中间的一种偶然的机遇。但和那些国民党的私人关系,除了曹勛是从小认识的以外,都是从政治关系来的,即从过去的政治关系——过去我是国民党,一同参加过罪恶活动。这过去的政治关系之所以到了没有政治关系而且变成敌对的政治关系(谷正纲显然是认为我是敌人的)的时候,还能使他们对我有若干好感,至少是情面之类,如反共情绪表示最烈的谷正纲,尽管一面指桑骂槐,但还是准许出了两期刊物。虽然心理复杂不易猜测,但至少也说明我过去在他们看来是不错的,很合乎他们的政治要求,而现在也还不是他们的最直接的政治死敌。这种私人关系其实充满了政治意义,在这个政治意义的照明之下,我的反动性已经须眉毕现了。不仅如此,有些人是和我有感情的,如康泽和曹勛,尤其是康泽,私人感情纯粹由过去的政治关系亦即政治感情而来。这种关系和感情,就我这方面说,问题更严重。它直接表示我在参加革命之后,还对过去罪恶活动的伙伴有所依恋,间接表示对过去罪恶活动本身有所依恋,亦即对那种活动不但毫无悔罪之心,甚至还有沾沾自喜之概。康泽是著名的特务头子,曹勛也至少当过特务,都是最凶恶的政治敌人,对这种最凶恶的敌人还有感情,那就无论多少,都是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假如有立场)的精神叛变。我对我的反革命阶级根性是在这儿抓住的。抓住之后,其他问题都迎刃而

解。曾养甫、张道藩，前面说是一种偶然的机遇。但这只是把问题孤立起来看时，才是如此，若当作整体的一部分，却并不偶然——我之所以不争什么事是被派的，什么事是组织知道的，就是因此。正是我这样有着反革命阶级根性、对最凶恶的政治敌人都怀有感情的人，才会想到去利用曾养甫的交通关系，到张道藩那里去打什么主意。也因为是我，才被私人感情也很淡然的李毓九、段梦晖之流当作施惠的对象，才认识姜斌那种人，也才能成为胡风的俘虏。

其十，以下试探一下我和反革命关系的危害性。

我和反革命的这些来往，对党对革命的危害，首先是毁灭了我自己，而毁灭了自己这件事本身，同时也是毁灭一个共产党员，毁灭了一个党员所应发生的革命作用，削弱了一分党的力量，革命的力量；也无异增长了一分敌人的力量。和康泽、谷正纲、卓衡之的来往中，都得过人家的赠与，对康泽还自动向他要过钱，敲过他的竹杠，得过他的津贴。这还可以说有私人关系在内，钱也可能完全出自他们私人；但和张道藩连私人关系也没有，和段梦晖也不算有什么私人关系，钱又不出自私人而出自国民党的文化机关，这就只能是一种政治性的出卖。而且张道藩的收买之意已明白讲出来了，尽管我没有回到国民党去也没有替他作过别的任何事情，但我没有表示严正的态度并拒绝那笔收入，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公开拿国民党津贴的人，也就是对党对革命的叛变。至于和李毓九的关系，更使我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吏，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候，简直就是投敌分子。贯串在这一切关系之中，比任何个别事件乃至一切事件都严重的是，我对这些事的严重性毫无感觉，一点也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对。甚至有时还觉得骗骗国民党的钱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欺诈取财的流氓想法，是从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来的，也就是反革命阶级根性的另一种表现。这种不从政治看问题，不知道从政治看问题，以及毫无组织纪律观念，藐视组织纪律，甚至到胆敢以身试法，泄漏党的重要机密，除了反革命阶级根性之外，还从早年所受的《庄子》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来的，那些东西巩固了我的反革命阶级根性，特别是《庄子》的置身一切事物之外的《逍遥游》思想和不问是非的《齐物论》思想。我把在参加革命之后接受康泽、谷正纲的钱和从前在一起时的钱财不分彼此，有无相通看成一回事；拿过谷正纲和卓衡之的钱之后，回来还洋洋自得地对同志们讲，用那钱请同志们大吃大喝，严格地说，也就是起着腐蚀同志的作用。完全不了解伪文化运动委员会聘请别的同志作特约和我自己进行去拿那笔钱，政治意义是刚刚相反的。一点也没有想到接受李毓九、段梦暉的假公济私的“恩惠”是一种变节。既然不知道从政治看问题，也就谈不上政治警觉之类，这特别表现在姜斌关系上，自己处于反革命包围中也不知道，反革命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派他的外甥回国就派外甥回国，不向组织反映。管子芳、曹振武要写介绍信就写。以致一贯离奇荒谬的无组织无纪律，如在姜斌关系上所表现的，在我的问题上反而是小事了。

旧世界对新世界的反抗，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方法的，其中最毒辣阴险的是腐蚀那带有反革命阶级根性而又混进了革命队伍的人，让他不能摆脱反革命阶级根性，不能获得革命的阶级立场和感情，不能成为革命者，而是相反，成为危害新世界的反革命。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个人是

阶级斗争的体现者。在革命队伍里如果不能起革命作用,势必或多或少地起着危害革命的作用,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是反革命作用。或多或少地成为革命阵营里面为反革命服务,体现着反革命的阶级斗争。我就是这样为旧世界服务的一种人。这些行为对党和革命的危害性,到今天为止,我还未完全认识清楚,反革命阶级根性极狡猾地蒙蔽着我的理智。但有几点显而易见的却可以指出:

拿姜斌这件事来说,首先放走了姜斌本人,又资助了几个反革命到台湾去,这都是增加敌人力量的事。姜斌是否特务我不知道,当他工作时究竟为谁工作也是问题,而他在香港已经生活无着,以他那种人,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参加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同时我还介绍了来历不明的人及反革命的子女回国学习,即使都真是他们自己来,真是学习,也是敌我不分,让敌人子女混进革命阵营,不知会造成什么恶果;而那介绍信是可以冒名顶替的,可以不去学习而混进来作任何反革命活动的。姓卢的那件事的下文我不知道,姓曹的两个女孩子,听说是曹振武的老婆送她们到广州的,谁知她是不是借此为名而另有任务呢?既然她可送,别人当然也可以送,怎能保别的反革命没有掺杂其间;即使事实上没有,而这种危险性总是有的。我还不止介绍过三个青年,最严重的[是]替一个反革命王镜清写过介绍信(没有生效,不是国家机关),介绍过当时不知他是反革命的庄涌,介绍过不知有何历史问题的李石锋、谭宝一。(经过这些痛苦的经验教训,现在才明白,在我的这种情况之下,凡是要介绍的,不是反革命也与反革命问题有关)这就说明,我是个党的缺口,反革命可以从我这缺口涌进涌

出，给党和革命的危害怎可计算得出呢？

就和胡风的关系谈。首先我是胡风“理论”的体现者，他主张不要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我正没有立场和世界观；他煽动作家脱离政治，脱离群众，我正是如此；他鼓吹自发性，反对学习改造，我正是没有经过任何学习改造，醉生梦死地过日子……诸如此类，我几乎以为他的“理论”是以我为模特儿描画出来的，而我的毁灭，恰好证明他的“理论”破产。关于这，还可以说不是受了胡风的影响而是我本来如此的。但却有受他的影响的地方，即他对周扬等同志的宗派主义态度。当我在上海时，对文坛情况不了解，组织上的事更不了解，又很少[有]办法接近周扬同志他们，即很少[有]机会直接了解，不免被他所蒙蔽；以致造成对他的一种盲目的信任，发表他的自传，并在自传后面写了带有感情的后记，并写过帮他的忙讽刺郭沫若的文章，成为胡风吹捧者，今天说来，即反革命的吹捧者。但更严重的是在北京的这一段期间，明知他的思想有问题了，而且是反党的；后来林、何同志的批评也看见了。他当然要来找我，看准了我是他“联络拉拢”的好对象，而我这种有反革命阶级根性的人，正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和他气味相投，倒过来我去找他。这样我就成了他的情报员，庄涌被捕了去找他，告诉他庄涌那里有他的信；王任叔同志要来社了，又去询问他对这事和这人的看法；而且藐视法纪，告诉他高饶事件的秘密。为他当情报员简直到了赴汤蹈火的程度。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他是怎样的反革命（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已想通了），也不知道我供给他的一些情报发生了什么具体的危害。但庄涌事件是供给了他以思考对应之策的余裕，关于任叔同志的事

也给他机会，考虑如何破坏国家出版企业，中伤领导，特别是在我身上打主意来实现他的阴谋诡计。泄漏党的机要的秘密——高饶事件的危害更百倍于此，它是使敌人提前窥知党内虚实，供给敌人以直接危害党，危害国家，危害整个革命事业的资料。同时我又是胡风企图的党内执行者。胡风说雪峰同志如何如何，说任叔同志如何如何，恰好我曾在群众中用资产阶级考据的观念，以十分恶劣的态度攻击过雪峰同志谈《水浒》的文章，在领导会议上和他吵嘴；对任叔同志的态度更坏，造成二编室对任叔同志的不满，自己又毫无根据地说任叔同志自己想当社长。种种反组织、反领导，因之也是反党行为，恰好正中胡风下怀。而我这种在党为反革命服务，也不仅是对胡风，对一切反革命都是有利的。

为敌人作党内代办，不但表现在某些行为上，也表现在某些文字里。人怎么生活，就怎么思想。既然我的反革命阶级根性还如此顽强，既然我对某些反革命还保有某种感情，它就不能不在思想上有所反映。我的思想一向落后，全部文字都是落后思想的表现，没有一点马列主义气息，不知给与读者多少毒害，而直接表现了反革命阶级根性的，是《记康泽》，当时主观上想暴露康泽的丑态，客观上反而像康泽真有意去做民族英雄，替他尽了宣传或辩护的任务。我的对反革命的感情限制我，使我只罗列了一些现象，而没有向更本质的东西突进。另外是臭名昭彰的《命令你们停战》，说两党都不要打内战，自己站在“两党”之外和之上，把革命的党和革命的战争与反革命的党和反革命的战争等量齐观，一齐称之为“内战”，这就混淆了党和战争的性质，抬高了敌党，降低了我党，实际上尽了为

敌党宣传辩护的任务。有着这样的思想意识，再来描写革命领袖，不言可知，势必非达到侮辱领袖的境地不可。我写过一篇《毛泽东与鱼肝油丸》，是因为报上有人捐钱给毛主席买鱼肝油丸吃，因为他看毛主席好像不很健康。这和我在延安看见的毛主席的一时印象有点相符，我就写了一点我的印象，此外还谈了一些什么，现在记不起了。但里面没有对革命领袖的热烈的爱戴，客观主义地把毛主席写得像个病夫和没有任何过人之处，破坏了读者脑中的毛主席的崇高伟大的形象，甚至使读者对毛主席至少是外表方面产生一种幻灭之感。对于党、对于革命是很不利的；同时当然是有利于党和革命的敌人的。上面说过，我的文章几乎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为胡风而讽刺郭沫若，为胡风自传写的后记这种明显的问题还不算。我应该加以仔细深入检查，这里限于时间，只说到这些为止。

关于危害性，目前所能检查到的还只是如此，我愿在同志们的帮助之下继续检查。

三十万字和猖狂发言

(1955年)

应该是在号召批评《文艺报》之后，一天，我和胡风谈到他的“理论”问题（在他家里），我说他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说他一点儿也没有错，又回到他说过的“只有毛主席理解”。他已经写信给毛主席了，并说说不定批评《文艺报》和周扬不兼文化部[领导]是与他的信有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把他的意见写给毛主席去了。但还不知道“三十万字”；三十万字是在“意见书”快在内部印出的时候，在邵荃麟那里听见说的。我曾为有三十万字之多而吃惊。（当他说他写信给毛主席了的时候，我的心理是什么呢？好多时来，其实虽然香港时代就已经有人指出他的错误，我自己也还写过文章，到北京后，林、何文章也发表了）（以上括号内文字原被作者删去——编者注）牛汀说三十万字材料是我供给的，不知根据什么。而且意思也弄不清楚，是三十万字里面的材料有我供给的呢，还是都是我供给的呢？是我事先知道他要写什么而供给呢，还是不知道呢？我在这里声明一点：

三十万字，从他立意写到写完送出这一个长期过

程中，我一点不知道，绝对未参与过会议或意见。

供给材料之说，也听见邵荃麟讲过，他说：胡风把谁和他谈的话都写进去了，其中也有我说的。为了这事，我曾要到一份“三十万字”来看过，还没有发现什么。当看的时候，不仔细，现在也记不起什么来。但就记得较清楚的意见书部分讲，里面决没有一条材料是我供给的，也没有一条意见是我的。仿佛记得事实部分，他把谁同他讲什么都注明得很清楚，怎么与我有关呢？是不是现在还可给一份“三十万字”让我仔细看看，看出那些话是我说的，让我彻底交代呢？

关于猖狂发言，已经交代过。我同女儿到他家里去，大概是快开扩大会议了。我问他发不发言，他说如果有人请，他就发言。我问他发什么言，他讲了一点发言的内容。说的时候也很猖狂。但我当时不但态度，连内容也没有以为有问题。曾说“你发言吧”之类的话。出来之后，我女儿说他有神经病。他第一次发言（我只听过那一次）之后，我还认为很不错，还未散会的时候，我在厕所碰见骆宾基，（曾对骆）说他发的言很好（但具体的话记不起，大概属于“有声有色、慷慨激昂”之类）。第二天在社内对舒芜讲过，具体的话也记不起，大概是像他[舒]所说的“尖锐，尖锐”之类。总之，我不但觉得他的话的内容有道理，连那猖狂的态度也觉得不错。除了对舒芜讲过之外，是否还对别人讲过，记不起。以理度之，很可能对张友鸾和毛邦安讲[过]，因为这几个人比较接近，容易讲到。但记不起讲过。如果对张讲，恐怕只剩下态度问题，我跟张讲话，通常不大接触到思想内容之类。对毛讲，恐怕连欣赏态度的话也

没有，因为她屡次反对我和胡风来往，我认为她机械。文艺问题是比较复杂的。这种意见，我也曾对许觉民讲过几次，最后一次是在通知我停职反省的那一天，我还说文艺问题真复杂。其实这时候我已经知道他的“理论”是错误的，而且《人民日报》已宣布他为反革命了。我彻底悟出他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我也说过，是在反省期间，是和悟出我自己是反革命同时恍然的。关于猖狂发言，曾有一天躺在床上想到，他的话是全部不对的，他自己倒真是庸俗社会学和形式主义。我在扩大会议发言时，曾想提出谈谈，因为对“庸俗社会学”的真正涵义弄不清楚（现在还未弄清楚），没有提。

我和胡风的关系本身具有复杂性，我现在还分析不出。其复杂处在于，我知道他的“理论”有问题、反党，还以为他有什么高明处未拿出来，愿意他是对的，愿意毛主席能理解。同时我对邵、林、何的理论也从来没有以为是不对的，顶多也只以为那些文章把胡风的片面的可以讲的地方抹煞，所以不容易解决问题，使他在读者眼中还有逃路。可是我还同他来往，一点也不觉得这来往有什么问题。真不知什么道理。但这我自己分析不出的地方，和我对别的人和事的态度是统一的，即我对反革命有先天的契合，看见了，像看见至亲骨肉一样；对革命有先天的抗拒，这大概是所谓反革命阶级根性，使我这里那里凡碰见党群相对的地方，我总站在群众立场，反党立场。问题是我自己检查来检查去，一点主观上的反党反革命的意思都没有。赶紧声明：决不想用这句话来企图什么，不过说一点内心的真话，也明知道凡是反革命，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反革命，大概有一条规律：自己不说知道自己是反革命。政治上的事，当

是问作了什么；怎样想是次要的。我之所以说出这句话，是因为越反省越不了解自己，希望组织能帮助我分析，因为这件事对我自己是很重要的。

猖狂发言后，我和胡风就没有来往了。不知何时（总在《我们要战斗》^①发表之后），萧军来邀我去胡家，叫胡把他究竟要怎样，一齐摊出来。我未去。

关于我对胡风问题以及我的整个问题的矛盾，我一直以来的行为、思想、感情、理智的矛盾，乃至在反省中间的心理矛盾，我还想不出用什么话表现。群众说我还没有认清自己今天的地位（人民的敌人），不在乎；楼说我没觉悟，没有站在党的立场和过去的反革命的我斗争，甚至以为党在罗织我。这些话，都道着了我的心理状态，至少是道着了心理状态的一面：我至今还未完全反省到我自己是反革命。作为党员，我当然是最坏的党员，只是无组织无纪律到了我这种程度，早就应开除，更不必谈对党的毫无理解，毫无党的立场等等。我满脑子都是欺骗组织，抗拒组织的想法，几乎只要动一动都会反党。但作为反革命，我又是歌颂党，歌颂新中国，从来没有一次半次曾经想到要反她。我的行为，在反省中，最使我痛苦的是介绍反革命和与反革命有关的人或有问题的人，对于这种人，几乎是来一个介绍一个，唯恐一夫不得其所（我说“几乎是”，因为也有拒绝介绍的，但拒绝也不是由于政治认识，面是因为他同我毫无关系）！其次是从这些事追溯进去，在感情方面，对

^① 《我们要战斗》：指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2月10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某些反革命(如曹氏弟兄)实在有如至亲骨肉。更奇怪的是对于我实在看不起的人(如姜斌管子芳),也能跟他们来往,以致发生严重问题。于是得到结论:天生的反革命!我很同意“反革命阶级根性”,“阶级异己分子”等语,就是为此。对于一个反革命,他主观上怎样想是不重要的;但自己反省,自己主观上想反过没有,应该是重要的。另外我和任何反革命都没有组织关系(尽管今天还未得到完全的信任),这一点也应该是重要的(所谓没有组织关系是指参加革命以后,在南京时我是国民党、改组派)。既然没有想反革命,没有反革命组织关系,我的行为无论怎么可疑,或不可理解,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因此我又以为我的问题并不严重,甚至连党籍都不会开除,听大家说我是反革命,盗贼,流氓,骗子等等,实在像听说别人的事一样,不在乎。同时也就觉得自己在衔冤受屈,在被罗织。我认为我基本的东西是对政治、革命的实际斗争的无理解和玩忽乃至轻视,现在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一望而知的事,一个五十几岁的人在几十年经历中都没有知道。及至反省到这些都是不对的时候,又得到一个结论:不习水性,淹死在水里——这话又恰好和“天生的反革命”相通。我的反省过程也是个矛盾过程,一时以为什么都完了,一时又以为没有什么,两种心情轮流交替,周期性的此起彼跌,此跌彼起!老实说,我现在还是这样。

对胡风问题矛盾更多,一面已经到了以为“胡风的‘理论’连小孩也骗不信,何以他会有那么样的自信,狂妄到以三十万字上毛主席”的程度;一面在开始反省时还以为文艺问题复杂。……我希望组织了解我的心理状况,当然更希望帮助我分析这些矛盾!

和姜斌在香港

到九龙后，住在旅馆里。第一次和他过海时，他就在轮渡上碰到熟人。那人三十多岁，中等以上个子，好像还有点漂亮的样子，喊他“姜大哥”，都是湖北口音。另一个女的，大概也三十多岁，和那男的是夫妇。那人自然问他什么时候来的及武汉情况。他似乎没有怎么答复。他们谈话时，我让到旁边去了，为了避免让那两人知道我同他是一路的。过了海，他和他们分手了。他告诉我，那人名张国×（后一字记不起），原在武汉开什么铺子，解放前就到香港来了。那女的是老婆，妓女出身。现在准备搞什么生意。关于生意的事，我一无所知，话就溜过去了。总之，他在香港的关系是通过这姓张的联起来的。好像只一两天，他就和那姓张的去跳舞，替他介绍了一个舞女。另一天和那舞女到什么人家里去打牌，赢了一百多块钱，都给那舞女了。什么人家里呢？还是听见过的名字，也是湖北商人，就是名字忘记了（记起了还可以补充）。就在这几天中，他一次回来说，碰见张稚琴，听说我来，约我明天到大酒店见面，请我吃饭，张说他有房子，问要不要。不要押金，租金二百，几时他碰到出押金的人，我们就搬云云。第二天，我碰到张稚琴，谈了两件事，一是房子，我答应要；二是约我给《文汇

报》写社论。他说你来干什么的？我说有点事。他说怎和姜斌一道，我说在广九路火车上碰到的。住进那屋子之后，他又问过一次。我说你不要管。他没有说什么。但其实等于告诉他了。和姜住在一起，大失策，因为谁看见了都会怀疑。住进去后，他带过几个人来，一那舞女，舞女后来还带过一两次“姊妹”，二是姓张的老婆，姓张的恐怕也来过，我不知道。三是一对夫妇，男的个子不高，黑瘦，四十来岁，湖北人。姓名，姜讲过，记不起，好像是“崔国基”之类，解放前在武汉干什么差事，也不记得了。女的显得很老很丑。他们同时来过两次，女的单独来过一两次，有一次还在那里打牌。他曾告诉我，那男的曾问我是干什么的，他答是《星岛日报》编辑，暂借他的房子住。有一天晚上我回去，门掩着，女佣人回家去了，姜脱了衣服躺在床上，听见门响，就喊“国基”。看见是我，就告诉我，一点钟光景前，××基来向他借二十元，他身上只有一百元整票一张，自己脱了衣服，叫那人去换，那人拿去，过了一个钟头还未回来。以后也未回来，好像那次之后就夫妇都不来了。那人住在九龙城，姜说了去找的，但未去。此外，来的人就是[姜的]外甥和外甥关系带来的、后来和他开馆子的三四个上海人。开馆子的事是那姓张的女的谈起的——香港的房子，一间间只隔层薄板，上半截又空着，他们在前楼讲话，我在我房里可以听见。那些人虽有时看见，但未交谈过。那女的大概看见姜有房子住（押金通常几千上万），以为他有钱，常常来缠他，商量打伙做生意；他又想她们夫妇拿钱出来做生意，也乐于谈。起初我还以为他谈得玩，后来说要派外甥回武汉搞钱（把“航运局”的股推出去），我才看出是真的。我曾叫他不要做生

意,他说没有冲突。馆子原说那姓张的女的,他,一两个舞女(舞女同时作招待),一个人拿三千出来,但后来馆子开成时,只是他的外甥因为听说他要开馆子而带来的几个人和另外两三个广东老太婆(只有千把块钱的穷人),一人拿一千。姓张的女的和舞女们都未参加。但姜的一股是那舞女押了金链的六百元。关于开馆子,我写过一篇《论开馆子》,是听见那女的的话有感而发的。在这屋子里住了一个多月,住到旧年底,新历年是在广州过的。他和彭孟缉通信,接到入境证,派他外甥回武汉及外甥回来,都是在这屋里。他写第一封信给彭,是搬进这屋里之后,大约到港一礼拜以后。说他从内地到香港了,打算在香港生活下去。接到彭的回信,说希望他能在港想到办法。信极简单平常,普通中国[字]八行,毛笔字很大,不满两张。署名有个“孟”字,但无“彭缉”字。孟什么记不清。姜给他的信是写的[姜的]老婆的名字,也记不得。现在想起来,这些都是重要关键,应该把那些东西拿在手里,向组织汇报。但那时一点也未想到,好像这些都与工作、与我不相干似的。姜给彭的第二信就说要到台湾去。没有等到回信就给他第三信,这封信提到他要开馆子。但这封信其实我没有看,是姜口里说的。估计时间,并没有等到第三信到达,彭的入境证就发出来了,为时大约到港后一个多月光景。这时候,他正在要开馆子,派他的外甥回国。我叫他不要搅生意也在这时候。他说等他外甥回国回来后就走,计时约十天左右。使他停留的原因,不是开馆子,而是他同那舞女的关系,据他估计,她身上佩带的总值好几千,而她表示要嫁给他。他向她吹他有钱在武汉,不过暂时没有。她也相信,所以开馆子时,股本是她给他的,

她年纪已三十多,大概急于要嫁,而姜刚到时也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至于为什么弄到开馆子之后才完全决裂,就不清楚了,总之舞女发现他是穷光蛋。除此之外,自然还在想那姓张的给点钱他或者还在想别的什么人给钱他。他的如意算盘是馆子开下去,舞女嫁给他,坐镇馆子。他又到台湾去,无论公事成否,到彭那里骗点钱来,这是我根据他屡次谈话又加以推测的估计。后来馆子塌了,他的原形毕露了,一切惨败,这才决心入台。他搬出九龙之后,住在离馆子不远的旅馆里,那时馆子还未开幕,还在修理门面,开幕是旧历年后不知几天。我看见陈义明几个人,是在那里。陈他们住在于诺道海边的小旅馆,他的馆子是在湾仔那边靠山的马路上,旅馆在附近的一个下山坡上。在旅馆不知住了几天,只知道最后是没有钱住了,把几个上海人存在他房间里的箱子押在那里,自己和几个上海人就睡在馆子的阁楼上。忘记什么时候又搬进那旅馆了,只记得离港前是住在那里的。临行,骗一个裁缝给他缝了一套西装,一个钱未给就走了。在这期间,我去催过他几次,他说怕杀头,其实他的真意并非如此,或者对那舞女还未绝望罢了。未发现他和别的什么人来往。他是在海南岛解放前不知几天走的,因为海南解放消息传来时,我曾想到他该到了。补述一点:他派外甥回武汉是写信给他的“航运局”的副经理的,带了两支原子笔,一支给他,另一支给里面的谁。副经理姓名不记得,是一个小眼睛、五六十岁、矮瘦小黑的老头子,有一个相当年轻漂亮的舞女之类出身的小老婆。外甥回来说,一个钱未弄到,算起账来,他推股之后还要找钱出来。当然有回信的,我没有看。

(以上是姜赴台前的一段。这段经历本身,除了那位钱同志和他谈过话以外,无一处有人证明,就变成完全是我信口捏造。除此之外)(以上括号内文字原被作者删去——编者注),他去台之后很久才有信来,前后来过两封信,头一封说他到了,会见了什么人,叫我把回信寄到北投旅馆什么人收。北投两字不知何意,他又写得很草,总以为有什么错误。后来不知听谁说到,才知是地名。我回信之后,他又来过一次信,说把话和某人谈了,谈得很相投。第二信收到之后一个多星期吧,他就回来了。说是台湾有风声,说姜是去找彭,而且是为了什么事。彭知道这风声了,连忙把他关起来,关了几天,驱逐出境了。但关几天的这话,印象不深,好像他没有说又像说说的。他给驱逐令给我看,上写着“查有姜斌其人……形迹可疑着即驱逐出境”等字样,是台北警备司令部的。又说,他和彭谈过反正的事,彭表示如解放军攻台,他可以起义。如不攻台,他什么都不能做,因为牵制太严。又说碰见过吕国珍[祯],谈到问题,吕不敢回答。又说碰见两个师长中的一个,很客气地招待他,还未接触到问题。又说看见过陈义明,陈在路上看见他就回头跑了。他比我这里写的稍微详细些,但详细得有限。如果我有今天的水准,我会盘问他一下,不但知道得会多一些,而且他说的是真是假,也可盘问出来。但当时把他说的都信了。只叫他写个报告。他写了,我看空洞得很,就像不到台湾也写得出似的。我退给他,叫他写详细些,写来了,还是空空洞洞。我当时只以为他不会写,没有别的疑心。这时候,我约他和钱同志到我处,三人一同到弥敦酒家吃咖啡,他把报告和驱逐令给钱看了。钱和他谈了许久,我不知为了什么

离开了一下，不知他们谈的什么，但有一点是可断定的，是谈台湾的情况。钱对台情况是很熟悉的。谈后，我问钱，那报告是不是太空洞，他说是，没有说别的。那报告，可能是退给他再写，他写不出，日子一拖久，我到《文汇报》去，后来忘记了。但也可能是我拿回去关在箱子里了（现在我还幻想，我房里有乱糟糟的稿子之类，组织检查过了，可能发现一点什么东西。但我恐怕没有这幸运），因为值不得一转呈，又搁下了。这两说以前一说为可靠一些，因为进《文汇报》后，曾特为过海到九龙他住的木屋区去找他，就是为催报告。他穿着衬衣裤在家里，说那套骗来的西装当了，旧的一套破了，拿去织补未取回，没有衣服穿，未出去。钢笔、手表也卖了。我催他写，他说打算就写。以后他既没有送来，我也忘记催，就这样完了。关于台湾风声问题，我问过他是怎么去的，他说可能是管子芳通知的，因为只有管知道我们一道来的，而又两个都认识。这是他推测，就上述的过程看来，知道这事的可能不止管一人。过了不知多久，他过海来找我，说彭的老婆写信给他，说有一批货要运港，叫他替他找个收货庄。他把信给我看了，确是女性字体，里面有几种东西都是我不知道的。他给我看是问我有无办法，我也没有想，只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后来他又找张稚琴，张给他找到从前在桂林开过中烟公司的一个姓张的商行。但那货始终也未来，也不知什么缘故。直到我离港前不久，他还叫他外甥去找我借伙食钱，可见那货杳无消息，如果到了，他的情况应该改变一些。这件事我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只以为姜斌本来是干这事的人，当然如此，完全没有想到与我有关之类，我不该与闻。与闻之后，也未表示严正立场，只是不管而

已。幸而货没有来，如果来了，姜经手卖了货，搞到钱，说不定会分点钱给我或还我“借”给他的钱，今天说起来，我就更不得了了。补述一点，他刚回港，叫他写报告的时候，曾叫他回国。他说他本打算立功了回去当干部，现在功既未立，干部当不成。武汉的东西已经没有了，欠债多，要坐牢，坐了出来还是无出路。他不愿回。我想他说的也是实情，我又无法强制他回，没有想到这事又该我负责。其实这种工作，只要跑了一趟，无论成败，都算有劳绩，政府都照顾，我当时不知道。即使知道，对他讲，他也未必肯回。他并不热心当干部，而是胡骗胡撞。

这是在香港的一段经历，由于我没有汇报过，除了那位钱同志可证明一点之外，全部没有人证明。他在香港，张稚琴可以证明住房子，替他找收货庄的事。[张]人也在香港，如果无法找到，这事就成为我在这儿信口捏造。康泽问题有他[康]在，胡风问题有胡风及许多胡风分子在，容易核对；唯有这件事，我一点有利条件都没有，至少我以为如此。而姜斌去台之前究竟在香港干了些什么事（除我写的之外），派外甥回武汉除了搞钱之外还干了些什么事，他到台湾去又干了些什么事，回香港后又干了些什么事，所有这些我都不知道，而这些事是可以大到无边的。加上我没有汇报工作，叫我回来我没及时回来，这就造成一个老大的疑窦，好像我从开始就是卖放、护送，后来一切我不知道的事，我都参与，即与他同谋。而我又提不出有力的辩解。所以，当我想到这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的时候，我觉得无法解决而神经紧张起来，当对组织一定可以解决任[何]复杂疑难问题的信仰坚定起来的时候，我又心平气和。

最近发现，紧张和平静，周期性地互相代替，周而复始，这也就说明我对组织的信任还在动摇中，反革命的东西还未完全消除！

我对这件事的理解，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没有想到是我去作策反工作，以为是他去做，我不过去和他发生联系（后来联系又未发生好），一切以他为主。其次，看见国内所派出去的一些人，似乎并未经过什么考查，也并未要求什么觉悟之类，只要去就行，成败在所不计，我以为这工作只如此，与一般间谍战性质是不同的。始终也未朝那方面想。如果想到，我不会去，因为那样的事总要有些训练经验，我是一点也不懂的。其三，也看国内派出去的人，本来包括他不回来和随便什么时候回来，又轻易理解了，没有想到他本人尽管可以如何如何，我一参与，责任都该我负！……所有这些，不过表露一点当时的心理，作为辩解，谁也不信，因为我不是一个小孩子。这和我汇报、不回来是不懂政治和组织纪律的严重性一样，没有人信，我又没有办法使人必信。到这里我才真正碰到坚硬的东西了。

作为工作说，香港这一段，也从头到尾都是错的。首先，我不该把方方同志给他的生活费和路费一千五百港币交给他，使他有作种种腐烂活动的余地。他到港一个月，就把那在别人可以生活一年的钱花光了，多数花在舞女身上。其次，照上述的那些情况看来，在香港所碰到的事，没有一样不是严重问题，而我一点不感觉，反而以为他本来是这样一种人，只要他去就行了。对于他的腐烂生活和把来历不明的人带到屋里来，一点未加阻止。最后，是对他不但失掉了说服力，也完全失掉了控

制力。他拖延不去，去了之后不回来，我都没有办法。再就是和他来往的那些人，全部都是可疑的，连那舞女——我看见过一次，不漂亮。而那骗去他一百块钱的人最可疑，和他的关系不浅，可以向他借钱，可以把钱硬拿走，并不是普通欺骗，而是他觉得拿走了也不怎么要紧。派他的外甥回国更可疑，说不定武汉的反革命逃港就是那外甥去通风报信了的。所有这些我也一点没有警觉，甚至以为如果他搞鬼，派外甥回国就不会让我知道，而相信他无鬼。以后的驱逐令和报告也都可疑，而他是否真正和彭孟緝接触到反正问题，是否向彭出卖了两个师长，是否还做了些旁的什么事，回港来又是干什么的，等等，无一不是问题，我又没有想过。汇报的事更无可解说，不是要他写报告么？不是准备汇报的么？可是终未汇报！

末了说说金或钱的问题：陈义明的事发生之后，我在原《华商报》三楼找到张铁生，跟他谈这件事。谈的时候，我翻出笔记簿找陈他们几个人的名字给他看。恰巧写名字的那一面的另一面，贴着一张电影女星的照片，我非常不好意思，用一只手掩着，只叫他看另一面。谈过之后，他说明天叫一个姓金的来找你。并用一个纸条写了一个“金”字而且加上一道圈，成为：⑤。第二天那⑤就到我处，是中等身[材]的小胖子，江苏普通话，面白，圆脸，三十来岁。陈等赴台之后，有一天和严广澍饮茶，他怎么露了一句关于陈他们的话，而这事只有那⑤知道的。我就问起⑤，他说不是金，是小钱。我才知道那人姓钱。现在回想起来，当然有些模糊，说不定他是说那人名“小泉”之类，那就越说越怪了。但无论怎样，严总是知道的，张也

一定可以记起来的。

下附在长沙和南昌的经过：

从武汉到了长沙之后，停了两天。这两天中有些事可说，但记得很模糊了。我一方面：因为接车的有段梦晖，我问他胡建文在不在，他说在，住在某处。不知是我和姜斌、段梦晖三人还是和姜两人去找胡建文。姜和胡、段以前都不认识。我和胡谈，有没有什么台湾的关系，姜可以带去，看那边能不能搞起义之类。胡说 he 去找找看。第二天他带了一个统战部（也许是别部）的科处长之类的人到他家里来和我谈，给了两封信，都是给当师长的人的。那统战部的人的名字，写信人的名字，收信人的名字，信的内容，都记不得了。谈话的内容也记不得，大概不外他问谁去，我说有这么一个人之类。姜斌方面：头一天，他带我到一个什么商行之类的地方去过，记不起是不是在那商行里碰见过什么人，总之第二天上午吧，两三个生意人请客，也有我在内，有胡建文夫妇，有女画家邵一萍，她和胡建文住在一起。但有没有段梦晖和邵一萍的丈夫何汗文，记不起了。那些人和姜的谈话倒是生意人的话，不过从话里听出，像是姜在长沙商界或流氓界有点地位的样子。不知怎么出来的一个印象，似乎那几个人都是开“有利商行”的。有利这两个字也许不完全正确，似乎也不在什么地方，而只是在他们口中听出。这是一。头一天晚上，他又带我到一个外面是广场、门口有竹篱巴墙的人家，是旧式住宅，主人不在家，他留下话说他来了，明天什么时候再来。第二天又去，里面有两个女的。矮一点的、年纪小一点的喊他“姐夫”，另一个高一点，三十多岁，比较漂亮一点的当然是“姐姐”。从话里听出，她们都

是暗娼，那大的已嫁了人，住在衡阳，小的听说姜来了，连夜打电话到衡阳叫她来，她对家里扯了什么谎来的。她和姜已三年不见了。晚上“妹妹”请客，有那几个生意人在内，饭后由姜给了钱。事后，姜说那大的曾经流落在武汉，他周济过她，所以关系跟一般关系不同。那两三个生意人，两个女的姓名，都不记得了。这是二。这点材料不知有无参考价值。

到了南昌，姜斌那方面没有什么事。我这方面有两件事。一，我问石凌鹤同志有没有台湾关系，找不找得着，他说没有。这当然是把秘密泄漏了。但他也荒谬，他在文联招待我和周立波同志的宴会上高呼为祝我的“伟大工作”成功而干杯！我不知道听者怎么理解。二，有一个名陈诒孙的人到招待所来找我。这人，四七年过武汉时见过一面，四八〔四〕九年在香港，戴经尘捐助《周末报》二千港币押金时，曾用他为发行人去登记。此外，毫无关系。他来找我说，他原来参加一个什么民革之类的组织，外号“小民革”。后来小民革并到民革去了，却没有他。我对这样的事一无所知，叫他找石凌鹤谈，曾介绍给石。据石后来说，他并没有来找。

曹 和 江

(1955年)

曹振武是曹勛的哥哥。幼年和曹勛一块儿玩时，就听说他的哥哥是参加武昌辛亥起义的。后来不知怎么，被齐燮元抓到南京关了八年。我离开家之后，第一次做事，是由我的老师孙铁人介绍我到闽南泉州何成濬（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当录事，其时为二三年。那时曹振武在作何的警卫队长，开始认得他，把他当作一个同乡前辈看待。我当录事大概半年光景，就到南洋去了，约一年半光景才回广州。他在何部做营长，结了婚，老婆名谭佩华，是个助产士。我到苏联去之前，曾在他家住过一个短时期，不但他，他的老婆也待我很好。我从苏联回来，他在武汉政府方面。武汉政府失败后，他在上海住了两三年。在这时期，我在南京，有时到上海去时，总到他家去玩。后来不知怎么，他又到何成濬那里去了。以后似乎总在跟何当副官长之类的职务，在武汉时期很久。三五年，我从康泽那里转来，曾到他家里去过。抗战初期在武汉时也到他家里去过。四七年从重庆到武汉，也到他家去过，他不在家，看见过他的老婆。他到南京去当伪国大代表去了。

四九年末我到九龙去找他，他住在离深圳不远的铁路边的

小车站旁边。一去，他不在家，看见他的老婆。老婆说，解放前她们家里掩护过一个地下党员，名字我记不清了，那人叫她曹夫人，她说从来没有人叫她什么夫人，只有人叫她曹大嫂或谭先生。那人以后就喊她谭先生。后来曹回来了，我和他到外面去溜。我说张执一部长叫我劝他回去，说他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放心。并把张交给我的一个名廖威的人写给曹也是劝他回去[的]信交给他了。他说，这事我也常在想，台湾反正保不住了，长此下去怎样呢？张春山（也是个同乡，早死了）从前告诉过我一些养鸡养鸭的办法，他有些这种书也还留在这里，我想租块地来试验一下，看能不能生活下去。目前正在进行。回国的事我也想过，打算写封信给必武——董老和曹及何成濬都曾有关系，从前在泉州时，董老到过泉州，并曾为武汉中学（董是校长）募过捐——要他给我一封信，说叫我回去，我才觉得有保障。既然武汉方面也说叫我回去，这事可以考虑一下。你今天不要回去，晚上详细谈谈。晚饭后，她的老婆叫小孩子去喊曹勳的老婆（这人四七年在京山故乡见过一两面，不熟，这时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反正离曹振武家不太远）来，另一个年轻人是房东，和我打牌。曹到外面去了。现在想起，大概是找人商量去了，而且找的那人可能是一个名叫张潞川的，我后来曾看见过那人。晚上，打牌之后，时间已迟，谈得也并不详细。他说，他想是想回去，不过生活没有保障。他和张执一没有关系，张又没有信给他。他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他和曹勳还和有个在武汉的喻育之通讯，他们说他们都在学习，他连学习也来不及（吃不消）了。我跟他说，既然张叫他回去，不会不负责，不会还要他劳动。至于学习，是大家都有事，用不着

怕。他说他还是给董老写信，并说叶剑英在军调处时代和他在一块儿，看来人很和善，不知他还记不记得。我说也不妨通讯试试。第二天，我临走时，看他家少年儿童之类不少，我跟他讲，养鸡养鸭为一时权宜之计自然可以，不过为长远打算，为下一代打算，还是回去。大概这句话触动了他，他说有两个女孩子正没有办法，你能不能介绍她们回国读书。我说可以，下次来再讲。这样就分手了。

旧历年初，他的两个女儿和小儿子还有曹勛的两个女儿到我[住]的地方找我，我和他们过海玩了一回，请他们吃了一顿饭。知道哪两个是要回国学习的。过了几天，我又到他那里去，给那两个写了介绍信。我问他给董老写过信没有。他说还没有。我问为什么还没有。他说他心里想的事太多。三十多年了，人家对他怎样看法又不知道。这样一件事总要想周到一点。我说写封信没有什么要紧。他说他要写。这回那两个被介绍的女孩子送我上车站。第三回，也许是第四回（上述的一二两回之间，似乎还去过一次）去，正是湖北一个叫孔庚的老家伙死了。香港的反动报纸宣传说是被逼吐血死的。我一去，他就跟我谈这件事，说孔庚那么老了，都被逼死了，可见回去要图生存是不容易的。我说香港报上的话不见得可靠。孔庚七十几岁，死也不稀奇，而且那个人就老国民党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应该和他不同。他颓丧地摇摇头，说无路可走。我说你不想回去了么？他说，想是想，不过要回去能活下去，我又不止我一个人。这回没有在他家玩，很早就回去了。他送我到车站，走过车站下面的一条小街的时候，碰见两个人，跟他打招呼，其中之一，也跟我打招呼，问我认不认识他。这个人

名张 滌川，黄埔第一期，我还是在黄埔时看见过的。他曾做过“汉口市参议长”，不知是否也是“国大代表”。另一个人不认识，年纪比较轻些，约莫四十来岁。那人就住在那儿，邀曹和我到他家去玩。我没有去。曹说回头来。曹曾告诉我那另一个人的名字，以前未听说过，随后就忘了。在车站，我又对曹说，你如回国不放心，可以立点功再回去，比如说多约几个人，发表一点表明政治态度的文件之类。这话我是看见张 滌川了想起这样说的。他说让我过些时再看吧，我还立什么功呢？辛亥革命立了一大功，结果是坐了八年牢。出来一切不算，从队长当起。后面这话他从前也说过的。我看他像不想回国了，那就说也白费，没有说了，走了。这一次，听她老婆说，那两个女孩子已回国去了，是她送她们到广州的。

几个月之后，我又去过一次。那时我已进《文汇报》和张稚琴一同到广州，回来时进不了口[岸]。因为香港政府下令凡不会说广东话[者]不准进去。我们混了两次混不进，就找本地“烂仔”带路偷渡，被捉，关在警察局一夜。出来后，再次偷渡进去，我已经连衬衣也没有了。本来交给烂仔拿着，他逃跑了。光穿件背心进市内不像样子，就在曹住的那车站下车，找他借衬衣，并在那里睡了一觉就走了，没有谈什么。我想他如有回国之意，会自己谈起的。以后没有去，连衬衣也没有还给他。

这回，据从武汉来找旁证材料的人说，据他的儿子育南（防空学校作技术工作）说，曹振武于五一或五二年到台湾去了。曹育南于五〇或五一年暑假曾到香港一次，把最小的弟弟（十岁左右）带回国来了。这样，我当时在曹家看见的几个人，有

三个到台湾去了——他们夫妇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儿；有两个回国了——大女儿（其实是第三个，以上两个早已结婚了），那时正在等未婚夫从美国回来一同回国，后来回国了（据曹育南说好像在上海方面），小儿子跟曹育南去了。只是曹勛的老婆不知下落。曹勛家还有没有别人也不知道。

这回《文汇报》来要旁证材料，说到一个名江权的是谁介绍进去的。看履历，是我介绍的。这江权是曹振武的老婆的姐姐的儿子，母亲早死，我从认识他起，他就跟着曹振武的老婆的。我在广州曹家住的时候，他还未长成人，是个失学的少年。我在南京时到上海曹家去玩，也看见过他，正在学开汽车。三五年在武汉也看见过，抗战初期也看见过，不知在混什么事，似乎已不在曹家住了，不过还常到曹家来。四九至五〇年，记得不曾看见过他，不知怎么把他介绍到《文汇报》，我以为当我还未进《文汇报》时，曹振武老婆要了我一封信介绍给张稚琴了，但我在《文汇报》几个月，一次未见过。那么，当是我快回国时，他来找过我，我留下话给介绍的。这时已许久未见曹家夫妇了。这事还可以到《文汇报》去问问。

两个鬼影

(1955年)

因为要回忆一点在东京的情况，忽然有两个鬼影浮现出来。因为在反省中学会了一点政治警觉，不免随处应用，觉得这两个鬼影非同小可，赶紧交代一下。

三二年下半年不知几月——甚至是三三年初也说不定，一天，周颖跟我谈，有一个梁子青，一个杨以周要来看你。我问是什么样的人，她说从前在北方搞国民党的，不知怎么不能容身，跑到日本来了，现在想搞点进步文化活动。她还说过她在什么地方怎样认识他们的，现在记不起来了。不知过了多久，这两个人来了，由周招呼进来坐了坐，他们说，什么时候要在青年会举行一个茶话会，谈谈关于学术讲演的事，希望我去出席。——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忘得干干净净了，这次是从一点小事记起的，其整个过程还是不清不楚，像做梦一样。——到了那天，我去了，到会的除了梁、杨外，几乎都不认识，只有一个住在青年会名周咸堂的是见过的（这周咸堂也是周颖的朋友，我和她到他住的地方去过几次，去时也并不止我们两人，常常还有周颖的别的女朋友。这人现在想起来，至少是很落后的，但在当时却不觉得）。大概十几个人吧，大家还自我介绍过一

下,但也没有记下一个名字,当时的印象,似乎真正的学生占多数。茶话的题材是要酝酿在青年会隔多少时期公开举行一次学术讲演会。结果是推梁、杨、周或者还有别人负责筹备之类。这个学术演讲会,是我现在给它取的名字,它当时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可是怎样也记不起来。在会场有一个印象,即那些出席的人对梁、杨似乎都不很熟,周咸堂似乎处处把招待人是梁、杨这件事(例如倒茶、分烟之类)让它显著起来,而推选筹备人的时候,梁、杨似乎几乎不能两人都当选。这之后不知过了多久,讲演会居然开成了。我去听时,已经开讲,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讲者似乎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可是不知道什么名字。所讲的就我听见的一节,倒真是辩证唯物主义。当时并不懂,涉及到地理环境与政治制度之处,我还不能了解透彻,后来看斯大林的书才了然,而那人那时讲的正是从斯大林来的。所谓讲演会,就只这一次。以后也许还有别人讲过,我不知道。那个什么会是否还存在,我也不知道。

这个如梦如烟的什么讲演会,在听的当时,我认为是进步的。现在想起,恐怕又当别论了。不是怀疑那讲演,而是疑心梁、杨。爽兴把下面一节讲了再谈。我被捕后要押解回国的那天,白天里虽然不能自由外出,但已衣冠齐楚,不住在“槛房”里了。在那警视什么的楼上一个走廊上,周颖喊我说梁、杨来看你。这时,我才看见他们正待下楼去,听见周颖跟我说话,又从楼梯上折回来和我握手,说了几句慰问的话。其中之一还拿着一个公文包,好像办公的,又像要到别处去慰问别人去似的,说后就匆匆地走了。

我和这两个人的会见,一共四次,听讲演的那次,连招呼也

未打。以后永远未见过，未听说过，也未在任何地方看见他们的名字。

这事有些什么可疑呢？

一，我在东京一年多，未参加过或听说过公开茶话会搞什么进步文化，也未听说过公开讲演辩证法之类。也许有，不过我不知道。

二，那茶话会甚至讲演会会场租金，似乎都是他们花钱的。一般地说，这种事也少有，进步方面的人都穷，很难自己掏腰包的。

三，我在审讯时被问到过一些不相干的人，似乎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

四，胆小的、不问政[治]的人，碰着政治事件之类，避之如[惟]恐不及，真正进步的人也要避嫌，他们何以特为跑来看我，而我和他们的关系又实在未到非看不可的程度。而且又像不是专看我，还要到别处去看别人。

五，以后二十多年未见在任何地方出现——当然是我没有留心。

因此，我疑心：

一，他们与日本政府方面有什么关系或默契。甚至那周咸堂，是老留日学生（即有点庚款之类可拿，许多年不回国），在日年数不少，也不无可疑。

二，他们是否所谓留日学生监督处或使馆之类的办事人之类，我看他们实在像办公。

三，国民党里的什么？

四，二十多年不见不问，是否在北方搞伪政权？

因此，我以为这两个鬼影非同小可。那周咸堂也许在云贵等省做什么。他是那一带的人，解放后不知谁还提到过一次。

这事可问问周颖，关于梁、杨、周，她都比我知道得多。

叫回来为什么不回来？

组织叫我回来我没有回来，当时曾想过一下，姜斌还未去，叫我回去干嘛呢？这件事难道可以丢下不管么？我认为不应该。所以未回来。毫无其他理由。问题是不但没有回来，而且也未写信。为什么未写信呢？毫无理由。不但这次未写信，以前以后（除了一次向张执一说关系调到华南了的信）都未写信，后来回国见到张了也未汇报工作，这是我无词以解的事，我以为还是我的问题发生之由。

现在我都懂了，叫你去你可以不去，叫你回来你可以不回来，那算什么组织呢？那还革什么命呢？不请示，不汇报，那算做什么工作呢？但在以前，确实不理解，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后来也未碰到过这样问题。周总理叫我到重庆，我迟误了两年才到，他一句话也未说。本来没有做过工作，也未碰到汇报工作的事，组织纪律根本没有和我发生过关系。在新四军时，曾一度出来印刊物，也一封信未写过，也是过了很多时才回去，也未受到谴责。这样的事是无论怎样说都不能见信于人的，我只希望组织能从其他情况乃至别人的情况来给我解决

我总以为在这次肃反运动中，一定会发现许多怪人怪事。我不相信荒谬的人只有我一个。

如果以为不回来是要在香港做反革命工作或贪恋香港花花世界,我不想说什么。我在香港做过什么反革命工作,组织一定可以洞察的。贪恋旧世界则不一定与政治有关。如果以为不回来是因为自己做了反革命,怕回来杀头之类,这也不能直接说明,只能提供一点参考。我终于回来了,而且是早就要回来,香港留着不放。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呢?是镇压反革命高潮时。我在香港知不知道呢?知道。我还为广州镇压反革命写过文章,在杂文选中——《死生亦大矣》。我如果丝毫感到自己有亏心事,还敢回来?就算事先不知道,回到武汉后,列席过中南军政会议,整个会议就谈的一个问题:镇压反革命。如果我有丝毫内疚,这时还不警惕,还不逃走?也许是无法逃走了?刚刚相反,香港组织原叫我回去,我也答应过回去,却又无组织无纪律欺骗组织了一次,没有回去。再,不是在京发现了一本汪精卫签字送我的画册么,如果我有丝毫内疚,想到一天会成为我的罪证,我还不销毁?不但不销毁,还给别人看?从这些事看起来,我不回来固然不对,但不是因为怕死。

在香港时的“阔”和贪污

香港的生活水准，像我这样好吃吃喝喝但是光杆儿的人，只要住处随便一点，一百五十至两百港币就可以了，或者说很不错了。我在香港时的收入远超过这个，当然看起来“阔”。

在广州时组织给五百元生活费。

一到港就为《文汇报》写社论，每月三百元。写过两个月光景。

不久，为《大公报》每日写一短文，每月四百元，到进《文汇报》为止。

在《文汇报》每月薪水四百五十元。

此外，社论或短文之外还可多少写点别篇文章。

光是这收入，在别人是可以养活一家几口人的。

我的收入还不止此。在《文汇报》时，出了三本书：《天亮了》，《海外奇谈》，《寸磔纸老虎》。这后两本是向《文汇》和《大公》买来或赊来的废纸印的（把卷筒机印报时废掉的纸积下来，加以整裁，可以上平板机印），比普通纸便宜得多。这样，三本书合起来，我落下了三千多元光景。

这样，我就冬大衣，夹大衣，毛线衣，钢笔，手表，都有了，还有别的日用品及箱子、毯子之类，还带了不少的东西给家

里人。

贪污党的费用，大概指这么一回事：

姜斌早把组织给他自己的费用搞光了，到台湾去时当然没有路费，来向我想办法。我早问过他要多少钱，他说要千把元。为什么要这么多？一方面他要留点钱在身上以防万一，一方面要给彭的母、妻买一份丰厚的礼物，把关系搞好一点。我觉得也有理由。这回他来向我找路费，我向吴荻舟谈过，他说组织不能管这事，因为路费早给了。我无法，去向大公报商量预支稿费给他了，然后作几个月扣还。我找罗承勋，罗说没有这办法。我说是与党有关的，是急事，他说可以找费彝民去借。借了，我还是说扣稿费。及至发稿费时，并没有扣。我问罗。罗说老费说不必还了。我一直以为是我向费借稿费，他说不要还，自然得其所哉。但一不要还，这笔钱就变了性质，是党的费用了，这事怎么也想不到。如果我连这样事都想得到，根本不会出任何问题，我今天也不会是反革命了。

姜斌确实未把千元全部拿去，只拿了五六百元，其余部分是我贪污了。这以前，组织曾介绍一个姓王的来，叫我照顾他到台湾去。他来了，一个钱没有，穿的从乡下穿来的棉袍大褂，不但不像样，于气候也不配合。我给他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换过，还有旅馆、伙食、零用，共计百多元。这不是算账，是想说明一点，我为党用钱，向不计账，而姜斌这事，也原是想用自己的稿费去抵的。但结果还是贪污了。我有许多鬼使神差的事，本来都是好意，结果弄得满身狐骚，成为反革命。贪污党的费用，在我倒只是小事了！

在香港和哪些人来往

这个问题组织虽未提出，也应该交代一下：

○罗承勋(党员)

○严广澍(同上)

○高朗

○黄永玉

○陈××(以上《大公报》，其中以高朗来往最多，黄永玉、罗承勋次之。坐咖啡馆之类，大概多同高、黄)

○胡希明(《周末报》，原在桂林《力报》当过采访主任。倾向张稚琴。酒鬼，喝酒大概多和他一道。此人现在广州文史馆之类的机关。)

○邵慎之(原当过桂林《力报》编辑，能力强。与张稚琴无关系。但历史问题繁多。曾充伪《中央日报》及《新闻报》记者。解放后，由青岛到香港，带有民盟关系。他说他原是党员，在平江工作，平江事变逃出，关系无人证明，也不知如何找关系，关系断绝。[邵]和严广澍很熟。邵到港后，找严谈。严叫他打人国民党文化方面，他放弃民盟关系，和姚克来往。工作如何，不知。后来因生活不能维持，要求进《文汇报》。我和严谈，严极赞成。通过张铁生、张稚琴(其时此张已将离馆)进

《文汇报》。去年,《文汇报》有人来谈,他和姚克住在一处。华南组织曾来件要求了解,我反映如上)

○董秋水(原与周鲸文有关系,依周为生多年,但暗骂周夫妇亦甚久。现在人民出版社)

○梁琛(原在照相馆做技术工作。纯朴,政治落后,现在京,在与小经场剧院有关的机关服务)

○王琦(美术家,现在美术学院)

其余因工作关系而来往和无直接关系而偶然碰见的人不计。

(姓名前的“○”为办案人员所加 ——编者注)

在党内关系的不正常

我在党内和别人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包括这样几件事：

对方紫、周延及赵其文个人。

对贾芝、历民、方紫那届支委。

对王社长。

其他。

要交代这些，不能不说明原因，不能不牵涉到别的人和事。

“三反”及以前，我和大家一般地接近，关系正常。

从在“三反”中我参加一点工作开始，我渐渐和许觉民、毛邦安更接近，后来还对毛发生了某种感情。有了这种感情，我就变得急躁，不专心，不耐烦，影响到工作。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件痛苦事，因为彼此年龄悬殊，矛盾太大，难以解决。而我又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一碰到这样事，就放弃不了。我对毛的印象好，主要的是她的工作精神，每天[工]作十几个钟头，日夜都管事，吐血、晕倒、从楼梯上滚下来都不请假；其次是对公共财物的细心爱护等等。而这种事，社内又没有别人知道。但毛也有缺点，其中就是狭隘，拿自己要求别人，自得意满，不能容物之类。我们接近之后，她有点说方紫的坏话，也没有别的，就说她尽说得漂亮，实际工作不做。不是没根据，方紫做

支委时,有些工作是拿给毛替做的。我本来都对方紫的长处特别是讲话的条理很佩服,听了毛的话之后(不止一次)证明别的事件(一编室有人说她半年只看了几万字稿,而且是在家里看的),逐渐同意她的话起来,对方的看法有了改变。我是个性情直率的人,有了这个改变,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变得比毛对方的看法更坏,即我以为方的病未必怎么严重,不过借此偷懒。同时看见许觉民也是老肺病,毛的胃溃疡常吐血,都不曾借病请假。这样一对比,我就不喜欢方了。此外,这是我的老脾气,不喜欢女性爱漂亮。因之也不喜欢方的漂亮劲儿。一次她问我对她的观感,我说她像上海小姐。她叫我不要对别人讲,我以后也未讲。对周延的疏远,也是因为毛的关系。她们两人在忠诚老实学习时期就有些小隔膜。我看她们一直未谅解。我既和毛的感情增进起来,自然不敢和周接近,避免误会。群众说我对谁都说过怪话,其实我对周、历民、贾芝、许觉民,都未说过怪话。说许单纯得像一根棍子,是当作优点在支部会议上说的。总之我对方、周两人的疏远和以后的“不正常”是从和毛的关系不正常来的。

“三反”之后,贾芝士改回来,一回来就说社内“三反”未反透,冯的官僚主义未反到。我说“三反”所反的官僚主义似非任何官僚主义,而是因为自己的官僚主义纵容了贪污浪费现象的那一种。他以后才不讲了。他回来不久,冯要调他做办公室主任,他坚决不肯,两人谈话很僵,我参加旁听,还帮冯讲过几句。内容现在记不起了。此外,关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报酬问题,贾芝对社一直不满,包括对冯在内,这问题闹了很久。历民对冯也不满,一次他不知对冯讲什么,冯暴跳了一

阵，他无法说下去。事后，他摇头对我说：“跟他说话真难！”

整党的时候，支部决定以我为重点，好像也包括冯在内。好像外面还有人说：“三反”时没有反到冯，这回整党预备怎样？——这话好像是许说的，外面的人好像是出版总署的。我要被当作重点，精神上没有支持，也不知该怎么办，就到冯家去请教，同时也就说支部打算也整他，他将怎么办？但具体谈话内容，记不清了。这样冯就在一次支部会议讲了一顿方紫（方未出席），内容记不得，但知道连我在内都多少出乎意外，那态度和内容对方都有点过火。下次支部会议，方出席，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支委声明某些意见不是方紫意见而是支委意见，冯的态度也缓和了。整党也没有整冯。方的那次谈话中有一句，冯像是她的爸爸一样，我听了非常不舒服。我曾对许说过，方尽作巧言。也是后来对张友鸾说方是长舌妇的理由。张对我说，党内同志不该乱说。我当时还不服气，但后来也未说了。

整党后，方写了封信给冯，要求以周延为出版部副主任。冯在支部提出，并号召大家说服周去。别人我不知道，许、毛、我三人都出乎意外，而冯的那种提出法，使别人无话可讲。毛、周之间有隔膜，许、周之间也很久搞不很好，周本人以前曾向我表示过愿做编辑工作，不愿“打闲杂”。我为感情所蒙蔽，觉得毛工作忘我，处理事务能力也很强很敏捷——这一点，许、楼似乎都[有]同感，他们有许多事也问她，做行政领导之类，当比周强。我本来还想讲话，因为牵涉毛在内，而毛又很快就表示她的不满——她两次当场要求去做资料工作，我就没有讲了。关于毛，我向来就想讲话，但一讲就暴露两人关系，不敢

讲。不过偶然对冯、楼讲这么一句两句。周到出版部之后，群众也不满。出版部人怎样不知道（周后调工作，似是因出版部人提意见太多），一编室方殷之流，二编室黄肃秋之流，都飞短流长地有意见。这一件事，我对冯、方、周三人都意见。

评级评薪时，评委会的名单是冯决定的。决定时，毛好像表示没有一个支委参加，似乎不好。冯说不管。支委也未召集支部会议讨论关于评薪事。这时候，是党和行政脱节最厉害的时候，以后改选，留意到这问题，流弊就较少了。我对方、周更有成见。以前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的，这时都觉得不好了。“忠诚老实”学习时，有问题的人都有点怕方紫——指陈北鸥、方殷、黄肃秋等人，这本是她的好处。但这时我却以为群众因为方紫而不敢充分拿出自己的意见来。评薪我作编辑部小组长，事先曾到一编室去了解方紫情况，向别人了解的，忘记了，向陈北鸥了解的，是她不做工作，半年只看了多少字，且是在家里看的。这说法与我的成见符合。我也曾叫他发言。黄肃秋本不满周，我也叫他发言。叫文怀沙发言时，文或者因方是支委而踌躇，我说这次支委是反冯的（根据上述的那些理由），但我不记得说过我是党内、不好提意见之类的话。因我是小组长，本来不便提意见。而我虽说过支委反冯，但注意点不在支委，而在方、周二人。开会时意见也不算激烈。这是我拉拢人，打击人，借党外力量打击党内的事实经过。至于支持本人回避，我是评委会小组长，当然完成评委会交给的任务，至于那办法我觉得利弊都有，没有站在对立立场，倒是奇怪支委几个人何以那么反对评委会定的办法。评委会定这办法，什么理由，我不知道。这可问当时参加评委会的人。

以上的叙述想说明的是,我没有反对过冯、楼、许、贾等人,所不满的,打击过的,只是两个女的,方、周。之所以这样,是从和毛的关系发展而来的。受了毛的影响,迎合她,取悦于她,而又碰着那些具体情况,所以成为这样了。也还不止这些事。我为和毛的问题不易解决(在我这方面是内疚太多,像在欺负人),常常苦恼,有时不安心工作,甚至支部会提出质问。我无法,嫁祸于冯,说是冯在支部说我是批评自我批评的对象之故。这话,楼去对冯讲了。冯当然早已洞若观火,对楼说我儿童似的天真,也儿童似的狡猾。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另一次,在社务会议上和楼闹起来,完全是为毛的工作问题,楼当然记得,别人恐怕也记得的。年终鉴定时,起初我并未过问,后来积极主张纠偏,也因为问题集中于毛了。领导上也已洞若观火,陈部长曾在会议上说:不要以为聂××是毛××的保护人!

我之反王,主要的是由关于二编室工作问题的意见不同而来。二编室工作的特殊性这里不必提,王对二编室的意见,几乎没有一个是与我相同的,而我认为是他不理解二编室的具体情况。这很容易使人认为是他来领导二编室,和我冲突,所以我反对他。其实不是,我不过觉得这事应在宣布之前和我谈谈,以免宣布后群众来问我,我不知如何回答。如果事先酝酿,说不定我会把全部交给他,我正想有人来领导,我好卸责。冯也屡次对我说,找个副主任了,我不管事。不过这事有矛盾,即从领导看来,张友鸾做副主任问题较少,但从二编室情况及水准看来,舒芜做最佳。而舒似乎又有另外问题。这是

说我并没有因王来领导而感到什么。王来后，一连有这样一些问题：

一、王写了一篇关于整理古典的文章，要印出去散发，我觉得那文章不好，不知怎么说，只说送给冯看看。冯看了大概也觉得不好，也不好怎么说，在印不印中采了一个折中办法，在内部打印参考。

二、向外印发了一个重印文学古籍的书目，引起“古典界”大哗，纷纷提来很不客气的意见，有的甚至是骂。这书目未通过二编室。二编室人纷纷向我提意见。其实也未和我商量。

三、社内社外，亦即开门关门问题。他主张大开门，工作都叫社外专家来做。我也原则同意，并在一个时期号召把手边可以推出去的工作都推出去，编辑留下充分时间看稿。但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社外专家都是干部，只能在业余做，很难赶任务来与计划配合，即使他答应何时交稿，到时不交也毫无办法。闲着的专家，他之所以闲着，必定大小有点问题，不敢找——如王古鲁之类。社外专家搞的稿子不能用，拿起毫无办法，因为那不是个别的小问题而是整个体系从头错起。这两件事都有痛苦经验。《杜甫选》找冯至做，这个专家不算找错了，他也极愿做。但他没有时间，开始工作之后，一时到这里去了，一时到那里去了，最后推出来另找别人，而他做的部分极少能用的。《白居易选》找王汝弼，事先未多了解，稿拿来，一个字也不行，而又要尊重专家，不敢得罪他，而他的脾气又是很怪的，稿子压下很久不能处理。《杜》、《白》两集不能出版，影响《三曹》和《陶集》，因为如果先出《三曹》而不出《杜》、《白》，读者也会大哗的。另一方面，社内人因为有种种痛苦经

验,已逐渐摸出一点小小的路来了,而这点路又不一定是社外专家所完全理解的。因此,我的意见:门是要大开的,不开工作做不下去,而二编室的门则是逐步开大。这个问题牵涉广,这里只能粗略叙述,归结则为二编室人说的:社会主义企业、资产阶级专家、封建社会文学之间的矛盾。王在大会说,我们是浅薄无聊的,专家是如何如何的,而不带任何限制,引起二编室人情绪大波动,说起什么“进门低三尺”、“两行编辑泪”之类的怪话来。因为有些人自以为如果在社外就会是专家(如周汝昌、张友鸾),其实不见得。

四、标准与体例问题。标准是思想性的,体例是技术性的,谁也知道标准比体例更重要。标准是二编室工作的致命问题,又恰好是大家都未钻通的问题,即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如何取精华,如何去糟粕(这也有痛苦经验,《三国演义》去其“糟粕”,结果重来过)。工作不能等钻通问题了才做。在大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之前,就力所能及的,为工作所迫切需要的,也就是摸索得来的一点小东西要告诉别人的,就是体例。由舒芜花了很长的时间起草但未完工的注解体例,大概也还有些可讨论的吧。王认为不及标准重要,认为繁琐(我以为倒是细致),否定了。我当时曾表示不同意见,他不听。

五、劳动纪律问题。劳动纪律和编辑工作的矛盾,也是长期不易解决的问题。王来之前,提起过许多次,冯还提出过编辑可以迟到的话,但它影响其他部门。按时上下班,对看稿、校对、标点,问题不大。问题在有时要拿笔写,一谈到写,都认为办公时间在办公室效率低,甚至根本无法写。也不止二编室,金满成在大会发过言,我还提出过相反的意见;朱葆光有

一次表示这是编辑工作的生死问题，即按时上下班，编辑工作无法做。张友鸾说两副社长都有年轻爱人，所以力主早睡早起。……王也明了这一点，好像还有什么表示，但一面又叫人事科查劳纪，一执行，就派人在门口看谁何时进门，核对和揭发其与签到簿不符处，引起群众不满。

六、定质定量问题。劳纪松，当然有人偷懒，但在自觉性提高或责任心加重的时候，却可以发出很大的积极性。张友鸾在会场报告过他在家半夜工作的情况，真假如何，因未见，不得而知。黄肃秋夜间用幻灯和胶卷校对《西游记》，是在社内作的，不但好几个夜晚，并且两三个通宵，是我看见了的。查劳纪一来，这种工作精神就会受到影响，而自然要涉及到定质定量问题。这不但是工作者的要求，也正是社的要求。于是开会搞定质定量条例。以前，二编室人口不言钱（不过不言而已，心里还是有数的），社内社外专家编辑问题一提出，劳纪一检查，大家都谈起钱来了，即他们原做的工作，给社外专家做，应付出多少钱；办公时间以外做的工作，如定质定量后，则可得多少钱。资产阶级思想或情绪，充分地表现在定质定量办法的条文中。我不是未感觉到，但没有揭穿或采取别的什么措施，因为我愿意王（王都出席会议的）和别的领导了解，原来二编室并非经常在怠工。办法定出了，照办法看，二编室照原来工作情况不变，社应该付出一笔超额劳动的报酬。办法未批准，也不应批准的。

七、三本小说注解费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冯、楼、王三人意见都不同，因为我比较理解工作实况，他们几个人又都穷得很。而编辑报酬问题，又是一个很久未解决的问题。记得冯曾

叫楼写信给习部长，结果如何我不知。又曾叫许、楼、毛、我讨论编辑部局部调整薪水，也因影响别的部门太大而无结果。基于这种精神，我才一再力争。不过与王只是部分关系，且不详谈。有一点应申明，曾经给过一次钱，是注解费而不是加班费。有三点可查证：一，社内稿酬是规定注解算编辑额外工作。二，财务科当有存根注明是什么费。三，《三国演义》的钱也是按注解了多少条而几个人分的，而且《三国演义》的钱较少，是因注解比较容易的原故。二编室也发过一次加班费，是再版《红楼梦》的，发给舒芜、张友鸾、李易三人有差。张友鸾还曾退回不要，说明他无功，以表示以前有功而不给报酬的一点抗议。

以上这些问题加上我原以为他居高临下和摆架子的样子，加上他在支部会议说二编室只有我能领导党不能领导，加上说他没有来就知道我难搞等等；再加上他报告时说打打胡风，拉拉路翎，压压柯仲平之类怪话（好几次报告，似乎都有人不满，细节记不起了），舒芜、牛汀、郑效洵都向我反映等等。我得到一个印象，他就像毛主席所说的“下车伊始”要改革这改革那，其实具体情况没有理解。为了使他能多理解二编室，曾开过一两次会请他参加，不过也带着一点情绪。希望大家说得更多些，发表一些足以看出二编室在那里苦干的精神的意见，但我并未布置，也未叫他们说些什么。二编室有些人不满王，尤以舒芜为甚，在我这方面看，我倒是受了他的一些影响。二编室不满王的最高表现是工会小组向王提意见的态度恶劣，我曾及时批评他们。舒、赵都说我批评得太早，影响了二编室的情绪。我对王不满，本来也逐渐平息，到了年终鉴定，许多事又旧事重提，

我在和二编室同人在社长室开会时，说得声音很大，希望他听见我对他在提意见。但那意见内容，现在记不起了。那记录王是看过的。

我为什么说王自己想作社长呢？有些细微的事记不清了。我既对他有了上述的看法，对王的一切都带着一些成见。年终鉴定以前，一次支部会议，王把冯拉来要他检讨《文艺报》问题，这事冯和全体都没有这准备。谢素云不知怎么为收王的一张稿费单的问题，被屈得哭，自己要去拿钱来赔偿；而王后来一定不要谢当秘书。王说毛邦安年轻不能当人事科[长]。诸如此类，本来都没有什么，我把他联系起来看，觉得王有点要打击冯的威信和不要原来的人的样子。年终鉴定时出了极端民主的倾向，群众要搬“三座大山”，对冯、楼也都提有意见，王来不久，提意见的自然少。王不能控制，几乎无法下台。我却以为王像是越闹得凶越好，越显出社在过去是如何一塌糊涂，好像这样于他有什么好处似的。再就是黑板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到“冯既不能来为什么不辞职”，我看他看黑板报时，似乎很欣赏，我指给他看，表示这文章不好，他很不在乎。还有些什么别的记不清的事，合起来，就疑心他是自己要作社长，跑去对冯讲。冯说他也有这种感觉，叫我不要对别人讲，但我还是在支委间讲了。毛同意我的看法，许表示怀疑。有了这种看法就越看越像，曾同毛商量叫她去向冯反映群众提意见的情况。反映之后，我又打过一次电话给冯，说群众态度激烈，于王很有利。事情就发展到这里为止。以后是陈部长来领导纠偏，几次会议开下来，这一看法也不存在了。后来开会谈到团结问题，检讨到自己没有从组织看问题，准备以后搞好团结。这话

就没有提。不过情绪上对王的不满并未完全释然。到楼回来时,我和毛向他汇报社内情况,又向楼提起往事。但提到过王想当社长没有,一点也不记得。我说过王怕我向邵荃麟去反映。他的打打拉拉压压说,我向邵反映过。邵表示他说得很不好。这事我对毛谈过。毛后来不知看见王对我的态度有何不同,认为是怕我反映,我也未加分析,便跟着他说了。(楼回来之后,因向他提往事,我和毛对王的态度又有些不好了。)(以上括号内的文字原被作者删去——编者注)一天,在社长室和毛不知谈王的什么,楼听了之后,笑说这恰恰是无原则纠纷。我当时还不以为然。过了几天,想来想去,才领悟到无原则纠纷的意思原来如此,而且和不从组织看问题也是一件事。

以上是反王、反领导的经过。但我的领导与被领导观念很不明确,一天我对赵其文说王是否居高临下。赵说应不发生这问题,因为他是上级,我还说我和他同级,不过他多管一些行政罢了。在我看来,特别是说王想当社长,是他在反领导,我倒是拥护领导。我有那种看法,尽管是不对的,我应该怎么办呢?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想出在我当时是最好的办法。现在几位社长自己一检讨,人民内部的事,前嫌尽释,回头去看,只剩下我这个反革命在那里挑拨离间了!事已至此,夫复何言!

对王,我没有一开始就反对或事先布置反对。事先我对楼说,王、楼之间避免将来职权冲突,王可先只作副总编,是一时的想法,不知道从组织看问题,落到一种陈腐的看法,并非蓄意反王。据王在年终鉴定之后说,组织本来决定他是第一副社长,楼是第二副社长,在他说之前,我不知道。笼统地说两个副社长,是容易使人想到职权问题。我对王不满,起初只觉得

他居高临下，好摆架子，这是在支部会议上谈的。加深了这种不满，是他说党不能领导，显然把我看作党外（现在我变成了反革命，那是他有先见之明）。至于二编室职权问题，我只有些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顶好都给他管，一方面也感到多一层手续，事实上有些麻烦，有些事我就叫二编室人直接取决于他，他又批回交我决定。其实也不曾真有什么冲突。上述的那些事和他的意见不同，也没有一件是我原不如此主张、因为王如何主张了我才采取和他相反的意见。对方、周问题，如上所述，我由和毛的关系发展而来，有些私人东西在内。而对王，检查来检查去，都检查不出私人的什么来，也不因为他对毛有什么不好。他对毛固然没有太多的理解，也没有形成一定的看法。他说毛看问题机械，文化水准低，倒是从我这儿得去的，他不过未像冯、楼那样带着一点宠毛的意味罢了。所谓反，也不过和楼、许、毛谈谈，其中和毛谈的较多，影响她对王的看法，在王面前不像在许、楼面前那样随便，而自以为受了屈。另外就是和舒芜谈，主要的还是舒芜和我谈，说王每次报告都有问题。说来过错当然在我，二编室有些事有些意见，现在记不起具体的东西来了，有时不是我领导舒芜，倒是我跟着舒芜走。我的态度可能影响了二编室；二编室人对王不满，我除了提出一次批评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倒是因为和我的情绪一致而默许，而受他们的影响而增长不满情绪，但也未去煽动那火焰，布置什么来反王。最后说他想当社长倒是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从来未想这些就是反王，反领导，乃至反党，反革命！

对于赵其文，起初的希望之类的空话不谈，主要的是因为

他一来就向毛、王反映我在王利器家谈冯的《水浒》文章的事。我觉得学术问题，应该可以随便谈谈。其次是他在党内反映张友鸾说冯的那文章不知所云。我对张的看法，是他既不懂理论，又对冯很敬佩，平常对别人也不说这样偏激的话，何以这回如此。我问张，张说没有说过。我疑心赵的反映至少是夸张的。这意思一直未改变，后来他说我把王拟的书目划去百分之八十，说我对他说王反对他当副主任等等，也可说明我并不是没有根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在二编室和谁都搞不好，首先是和黄肃秋吵，我还说过黄。舒对我说他的业务水准不高。大概由于我向张友鸾说过冯文什么坏话而引起，二编室有些人因为他好反映，他来了有些话就不说。再加上我不大找他，总是找舒、张时多，我在二编室，一般的情况，平常和舒、张较为接近。这样使他在二编室工作不安，我没有为他采取什么措施。此外，王、楼两人想以他为副主任，我主张等一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群众会不满。在二编室舒芜威望高，各方面都比较行，赵的业务能力如在一般水准之下，这问题是应该考虑的，而我既疑心他的反映至少是夸张，也就是疑心到品质。我主张等他表现出一点长处足以使人心服了再发表。而这话我又跟赵讲了，意思是要他努力工作。关于赵的问题，我也曾和他本人恳切谈过，他也认为谈得不错。不过谈了之后，我在感情方面还一时扭不转，未好好帮助他在二编室打开局面。后来成立五编室，王说要调他去，当然很好，我没有挽留。心理上倒是觉得这样最好。现在想起，赵之所以在二编室不安，后来调五编室，原来是我排挤他，打击他！甚至之所以要成立五编室，是因为我难搞，我的独立王国插不

进手去。这真是悔之晚矣！

我现被疑为这些事是受了胡风指使而做的，我申明，我没有受过胡风指使。

我说过我受了胡风的影响，我比别的胡风分子更胡风分子，[那是]事已至此的一种忍痛牺牲，自己对自己的诛心之论。胡风确实讲过王的坏话，但他也说过冯、楼的坏话，我却没反冯、楼。如果受胡风指示或“仰仗”胡风之意，在二编室我应打击排挤的是舒芜，我对舒芜却无话不谈，在领导面前没口称赞。至于我和王的意见不同的那些事实，不是我制造的，更不是胡风所能制造的。

王国和政策

(1955年)

二编室有些特殊作风,这些作风的造成,有的与我有关,有的与我无关。

由于我不精通业务,有事大家商量,计划之类,也由大家订,而分成小说、诗歌、戏曲等组,互推组长,组长召集会议讨论,主任坐享其成。好处是民主,坏处是领导意图不一定能完全贯彻下去。

我一辈子的生活和思想都和纪律相抵触,特别是劳纪。我从小在吸大烟的家庭中长大,养成不能早起的习惯,后来在外面做事,虽然屡次下决心改,可是总只能坚持一年半载就不行了。我的经历之所以与新闻有关——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新报》,南京中央社,《新京日报》,上海《中华日报》,桂林《力报》,重庆《商务日报》,《新民报》等等,基本原因,就是报馆无需上班,至少无需上早班。碰到纪律性的事,我总想法溜掉,不愿做独当一面的行政首长等等,也是为此。所以我比别人都更理解生活习惯与劳纪抵触的痛苦。二编室原有两个人在劳纪上最成问题,张友鸾做过三十年报纸编辑工作,习惯不容易改;麦朝枢年纪太大,冬天上早班等公共汽车的情况,吃不消。

这两个人也不能不影响别人，如舒芜，起初很遵守劳纪，曾有一月全勤，后来看见二编室无所谓，也就松懈了。但这些人其实是勤勤恳恳的工作者，并非偷懒的人。关于劳纪，以前写过，这里不多谈，只补充一点：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在有完全从新生活中出来的编辑人才出现之前，是不容易解决的。冯曾有一次主张编辑少上一个钟头班，听说人民出版社编辑只上两个钟头班，可见不止是二编室的问题。二编室的人，特别是舒芜，很好在办公时间聊点天，从聊天中很能谈出一些问题，不是读书和开会所能得到的。我自己在这中间就受到许多益处。因此我也常参加那种聊天，当然聊不出什么道理来的时候也有。我还有许多片面性的、不完全切合实际的想法，我以为二编室应该有几个人成为真正专家，成为能在具体业务之外多想些问题的人，应该有人看一些暂时于业务无关的书或文章。例如小说组，应该有人把所有的旧小说，所有研究旧小说的书和文章，有步骤的看一遍，即使暂时不在具体业务上有所表现，只要他看了能若干程度地成为大家的知识，对整个古典文学运动应该是很有用的。同时，二编室的人一般地政治水准低。其中舒芜较强。顾学颉和李易较有点新知识，但穿凿性也大；顾的写作能力也低。严敦易、周汝昌业务能力强，但几乎完全不懂什么马列主义。在《红楼梦》批评运动中，《文艺报》和二编室都希望周汝昌能提出一点自我批判性的东西，却硬提不出。二编室要周把他的《新证》删改一下出版，他也删改不出。他的和胡适、俞平伯相同的那一套还是根深蒂固。二编室的业务学习对大家有点用处，但严、周二人因耳聋，受益亦少。此外张友鸾也几乎与新东西绝缘。我以为这是很危险的，简直想不

出好办法！我的这些片面性的想法，有时也有意无意地讲出，影响大家，更造成和劳纪乃至出版计划的抵触。

我比较关心大家的生活，也对他们的生活有些理解。张友鸾在斗争会说我不关心干部生活，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举例，我不批李易的借款条，认为五元十元不值一批。这事是有的，因为财务科叫我不要批，批了他们不好做账——借款时常离发薪时不远。为了兼顾，我自己借钱给李易而不批。这道理李易当然不懂，以为我个人示恩卖好。二编室人，常常用费不能终月，舒芜、陈迺冬向我借过款，黄肃秋一个时期几乎每月必借，张友鸾、陈启明现在还欠我的钱。严敦易的《〈水浒〉研究》早支过钱，周汝昌生病时我请王叫人送去过二百元，张友鸾、黄肃秋现在恐怕还以《〈水浒〉研究资料》名义（这书后来因要把每一条材料找原著来对而耽搁了）各欠社三百元，这些都是通过我替他们想的办法。我一再为他们争报酬，除了和《水浒全传》比觉得社内社外不公平，和《李白诗选》比觉得诗与小说待遇不公平以外，主要的还是为他们的生活。二编室人如果有些对我有点好感，理由之一，应该是关心他们的生活。当然，现在斗争反革命，所有的话都变了：造成什么事实，运用什么手段，腐蚀什么等等。

此外，因为水准低，没有一成不变的见解，容易听人家的话，特别是舒芜的。因为自己写一点研究性的文章，也就鼓励大家努力此道。如看见有人在办公时间写点业务外的文章，也不深究。

这些都是与我有关的，其他与我无关的皆不谈。我觉得这样，似乎还不算独立王国。如果说，许多事，问题，情况，我都

没有及时向领导汇报,以致领导没有更多了解二编室;上级指示我没有及时传达,传达得不仔细,解释得不清楚,致使二编室人对领导上有隔膜之处,这就是独立王国,那我也认为是。如果因为王插手不进就是独立王国,我认为不是。冯、王先和我说明,酝酿如何插手法:或王管我不管,或共管分工,或在我管后再管一次,无论那种办法,我不会不赞成;通过我到二编室酝酿,说明需要如此的必要,不可能插不进手。不这样做,甚至我连知都不知道,二编室人也完全莫明其妙,而不知采用的何种方法来硬插,碰到一点小问题就认为是我抗拒,巧布八阵图,我想我负不了这责任。

我本来不懂古典文学,我不是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或爱好者,我担任二编室工作,一开始就带着很大的勉强性。几年来在工作中摸索到的很少的几点理解,主要的是关于小说方面的理解,作为对于政策的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有理解,至少是没有完全理解关于古典文学的政策,特别是属于二编室范围方面的,即整理古典方面的。因此,我一方面并非古典文学的虚无主义者,对古典文学一概否定;同时也不是对于每一个问题,思想都打通了。

主要[一]个问题就是精华与糟粕的辨别与去取问题。我说过,这是二编室,特别是二编室主任,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尽管遵照上级指示,倚靠干部工作热情,尊重专家和群众的意见,都不能完全不影响工作。我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散文方面,《庄子》定入计划了,没有积极组稿,我认为作为思想,《庄子》的毒素可说是很大的。而把

在新人物面前放一部《庄子》，和过去我们自己读《庄子》看作一回事，当然会造成思想错误。对《韩愈文选》，似连计划里也没有。我认为韩愈最重要的文章是现在最不需要的文章，如我所记得的几篇如《原道》、《谏迎佛骨表》、《送李愿归磐谷序》、《上陈给事书》等等，现在看来恐怕都是不好的。而其他的东
西，又不足以代表韩愈。特别是散文，我以为越是讲道理的东西，即越是作者思想之所在，也就越是在今天没有用处。此外，还有从五四得来的影响，不喜欢文言文。在诗方面，我还是认为首先要向读者推荐的是李、杜、白、陆，先把这几家送出去之后，才能谈到别的。因为[有关]这几家的工作上发生了问题而耽误了时间，陶、曹等集的出版也受到影响。此外，我认为历代诗、唐诗宋词等选集，是浩大工程，应由学术机关研究机关来领导做，要多花人力和时间；出版机关来做这事很不适宜。一两年间，三五个人纵能做出，一定问题繁多，纷纷[受到]责难。如果必须出版机关来领导，最好也先不由国家出版社首当其冲，而由别的出版社试办，到了一定时期，国家出版社吸收其经验教训和成果而予以加工、提高和增补等等。因此在前年定计划时，我提议把这一部分工作推出去了。这当然有畏难苟安之意，同时在目前的二编室还不能领导这工作，社外专家也还很少是我们相信其确有把握的（这里面问题也很多，以后或者要谈到）。戏曲方面，《元曲选》已做了，《桃花扇》、《牡丹亭》都列入计划了，工作似由文学研究所的人做。研究工作和出版工作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大的，非常难按计划时间出版。《长生殿》、《琵琶记》二书，大家无把握，似未列入计划。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可以整理出版的。小说方面，有几个问题

可谈。首先《三国》删去其“后人诗叹曰……”，以为是去其糟粕，结果一切还原，得了一个痛苦经验。其次是《红楼》错误，我认为错误是有，但不是像资产阶级专家俞平伯、王佩璋说的那样。因此我曾说冯张皇失措。但我还是服从领导，当众检讨了。俞平伯的“权威”倒后，这问题多少应有些改变，我觉得我原来意见还是没有错。俞、王攻击新版《红楼》，原因似是未请他们来出甲本而是出了乙本——亚东本。记得乔木部长曾举出宝玉对袭人讲太虚幻境，甲本较乙本含蓄，乙本袭人被写得鬼头鬼脑，丑。周汝昌《新证》就曾以此非难乙本，说“把两个小孩子的天真无邪的胡闹糟蹋成什么样子了”。其实这是就文论文，孤立的看法。就全书看，乙本更露骨地表示了对袭人、宝钗之流的憎恨，袭人这种人从最初起就不让她有好看一点的样子。我始终以为乙本较好。曾对做工作的人说，校勘两本时留意，发现了乙本较胜的证据，可抄下来送中宣部看。这话想来想去，不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还是服从领导，准备改印甲本，请俞平伯、王佩璋等来工作。工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专家们的笑话，即：从来就不曾有过一部真正完全的甲本。于是只好把凡属于甲本范围的各种本子搜来凑成一个甲本。这工作，《红楼》研究批判运动一来，专家们不敢继续工作下去，告一段落。二编室又准备一个较可靠的乙本。在《红楼》问题中，尽管我一再服从领导，但老实说，我觉得我没有错。因之，我有情绪，我当然没有达到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心平气和的境界。再，去年出了《镜花缘》，而压下了《三侠五义》——准备在《封神》、《东周列国》之后出。这几种书工作都做好了。只是发稿先后问题。我本主张先出《封神》后出《镜

花缘》。二编室人觉得《封神》不易被理解，放后一步，我没有争。现在似乎有人说二编室放下重要书不出而出可有可无的书。不知是否指《镜花缘》和《三侠五义》等。我以为《镜花缘》尽管可以出在《封神》之后，但应该出在《三侠五义》之前，而且它还不算可有可无的。明、清两代的古典小说，别的不谈，有一个共同点，是都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反映了从清末起开始实施的一些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要求。手边没有年表之类的书，粗略地说，清末以后的一些改良或改革，大致如次：

一、废八股（《聊斋》）、《儒林》、《红楼》都反对）

二、废科举（八股和科举）

三、禁女子缠足（《镜花缘》反对女子缠足）

四、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水浒》、《怪现状》反对官僚政治，《封神》主张推翻旧政权）

五、五四时代提倡白话文（古典长篇都是白话。《镜花缘》讽刺咬文嚼字）

六、男女平权，反封建家庭、封建婚姻（《红楼》反对封建家庭及婚姻制度，《镜花缘》主张男女平权，反对蓄妾等等）

七、非礼非孝（《红楼》反对旧礼教，《封神》哪吒出世及殷郊、殷洪故事都大胆地提出对孝道观念的怀疑。把孝道拿来用政治的眼光加以衡量等等）

.....

《镜花缘》是属于反映民主要求的小说中的一部，除了那些民主要求之外，个别章节也还是很好的讽刺文学，甚至有的还超过《儒林》，不过它不完整，矛盾多，改良主义色彩浓——它是不是出于一人手笔，这问题还大可研究。特别是和《红楼》相

比，它标志了清代古典小说的衰颓。从最高点急转直下，一下子落到几乎可说是最低点了。但要完全抹煞它，认为可有可无，还是应该容许有些异议的。

《三侠五义》我以为迟点出版也可以，这和我对于它的看法有关。我以古典小说是《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封神》、《儒林》、《红楼》、《镜花缘》等书，即反映了资产阶级性民主要求的。明代小说多以起义换朝的英雄为题材，《隋唐志传》、《残唐五代》、《三国》、《水浒》、《封神》等。清代小说多与此相反，多以为现政权服务，翦平民间或地方势力的“英雄”为题材，《三侠五义》、《小五义》、《七剑十三侠》、《乾隆游江南》、《施公案》、《彭公案》、《野叟曝言》、《荡寇志》、《花月痕》等等，是反动的。《三侠五义》是属于这一方面的。这看法当然太简单，一方面《三侠五义》本身写得较好，二方面这些反动小说中也可能发现一点什么新东西。因此对《三侠五义》并不排斥而是在思索对它应该怎样理解。

此外，二编室也可以拿起对笔记小说的整理工作来。我也曾思索过。明朝有没有笔记小说，我几乎一无所知。明朝是和长篇一致的短篇小说发展的最高时期，主要著作是“三言”。清人的笔记小说或短篇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可说是“三言”的反动——《聊斋》、《阅微草堂》、《子不语》、《觚觚》、《谐铎》、《两般秋雨历》、《夜谈随录》、《夜雨秋灯录》、《剪灯余话》、《新话》等等。白话文没有了，市民型的人物也不见了，甚至像《聊斋》那样刻画文字也没有了。总之，清代的短篇是从市民手中回转到士大夫手中去了。里面有没有较好的东西？当然有。但除了《聊斋》，值得整成专集的不多。这需要工作者，也需要

时间，把它们选成几个集子，整理了出版。附带说一句，这些书都还是小时候看过的，差不多三十年来没有看了，所以这里所说的，并不完全准确。

以上就是我在二编室的一些作法、看法和想法。由于我水准低，对于“古典界”情状向来不熟，看不起专家，招致了许多困难。碰到困难又没有仔细思考，想办法来克服，影响了工作，影响了出版计划，引起社内社外的不满，都是有的。但怎样违反了政策？有什么急需出版的把它压下了？有什么头等书我用次货掉包了呢？出版计划究竟小到如何程度呢？如果尽量放大，究竟可以放到多大呢？所有这些，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什么来。我不相信如果是与政策有关的问题，竟是我所能转移的。

检 讨

(1955年12月)

我的思想、感情、意识，由这些东西所形成的精神状态，由这些东西所发出的行为，就总的方面说，都是非党的，非革命的，其严重的地方，是反党的，反革命的。我从来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感情，也就是没有党性，特别是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也从来没有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具有过无产阶级思想，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书本上的词句变成我自己的血肉、自己的世界观或思想方法，根据它来处理具体问题，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所有这些，在北京的这几年中，已多少本能地感觉到一些，所以我屡次说我没有做好一个党员。但能真正接触到问题，真正能够加以某种程度的分析，则是这次反省中的事。

我出身于由地主阶级没落下来的封建腐朽的家庭，这个家庭除了没有土地以外，除了有时可以操很下贱的职业以外，别的方面都应该属于地主阶级，它向往着地主阶级的生活，迷恋着过去世代的“光荣”。我生长的那个地方，是极闭塞落后、没有任何文化、看不见任何人类前途光明的地方。因为穷，小学

以后没有进过学校，二十岁以前没有离开过家，没有接触到任何思想的阳光。我的文化水准，特别是就思想方面说，是很低的。我受过各种旧东西的影响，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庄子》。我很清楚地记得十几岁时如何欣赏《庄子》的那种置身于一切事物之外的《逍遥游》，是非黑白反正一样的《齐物论》，首先把自己养好的《养生主》，对于别人最无用才是对自己最有用的《马蹄》等“名篇”。从庄子的思想出发，人是非变成游戏三昧、玩世不恭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放任自流、恣情自适、自得自满的庸人不止的。我还不能说我身上究竟有多少庄子的影响，但和他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不过一向不怎么意识到罢了。

此外，我最初接触关于新文化的书是无政府主义的。一接触之后，就很欣赏，随时留意找那种书看。大概我到外面来了之后，最初一个时期对我发生了思想作用的，就是这一种。这种思想很快就和我原来的庄子影响结合起来了，成为一种能抗拒别种思想的力量。这力量在我身上清清楚楚地存在，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的时期，大概有五六年之久。至于残余的影响，可以说是长期的。我清清楚楚地感到从一九二三到二七年间在广州的时候，在莫斯科的时候，对于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抗拒，认为不彻底，承认强权，而最彻底的当然是无政府主义。自己也曾经检查过这种思想，给予过清算。但它的影响却长期地存在。这特别表现在对政治的不热心，玩忽，甚至对别人一心一意地从事政治活动，觉得“像煞有介事”。更具体的表现是对组织纪律的不重视，像与自己不相干；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看得稀松，有时甚至反感。这就是说，作为思想，狭义的思想，我已经不相信或者说反对庄

子或无政府主义了；但在感情方面，意识方面，广义的思想方面，庄子和无政府主义的结晶体却起着不小的作用。

还有，我受了一些五四思想的影响，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于五四，我只看见了它的资产阶级的作用的一面，没有看见更重要的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作用的一面。其中问题较小的且不谈，有几点应该提出的是：易卜生的个人主义，这也很容易和庄子和无政府主义相结合的。全盘欧化，当然是指文化思想方面，也就是全盘资本主义化或资产阶级化，更确切地说，买办化。我对于这问题一向不了解，虽然没有写什么文章涉及这个问题，但精神上却暗自相信了许久，甚至在做整理古典文学的工作中，也发生过一些矛盾。一直到《红楼梦》问题讨论中，才有若干领悟。这一点恰好是与胡风思想相同的。

这些东西一望而知，是与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根本不相容的，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立场、阶级感情、党性或组织性纪律性等等。立场、感情都不是天生会有的，它们也不会自然有起来，而是要人去争取，努力去获得。而我的放任自流、对政治不热心、对组织纪律不重视等等恰好妨害我去争取、去获得。即妨害我靠拢党，妨害我参加剧烈的斗争，妨害我钻研马列主义。我的思想体系，我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反党、反革命的。不是说我几十年中不曾有丝毫改变，刚刚相反，是不断地在改变，但那些改变，也是自流的，渐进的，而且微小得几乎是不足道的。我也不是丝毫不曾努力，但那些努力也是极微小的，比一个党员所应有的要求是远远地赶不上的。

由于没有阶级立场、阶级感情或党性，由于没有把马列主

义思想据为己有，由于思想体系里的置身事外、不问是非、玩忽政治等等庄子及无政府主义影响，就发而为以下一系列的非党、非革命乃至反党反革命的言行。

一、和反革命的关系方面。

首先是和国民党的关系。抗战开始后和全国解放以前，都和大大小小各种国民党人有过来往。这些来往是没有经过组织允许的，甚至来往的人中，包括著名的特务头子在内。我原来是国民党，原来有许多国民党关系，原来可以说没有国民党以外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本来可以割断的，抗战一来，由于我对抗战的理解的错误，好像既然抗战了，两党合作了，私人来往一下不要紧了，好像我得了谁的特许似的。这，首先是组织纪律问题。但问题不止于此，问题正在于我把那种关系，当作一种普通社会关系，好像彼此不是属于两个敌对的党，好像这种来往是与政治无关的，我是与政治无关的。这就表示了我的置身事外、超党派或处于两党之间的那种游戏的非政治的反党反革命的思想。而且那些人中除了少数是一时利用以外，和他们来往的时候，在感情上没有什么憎恨，甚至对特务头子还有某种程度的友谊，甚至在他被俘之后，还写了一篇文章记述和他来往的经过，里面还把（他）写得一表非俗，尽了替他宣传、辩解的任务。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感情，没有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势必非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不可。

再，和胡风的关系。和胡风的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起初的认识，不在于认识以后的若干年间，而在于已经指出他的思想有严重问题了，还和他来往。这又是置身事外的思想，是好像这种行为与政治无关的思想。不但来往，还常常把他所不知道

的事情告诉他，最严重的是泄漏党的重要机密给他，即尽我的力量以党的重要材料资敌。除了没有立场、没有阶级感情、没有党性以外，同时也表示了玩忽政治、游戏人间的劣根性。以前，我还以为在思想的重要问题上，我和他有什么不同，我和他的来往是和思想无关的。经过反省，才发现自己的思想几乎与他的完全一致。他赞美自发性，我正是一切都放任自流的；他主张不要立场和世界观，我正是没有立场和世界观；他主张文艺不要从属政治，我又正是不关心政治、玩忽政治的；他歌颂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抱虚无主义态度，我也正有着五四时代对中外文学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他明目张胆地写了许多反动文章，玩（顽）固地坚持他的反动理论，仇视党的同志的正确理论，我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原来和他的来往也还是以思想为基础的。

我的严重的敌我不分，以致发展到为敌宣传，以重要材料资敌，除了上述的思想根源以外，同时也是庄子的把是非黑白看成一个东西的“齐物论”的具体体现。这是属于反革命同时当然也是反党反阶级性质的。

二、言论方面。

上面说过，庄子的思想非发展为庸人不可！我其实早已是一个思想上的庸人，甚至追求成为一个庸人。这种庸人又是和没有阶级立场、观点、感情，不懂马列主义等等是一个东西，发展到极致，也就非成为反党反人民不可。我是文化工作者，主要的是以思想影响人，我自己的思想既如上述，写的文章就不可能不犯错误。我写了许多反对国民党或反对国民（党）方面的文章，但那些文章，几乎都是没有思想性的，即不是党的和

马列主义的立场，而是一种随便，一种调皮捣乱的立场，因为国民党实在太反动，从任何立场都可以反对，所以在写文章的当时还有机会发表。这且不谈，只说有严重错误的。

其一，是上面说过的为特务头子宣传的。其二，是一首诗，《命令你们停战》，说谁发动内战、继续内战就反对谁，即所谓“各打五十板”。这首诗周总理看见过，说我丧失立场。说今天国民党打我们你反对固然不错，但我们是革命的，有一天国民党不打我们，我们要打他，你也反对吗？其三，有一篇《毛泽东与鱼肝油丸》，是因为有人捐钱请毛主席买鱼肝油丸吃而发，涉及在延安所看到的毛主席的印象，把毛主席写成一个貌不惊人的病夫，也不会讲话的样子，诬蔑了毛主席也就诬蔑了党的最高领导者，造成读者对毛主席、对党的不良印象。其他错误较小的文章这里就不罗列了。这些文章，都是丧失立场，好像自己不是党员，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甚至有故意装成一个普通老[百]姓，以为那样就更有力量，更显出国民党的反动的错误想法，即我所谓追求做一个庸人。这种想法是从放任自流的庸人思想出来的，也恰恰适合于自得自满的庸人思想。因为既然要做一个庸人，当然无需去掌握马列主义，去争取获得立场观点，事实上就是把马列主义看成在庸人思想之下的东西，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党员，变成毛主席所说思想上没有人党的党员。追求做一个庸人，至少是安于做一个庸人，从这庸人的眼光来看这世界，当然会把党看成和国民党一样的东西而“各打五十板”。把革命和反革命看成一样的东西，不但降低了党而且诬蔑了党，事实上也就是尽了反党作用。这是不问是非的“齐物论”思想和置身事外的“逍遥游”思想在文字上的

具体表现。同样地,其他两篇也是从这种思想来的。写反革命特务头子和写党的最高领导者,都是同样用一种方法、一种态度,即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态度,没有对反革命的憎恨,没有对革命领导者的热爱,要不造成为反革命宣传、诬蔑革命领导者的效果也不可能。这些文章都是反党的,也是反革命的。

三、在社工作的情况方面。

由于庄子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由于由那种影响而来的对组织纪律的不重视甚至反感,对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不重视甚至抗拒,由于由五四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来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不理解和虚无态度,使我在社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

其一是对劳动纪律不重视。自己实行违反劳动纪律,不按时上班下班,造成群众把我看成特殊分子的印象。因为自己不能以身作则,也就不能干涉被领导的人,造成二编室一般地不遵守劳动纪律。不但如此,还在社务会议凡是讨论劳动纪律的时候,我都强调编辑工作的特殊性,造成劳动纪律执行上的困难,助长二编室以及整个编辑部对劳动纪律的抗拒情绪。

其二是不尊重领导。首先是对雪峰同志的不尊重不爱护,在社外群众面前以恶劣的态度谈他所写的关于《水浒》的文章,而自己又是从一种资产阶级的考据观点出发的。在领导核心小组会议讨论工作报酬问题的时候,以十分恶劣的态度和他的意见对抗,即实行和他粗暴的吵架。也不尊重和爱护适夷同志,常常说他头脑简单,甚至在社务会议的时候和他吵架,并且离席而去,造成群众的极恶劣的印象。更不尊重爱护任叔同志,在二编室工作问题上,几乎处处都和他的意见不同,其实

并没有好好考虑他的意见，反省自己的意见。只简单地认为他不了解二编室的具体情况，为了使他了解，特别召集了几次会议请他出席，那些会议在我自己是有反抗情绪的。对任叔同志的态度发展到了极致，就是从一种极庸俗的观点看问题，毫无根据地认为他想取雪峰同志而代之，并把这意见对别的同志讲出来。所有这些（其实不止这些）以及由这些所发生的影响，直接造成因为我的缘故的领导上的不团结，造成社的集体领导的不健全，间接造成若干程度的人心涣散乃至对社的悲观失望的情绪而影响工作。我的对领导的不尊重不爱护，还限于社内同志。对陈伯达同志所写的初版《水浒》的关于施耐庵的文章的问题，曾向群众谈过，其实不谈，群众并不知道是陈伯达同志写的，一谈就损害了陈伯达同志的威信。关于胡乔木、周扬同志也说过一两次怪话。完全没有组织观念，完全不觉得自己是个党员，当然会发生这种反组织、反党的行为。

其三是对被领导的放任自流，不好好检查工作，不要求遵守劳动纪律。我自己对自己如此，推己及人，对别人也如此。因为没有细心检查工作而造成《屈原[集]》、《红楼梦》的错误问题，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出版社的威信。其次因为自己领导能力、业务能力都低，不免尊重工作者特别是个别工作者的意见，把它当作自己的意见，成为群众的尾巴。而那些意见有时是和社的意见不协调的，有时是反映资产阶级思想或宗派主义思想的。具体的例子是听从群众片面反映，跟群众走，没有跟赵其文同志布置好安心工作的环境。再就是不从组织、从社的观点出发，过分地照顾他们个人的生活，照顾他们的物质利益，照顾他们的情绪和兴趣，在社务会议或核心会议上，凡讨

论这种问题的时候，总是站在他们的立场而与领导意见对抗，通不过的时候，还把会议情形告诉他们，表示不是自己不尽力。用这种方法来博得二编室部分人对我个人的不正常的“拥护”，同时也就造成对社的不满情绪，而形成一种独立王国的状态。此外不耐心说服人、争取人，怕得罪人，不接近更多的人，汪静之的离社和赵其文同志离室，都是与我的工作态度分不开的。而这种态度是反组织的，因而也是反党的。

以上只就严重的问题说，其余如生活的散漫，吃吃喝喝，与同志间的关系不正常，待人接物的态度不好，以及业务上的个别问题，都与整个思想体系有关，也都造成了不良印象，不过比较次要一点，避免冗长，姑且从略。

总括以上所述：和反革命的关系，反党反革命的言论，反组织、反党的工作态度，都是从我的由庄子、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等的影晌所造成的反动思想体系或精神状[态]来的。但我一向并不这样清晰地感到。十分感谢这次肃反运动，使我认识了自己的这些反党、反革命的东西；认识了我的言行、我的历史竟是和反革命、反党这样密切地联系着的。我和反革命来往，为反革命宣传，泄漏重要机密给反革命，污辱毛主席，把党看成和国民党同样的党派，这些言行，都是反党、反革命的，直接损害了党的、阶级的、人民的利益而帮助了敌人。其他破坏组织、破坏组织和党的威信的思想 and 行为，是直接反组织、反党，损害了党的、阶级的、人民的利益而间接帮助了敌人。

在反省的初期，我是有着抗拒的情绪的，觉得自己最多不过落后而已，何至与反革命三字有关。经过写历史材料，这些

材料不但提供给组织,同时也提供给我自己,用真凭实据把自己证明给自己看,那些材料的每一件事对我自己都是一顿鞭打,使我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起了变化,彻夜彻夜失眠,几乎要淹死在自己流的汗里,而同时又不可忍耐地发冷发麻,这样经过一个相当长——一个月以上的时期,才认清了自己,哑口无言地在证据面前低头。但同时也就来了胸襟开朗、心平气和的阶段,我相信我以后能肃清那种思想,能改正那些错误,惟其自从现在起,我能遵守严格的组织纪律,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能全心全意地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做一个新中国的工作者。我深恨这次反省对我说只来得太迟,假如十年前这么来一次,我应该多做多少工作,能把工作做得多么好,能对人民有多少贡献!

不但认清了自己的历史,同时也领悟了不少旁的道理:其一是,我领悟到从旧人变成新人这句[话]。从前以为只要社会环境改变了,人就会自然变的意见是错的。旧人变成新人,必须经过思想革命,经过脱胎换骨,经过一阵心理乃至生理的苦痛。另一是因为认清了自己,同时也更透彻地认清了胡风思想的彻头彻尾的反动性。他是文化上的一切反动思想的集大成者,因而也领悟到许多文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有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即文艺游离于政治的倾向。尽管他们自己不曾这样主张或自以为不是如此。于是觉得文艺上的每一个具体问题几乎都有重新读的必要而有无穷的东西可读。再就是我一向以为有些东西是我无法搞通的,比如政治经济学和俄文。这次反省中证明不是那么一回事,《资本论》看过一遍了,并没有特别搞不通的地方,几个月来自修俄文,把在苏联时钻了一年

多钻不进去的俄文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这才明白以前之所以搞不通，只是没有下苦功的缘故。在哲学方面，因为自修俄文是以《联共党史》为教材的，特别看重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参看了几种旁的书，懂得斯大林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领悟到毛主席的《矛盾论》在哲学上是个新发展，特别是关于主要矛盾的那一部分，而这个发展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的，像毛主席的其他著作的每一个原理都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符合的。末了，对古典小说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它们都反映了市民阶级的要求，那些要求是后来的废科举、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全国解放所逐步实现了的。而那些要求，它们之间又是彼此共同的，如《聊斋》、《儒林》、《红楼》都反对科举和八股，《红楼》、《镜花缘》都反对妇女压迫，《水浒》、《怪现状》都反对官僚统治等等。一句话，我对这次反省，对于党的感恩戴德是无限的，我以后如果能够做任何一点点小事，一定会与以前不同，都是这次反省所给予的，都是党所给予的。

经过这次反省，经过了内心的苦斗，我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已经根本崩溃了，今后是怎样巩固新的思想所占有的阵地，使它得到充分的发展。

首先向党保证：今后决不会再和明知他是反革命、明知他的思想有问题的人来往。我将和一切旧社会的人割断任何关系。这并不困难，那些来往其实是毫无必要的，因为过去安于做一个庸人，不理解自己是参加政治斗争的一员，任何行为都有或可能有政治性，所以对于那种来往还觉得有多少世俗的兴趣。只要有这觉悟，只要随时警惕自己，提高自己，没有那种

来往,倒是十分自然的。

其次向党保证,决不再泄漏任何秘密给任何人。旧的关系断绝了,有问题的人物不来往,自然不会再把机密泄漏给敌人,这里是说即使是同志,只要是他所不应该知道的,我也不泄漏。

同时向党保证:今后无论做什么工作,[在]哪一级的地位,我都要遵守组织纪律,遵守劳动纪律,服从领导,全心全意把工作做好。这也并不困难,既然庄子、无政府的影响已经清除,经过这次反省,我是二十多年的老作家、有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的包袱就不会有了,也就不再有什么使我不尊重、爱护、服从领导的了,也不会再有使我倚老卖老,以为特殊一点也不要紧的了。

除了上述的保证之外,我要求党削除我的党龄。我有二十年党龄,如果把中断了的不算,扣足了也有十几年。但我过去实在没有做好党员而是相反,损害了党的利益,帮助了敌人。我不配有这些党龄,宁愿做一个新党员。而我真正做党员,也不是在过去而是在今后。我还要求免除我的领导职务,降低我的级位。我的知识和能力都不能担负起原来的工作,过去因为勉强性太大,以致造成种种错误、种种损失。今后我愿做个编辑或助编,在别人的领导之下,犯错误的机会少些,即使犯错误,关系也小些。再,要求党给我过一种严格纪律性的生活。我过去对自己放任,以后当然管束自己,最好是党能给我一点管束。不过应该有怎样的具体措施,一时还想不到。

我有许多错误,是属于组织纪律性的,我特别对于这方面缺乏修养。我应该要求党责成我订一个对党的与组织纪律问

题有关的文件，指定专人帮助我、督促我，使我在一定的时期内，每隔若干时候，向支部提出一次口头或书面的学习报告，报告学习的心得和进展。这之后，学习中国革命史和毛主席的著作，再就是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特别注意和具体问题的联系方面。这种个人特殊的学习，一直到党认为不必如此了为止。

末了，谈一点个人愿望：我觉得惟其是现在，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较有能力从事于研究和写作，也才真有多少东西可写，写出来对于读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真有不少用处。年纪已经大了，要补充的知识如中国历史方面，很少汇集好了的现成材料可利用，势必要花一些工夫，必须争取一点时间。因此以极严肃的态度向党同时也向社要求，考虑我今后工作问题时，多注意一下这一个问题。如果党对我的看法和我自己的看法完全相反，当然又当别论。

以上算是我的初步检讨。由于目前的觉悟水准的限制，当然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希望同志们多给我帮助，让我尽可能快地做出较为全面深刻的检讨来。我现在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追溯我和康、谷的关系

(1955年12月29日)

我和康泽、谷正纲的关系，应该追溯到在南京时的一段罪恶活动。二七年回国，正值孙传芳攻南京，攻到龙潭，让桂系军阀击退了。桂系因此功而迫蒋匪下台。但桂系在国民党内历史浅短，因拥西山会议派谢持、邹鲁等为傀儡。南京的蒋系以伪中央党段锡朋、罗家伦、谷正纲等人为首，掀起过一次所谓反西山会议派运动。康泽和我都是训育员，都参加了这次运动。我甚至还很积极，因为向来讨厌西山会议派，特别是戴季陶。积极的表现是在由贺扬灵主编的《救党特刊》上写过几篇文章，其中两篇是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一、《与李协和论党争》。因为那次运动在示威游行时，桂系军队开枪打死一个伪党校学生，伪党校学生抬起尸首到伪国府门口去请愿惩凶，李烈钧出来讲话，说这次运动是党争，即共、国之争，亦即反西山会议派的是共产党。我说西山会议杀了人不改悔，推在党争身上，还有继续杀下去之意；而堂堂政府负责人在群众面前公开造谣。另一篇《共产党的宣传机关——西山会议派》，说西山会议派动辄说这个共产党，那个共产党，凡进步一点的都指为共产党，实际是说只有共产党是进步的，就是为共产党宣传。后面

这篇特别反动，但很投合谷正纲、康泽的胃口。康泽对我的好感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他和我住在一个宿舍时，用钱不分彼此，一块儿吃吃喝喝也是有的。

二八年，不知内幕如何，由留苏的人搞了一个刊物，名为（国民）《党基》，由唐健飞主编，我参加编委，我是事后才通知的。这刊出了六期，我写了三篇文章，一篇为《以党治国》^①，即以国民党治国，推论下去，当然和后来叶青等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是一样的意思，不过没有那么明确。这是我写的最反动的一篇文章。其余两篇都是骂无政府主义的，一篇《无政府主义者与军阀》，是以吴稚晖为例，说无政府主义者有奶就是娘似的崇拜枪杆，陈炯明、桂系、蒋匪，他都崇拜。并引起过吴稚晖的回答。另一篇是《面包怎样略取》，是批评《面包略取》^②那部书的，说它把强力、武装、组织之类都反对掉了，赤手空拳的个人无法略取面包。这篇文章曾引起康泽的注意，他以后说我“左”，是从这儿开始的。这刊物的最后两期是我代主编的，第七期我写了一篇讽刺蒋匪的短文（内容记不起，是以他对军队训话为题材）引起黄埔系大哗，由贺衷寒召集全体留苏会议，把刊物停止出版，本期未发表部分扣留了。

二九年下半年，我参加过反动组织改组派，由沈苑明和我联系。外人知道的不多。这年年底我回湖北，沈对我说，过武

① 该文全称为《中国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刊于《党基》第4期、第7期，署名绀羽。

② 《面包略取》，俄国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1927年11月上海自由书店出版。1940年书名改译为《面包与自由》，现收入《巴金译文全集》第九卷。

汉时不妨停留一下，如果唐生智拿下武汉，我可留在武汉办报。并叫我和武汉负责人杨子福联系（沈、杨二人均于胜利前死去），我停留了，联系也取得了，但武汉无恙，只是我停留得太久，回南京时由伪中央社副主任降为编辑了。此外没做过任何活动，也未写过任何文章。谷正纲是南京的大改组派，我虽然未和他有任何组织联络，他应当是知道我的。加上从前在一块儿混过，一同参加过反西山派运动，所以对我有些情面。但改组派后来无形解散了，谷也投到 CC 去了。

三一年不知从几月起，我带编《新京日报》副刊，总编辑是段梦晖。“九一八”后，我在那附刊上一连发表几篇反日文章，主张停止内战，联苏联共，联合工农共同反日。“内战”两字在当时南京都是违禁的。联苏联共联工农更违禁。就因为这，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抓我，我逃走了。我的文章，段梦晖是赞成的，同时我弃掉伪中央社职务潜逃，在一部分人中会被认为奇事，而段梦晖是推许的。所以他后来对我有好感。

和胡建文也有一段历史，但说来话长，又属于丑表功之类。暂且不谈。

同志们的意见，总括起来，是特务头子之类给钱给我，特务头子是不讲私人关系的，为什么给钱，必定是我也是特务或为特务头子所利用，才能这样。斗争是不许答辩的，不过我要冒死讲几句话。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不是一根单线，所以特务头子也有他的矛盾或复杂之处。一般的情况，特务头子是不讲感情的，但有时不完全如此。如果他是一点也不讲私人关系的，党就不会考虑到叫我打入康泽里面去或去向谷正纲进行什么。如果是只讲私人关系，那我就打入康泽里面

了，刊物就可长期出下去了。正因为也讲私人关系，也有他的政治立场，所以发生问题。卓衡之并不一定汽车装满了人，可能是政治立场的托词；但在私人关系上又帮助我路费；康泽不愿捐钱给演剧队，但还是捐了；谷正纲一面大骂共产党，一面准出刊物而出了两期又禁止了，这些都[有]它的矛盾在。我以为问题不在他们给不给，而在我要不要，我要了，还自动地要过，这就失掉了我的政治立场，吞下了糖衣炮弹，自己把自己炸毁了。

如果是特务，是谁下面的呢？当然以是康泽下面的为最合理。但这样一来，有几个问题不能解释：一，十几年只拿了四百几十元，我贪图什么呢？二，从三八到四四相隔六年才一见，算做什么工作呢？三，是特务他用得着请我在什么场合写文章，我敢敲竹杠叫他买书，他会叫我用功研究文字学？四，是特务还劝他不要当特务头子——他不当头子我还当什么特务呢？五，是特务还敢公开发表文章，暴露自己的关系？六，是特务我还经常失业，穷得没饭吃，在桂林最后一个时期党看见我生活无办法，每月给我四百元伙食费。七，是特务能十几年不做出件案子来。三五年党派我送丁玲同志到西安，这件任务总算成了吧，我总没有出卖她吧。关于康泽关系，党现在掌握着特别丰富的材料，有些我看是直接来自康泽那里来的。惟其这样，我更敢说，如果我当过康泽或任何人下面的特务，请党不管肃反的“一个不杀”的宽大政策，把它当作特殊问题处理好了。我决不相信康泽不会陷害我，但即使陷害，假东西总会拆穿，党总有办法把问题搞清楚的。

现在叫我交代和反革命的来往中，有何损害党的事情，并

且说诽谤党的话不但有而且很多。我想了几天(专注意康、谷两人关系上,因为对别人没有可能),想不起,因为要联系到具体的话,具体的情况,要与材料相符,这便不是空说骂过或没有骂过所可了事。我还有什么顾虑呢?已经检查到自己是反革命了,雪峰同志也说我是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阶级异己分子,再有什么,也不过是这样吧;而肃反政策是一个不杀的,处分也没有什么可怕。可是我想不到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党在[这]一方面能给我什么启发。但我知道我没有说什么,也不能乱说我说过了。我的问题特殊而复杂,但我坚信党一定有办法把它弄清楚。同时也坚信党决没有要我说出我所没有做过的事或说过的话的意思。

五五、一二,二九

愿意或能够做什么工作

愿意或能够作的工作还是文字工作。

第一，想从俄文翻点理论的东西。俄文是这回反省中补习的，全程也只看了四章《联共党史》。这程度是很浅的。正因为浅，怕不用就又丢了，所以想急于用一下。翻译力所能及的限于理论方面，是带着很大的学习性质的。

第二，想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以前的小说史或文学史中的小说部分，关于小说是从古算起的，所谓小说家出于稗官，但在很长时期中真正近代意义的小说是没有的，因此，《搜神记》、《世说新语》都算作小说。其实小说应当从宋人平话算起，它是与说书这件事有关的，长篇小说只能由说书人积累而成，不能由作家突然天才爆发而创造出来（指最初形式），短篇则明代以前也是与说书相联的（“三言”）。先有这种由说书积累而成的长篇（当然经过文人编修），后来才有专由作家创作出来的写实小说（《金瓶梅》、《儒林》、《红楼》等），而说书人的小说，则多是以故事为主的（《三国》、《水浒》等——后来也经过文人编修）。以前的小说史是不管时代背景的。但连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的产物；特别是写实性的小说，不管社会情况，简直无法说明何以有这一作品，甚

至还无法评价，例如不懂得蒋士铨之流的节孝诗，就不显《儒林外史》中的对望门殉夫、万里寻父的讽刺的进步性。以前的小说史不管政治倾向，《荡寇志》、《花月痕》之类被与别的小说等量齐观，其实它们是反动小说的艺术代表。又如有些书不提，如《施公案》、《彭公案》之类，但这种东西是叙满清入关后如何镇压全国各地民族运动的，如窦尔敦之为民族英雄，还有旁的记载可考。它们是满清王朝血腥统治汉族的反映，真正反动基础的上层建筑，和《荡寇志》、《花月痕》一起，是《红楼梦》以后的一个大转变，一个大反动热潮，同时也是满清王朝发生动摇了、需要一切力量来巩固政权的反映。这些东西当然不能和进步小说并重，但只要提一下，给以若干适当分析，一面[部]小说史才出现了全貌，而《儒林》、《红楼》、《镜花缘》以及以后《二十年怪现状》乃至《官场现形记》的进步性就被衬映出来了。诸如此类，当然一下子说不完，总之想写这么一本书。这工作，由于《红梦》讨论的成果，比以前要容易一些，但也因为历史知识不够，许多书要看，小说本身也要看，需要很多时间，至少也得三五年才能完稿。但完稿之前可陆续发表一些个别研究的文章。

第三，想研究《随园诗话》，这与研究清代小说有关。《随园诗话》介绍了几千首诗，几百个诗人，那些诗人多半是无名氏，没有专集的。就是说，尽管不出“读书人”范围，尽管是经过袁枚选择的，因为分量多，说不定会看出点什么来，说不定通过那些诗能看出点当时社会的面影，而据记得的几首或几句，就可看出当时（即所谓乾嘉盛世）的读书人很穷，普遍无出路，想做官等等。而且如果真正看不出也不要紧，那就不加研究好

了,所费的不过看一遍的有限的时间。

第四,《水浒》研究已写好五篇,发表过三篇,都需略加修改。还有两三篇须写出,全部完稿当需半年多时间,也想把它完成。

第五,本想写一部专谈胡风文艺思想的书,经过这次反省,可说更有把握。而且不仅是谈胡风,也同时是批判自己和胡风相同的一些东西。不过组织如果认为不需要,那就算了。

此外还有些别的野心,如研究马列主义,把《毛选》和马列主义合起来研究一下,看《毛选》如何发展了马列主义。不过这和我的能力太不相称,我现在对《资本论》的理解还很不行,那就不算作我能做的工作之一,等我自行研究到了一定程度了再说。反正这些书和文艺理论之类的书,我以后是要经常注意的。

致党支部的信

(1956年2月)

党支部：

我迫切地要求有一个负责点的同志和我谈一回话，打通我的思想。最好是陈克寒同志。

我的问题的严重性，无论谁看来，都是我有什么没有交代；而我则是没有东西可交代。因此，没有方法解决。

我和姜斌的关系，从头到尾都是荒谬的，尤其是到香港去这件事，荒谬得更为离奇，更为无以自解。现在越想越荒谬，不但同志们所提出的，我还想到别的，例如初到香港时和姜斌住在一块儿，有时同行同走，也是问题百出的。所有一切荒谬的事，都无法解释，而又恰好只要说我是和姜斌一道的特务，共图做反革命活动，便一切融会贯通，毫无疑窦。我不但提不出任何直接足以证明我不是特务的证据，连间接的证明，稍微有点理由的也举不出。我想请组织考查我的历史，正是历史全部都是问题。过去是国民党，参加左联是胡风反革命吸收的，入党是叛徒吴奚如介绍的；一贯是国民党圈子。我想说我作过什么文化工作，写过多少骂国民党的文章，而正是那些文章有许多思想问题，甚至是帮国民党的忙的；即使那些文章不是如

此，而看一个人要看他的行为而不是他的言论。这些又恰恰证明我之为特务或别种自觉的反革命，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我实在连自己也疑心我是特务了，但我检查来检查去，不是特务，没有和姜斌共谋。这样，我完全跳在黄河洗不清，越说越显得狡狴，越说越证明是顽固的反革命，连这次提要求，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每个特务大概都是如此，又不合乎特务分子的规律！

如果只是如此倒没有什么，承认是特务或共谋好了。事到如今，我还想抢救什么东西呢？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承认了之后，必须交代一套特务组织和别的罪恶史，那一套又是不能随意捏造的。而我对那些东西实在一无所知！即使我善于捏造，也是明眼人所能识破的，那就越说越显得狡狴，越说越是顽固的反革命，越说越要从严处理！这就使人不能不发生一种说怪话的想法：反而不如真正的特务分子，不如早做特务，今天可有彻底、老实的资本！——这种反动的想法都有，可想我的思想问题如何严重，它如何妨害我写交代材料！三天过去了，还一个字写不出，脑子里只是想这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三晚没有合眼，白天又只是想睡，睡又睡不着，只有一次连续睡了三小时。（当然要请求支部给我宽限补充材料的日子，同时也请求给我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我认为世上应该没有真正跳在黄河洗不清的事情，不相信有什么复杂问题，组织会不能解决！只是我不知道那洗清的办法，看不见那解决的朕兆，从斗争的趋势看来，倒是刚刚）（以上括号内的文字原被作者删去——编者注）眼疼，背疼，脑子又一刻不休息，只是想：世上有没有不白之冤，跳在黄河洗不清的事呢？要是没有，为什么有这样的话

呢？又想，我的问题真是奇案，说不定因此而把名字留在历史上。但也不相信它是整个肃反运动中唯一最复杂的，不相信它真正复杂到了连组织也无法解决的程度。这样我除了一再三向组织表示态度，用这个方法来帮助组织了解问题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急于解决，目前继续反省也好，机关管制也好，法院押候也好，劳役改造也好，可以用任何一种办法，让我等候组织研究已有的材料，搜集新材料。我还是向组织表示，如果发现真正足以证明我是特务的材料，无论何时，都当作现行问题，不按肃反一个不杀的宽大原则而作特殊处理。

交代要写下去，其实也只不过重复一次已交代的，在主要问题上。请求给我时间的宽限，几时写好几时交，我也尽量赶快。解决思想顾虑问题，我不过这样提出，请支部参考。

聂绀弩谨呈 五六、二

昨夜想起，我所犯的错误的恶果可以大到无边，不知现实情况究竟达到什么地步。那就不是特务，只就错误论，也可枪毙十个聂绀弩而有余。既然如此重大，我要仔细把记忆所及的东西一一搜索出来，交给组织，至于个人的那个实际问题，只好暂时不管也罢，就整个问题说，其实是很小的。实际上我比特务更坏！为了让组织了解我的精神状态，上面写的还是呈上。

三日

对于反省的看法

十分感谢党给我反省机会，使我能自己考察一下我自己。这不是什么门面话，完全是真实的意味。我也知道，由于这次反省，什么地位、名誉之类，会受到很大损失。但那些都是虚浮的东西，如前人所说钱财的话一样，是“身外之物”，而我所得的则是实际的利益。

我从来未考察过我自己。一向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地过着，这回一省查，自问：我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对于这一问题，简直无法回答。

我和许多反革命有私人关系，里面有些是带着友谊之类的。我一向没有想到这中间会有什么问题，没有想到既然从事政治活动，从事革命，就要分清敌我，割断这些私人关系。没有想到不割断这些关系，对于革命、对于自己会有什么损害。刚刚相反，想的是另一套：什么真金不怕火烧，什么出污泥而不染，什么尔为尔，我为我，尔等能挽我哉，等等封建时代的从个人看问题的教义。其实只要想到，只要知道，必须割断这些关系，实行起来是极容易的，因为和他们来往，并无任何必要。问题的严重性，不在没有想到，而在为什么没有想到，这现在几乎小孩子都知道的事。这无非说明我出身于封建阶层——

我自己家庭虽不是地主之类，但按那社会关系说，应属于地主阶级，我的幼年教育也完全是封建的。这个出身，使我很自然地参加为反动阵营的一员，而且是相当久的时间，和反革命的来往，本来是一种自然和正常的事。我离开反动阵营，跑到革命方面来，并非由于我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也未目击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真实情况，更没有获得马列主义思想，因此也就并非获得了工人阶级立场感情意识之类，对于反革命也就并非有了强烈的仇恨；而是反动阵营太过于黑暗，几乎从封建观点也可以反对它，我的若干“正义感”和若干无政府个人主义之类，促使我离开它；至于入党，也不是因为真正有了什么觉悟，而不过是因为大势所趋的缘故。像我这样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参加革命，想为一种悲悯、义举、高贵的情操，自以为高人一等，在革命中应该享受一种特殊的待遇，如《联共党史》所载：孟塞维克关于党员的看法，即列宁所斥为老爷似的无政府主义的。这并非明确地这样想过，而是以一种朦胧状态潜在着，造成一种并非十分明确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当然是非党的、非工人阶级的。我未能意识到它，未能了解它的危害性，未能除去它，就让它妨害我成为真正的党员。

但我也不是不憎恨国民党，但这憎恨并非从无产阶级立场去憎恨它，而是从莫名其妙的理性、正义之类的观点，里而还甚至含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同时所憎恨的是那抽象的国民党，是国民党的那一套办法制度，对于个人，只限于那离我较远的、高高在上的少数当权者，至于一般的和我差不多的以及在我以下的小人物，尤其是我所熟识的，则并不憎恨，只觉得

他们落后,可悲。如谷正纲、康泽,当然是坚决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但除了他们之外,在我看来,不过是些在社会上混饭吃的家伙,有的甚至自己还对现状不满,同情革命,想革命。这种人,特别是抗战期间,和他们来往一下,对我并没有什么危害。特别是几个同乡,小时候在一块儿长大的人,看见了很亲切,像出了远门的人,回到故乡,看见亲戚故旧一样。就是谷正纲、康泽,也因为一则有私人关系,二则既然合作抗战,他们把我也没有办法,只要我不变得和他们一样,也就没有什么可怕了。发展到最后,即在解放之后,简直为反革命写介绍信,讲人情,惟恐反革命一夫不得其所!而且也一点不感觉这中间有什么问题。这就说明尽管人了党,仍旧是和反革命臭味相投的,至少也部分地仍属于反革命阵营。即使不必这样说,也是整个人生观是和党和工人阶级不相容的。我领悟到了这一点,所以说我是“反革命阶级根性”,“阶级异己分子”,“一贯的多方面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也就只好接受,反而并不觉得恐怖或侮辱了(反省初期是觉得的),因为实际情况是可以这样说,甚至我自己也只好认为我是“暗藏得最严密(即不自觉的)的反革命”。尽管当我自己对自己说的时候,我还不完全服气,我还不觉得我如此其坏,但要公开地驳斥那些话,证明我完全不是,我又没有这能力!

有一件最足作为我的特征的事,是我出奇地不懂政治,即不懂实际政治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把政治活动看作家人父子亲戚朋友间的日常来往一样的无关紧要。穷追下去,直至还有些藐视政治、藐视权力和纪律的心理,认为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我并未真正参加过什么实际政

治活动,另一方面,更和我小时所受的教育影响有关。十几岁时爱读《庄子》及许多关于高人隐士特立独行的人的传记,看小说看到“诗酒傲公侯”之类也特别眉飞色舞。《战国策》上有一个故事,赵威后问一个从鲁国来的人,鲁国有个陈仲子,是天子不能以为臣、诸侯不能以为友的人,这种人是率天下于无用的,何以至今不杀?读这时,非常气愤,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这人不是很好么,为什么要杀呢?政治真是见鬼!后来到了外面来,首先接触到的“新”文化又是无政府主义。其实并非同时未看见别的书,不过无政府主义最为我所理解,最投合我的胃口,所以印象特别深。这不是说《庄子》、《高士传》,诗酒傲公侯的《今古奇观》以及无政府主义,一直在我身上原封不动地存在,指挥着我,我一直相信着它们;刚刚相反,我早已不相信,并写过文章反对它们。不过尽管不相信,尽管反对,却并非完全根除了。它们还有力地在我身上潜在着。这些东西使我廿年来脱离党,脱离政治,一直是个人独来独往,简直没有真正过过组织生活,没有参加过实际政治斗争,面没有过组织生活,没有参加实际斗争,又反转来使我不懂政治的这种特征依然故我,毫无寸进!整党时,我曾检讨过我的所谓“我不在内”的想法,所谓我不在内,就是说什么都与我不相干。铁的纪律,并非没有从书上看见过,但与我不相干,我不在内;党员要兢兢业业工作,也听见说过,也与我不相干,我不在内;劳动纪律,也知道它的重要性,但与我不相干,我不在内等等,我一向实在是这样想的。整党以后,已比以前好得多,可说在北京工作时,已比以前好得多,许多老同志都这样说,但它的残余物却不是完全没有。这一特征使我不靠拢党,不求了解如何

做党员，如何多受到党的教育，以致关于党的知识特别蒙昧，不服从党的调遣，不请示汇报，没有组织观念，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观念——根本没有以为谁是领导，也根本未真正领导过别人。明知胡风思想问题严重，党方面已一再批评，还和他来往，并且泄漏机密给他！如是等等，真不知领了谁的“旨意”，何所恃而不恐！既然如此，何必入党？何必在党里混？在外面不是更随便、更“自由”么？人的糊涂荒谬，只要稍为清楚一点的时候回头去看，都是极其可怪甚至无法理解的。

关于领导与被领导的问题，还有些话可谈，即我的基本精神完全直接与党、与组织原则相违反的。一般地说，我不喜欢接近或者知识方面或者地位方面比我高的人，和这种人在一起，我非常神经过敏地感到他对我有优越感，而我自己则有卑屈感，因而觉得和他无话可说。如果勉强说话，实际上就是在迎合他，拍他的马，而我觉得拍马是最可耻的。又，和这种人在一起，不免有时要听见他对我某种东西的意见，我又觉得这是在受教训，我是最不爱受教训的。因此，我宁愿和在某些方面和我差不多的、甚至比我低的人在一块儿，因为这时候我感不到什么威胁。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我可专好“友不如己者”。但我也并不是想在这些人中造成一个什么小领袖的地位，事实上也从未造成这样的地位，甚至有人提到这之类的话，我还嗤之以鼻。这种情况应用到组织关系上来，应用到领导与被领导问题上来，就成为不愿意接近领导，甚至对领导多少有着一种先天的反感。这种反感，如果他不是以领导的资格站在而前，是不会有的。正因为是领导，所以求全责备的心理也有了，即使他有一点很小的弱点也看做很大了，请示汇报或

听他的指示就感到很大的屈辱了，态度脾气之类就很不像样子了。另一方面，对于被领导的人，惟恐他感觉得我是领导，惟恐他觉得我高高在上，摆架子，教训人，而用种种方法来消灭这种痕迹。即和他们打成一片，做朋友，以期大家平等地来做好工作，只要工作能应付，别的是不讲究的。因此，关于工作，主要的精神是放任自流的，既然怕在他们面前摆领导架子、甚至惟恐说一句重话，结果当然如此。于是工作好坏，不取决于我领导的有方无方，而取决于被领导的自觉性的高低，实际也就是放弃领导。但我的这种搞法，也有一种好处，即我真懂得他们的疾苦和愿望。这不一定是别的领导，特别是隔级领导所能完全具体深刻了解的。不过我把这点点好处应用得很坏，即一方面表示对他们同情，认为他们的情况，组织上不很了解，于是加强他们对于“疾苦”的痛感，使他们产生或加强他们对组织的若干不正常的情绪。另一方面，因为领导不理解他们的“疾苦”，使他们多少有些不安心工作，认为领导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而加强对领导的反感，于是在有机会时就为他们争福利，而这争福利的态度，实际上是和劳方向资方争福利的态度很少分别的。因之也很难为领导所理解和接受。更因之造成我和领导之间的对立。更坏的是我又常把争福利的失败情况告诉他们，更加强他们的不满情绪。于是我与领导对立，他们也与领导对立。尽管我主观上不愿做这领导工作，恨不能早日解除这一职务，毫无当小领袖、要谁拥护我之意，客观上却可以说是搞小圈子或独立王国，即所谓分散主义。上面说过，我实际等于放弃领导，其实还不止此，有时甚至被被领导者领导去了。从上面正式来领导，我或许是不好领导的，但从旁

面、从下面，非正式地来领导，我却非常容易不知不觉地被领导去的。因为那些人的话我很容易听信。所有这些，都是我不懂政治，藐视政治，不从组织看问题，不按组织原则办事所造成的恶果。斗争会上有人说我横冲直撞，听起来很刺耳，但这种情况真是可说是横冲直撞的。

我的教育程度是小学。这件事本来很平常，但在我则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影响。当然也是因为和我的上述的人生观与精神状态结合了的缘故。这影响可说都是不好的。其实是自满自足。一个小学生，在社会上混来混去，混成知识分子，混成作家，不免自己觉得自己很行起来。这样就一方面不求上进，固步自封，即使没有更多的知识，也不觉得有什么欠缺。另一方面是无缘无故地看不起人，不容易看见人家的优点，即使看出人家在知识上比我强，也觉得他的教育程度比我高，应该如此，没有什么了不得。另一是自卑，觉得自己知识实在有限，特别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因此对于许多新东西、高深的东西，凡不是一看就懂的，就认为无法理解，不肯钻研。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看过书，但都是拣那看得懂而且觉得有趣的，抵抗力稍为强一点的，就不敢过问了。对于马列主义（主要的是指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不是没有过钻研的尝试，看过一两次“辩证唯物教程”之类，钻不动，就认为是高不可攀，听之任之了。做文字工作，以思想影响读者，又是党员，不懂得马列主义，现在想起来，简直滑稽荒谬。我的的人生观之所以没有得到改正，文章常犯错误，对胡风的理论长期地看不出问题，和胡风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其直接原因，可说是不懂马列主义。这回反省，有时间钻研一下，这才明白，并非完全高不可攀的，而是自己

没有下过苦功。这几个月的工夫，虽然也懂得不多，也多少懂了一点。当然要如何精通，是很难说的，但懂一点也比一点不懂好。即就我此次钻得的一点点，如果早懂了，我的文章就会全部改观，我也不会是现在的我了，这真令人悔恨不已！除了马列主义不谈，我也没有对任何一种别的学问有较深的钻研，有种东西曾[得]到一点门径，即文字学或称小学，本来可以继续弄下去，因为抗战一来，把生活秩序完全打乱，只好放弃了。以致今天文化建设的时候，叫我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外行，都不称职。因此叫我搞古典时，我认为是需人承乏，暂时客串，至于工作本身，其实是和我不相干的。没有好好想，也没有能力想，没有钻研，也没有想到要钻研。跟以前编报纸副刊一样，以为工作本身自会开出路来，用不着去想它。因此毫无通盘打算，也没有细心工作（因为反正没有能力），以致工作常常出问题；出了问题，也泰然处之，觉得与自己不相干，自己本来没有这能力。在这次反省中也想到，我的这种态度又是整个错误的，不懂可以变成懂，少懂可以变成多懂，即使不懂，就原来的水准，只要细心工作，也可少犯许多错误（如《屈原[集]》、《红楼梦》的错误），也可以逐渐懂起来。对于《水浒》，本来也一点不懂，钻了一下，总多少有些头绪了；在反省中多想了一下，至少对于小说，想出一些道理来了。对于政策也是一样，本来不懂应该怎样对待古典文学，这回从各种书中得了些印象，加强了原有的印象，把它们集中了一下，作了一些摘记，政策的面貌就相当鲜明了（指马恩列斯毛关于文化遗产、上层建筑之类的言论）。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当然还很不够，但比之从前一点不钻不想，却好得多。早有这点知识，工

作也会多少不同。

以上所述,真所谓荦荦大者,我所检查到的远比这多,有的以前写过,有的如处世态度、男女关系、生活方式等等与政治和工作不算直接关系的都没有提,而提到的也说得很不透彻。总之,从各方面看我自己,简直无一是处。连写过几篇文章这事,想起来也刺谬百出,实在因为我是小学出身才算是文章,根本也不值得一提。有道是,错误,只要能检查出,能够认识,就等于改正了大半。我觉得我的所有的错误,没有一样是不能改正或改正起来有什么困难,因之我没有决心改正的。假如我现在又犯了错误,那就是我小视了那些错误的改正,把它们看得太容易改正了。但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困难的地方。首先,分清敌我这事,可说无需我做任何事实的改正,只要认识清楚就行了。因为事实上已没有什么反革命关系,[我]可以和他们来往了。剩下的一两个旧关系,他们现在也都是干部,经过这次肃反,他们也当有所提高,事实上好几年来有的很少来往或简直没有来往。以前说过,以后和这种人也割断关系。另外一件是以[后]决不介绍任何人。这更容易,因为事实上私人介绍的事已不大可能了。从组织看问题,按组织原则办事,服从领导,全心全意工作,更想不到有什么困难。因为这样,其实是心安理得,心身交泰的事;反之,不这样,才是心力交疲、心劳日拙的事。以前关于组织纪律的事,因为不理解即没有切实理解,它还是一种“必然”,君临着我,现在我理解了它,它就变成“自由”了。其他的事也和这一样。作为党员,我当然是一个最坏的,假如都像我,就其敌我不分说,党就不成其为革命的党;就其组织纪律方面说,就不但革命这种大事,[连]任何

带集体性的小事也会干不成！所以我说我不知我究竟是干什么的。没有这次反省，即使我还能侥幸混下去，不犯什么更严重的或同等严重的错误（谁能担保呢），也只不过糊里糊涂混完这一辈子而已。

党，对我个人说，从最初就是拯救我的。当我还在反革命阵营里的时候，以我这种出身，这种觉悟程度，是无论如何都无力自拔的。我之所以在反革命阵营里能感到不安，终于离开了它，极其清楚明白，那是党的影响。尽管我不是劳动人民，不懂马列主义，但因为有党的存在，有党在血泊中坚持革命的伟大精神，我才感觉到反革命阵营不可一朝居。党，党所领导的革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地在召唤着我。入党后，由于我没有靠拢党，由于抗战期间的某些特殊情况，由于我自己的感情与理智、习性与意志的分裂，我事实上只是一个挂名党员，党员在我其实只是一句话。尽管我有无数的可耻的胡作非为，但我终于未变得更坏，未回到反革命阵营里去（在我，情况是随时都有这可能的），那是党给我的影响，是“党员”两字在我身上发生了作用，虽然由于我自己的堕落，这作用是不算大的。这次，党为了整肃队伍，看见我一面满身是严重问题，一面也不是完全不可改造，本着一贯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我一个反省的机会，也就是我自己不能自行改造，自行提高，自行在思想意识感情方面最后与反革命诀别而真正成为人民队伍中的一员，党以党的力量来使我完成这些事，也就是最后一次从所谓“灵魂深处”来拯救我。一句歌词：“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在我的场合，“恩情”一词我觉得比什么场合都更适当，就我个人的感觉说。假如我还有什么遗憾，就是这反省

来得太迟，假如十年以前能受到这种教育，我应该能多做出许多事来。

每一次运动都使我提高一步，每一次运动在最初的时候，我都不完全明了它的正确性和及时性，也不完全能预测到它的后果。及至运动中途，运动的意义逐渐显示出来，而且愈来愈深刻地显示出来，我才跟着逐渐提高，及至运动以惊人的胜利结束，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何巩固政权，如何整肃队伍，以及如何走到社会主义去，在我脑子里其实是一笔糊涂账。没有这一连串的运动，是不能去的。这次的肃反运动的全貌，我当然无从得知，从我所身受的推测，它的正确、及时和深入，无可怀疑；没有这一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如何是会受到损害的。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作用和意义之伟大较易理解。也是就我这一特殊情况的角度看，也许有若干有历史问题的人，但在解放后有了觉悟，想真正为人民服务，可是因为历史问题没有弄清楚，不免成一种精神包袱，妨碍他前进的步伐；甚至那历史问题正因为没有弄清楚，以致成为一种把柄落在顽固的反革命分子手里，使他有被威胁、利用，终于变成现行反革命的可能。这运动一来，弄清楚了问题，反而卸下（至少是减轻）了他的精神负担，他好无挂无虑地勇往前进了。这种情况如果有，这运动只就这一点说，胜利也是伟大的。

拥护正确、伟大、光荣的党！

对支部大会决定的意见

(1956年5月24日)

支部大会决定开除我,我认为是正确的。我违反党纪的事实不止一端,如泄漏重要机密,接受反革命的钱,介绍反革命工作等等,只有一端,也就应该受到这个处分。其余较为次要的事,即使还有的可以有若干辩解,但也没有一样可说是无玷于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的。因此,支部大会的决定,是我分所应得。

现在党支书把这个书面决定交给我,叫我仔细看了表示详尽的意见。这种实事求是、丝毫不苟的精神,使我十分感动。所以我也本着这精神写下如下的一点坦率的意见。

从几点具体小节说起:

一,决定说我“出身于破落地主(一个开大烟馆)的家庭”。这,我一向自己也以为如此。但破落地主是否总该与土地有点关系呢?我的父亲一辈子没有过土地,正因为如此,才沦落到干开大烟馆这种极下贱的生意,即一面剥削人一面服侍人而又害社会的这种不正当的业。但他的先辈是有土地的,亲戚故旧也有仍是地主的,可说生活在地主阶级的圈子里面。因此,这个阶级成分,实在不知该怎么划分。

二,接受康泽的钱“六百余元”应改为三百余元。因为有一次的一百元是入党以前的事,另一次的二百元是“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队长马彦祥、副队长宋之的派我去找他募捐,捐来之后,交给他们了,并非落了私人腰包。在抗战初期,像这样找国民党的人募捐之类的事,在进步文化运动中似乎也并不认为什么不对。

三,和谷正纲的来往不属于私人性质。在金华时曾找他三次,碰见两次,都是党派我去的,任务也是完成了的。在见他时接受了他给我的三十元,当时想法,是借此表示我和他之间不划分什么界限,以便继续和他谈问题。怎么想法且不管,但也应改为“当党派他去与谷××接洽事项时,接受了谷给的钱(三十元)”之类,才更为实事求是。

四,姜斌大概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是特务分子,至少他和反革命有些关系。也正因为这种关系,才找他做某种工作。后来他不回来了,足见他具有反革命根性或本有反革命罪行,所以畏罪不归。但尽管这样,据我所知,也只是这样,他确实是反革命或特务分子这事,似乎还未证实。我想,什么是反革命,在这次肃反运动中,不会没有个明确的规定。那么,除了支部已有确证他是反革命和特务分子的材料以外,关于姜斌似乎应该加上“大概”、“可能”之类的字样。又,王镜清是反革命分子,但是否有血债,我一点不知。如果不是另有材料,也似乎分清一下。

五,“解放前一贯玩弄女性……在解放后仍未有所改变。”解放前,没有离婚和另外女性发生了某种关系,甚至同居,无论具体情况如何,结果总是玩弄女性了。但解放后,我绝未和

任何女性发生那种关系,甚至离婚几年后也没有。这不能说“仍未有所改变”,刚刚相反,是很有所改变。我承认我还没有改变到毫不动心,甚至离婚后也不和任何人触及婚姻之类的问题;但也未达到“仍未有所改变”即玩弄女性的程度。

六,“几度脱离组织关系”。这里面我的责任似乎不大。一次,“八一三”后撤离上海,随演剧队到后方演剧,无固定目标地点,无法带关系。到了一有人能证明我的关系的时候,我就把关系接上了(指在武汉碰见吴奚如和总理之事);一次在重庆,关系问题发生了误会,徐冰同志说他和我的关系不是组织关系。这件事我应负大部责任,但还不是全部责任。我一发现是这样时,就找总理把问题解决了。最后一次也是在重庆,和我联系的何其芳同志因办事处被国民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押解撤退,而不能在撤退时把我的关系有所交代,我完全无罪。而我一到香港,就找夏衍同志把关系接上了。我要说我组织性很强,那会成为笑话,但几度脱离关系,我却很少责任。

以上几点具体小节,我说的不一定都对,对的部分,也无碍于问题本身,不过程度略有差异而已。(本可不提,不过因为要我提,才提出以供参考)(以上括号内文字原被作者删去——编者注)其余几篇文章,因为政治水准低,结果效果与动机有出人,我该负责。但《记康泽》一文,特别是关于民族英雄部分,是写他怕死,紧张了一阵,结果并未去带兵,以致那紧张成为滑稽表演。不知怎么变成“吹嘘捧场”,具体文句一点也记不起,无从解说。

关于在社工作时的情况,主要的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那些材料主要的又在说我平日讲过一些什么话。我本来随便讲

话,讲了不能一一记住。当然里面有许多问题。但当群众揭发时是揭发一个反革命,谁不愿打反革命呢,当然打得怎么重就怎么好,而越是平时接近的人就打得越多越重。因此有些话本来不一定有问题,但一想到它是一个反革命说的,理解就不同了。所以有些材料在我听来,说话时的情况和语句显然大致不差,但在关键上差一两个字或态度的庄谐、语气的正反、声音高低有所不同,话的意义就改变了。例如在谈到具体工作时,新发现了一种矛盾,因而说到中宣部不知理解不理解这种下情。这里并无“欺骗”、“抵抗”、“诽谤”之意,材料却说我说“中宣部不理解下情”,这么一点小差别,对于话本身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材料这么多,有些并无他人也在场,也无法对证,只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在整个问题中,这些也许不是主要部分,但既列入决议中,我也应照党支书所要求的,说一点身受的感觉。

为了整肃队伍、教育党员和群众乃至教育我,支部的决议,我认为是正确的,个别具体小节的差异,无关宏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潮如此高涨,人民的生活如此幸福,那幸福使瞎子也闻得见摸得着。国家如此强大,它的地位提到如此高度,不但在和平阵营演着数一数二的作用,而且正因为我国的强大,因为我国在和平阵营的作用,基本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大大缩短了世界革命最后胜利的里程,甚至使这一胜利可能用和平方法取得。在我人世三十多年的时期中,假如有一个瞬间,我曾梦想过美好的将来,虚拟过那将来的景象,今天,党都给我实现了而且大大地超过了它。每天每天报纸消息使人欢欣得喘不出气来。就在这时候,我还在一件已经决定了的事

情上斤斤于个人的鸡虫得失，真是一面写一面感到羞愧！别的不说，就这斤斤计较，好像党在委屈我，这一点，也刚刚有辱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其实，支部的决定的精神，决不在这些文字或个别问题的枝节上。

我本是反革命阵营里的人，由于党的感召，使我脱离了那罪恶的渊藪。但也由于我的阶级根性，由于意志薄弱，没有把那些关系和影响摆脱得一干二净；更由于反革命阵营的恶鬼抓住我不放，使我在光明大道上走得如此迟缓，如此艰辛，如此不成看相。幸而党随时召唤着我，又使我尽管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自己终于未变成国民党或特务，和胡风有私人关系也未变成胡风骨干分子；惟其是在这次反省之后，我可以这样说，从反革命到革命的这个旅程，尽管别人只要一步就可跨到，我却走了三十年，未免可耻，但也终于让我走到了。今天随便把我放在什么地方，那里也是新中国，也是党光耀所照之地；任何工作，也是革命工作，党所需要的工作，对我都是光荣。光荣的新中国的公民，光荣的党和国家的干部，光荣的党和国家所重视的知识分子。我将忘我地献出我的一切，在工作上，赎回过去的一切罪愆，在这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不这样也不可能。我无论到哪里，党都会紧跟着我，我也紧跟着党，党将永远和我同在！我过去做了一二十年的有党籍的非党员，今后要做没有党籍的党员以至于重新取得党籍！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在支部大会表示愿意留党察看呢？我说过，这是个人愿望。既然是个人愿望，当然带着个人的东西，有些非分的希求。有什么理由呢？应该说没有。一点点不成理由的理由，实在只能对自己说，因为一说出去，作为党员

(在支部决定被批准之前,我还是党员),就应该觉得是可耻的。对党有话不说,是我落到今天情况的较小的原因之一,那么,就说我的可耻的理由吧: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身上的矛盾,也正是社会关系的矛盾(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的反映。看我的出身吧,看我的历史吧,一个卖大烟的人的儿子,一个小学生,在反革命阵营里混了若干年,二十几岁,地位爬到伪中央社副主任,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反革命。尽管这样,我以只身出走了,应该说我叛变了那个阵营。我之所以能够这样,一点不含糊,是党的力量,伟大的党的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感召力,甚至在今天我还能一点一点记忆出我受到感召时的感觉——它不是一次,不是一天甚至不是一年,那时期是相当长的,像我这样一个人也不是一朝一夕可能改变的。在党的感召之下,是不是我是完全被动的呢?也应该不含糊,不是,里面也有我自己的主动性,自己的努力或者说斗争在。但到这时候为止,我并没有变成革命者,不过离开了反革命阵营罢了。我这个男性的娜拉,在和“家庭”闹翻了,走到社会上来之后,首先感到的是前途茫茫,什么都是陌生的,尤其是对于革命,革命的党,革命的政治活动,更为陌生。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同志?我能干什么,怎么干?手里提着的旅行包放在哪一块确定的地面上?必然的事是通过许多偶然的事实现的。这时候,像外国书上所说,“第一个碰到的人”对我是很重要的。假如我碰到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受到他的影响、教育,因之也是受到党的教育,就可能变得好一些。但我首先碰到的是胡风,是吴奚如,两个问题人物,而一直把他们当作革命者看。当然,就我的原

有基础说,他们也给过一些对我是有益的影响,但无疑,有害的东西也多,特别是胡风。而最有害的一点,是我认识了胡风之后,由于当时的客观情况,更由于他的宗派活动,一方面使我也感染了一些宗派情绪,一方面也使别人把我看成胡风的夹带人物,我就无法接近别的革命者,无法受到那些真正革命者的影响,甚至对那种影响有所抗拒。在我原有的基础上,如果说辨别革命与反革命还比较容易的话,辨别真革命与假革命,就困难得多了,何况根本就不曾有这样一个警觉!我的羞辱的历史的造成,“第一个碰到的人”是个关键,但这关键不是我所掌握的,因此,与其说是我的过错,其实是我的不幸。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虽然从反动阵营走出来了,但真正走出来了的,首先只是我的肉体,至于精神方面,总还有多少(虽然我不能分析出究竟有多少)留在里面;同时,和我从反动阵营带出了物质行李一起,也不会不带有“精神行李”。这些问题,只有在革命实践中,在革命认识的增长中才能解决。但恰恰是实践和认识,由于上述的那个“不幸”,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说,我的感情、意识、思想即人生观,还是旧的乃至反动的。新的革命的东西不但没有完全胜利甚至还没有占到优势。这样,它就反转又限制我对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别的且不说,最具体的表现,是和反革命的关系没有割断。这些关系之所以没有割断,固然是由于我认识不足,以意为之地把它分为阵营与个别分子,政治关系与私人关系,好像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认为和反动阵营中的个别分子的私人关系,对于革命是不会有实际妨害的。有什么根据呢?任何根据都没有,不过是我身上本有的反动要素在那里发生作用罢了。但这件事,如果不

是抗战发生，不是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实行，不是革命形势的改变，我的错误认识也不会产生，和反革命的关系是可以割断或者可说已经割断了的。错误认识产生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使我犯了一系列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以致我今天害怕提到这些。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旧东西，反动的东西在我身上大肆猖獗了。我只是被动的么？不是，里面有我的主动性在，我自己堕落了，不但是政治的堕落，而且是人性的堕落。这里面，如果层层剥下去，还有许多话可说，可以更详细地画出我的堕落实来。不过这里暂时不一定有这必要。在这全面堕落的趋势中，我还剩下一点值得一提的东西没有呢？这真不好意思提，提起，也是以前提过的，尽管全面堕落了，究竟还未变成国民党、特务、胡风骨干分子。这算什么呢？是的，在别人那里，应该什么都不算。（但在我这里，特殊的历史，特殊的社会关系，惟其是有那些关系，有那些来往，而没有变成国民党、特务、胡风骨干分子，至少在我自己看来，是要算点东西的。）（以上括号内文字原被作者删去——编者注）一个人根本和反革命没有关系，没有来往，政治水准、理论修养都很高，当然不会涉及像我提的这样的问题，要涉及简直是笑话。但在我这里，具体情况是这样不同，这样一种历史，这样一种社会关系，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认识水准，尤其是在和反革命有这样一些来往的情况中，自己没有变成反革命，没有背叛党，也就表明我尽管无原则到如此不可容忍的程度，但一触及最后一点东西的时候，我还本能地有着一一点坚定的东西，也就是在我的这特殊形式之下，起码程度地忠实于党了。我说过，这也是党的力量；但同时也不能说没有我自己的任何努力在，尽管这努力小到像原子

核一样,以致我今天一面提出,一面又感到可耻。在抗战中的一个长期堕落之后,于四八年在香港开始涉猎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思想上有了若干朦胧性的改变,忏悔过去许多革命机会被我错过了。不用说,在那之后,又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在组织纪律方面。但另一方面也还是有着进步,冯、楼、王三社长都曾说我和过去有所不同,冯说过我能做组织工作,王也说过我组织领导做得不错(这些话的意思相当于支部决定中的“个人势力”、“独立王国”之类)。特别是这次反省,可说有个全面的改变,在认识方面也提高了不少。以往,对于新的理论出现,总是不能一下子理解,连对斯大林的语言学问题也是这样。现在,前天听见党支书告诉我一句话:世界革命最后胜利可能以和平方法取得。我一听,就理解这是个极其革命的原理。一方面是实际革命形势所必需,必然发生巨大的革命作用;另一方面又是马克思主义在新阶段的一个大发展。它如何丰富了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的例证,如何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及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在一国建成,同时,国家在共产主义时期的某种情况下还须存在等革命原理同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列宁、斯大林的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长期和平共处的原理的进一步的结论。而这结论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获得的(新中国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这个原理又如何和过去马恩列斯和它们斗争过的一切改良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等等不同,何以它们的妥协是反动而今天的和平政策是革命,如果手边有书翻翻,我甚至可以一一论证出来。这景况,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基于上述的这点点微弱的理由,即,我也斗争过,也有我的

一点点坚定性，也在近年来有一些进步，加上以前说过的我的错误都是可以改正，有决心改正的等等，所以颉颜希求党给我一个最后机会，考察我一个时期，在那时期，我仍然不够党员程度，就证明我无可救药，实行支部大会的决定，也不算迟。削除党龄，给最低职位，最繁重的工作，最严格的管束，我都乐意接受。

五月廿四

关于黄若海^{*}

(1955年6月26日)

黄若海是在桂林认识的。他认识胡风在认识我之后,很可能是我介绍的。

起初,他们似乎没有什么来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黄若海写文章拿给胡风看,来往的回数就较多了。什么文章记不起也不知道,但有一篇小说是叙他祖父的事的,曾经对我提起过。我没有看过,后来问胡风,他的小说写得好不好,胡风摇头,说他不会写。黄若海这方面则非常佩服胡风看文章的眼力,说他谈得很好。

在重庆的时候,胡风常住在乡下不易进城。进城时也未见他们在一处。在北京,我只见过黄若海两次,每次时间都不久,也未问他看见胡风没有。如果有来往,大概不很多。

黄若海在桂林是否和国民党有关系,我一点都不知道。好像许之乔在桂林谈过他有什么不好的关系。葛琴同志也像听说过。

五五、六、二六

* 原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加,当是外调材料。

关于彭燕郊*

(1955年6月26日)

彭燕郊现在湖南师范学院教书。

在新四军的时候(三九年)名陈德矩,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和我不熟。有人说他会写诗,正在向《七月》投稿。我到金华后,才看见《七月》上一首题为《战斗江南的春天》的诗,署名彭燕郊。起初还不知是谁。好像是等他从新四军出来(因病)后,才知道是他。他那时候,大概常向《七月》投稿,好像发表过几首诗。自然也就和胡风通信。但写的什么不知道。

四一年下半年,我从重庆回到桂林,桂林《力报》又要我去编副刊,而不要葛琴同志,原来是我编,葛琴助编,我走后由葛琴编。这回连助编也不要她了。这样使我很难处,我怕她误会。本来可以一个人编的,特别拉彭燕郊去作助编,以表示并非我不要助编,而是报馆坚决不要葛琴。这样彭燕郊就和我在一块儿做事。太平洋战事发生,香港的文化工作者回到桂林,胡风也在内。彭燕郊是这个时候才认识胡风的。一开始,往来似乎很勤,但我未碰见过。有两次印象还记得。一次,他从胡

* 原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加,当是外调材料。

风那里回去,对我说,胡风问你为什么不到他那里去玩。一次说,有人问胡风,老聂来过没有?胡风说,他还来我这里!这话也是彭燕郊告诉我的。足见他到胡风那里去的回数可能比我多。

后来胡风很不喜欢彭,说他是浮薄少年之类。有一次,彭的一本诗集要出版,要我替他写一篇序,我写了。胡风看见了,对我大发脾气,说替这样的人的书写序!来往也许少些了吧,我不知道。后来在重庆,也不见得有多少来往。但来往总是有的,不过胡风在乡下的时候多。后来一阵子,我自己同胡风不来往了,也就不知他们是否有来往。在彭燕郊那里,似乎未听见说胡风的什么坏话。

彭在湖南,曾写过一次信来,要我替他写证明材料。我回信说应通过组织。以后,组织来过两次要写,我给写去了。他在湖南出过两本书,一本《湖南民歌》之类,一本谈初步写作之类。前一本记不起,后一本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本书都曾寄给我,我都还没有看。

五五、六、廿六日

关于周颖的发言

我在肃反反省后，很长时期，都有着情绪。情绪在反省期间就有，不过反省期间，是反省不出自己何以是反革命；反省后的情绪则是从此万事休矣。起初觉得无面见江东，不愿同任何人来往，以为人家都会鄙弃我，不愿和我来往。时间稍为久一点，不免也碰见过一些人，其中主要的是骆宾基、何封、向思赓。前两人都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后者虽十多年前在重庆见过，到我家来，却是肃反后的事。他之所以来，主要的是住处近，其次是他觉得在肃反中也受了委屈，这种委屈，别人不易理解，在肃反对象面前，自然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和他们来往之后，我得到的印象都情绪低落，都觉得自己从此抬不起头。同时，又觉得他们都不以自己曾作肃反对象是由于自己错误。除了骆宾基外，似乎也不以自己的遭遇为可耻；即未作对象的人，也似乎并不以为他们乃至我自己曾作肃反对象是很可耻的。此外，大家都觉得自己其实被斗争一下或反省一个时期（更不谈较为轻微的被询问之类），即被整一下，是完全应该的，对自己有好处，例如我甚至早就该整。但是只不应作肃反对象，即用别的什么名义整——审干、整思想作风、整党等等，都心服口服。在这里，我逐渐形成了两个意见：

1. 大家情绪低落和人们不认为肃反对象是可耻的，这是党的损失——任何人的消极和党有多少不同的看法，都应是党的损失。

2. 关于什么名义整，我有点稍为不同的看法：如果不用肃反名义，被整的人不会感到严重，也就未必反省得彻底。不过事后应该有比对本本人宣布不是反革命进一步的措施，来分清楚这件事，而我相信党终于会有这个措施的。

声明一句：我的意见的形成，是以上述的那些人为对象，与真正的反革命及弄清楚了问题的留用人员之类无关。所以我的意见中根本没有成绩是什么，偏差是什么，百分如何等等。同时对于肃反整个运动，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千该万该的。

我以为是党的损失的，还不仅上述的那些。在斗争会上，有些同志的发言是与事实不符的，如雪峰说我的某一首诗是为国民党写的；赵其文说，我曾对他说王任叔反对他当二编室副主任；张友鸾说我骗了他七十块钱等等。我当时的心情，认为正义不在他们那边而在我这边。斗争者是站在党方面的，站在党方面的发言不符合事实，使被斗争者有正义不在他们那方面而在自己这方面[的感觉]，这就是党的损失。同时这种损失是应该挽回而且有方法挽回的，只要领导上谈到这问题的时候，附带说一句就行。怎么说，并未成为具体意见，大致像《人民日报》近来的某篇社论里一句：“有些伤害是无法补偿的。”或者还加上斗争者的发言应该实事求是。我以为党迟早是会提到这些话的。一提到，许多人的情绪是会解消的。我的意见与平反无关。我不要求平反，我不感觉党对我处分过重。我所注意的是一些无法平反的比较微妙的心理方面。

我的意见，不用说，是片面的，鼠目寸光的，见树不见林的，是舍大取小、弃全就偏的，因之也是脱离政治的。我所追求的是细致，是抚摸真正有委屈的人的心灵的创伤，是挽回党因为某些干部的情绪低落而受的损失。我的自由主义的积习是很深的，虽然有所克制，却也未克制到连夫妇之间也绝口不谈。这就被周颖在社会主义的发言里所采用了。同时也该说，在被周颖采用之前，在今天我这样写出之前，我的这些意见，其实不过东一句西一句，并不这样集中和具体明确。第一次把它具体化了是周颖，而周颖则是受了我的影响。

此外，我对胡风问题也有点意见，可说是一种纯粹的牢骚。即，我认为胡风的荒谬理论，虽在大体上被打垮了，还有许多点，却并未细致深入地给以完全的解决。我本计划写一部书来逐个问题给以打破，同时也清算自己，提高自己。及至一宣布他是反革命，一逮捕，这种理论斗争，一时就失掉了意义；及时我自己作了肃反对象，虽然有些问题想得更深入了，可是想写一部书的意图也被打碎了。不过这意见并未影响周颖，她的关于胡风问题的发言，与这意见无关；反过来说，我的意见与她的发言无关。

但周颖也不仅只受了我的影响。我之外，给了她较大的影响的是骆宾基。并不是骆有什么意见影响了她，而是骆出乎我们意外，是我们所见的人中（被肃过的人中）精神最萎靡的一个——其中在郊区某农业合作社体验生活的一段时间较好。我原以为骆是个相当坚强的人。解放前几次出入反动监狱，未牵涉到一个人，[带]脚镣手铐用飞机由东北解到南京时，自以为必死，但当他的妹妹在北京飞机场看见了他，表示要到南京

去营救他时，他怕她胡乱找关系，反而暴露了进步关系，就千叮万嘱，叫她不要去。这种精神我向来很佩服。这样一个人，现在却在肃反运动中完全弄得精神崩溃了，反革命、肃反对象几个字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一谈到这，就不禁泪如雨下。他之所以如此，也还有别的原因。他是多疑的人，又专好察言观色。他的家庭关系本来就很不好的，肃反之后，他处处都以为他的老婆也认为他是真正的反革命，他连累得她也抬不起头。他和同住的人家的关系也不好。肃反之后，他觉得人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他，甚至故意叫小孩在他窗外吵得他不能做事；他在街上走，那些小孩又在背后喊他反革命。因此，他在自己家里呆不下去，曾搬到吕荧那里去住，住了一个星期，吕荧就不要他住了，这又给他精神上一个打击。所有这些，自然都是小事，但骆的精神萎靡却不但影响周颖，也影响我，我认为“反革命”三字对我们的关系重大，除了自己的领会外，也由骆的这种情况促成。骆近半年来迁住颐和园，未见，听说精神更坏，已经神经失常了。这是说周颖的发言中，有些是从骆的这种情况而来的。

此外搬运工会有一谢仲明，与胡风毫无关系，却因胡风问题停职反省一年多。此人我不很熟，是周颖在慈幼院及劳协的同事。在斗争时，有人说我和周颖都是如何如何地反革命，都已被捕，藏有多少金条等等。他当即指出至少金条之类是乱说的。这种情况，他事后对周颖谈起，也影响了她，发言中的有些话是从这里来的。

以上所说的那意见，还是去年八九月间谈过的，以后就没有谈了。骆宾基也有半年多没有来往，他到郊区去体验生活，

来往就少了,搬到颐和园去后,绝未见面。至于别人,大概都避免谈到这个问题,因为对于私人,总是既不光荣又不愉快的事,同时也怕谈错,为别人所不理解。其中也有偶然心血来潮,想把自己的意见向组织或中央领导同志如周总理陈副总理反映一下,但随即想到,这样简单平常的意见,领导上不会不考虑到,也就罢了。至于那意见竟被周颖拿去做发言资料,却完全是出于意料的事情。

周颖的发言,是出于一时冲动,主要的是受了社会主义学院一再动员大鸣大放,小组会议大家自告奋勇的影响。她这人,落后是落后,几年来虽然想入党,却也并未把自己提到党员的政治水平。另一方面,却也毫无政治野心,连在总工会委员落选后,也从未发一句牢骚。其次,和任何右派无关系,特别不喜搞民革,民革曾要她当组织部副部长,她都未干。肃反时虽曾被询问过,其实也未被正式斗争(这些话如果不实,我愿负包庇右派,欺骗组织的责任)。也就是平常并无什么牢骚,并未蓄意发言。及至在小组会议上表示要起带头作用之后,才找言来发的。发言之前,曾对我说要发言,谈肃反并带及胡风问题。我问她怎么讲,她说还未想好。我说胡风问题最好不谈,一,据我看,党迟早会更明确宣布这问题及处理这问题;二,一谈胡风,很容易被理解为站在胡风立场;三,胡风那种人,幸而生在今天,如在过去,他的遭际可能更坏。孔子诛少正卯时所宣布的五条罪状,没有一条不切合胡风。胡风遇着孔子,连生命也会保不住。后来她把发言稿写好了,准备发言而没有轮上,回来把稿子给我看,说第二天就要发言了。我看了一下,里面没有谈到胡风。里面有些意见,本来是我谈过

的，我觉得她写得不透彻，就把那意思重说一遍。同时，她以骆宾基为模特儿，说肃反之后好像额上雕着肃反对象四字云云，也写得不够突出，我叫她再好好地想一下。但并没有动笔替她改。其次是叫她把有些过火的话不说，如扩大化之类。再，应明显地表示出这发言是为了爱护党。她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说，本来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响应党的大鸣大放的号召才发言的，也就是本来是站在爱护党的立场，除了这个立场，不可能另有立场。如果不是这样，谁会想到发言，发这言干什么呢？而且别人的发言比她的还尖锐得多（以上三行文旁有办案人员标的两条竖线“||”——编者注）。

她发了言之后，回来告诉我说，没有提胡风问题。我说很好，但过了两三天，她又作了补充发言，把胡风问题补上去了。她认为应该那样做，我同不同意，都无所谓了。这之后，她回来说《人民日报》要发表她的发言，她很兴奋、很得意的样子，好像向我说：你看，你说胡风问题不能谈，我谈了，《人民日报》还要发表咧！她没有要我看稿，我也没有要看。本来还觉得里面有些话不妥的，既然《人民日报》要发表，不妥的地方，编辑部会加工改正，就让它去了。后来《人民日报》为什么未发表，她又为什么去把稿子拿回来，我都搞不清楚了。最后，她拿一份打印稿回来校对，要我再看看。我替她把头一段换了，约一百多字。最后一段添了一句“表示一点愚忠”（以上两行文旁有办案人员标的两条竖线“||”——编者注）。意思是想把爱党这一点点明一下。现在看来，倒成了一种狡狴办法，用爱党的词句来掩饰反党的内容，但在当时确实是没有想到的。

以上是关于她的发言意见的形成、发言和起草发言稿的具

体情况。这就是说,我并未反对她发言,也未反对她的发言的全部内容,而是相反,有些意见,还是我平常谈出来的。即我基本上同意了她的发言。虽然里面有一小部[分]我不同意,我也没有采取有效办法加以阻止(以上五行文旁有办案人员标的两条竖线“||” 编者注)。其次,我未考虑过这发言发表后,对于党将有怎样的损害,更未理解这就是向党进攻。老实说,在《人民日报》六月九日社论《这是为了什么?》发表以前,我对于党外帮助党整风这整个问题都是不理解的。许多一望而知的反动、唯心、恶毒的言论,如储安平、葛佩琦、陈新桂等等的发言,实在不理解党为什么让他们发,为什么报纸还给发表。倒以为党为了彻底整风,不惜借这种反动言论来激发党员,这本钱可下得真大!又以为是党现在真是强大到不是任何力量所可摇撼,所以对任何言论都不在乎!至于思想革命,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反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矛盾之类的问题,一点也未想到。那么,那时候基本上同意她的发言稿,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不过我没有叫她发言,也没有替她起草讲稿。

八月九日

补充一点,楼适夷在我家里对我说:我(楼)作了几年副社长,却不知道当副社长有这么多好处,可以用公家房子掉换私人住宅,而找人家的钱又由公家付款(大意。总之,他是说王任叔有一笔不太小的款,是公家付的。鸣放初期才还),为优待高级知识分子而准备的家具,可以搬到自己家里去。可以越出规定要汽车,并且骂人(夏瑞枫)等等。关于这,不记得我说过什么话。想楼会记得的。楼又说:王任叔排挤他,甚至有什

么暗示(不记得)希望他离社,但是他就不走。几年以来,社里事,他一点也不能过问(大意,文字出入我负责)。我对他说过:从前,王未来时,我们也争论甚至吵架,但是谁也没有排挤过谁。楼说的后一件事,使我很惊讶。

关于周颖的发言稿

关于周颖发言稿的情况，基本上如上次所说，今具体明确如次：

一、我动笔替她改的部分。全文：

我谈对肃反的意见，不等于我反对肃反，也不是简单因为我曾被当作肃反对象的缘故。对于某一个问题的意见，并不等于对一切问题有意见，并不等于否定一切，刚刚相反，这些意见是在肯定党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前提之下，在响应党的号召之下，在《春秋》责备贤者的意义之下提出的。我想这也是用不着声明的。

这一段话，本有原文，是打印的稿子，因为改的字多，另外写在一张纸条上，那纸条不知她怎样了。最后一句：

但为了表示我个人的一点愚忠，还是在这里把我心里的话全盘托出来。

不记得改了几个字，但记得“愚忠”两字确是我加上去的。

二、口头说给她自己改的部分。

具体情况是，她要我替她看稿子，我不愿看，（一则我不愿管这事，二则她写的字看起来也吃力，我就一再推脱）（以上括号内文字原被作者删去——编者注）躺在床上不肯起来。她就坐着念给我听。我听了，认为应该改动的就说给她听，她就照我说的改，但也没有完全照改。（现在来看这段文字，觉得我叫她改的时候，逻辑上要比比较周密。这且不管，）（以上括号内文字原被作者删去——编者注）只说我叫她改的那一段：

如果他是一个冷静的人，他就会觉得斗争他在说谎；如果他是一个有风趣的人，他就会觉得斗争他在念咒；如果他是一个急躁的人，他就会觉得恐怖、冤屈，是非颠倒，天昏地暗。总之，他会感到真理、正义不在斗争的人那一边，而在这一边。这样的心理，哪怕只有一秒钟的存在，我认为也是我们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共产党的威信的损失。

这是就她的原文加以改组的。我加上去的字，只是“冷静的人”、“有风趣的人”、“急躁的人”等等。

另外一段：

我认为这是在斗争之后，对被斗争的人追加上去的一种使人哭笑不得的嘲弄。……额上刻着肃反对象四个字，他们觉得对父母妻子儿女负了罪，连累他们……也矮了一大截。

这些话,是我听了原文之后,给加上去的。此外我都没有替她改。她也从来没有从头到尾念给我听过。我在听她念的时候,还不知道她有完全的稿子。而她这样啰唆地念,也不只一次。至少在她房里和在客厅里各有一次,都是我躺着听的。

另外,动笔给改了个别错字,除去冗字的地方也还有,不能一一指出。

但我的问题,决不在周颖的发言稿哪些字句章节是与我有关系的,哪些是与我无关的。这都是枝节问题。根本问题,在于她的发言稿,那么猖狂地向党进攻,作为一个党员的我,怎么能听,怎么能看,怎么能动笔替她改!改一个字与改一千个,看一遍与看十遍,叫她发言与她自动发言,其中并无质的差别!现在我为了找出哪些字是我改的,我把发言稿拿出来看一下,并未看全文,只看那与我有关系的部分,也看得胆战心惊,一字一汗。但在当时听她念以及看她的原稿的时候,却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这除了表示我至少在那时候与她有同等程度的反党的思想意识以外,不能是另外的什么,现在我与周颖共同追究这问题,提到,如果我当时阻止她去发言是否会有有效的问题。她认为,我也觉得,是会有有效的。但我当时一点也未阻止,也未想到阻止。我们又追究下去:如果我们还是分居,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她会不会去发这言?她认为,我也觉得,她不可能有这勇气去发这言,不可能有这样坚强的“自信”去发这言。还不仅如此,我说过,那发言稿里的某些意见,是我在一年以前就谈到过的,不过她也和我的见解相同,也就变为她的意见了。现在分析起来,除了:一,百分之几的数目字是她

听报告得来的；二，关于提高就是嘲弄，是她描写的骆宾基（其中字句有我修改的）；三，扩大化及希望党检查扩大化的原因，是她自己的意见；四，胡风是否反革命问题，现在她说是她自己的意见，我却以为是从何封得来的（虽然我记不起何封曾谈过一些什么话，但何封是朋友中资产阶级法理观点最强、对肃反反感最大的一个。我希望他这次能得到改造的机会，好好地过关）；五，夫妇之间也有顾忌，以及她自己在肃反中的经历，完全是她自己体会而来的以外，便都是我的意见。其中主要的是说，结论不是反革命的肃反对象，党早应分别开来，加以声明，或先就用审干的名义，审出是反革命了再作肃反对象；肃反过程中斗争别人的发言有不正直的成分，使被斗者觉得正义不在斗争者的一边而在自己的这一边，这就是党的威信的损失。但关于胡风问题，她也有我的影响。我认为，既然不杀胡风，就不如不逮捕他，而只在理论上打垮他，使他受社会制裁；因为一逮捕，有资产阶级法理观点的人，以为反革命只是封、帝、官、资及其走狗的人，就会发生“他是什么反革命”的疑问，反而同情他。她从我的这些话得到过启发，重复一句，我觉得我又是从何封得到过一些启发（何封是我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决无故意陷害他之意，而是确实觉得他的思想应该改造一下）。我的这种意见，在反省刚完之后是没有的，是回到周颖处，并与何封来往之后才有的（其中正义在自己这边，是被斗争时的感觉）。那时到盛家伦家里去过一两次，一次他说某首长（忘记是谁）做报告，说知识分子中没有肃出一个真正的反革命，中国知识分子有五四以来的一贯的反帝反封的光荣传统云云，这之类的传说，在我的意见形成过程中也起着作用。此

外，知道周颖的朋友谢仲明、刘淑贞与胡风毫无关系而被肃；又不知听见谁说张光宇兄弟原来工作积极，肃反之后不积极了。加以那时优待高级知识分子和百家争鸣政策都提出来了。我便觉得就百家争鸣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说，肃反的偏差，使党蒙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损失很难补偿。我有一点和何封很不同，他认为他之被斗，是因为陈昌浩对他有私人报复，我一直认为与执行的个人无关。我的这一认识本来不太错，可是在我的意见中却起着坏作用，因为我既认为肃反有偏差，而这偏差又与执行的个人无关，那自然就归咎于党，认为是党的错误。而一这样，便觉得党一定会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承认肃反是错误，否则，被斗争过的知识分子的情绪无法正常化。及至等来等去，还不见党有所表示，我便对党的领导人有不敬之意，认为他们也有未必高明之处。有一次，周颖在国务院扩大会议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回来说，毛主席关于肃反，只说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未谈到对已斗错了的人如何。我听了要流出泪来，认为在我所希望有的那一点上，没有解决问题，知识分子的情绪还是不能改变，百家争鸣还是难以实现。我的这些意见，大概先后都和何封、骆宾基、向思赓谈过。何封很同意，骆无表示，向劝我不要这样说，说我们还是要依靠党的。周颖就把我的意见作为基础，变为她的意见，写成了她的发言稿。我一点未加阻止，反而推波助澜，帮助她起草，并且鼓励她去发言——最近她还记起我说过，“这种发言也是替党做事”的话。其实没有这样的话是不可理解的，我的心理，精神状态，都是愿意她去发言，赞成她的发言的。还不止此。周颖那回发了言，得到了社会主义学院听众的鼓舞，更高兴了，又到

民革、邮电部去发言。具体内容我虽然不知道，但基本内容却是知道的：反党。现在她检查那些毫无根据的猖狂的反党言论，简直不相信自己曾说过那么多，那么刻毒的诬蔑之词，因此而痛心而痛哭，埋怨我为什么不阻止她。她的埋怨是完全有理由的。她的那些话，现在听起来，没有一句不是反党的，没有一句不是十分鲜明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储安平、葛佩琦、陈新桂他们的话没有质的差别。这些话，在她发言当时，也并非一句也不知道。却一点没有觉得它是反动思想。不但不觉得说出来是于党于人民有害的，反而觉得是有益的。这些固然也是受了大鸣大放的空气的影响，基本上则是自己先有了反党的思想情绪，即先有了对肃反的不满情绪，这才受到影响的。作为一个党员，我经不起考验，先因为对肃反有意见，不知警惕，变而为在家里，在来往的人中间，猖狂地反党，散布反党言论，又变而为影响周颖，成为使她有发言的欲望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她在社会主义学院受到落后同学的影响，这里未谈及）；不但不阻止她发言，而且希望她发言，甚至怂恿她发言；终于不但是关于肃反意见，而且对于别种反动意见，也熟视无睹，习专不察。这就说明我根本失掉立场，根本污染了党员这一光荣的称号。尤其是我过去曾犯过严重错误，正在察看期间，而我还是毫不警惕，我行我素，无视党的处分，辜负了党的处分的教育意义。我向党低头认罪，请求党处分我。同时也提出保证，呕心呕肝、断头沥血地提出保证：这一次，惟独是这一次，我才真正认识党在任何一件事上的正确和伟大，以后绝对依靠党、信任党。首先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党对我的在反右运动中的教育。

关于冯雪峰

(1957年8月17日)

冯雪峰,我在鲁迅逝世前半月许才会见,以前不认识。会见他,是在周文通知我的一个旅馆里,谈的是关于派我送丁玲到西安的事。这事,本来已由周文和我谈妥,他和我谈,不过“以昭慎重”之意,并无新内容。具体的话不记得,也没有谈几句就分手了,我得到的印象:第一,话难懂;第二,架子很大。

我入党,在这一年半以前,关系在军委,跑关系的是吴奚如;两个口号论战之后,关系才转到雪峰这边,跑关系的是周文。

我以前编《中华日报》副刊,编《海燕》,都在入党之前,与雪峰无关,那时他还未到上海。

两个口号论战时,我从胡风口里知道雪峰从延安到上海的事。听胡风的说法,雪峰是延安特派来领导文化的,周扬、夏衍他们是抗拒领导的(具体的话不记得)。所以我也参加了口号论战。但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之后,胡风告诉我说,雪峰说我的理论是错的,叫我写一篇自我检讨的文章。但我等候告诉我,我的意见如何是错的,如何检讨,却一直没有告诉,也没有再谈检讨的事,所以检讨也没有写。论战文章也再没有写。

我没有看见雪峰和胡风或鲁迅的来往。胡风和鲁迅的住处我都不知道。

鲁迅死后，曾由周文通知我，到王任叔家里开过一次会。参加的是任叔、雪峰、胡风、夏衍、周文、我。是否还有别人，记不起了。会上谈了些什么也不记得，总是关于文化方面的。并且说这会以后要继续开。但以后也没有开，也不知为什么。

我和雪峰在离开上海以前，只见过这两次。

插说一点关于丁玲的事。这，我曾写过关于她的材料，现在还说一点，也许已说过，也许可作补充。

我和丁是在车上认识的，送她上车的是周文。和她连在车上及在西安旅馆里，一共十三天。最后一天来接她的是潘汉年。

关于丁怎样到上海及怎样和雪峰接上关系，不知道。也许丁略为谈过一下，忘记了。现在只讲记得的另外的一些话。

丁在到上海之前，曾到过一次北京，据说是最初一次的逃走。但在车上碰见一个《大公报》记者，那记者把她到北京的消息公布出来了，她无法隐藏，只好回南京。到上海是第二次逃走。

她在南京，并未坐牢，住在离中山陵不远的什么地方，国民党派人和她一块住，监视她。监视她的人睡在她的房门外面。后来那个人又和她住在一个房里，和她发生了关系。好像和她有某种关系的，始终是这个人；又像这个人不够能放她逃走的地位。那么也许和她有关系的不止一人。据说，中统方面流行一种术语，“谒陵”（玲）和“谒蒋”（她姓蒋），中统头子们高起兴

来就笑谈：“今天是谒陵或是谒蒋呢？”看起来，她是他们一个娱乐对象，奇怪的是，丁和我谈起这些时，竟津津有味，面有得色。

她和特务生过一个孩子。

她走时，那和她有关系的人送她。是夜晚，有月，两人在一条马路上依依不舍，走来走去。那个人是有肺病的，快死了，对她说了许多伤感的话。他说，他知道她终于要走的。他是个垂死的人，当然留她不住。她的前途远大，不必怀念他。革命总是要成功的。万一他不死，说不定将来还会见面，那时不知是何景象（大意如此）。于是，两人洒泪而别，像小说上的一对情人一样。我以为这人是冯达，她说不是。但是是谁，她没有说。在她口中，那个特务和一个革命青年差不多。

回头谈雪峰。

三九年吧，我在金华，和邵荃麟住在一处。他到金华找邵，也碰见我。招呼之外，未谈什么。他与邵谈什么，不知道。

四二年至四五年之间，他和我都在重庆。他住在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和韩侍桁常有来往，但不知搞些什么。

有一次，我在他那里碰见胡风。他们两人在谈周扬，怎么谈不记得，总之不是什么好话，我提醒他们一句：无论你们怎样看不起周扬，周扬的理论总是和毛主席一致的。胡风问：你怎么知道？我说这很简单，如果不一致，周扬就不会在延安搞得这么好。雪峰为什么搞不好呢？雪峰跳起来，把手里的一本书向桌上一砸，大声说：周扬有什么理论！

他和胡风时有过从，不知搞什么。

五一年下半年起，我到文学出版社工作。

他对我说，不必管事，好好研究马列主义。后来又说，找一个副主任，把编辑室的事交给他，我自己专门研究马列主义。这些话很投合我。他又在支部说，我对马列主义一点也不懂，比一个小学生还不如。支部应以我「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对象。我很不高兴他。

他和蒋天佐有矛盾，我一点也不知道。蒋常在养病，很少见着，也未管事。他如何排斥蒋，有些事叫我去，不叫蒋去，我一点也不觉得。评委会主委叫我代理，只是一句话，我并未真正代理。那时候，蒋在南京养病，不在社。我倒觉得他非常看不起我，「认为我」简直毫无任何能力似的。我经常在这方面觉得奇怪。他从来不曾和我商量一件事情。他叫我做什么，都是硬性指定，从无商量，甚至很少同我讲话。任何事，正如他有一次在支部所说，都是对我不开诚布公的。蒋离社时，我觉得很奇怪。我曾在支部会议上主张留蒋，提出蒋身体不好，可少管事，翻译一点东西。这意见，两方都不高兴。冯的意思乐得蒋离开，蒋的意思又似要管行政。会后，楼适夷告诉我，冯曾再三留蒋，蒋坚决要去。后来楼又告诉我，蒋说，蒋之去，是冯雪峰派排斥周扬派。至于具体经过，我一点不知道。那时，我刚从苏北调查施耐庵问题回来。蒋离社事，使我领悟一点，雪峰似以行政为自己的，他不管，宁可烂在那儿，别人也不能干预，除了适夷。

有一次，许贤民告诉我，有一次文化部一个通知，说沙可夫

因事请假若干时，此时期内由何人负责。雪峰看见这通知，把它摔得很远，大声说：“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请请假还要通知！”

整党时，支部拟以他为重点。他知道了，就在支部会议（他平常不出席支部会议），把支委方紫骂了几个钟头。那次方紫请假。下次方和他都出席。方向他道歉，申明并无要以他为重点之意（贾芝、严辰也同时申明），他也向方道歉，说上次态度不好。两下说的都不直指整党问题，而是指一些琐絮事情，现在记不起了。总之，整党终于未碰及他。

整党后，方紫写一封信给他，提出以周延为出版部副主任。他到支部会议来说，他自己要周延到出[版]部工作，要大家帮助他说服周延去干这件艰苦的事。周业务不熟，要好好钻研，要大家帮助她。这样一说，大家无话可说。周就调出版部。结果，作了几个月，作不好，又调编辑部。雪峰和周延无甚接触。他和谁也不大接触。他也不常到社，到了一会儿就走了。在那时期，社内许多事是听其自然的。

有一次在他家里，不知为什么，他说，当共产党员真难，又不能不当，又不能逃走。

本年六月初，他叫适夷约我到 he 家里去，我去了。这是我反省完结后第一次会面。他说在肃反期间，我似乎对他不满，觉得他没有帮我的忙，其实他暗中帮了忙的。他和王任叔都曾向文化部党委提过书面意见，主张不开除我。此外他说曾和邵荃麟商量，介绍我到各地去旅行一次，写出点东西来。我的小说集可以出版。此外，他说过的话：1，顾学颉的发言，就是态度不好，否则效果还要大一些。2，如果整风后还让他干出版社，他就要由他负责一切，稿子完全由他决定，不要今天来个

电话要出什么,明天又不出什么。比如周扬的集子,论文不像论文,文告不像文告,有什么出头? 3,反批评派非到一败涂地程度不会觉悟的。当时我不懂反批评派是什么意思,八日社论出来后,才明白是指党。4,官僚主义不是一下子可以克服的。从这回大家提的意见看来,党员普遍地不通业务。如果我们还是坐汽车,住洋房,高高在上地做官,不下到底层去看,自己不参加实际劳动,官僚主义就无法克服。

适夷说雪峰曾对我说:“你也可以出出气!”我不记得。也许说过,我未听清。雪峰的话我本不是句句都懂的。

一天在社里开会之前,他说以前说叫我到外面去旅行的话,暂时不谈,现在参加反右派斗争,把对结论的意见写出来,如写时需要他帮助,他可以帮助。但后来我找他帮助,他说他没有说这话,只得罢了。

八、一七

关于到矿业学院去

(1957年8月17日)

矿业学院的那人名胡建文，是莫斯科同学，我和他有卅余年交往。我以前交代的材料已经写过。

反右派开始后，周颖知道她的发言出了问题，思想搞不通，她认为她的发言不是反党而是爱党。这样，她的情绪很坏，天天在家里更不能安静下去。有一个星期一，她说她到颐和园去散散闷，直到晚上还不回来，我怕她碰见了什么意外，很担心。夜晚她打电话回来，说是到胡建文家去了。第二天我也到那里去找她。她说那里凉快，打算住几天。叫我也住几天。我看她的思想问题未解决，就答应了。周颖这人，个人英雄主义很强，不容易接受人家意见，尤其是我的。在那里，有胡帮助打通她的思想，比在家里确也好些。起初，周坚持意见是组织再三动员提的，本来说无论说什么都可以的，她又毫无反党之意等等。我和胡都反复说，大是大非与小是小非的分别，小是小非应服从大是大非。就那些已被反的右派说，他们的那些谬论还不该反么？至于她的问题，不算太严重，可以说清楚。发言是一种政治行为，失败了也应光明磊落，迎接自己所应受的遭遇等等。就是这样，谈谈玩玩，玩玩谈谈，直到星期三夜晚，我

说她说她提意见并非为个人，但现在她思想不通，主要的是个人的荣辱得失，那么，以前的发言，也就很难说完全不是为了个人。这话有点打动她，她的态度有些改变。我看有了转机，第二天就回家了。她还留在胡家。星[期]五或星[期]六天没亮，胡就起来喊周颖，说他想了一夜未睡，想她的事，认为她还是应该好好地受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旁的想法都是徒劳无益。周颖被胡的这种关心所动，那一天，就回家准备检讨的事。

到矿业学院的经过就是如此。

八、一七

关于陈企霞

(1957年8月18日)

在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期间，一个星期天上午，楼适夷来约我到冯雪峰家去吃午饭，说冯已约好在家里等。我同他去了。冯向我表示，在肃反期间，我似乎对他有些不满，其实他和王任叔都曾向组织替我讲过话，最后都曾向组织表示：最好不要开除我。似乎是要我谅解。我告诉他，这意见，王任叔早告诉过我。即使没有告诉，我推想大概也是如此的。冯又说，他和邵荃麟商量过，请作协介绍我去外面旅行，问我愿不愿意。我表示愿意。此外，问我写了一些什么稿子，说可以拿到社来出版，以前的小说集（原在社内）也可出版。最好还是搞几部东西出来。他以后也将埋头写作云云。

不知怎么谈起陈企霞，听他的口吻，陈的问题也接近解决了。从前，吴奚如曾说陈企霞对我印象不错，我一时想起去看看陈。我就问冯，我可不可以去看陈。他表示可以。并告诉我陈的住处。我从冯家出来后，就到陈家去了。

陈一见我，表示很热情，说曾向人打听我的情况，几次想到我家去看我等等。并说只有一点对我不满，即我恢复了自由很久，没有听见我讲过话。我问，我要讲什么话。他说关于自己

的肃反问题的。我说这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央批准了对我的处分。这处分我既然还有点小意见，我相信党会给以平反的。他说平反是平反，问题是我该斗争。我问，我该向谁斗争。他说这也是难，你们社里没有斗争对象。顺便他又告诉我，为我的事，主任叔还和谁拍过桌子（即土认我不是反革命。拍桌子是我现在安上去的，原话是什么记不清，大概是闹别扭之意。至于那谁是谁，他没有说，我也没问）。他问我从何处来。我说从冯家。他问冯对我的问题如何看法。我说他主张我多写点东西。他说这是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的办法，冯一向如此。他又说冯最不懂组织手续，他自己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和他共事很麻烦。此外，他说他的问题已濒于解决，近来常常开会。我问怎样解决，他说怎样解决呢，在哪儿毁坏了名誉，就在哪儿赔偿。又说我可以写信到作协要求参加这个会。我说我并不这么喜欢参加会。他笑说，党员还怕开会！

他显然对于自己的“斗争”很满意，他说他没有想到这么快会解决，他原准备坐十年乃至十五年牢，来弄清楚这个问题。又说陈克寒去看他，他如何拒绝不见。另外谁去看他，他把人家骂走了。他说他什么都不怕，人一个，命一条，失去的只是锁链。现在“反党集团”等字样是已经取消了。党章上规定的权利，如果不斗争，有时也会被人抹煞的。又说，坐视不义与躬行不义，当是同等不义。因为如果没有坐视不义的人，敢于躬行不义的人就少了。又说，从来没有本机关叫人失去自由的，翰林院能叫翰林失去自由么？又说，康濯、刘白羽都在会上检讨，向他道歉云云。

八、一八

关于和社内几人的来往

(1957年8月18日)

反省后,和社内人来往得最早的是金满成。因他和我相识最早,知道我的过去也最多,不至以为我是反革命而怕和我来往。我找他是和他下棋,别无他事。有一次,是快发薪水的时候了,我因为社内派人给我送薪水,未免太远,就想起请他给我代领,领了后,我到他家去拿,比较省事。他同意。我就写了一个条子给社。以后每月都是他给我代领,我也每月都到他家一次,直到他去休养为止。他休养期间一次未去,直到近来我有时候白天到社开会,会后到他家下棋,约一两次。合计约去过十多次。他一次都未来找过我。

和他未谈过什么话,也没有什么话可谈。他两夫妇都是很胆小的人,历史又乱七八糟,更非常怕事,决不谈什么。我和他相知既久,他的思想、学问、见解之类,我都知道,没有什么谈得来的。我到他家时,总是晚饭前后,他的孩子们都在家,他不让他的孩子知道我是肃反对象,都避免谈什么。再,有时 he 家有别的客人,我不认识,更不谈话。所以我在他家,除了下棋,并无别事。最近一次,是反右派斗争时期,我说周颖出了问题,恐会涉及我。他就表示最好我不再去他家之意,我就

未去了。

是不是说，我到他家，除了下棋，就都是哑然相对呢？当然不是。天气也谈，笑话也说，故事也讲，甚至时事新闻也讲，但有一定的范围，即让孩子听来，这爸爸妈妈的见解，决不落后。这是“父母之心”。我也遵守这个范围。再说，最初碰见时，他或许慰问过我，我也许还发过一点小牢骚，但那些话都是随口而出，毫无意义，时间一过，就无影无踪了。但彼此决未谈过反党的话、搞什么组织活动的话或向他点火、叫他发什么言的话。

去年某月在某书店碰见顾学颀。一同到东安市场去喝茶。两人相对，无话可说。我原同他并不接近（我接近的原[是]舒芜、张友鸾），几乎从未单独谈过话。在那场合，更不知从何谈起。他说到张友鸾如何因为我的事而作过检讨，及至听说我自由后，曾想到去看我，又因为曾揭发过我，怕我不理他，骂他。我为了打破当时那相对无言的窘局，又表示我不会不理张，就说你可找张来见见么？他就去打电话，约张来，一同吃了一顿晚饭，就分手了。在这时间，张和我谈的话较多，顾没有谈什么。以后很长时期，我也没有看见顾。

今年某月，顾和黄肃秋、陈启明来我家一次。为什么来，我不知道。看样子是黄肃秋要来看我，约他和陈一同来的。寒暄之后，就和他下棋，一共下了三盘。这中间，周颖也回来了，又来了一个许之乔，屋子里熙熙攘攘，又要下棋，弄得头昏脑胀，他们谁和谁讲话，讲些什么，一点也不知道。记得黄肃秋累次要向我讲什么，我累次不理他或故意和别人讲话。因为我觉得

黄在揭发我时的发言是不正直的。他说我包庇文怀沙过关，说我对他说过我和周延都是党内同志，不好提意见，要他提。都是无中生有（最近我问过他，他说我没有对他说这话，是文怀沙说的）。他说他曾讽刺我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但当时他说这话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因此，我对他还有点小芥蒂。

这一次，他们一直熙熙攘攘到吃过晚饭才走。以后我就未见过这顾、黄二公——除了开会。

李易来过我家五六次。头一次是说来看我。以后都是送薪水，送书（即后来陈启明替我做的事）。一来就下棋，除了他问过我关于我的文章的问题以外，连一个字的任何问题也未谈过。送薪水是金满成休养后我托他的。送书是他自己要做的，即替我向资料室借书，向社买书，送资料室新找到的我的存书等。这些事，都是在整风以前。整风开始后，不记得他来过。

张友鸾见过三四次。一次在和平餐厅。两次他来我家。一次张友鹤请吃饭，在友鹤家里。再一次是我到他家里。以前几次都在整风之前。只有我到 he 家里是六月初，即从冯雪峰、陈企霞家出来之后。从来未单独谈过话。头一次，有顾学颀在，在我家有陈启明在，在他家时有王珩、林辰在。他到我家，头一次，是来看我，第二次是替《新民报》副刊拉稿。我去找他是为打听稿子发表的情况。头一次，他首先第一句话说：恍如隔世！第二句就说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意即一面对不起我，一面组织又不相信他。随后讲他几次检讨通不过的事，具体的话记不得了。他有向我表明他并未以为[我是]

反革命之意。我也向他表示,我并未觉得他揭发我有什么不对。同时问他,他说我骗过他七十元稿费,这事弄清楚了没有。他说弄清楚了,我没有骗。此后没有谈什么与肃反有关的事。几次谈话中,他都说他不愿在社,打算到《新民报》去,以及请假在家,社准许他离职等等。最后一次,他告诉过,他在整风会上发过言,又把那关于他的检讨的事重复了一次。他说这些话时,有时我也插过嘴,但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或希望什么等等。他所说的事其实都与我不相干,也无需表示什么态度。最近在社内碰见他,他说《新民报》寄来我的稿费在他那里,他不便送来,也不希望我去取。

陈启明到我家来过十来次。最初也是来看我,后来就替我清书、借书、送书、送薪水。清书是我的书有尚在资料室未送来的;借书是向资料室、市图书馆、傅惜华、周绍良等借;送书是社有时赠,有时我向社买等等。送薪水是继李易之后,最近几个月的事。有时他也来向我借钱。他告诉过我,他曾在公安部关过多少时候。他说在公安部除了一进一出时问过几句外,一次也未审问,比反省还好得多。他说在这期间,他的母亲死了。老太太不知是什么事,也许有点怕。要不是肃反,也许还可活一两年。他除了他的老婆在肃反期间生活上发生了问题,去向冯雪峰借钱,冯不理,因此他认为从前在沪曾照顾过冯,为冯奔走过什么事,今日冯不借钱,有点不满以外,对肃反也未表示别的牢骚。我说他和冯,今昔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不能混为一谈。他也能理解。我和他谈过我对旧小说的一些看法,把我的稿子给他看,要他给我整理。他也和我谈过谢灵

运、李商隐、李后主等人的作品，并谈过毛星的什么文章。整风开始后，他曾告诉过我，李易发言，曾提到我的问题，似乎以为我之所以出问题，与社内人事关系有关。我说那是李易瞎说，我的问题与社无涉，尽管我在社时与谁也不算搞得不好，但那是另一问题。我的问题，主要的属于党内性质，李易怎么随便乱说。反右派开始后，他似乎有些提高，觉得右派不反不得了。也谈到过储安平之流的荒谬言论，劝我写文章。我告诉他，周颖发言事，多少与我有关，我精神上有负担。对于右派言论，我曾起草过四五次文章的草稿，并想写一篇关于知识分子的大文章，就因为有这点负担，每次都不能完篇，因此我很苦恼。

我说话很随便，不能说我什么时候都未发过一点小牢骚。但那些话都是随口而出，说了就忘了，也不记得是对谁说的。对社里这几人，想来想去，想不起对他们说过什么太不对的话，特别是对李易、顾学颀、黄肃秋，可说等于任何话都没有说。附带声明：我与舒芜小集团及他们的任何活动都毫无关系，从未对他们点火或做过别种阴谋活动。

八、一八

关于和某些人来往

(1957年9月23日)

冯雪峰为什么叫到我到他家里去，我一点不知道。我为什么去呢？是他叫我去的，是他叫楼适夷邀我一同去的。一年来，我没有想到要到他家里去或有什么要碰见他的意思。如果有，我会早到他家里去了，用不着他叫人来邀。

他首先对我说，听说我对他有不满之意，认为他在肃反中未帮我的忙。我不知他听谁说，我记不起对谁说过对他不满之意。我以为是骆宾基对他说过。昨天在首都剧场开会碰见骆，问他，他说他没有说。

在雪峰说这话之前，我已知道他听说我对他有不满之意了。大约二三月间，杨霁云到我家看过我一次，对我表示慰问。我想不起杨怎会到我家，因为我和他的关系，决不到他去我家看我的程度。杨在谈话中表示：雪峰曾对他说，我不满意他，其实他是暗中帮过我的忙的。杨在我家谈话，没有一句有具体内容的，只有这一句话，还有一点意思。我曾想到：莫非是雪峰叫他来特别透露这点意思的么？

雪峰对我讲的话，另外就是说组织介绍我到全国去旅行，问我愿不愿。我说愿。他说他再去和邵荃麟商量。似乎以前

曾经商量过。我不知他说的组织是作协还是社。此外，他问我写了多少文章。我说十几万字。他说可以拿来出版。又说杂文集可以再版，小说集可以出版，并嘱适夷记住去办。这些话，如果是今天，我会警惕到是收买或什么，但那时我一点没有想到这些。我只觉他要办应该办的事，连感谢之类的意思也未表示。

其他的话，上次材料已写，不重复。

后来有一天（反右开始之后），我到社来开会，会已开始。徐达同志和他从会场出来，徐交我的结论打印样给我，他说他有几[句]话对我说。他说，现在参加反右运动，旅行的事，要过后再谈。结论问题，如果我需要，在提意见时，他可以帮助我。我说我需要。他说以后再谈。这样我们就去开会了。

大概一个多月之后，我到他家去问他怎样帮助我。他说他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那么，这句话也就不必谈了。在这次会见中，他说过半句话，似乎是“你总是……”、“反正你……”之类的几个音，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清楚，说了半句又未说下去，我再叫他说，他不说了。我说你以为我这回会被开除么？他说那要看事实。又说，过社会主义关，大家都要过。我想问：你也要过么？但没有问。后来想起，那时他似已知道他有问题了。

我去看陈企霞，是在冯家临时想起的。怎样想起的，记不清楚了。或者是雪峰提到他，或者是我想起约一年前，陈曾对文怀沙表示要去看我（附带一句，我未向文表示欢迎。如果表示了，他或者真去看我了）。我问过冯，可不可以去看[陈]，冯

说可以，这样就去了。什么动机呢？没有什么动机。有点好奇，想了解他是什么问题。也有点因为彼此都有问题，想找同情和同情他。见着他时，他表示很热情。说我的问题，他一向很关心。只有一件对我不满，即我出来了这么久，未听见我讲话。我问讲什么话。他说关于肃反的问题。我说我对于自己的问题无意见。他问我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我和康泽有关系。他说那是历史问题。我说现时问题也有：泄漏党的秘密给胡风。他觉得这事有点麻烦，停顿了一下才说，那时并不知道胡风是反革命嘛。他问我是不是对处分一点意见都没有，我说有也是一点点小意见，值不得一提。他说小意见也该提。我说，还要平反的。他说平反是平反，斗争是斗争。我问向谁斗争。他说向主张以我为肃反对象的人。我说我不知道是谁（在这之前，他说过巴人不主张斗我，关于这，上次已写过了）。我问他是什么问题。他说作协以他和丁玲是反党集团，曾传达到全国。我说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他说是党内。我说现在怎样了呢？他说现在正在开党组扩大会议（这时我才知道他的问题并未解决，原以为是早已解决了。我问冯，陈处可不可以去，是指他的问题是否已解决了。冯说可以去，至少我听来，以为是已经解决了），取消反党集团的帽子，恢复名誉，在哪儿破坏的在哪儿恢复。叫我去参加那个会议，写信给作协要求参加。我说我不喜欢开会，他笑我党员还怕开会。他说要斗争，不斗争，党章上规定的党员权利，有时也会被人抹煞的。他又说：坐视不义与躬行不义应视为同等，因为有人坐视不义，躬行不义的人才无所畏惧。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一面觉得他这人和我太不相同，一面也有点怀疑，是不是他的态度倒是对的

呢？我心里有点为他的话所煽惑，觉得他到底是在延安呆过的，懂得这些办法。因此我问到如果有意见应如何提出之类的话（这是我现在推想，或者我问过，其实记不起问过）。他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内可以批评任何人，可以向任何一级的党组织反映自己的意见，比如向支部提出，叫支部按级转呈到中央。

陈企霞曾问我在反省期间的心理状况。我说我起初很恐怖，我以为要杀我了。主要的是因为反革命三字，既然是反革命岂有不镇压之理。其次，在我到井冈山去之前，周扬同志曾叫我去谈过一次话，因为我写的一篇批评胡风的文章（谈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问题的），里面说共产党并不随便杀人，杀的只是如何如何的人。但把不杀人强调得太厉害，竟说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之类的意思了。周扬同志指出这一点，当然是对的。但是那态度严厉极了，大声地、两目发着威光地说：“共产党为什么不杀人！……”又说：“你写的《水浒》的文章有什么错误，我还没看！……”（这些话写在纸面上当然一点不可怕，但当时的声威却使我震慑）。我摸不着头脑，理论上有什么错误，指出了改正嘛，我又没有坚持错误，何必这样呢？我当时很窘，无话可说。后来周扬同志又和缓地说：“你这是书生之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搞通”……我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过后也就忘了。及至反省中，雪峰说我是反革命，回想周扬同志当时的态度，真有点毛骨悚然。陈笑说，这没有什么，大概刚刚知道你犯了大错误，很生气，不觉吓了你一下。我也笑说：自然只是如此。可是我在反省初期，精神上却因之吃了一点苦头。

第二次到他家里去，是反右已经开始的时候，也不是特意去的。何封在医院行过手术，出院了，我去看他。看过后，从他家出来，在路上想起去看看陈企霞。这回去，是有点动机的。因为周颖要被斗了，组织上不大相信她交代的材料，情况很窘。想到去问问陈——我以为他有什么办法。及至看见他时，我想到除了实事求是，他也不会有另外的办法，就不打算和他谈。倒是他问起，周颖向来还好的，怎么这回出了问题（他已经看见报上有文章批评她）？我说在我看，主要的是好出风头，现在弄得窘极了。他笑说：承认错误嘛，老实交代嘛。我说当然这样。以后就转到《聊斋志异》上去了。

对李易什么有关于社、关于政治的话都没有谈过。一次他曾问我对舒芜的看法，我表示过这人有些聪明，可不很正直之类的意思。他发言后，曾说起他认为我的停职反省与王任叔有关。我曾指出他的话是不对的——这一点，是周颖记起的。此外记不起任何事情。

顾学颉、黄肃秋和陈启明到我家里去过一次。事先，陈对我提起黄要到我家里来看我。我因为不大喜欢黄，曾叫陈不要引他来，黄也果真许久没有来。这回来，可说是未经我同意的。顾，我去年曾见过，这回是黄临时拉来的——据陈说是如此。时间似乎是在他们都发过言之后。

寒暄了几句之后，黄屡次想和我谈什么，我都把头偏过去，不大理他，并且用话岔开。随即提起和顾下棋，一下，就下了三四盘，未谈什么话。下棋中间，许之乔来看我，约我去吃晚

饭，等了一回，看我们尽下不完，他饿了，等不得，就走了。

张友鸾去年见面时就曾说要去看我，但一直没有去。有时我从陈启明口里听到一点关于他的事，例如，他要离社，写的通俗小说很受欢迎，不常到社办公等等。鸣放期间，陈又说他准备发言等等。一次，陈说他准备来看我。我说你不是说他准备发什么言么，叫他暂时不要来，过了这个时期再讲吧。我不知道张要发什么言，但本能地觉得一定与二编室有关，即多少与我有关，所以叫他不要来，以避嫌疑。现在我听他在大会中检讨，说是我叫陈叫他去的，跟事实不符。但我也不能说他一定说错了，因为我不是直接对他讲的，也许陈启明一面对我说他要来看我，一面又对他说我要他来。上面说到我有避嫌之意，但另一方面，我对嫌疑的警惕[性]是不高的，只警惕了这一次，而且到张到我家，我又忘了。至于对陈、李、顾、黄，不但没有警惕，反而助长我的自满，认为做了一会工作，总算还有几个人觉得我还不错。“骄傲使人落后”，我就这样被拖到嫌疑中了。我之所以没有警惕，主要的在我毫无想回社之意，即使组织要我回，我也只打算作特约编辑之类。这愿望在以前曾有书面表示过的。那天听张检讨，说他之发言，是为我卷土重来扫清道路，我才恍然大悟，他和顾、黄分别到我处去，说不定倒真是有什么作用的。但张的话也许是无法自解时的遁词。他已经要走了，还这样汲汲于为我扫清道路，我觉得他和我还没有这么好的“友谊”。而我之卷土重来，是我曾对他表示过的呢，还是出于他的意愿呢？

张友鸾未经我同意，就同陈启明到我家了。谈过一些什么

话，不记得。大概他谈到他要到《新民报》去，以前曾到过上海一次，已接洽好了，大概还谈到过他打算发言又不打算发。打算发者，是因为他真有言；不打算发者，已准备离社也。发言的内容未谈。我怎么表示，记不得，也许说过“想说又怕”之类的话（他在会上说，我在他家说过这话，与事实不符。如果我说过这话，也只能是在他发言之前；而在他家时，他已经发言了）。此外，他说《新民报》约我写稿。我说不写。他说随便[写]什么。我说以后再谈，现在专门研究旧小说。他说写在卡片上的东西也可以。再就是约定日子请我到张友鹤家里去吃饭。

在张友鹤家，我交了几篇《笔记之笔记》给他，即所谓写在卡片上的东西。在座有陈启明、金满成。记得金满成说过奖金问题。说：“某人虽然有某缺点，但有某优点，就给奖；虽有某优点，但有某缺点，就不给奖。”那天好像是李易发言，张友鸾谈过李易发言时的神气，就他拍桌子：“这样混下去是不行的！”不知是谁谈起，在肃反中，张友鸾作检讨了；张友鹤的女儿（或儿子）却在斗别人。我说：我的女儿也在斗别人。这正是屠格涅夫《父与子》所表现的。父亲与儿子并不直接冲突，却是由父亲的兄弟和儿子的朋友冲突。即父代与子代的冲突。古人说易子而教，现在是易父而斗，在较缓和的场合，也就是易父而教。只记得这一点。我问周颖，那天大家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她也记不清。张友鸾谈李易的发言，是她记起的。她说我没有说什么。

后来，六月初从陈企霞家里出来，之所以到[张]家去，是因为我要六点到政协礼堂去看戏，要在六点之前吃晚饭。那天星

期天,我估计馆子里人多,不容易按自己的时间解决,就想到到他家去解决。同时也看看我给他的《笔记之笔记》发表情况如何,稿费来了没有。另外,雪峰说介绍我出去旅行,书可出版再版,我很高兴,有点得意洋洋,想和他谈谈这种得意。再就是杨霁云曾到我处去过,也趁此回看他一下。在他家谈的话,上次已说过。曾问到过杨霁云,杨不在家。曾问到舒芜。他问是否想看看舒,我表示看看也可以。他说是不是不太好。我说不好就算了。我对舒本无个人恩怨,肃反中他发言不正直,我保持一定看法,但并不当做一件大事,所以见见也无妨,不见也不欠缺什么。去年我就曾向徐达同志表示请他带信给他们,叫他们不要因为揭露了我的什么而有芥蒂。此外自然谈到过我将旅行的事,问《笔记》的事,后来就是王珩、林辰来寒暄了一阵,再就是他家热的现菜现饭好了,我一个人吃了,他给我叫了三轮,我匆匆走了。再想不起谈了些什么。但那天,适夷和我谈到过王任叔排挤他。我印象很深,假如那天谈到过王任叔,我会说到这件事。但我不记[得]说过没有。有一次,张说舒芜说,王什么时候(鸣放期间)拍他的背,和他握手,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说,我也有过这种经验。这是我和张之间的谈话的一条,但记不准是哪一次。

陈启明到我家里来,有时也谈到社里事。他曾说张友鸾为《〈史记〉选》的事(分账、署名先后)和别人磨擦,舒芜组表哥的稿子,谁又主张不用(王利器?),李易如何在什么会上攻击麦朝枢……我问过:“这种情况是不是我在社时就有而我不知道呢?”他说从前没有的。鸣放期间,他说过雪峰说有冤报冤

……是不对的，他曾提出不同意见。又说雪峰主持会时对群众所提意见一点也不知道，昏状可掬。又说雪峰叫他到他家里去谈谈，谈什么不知道。我说他可以去，因为雪峰向来对社里的事不知道。例如陈所谈的二编室的事，雪峰也应该理解一点。陈说他不去。他觉得雪峰不会真正听取别人的意见，结果是去听他说一顿，彼此互不了解而散。此外他不喜欢雪峰，似乎还有什么私人原因之类，我不理解。反右期间，他曾劝我以后要积极些。何所指，我没有明白，也没有问他。最后，他说组织找他谈话，要他写关于和我来往的材料。我说我早就料到要这样的，因为社里的一些会议，没有通知我去参加了。我说这样很好，于我很有利，因为我处于一个嫌疑的境况中，组织从各方面了解，可以把我弄清楚。以后他就没有来了。在隆福寺开会的那天，他替我取了工资，说，请请客吧。我请他了。他告诉我他写了材料，如何如何写的。我觉得他主观上想为我解释，反而不好。不过已经写了，只好由它。但这意思当时想到过，不知确实对他说过没有。也忘记对他[说]过一些别的什么话。我想写一篇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是他给我谈的比较完全的情节，但我找了几种书，都没有找到与他说的完全相合的。我在社内碰见他时，还曾托他找。他答应了，但至今还未给我。

附注：他讲社内事给我听，都是他主动的，我从未叫他讲，更未叫他探听什么。不过同时也[未]叫他不讲。

九月廿三

关于宗派主义

(1957年)

关于宗派主义,我现在还作不出深刻的检查。我以为这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东西。起初,当然是和谁也不接近,因之也就是和谁都同等地接近。自从对毛邦安发生了某种感情之后,就自然和别人疏远,尤其是女的。“三反”后,就成为和毛及许觉民比较接近了。或者说,因为和毛接近,同时也就自然和许接近了,毛、许两人的工作关系是接近的。在那时期,许、毛、我三人的意见也比较接近。其所以接近,是因为彼此比较有机会拿出自己的意见来,另一原因是许和我都有点受毛的影响,有时甚至迁就毛的意见。毛是对什么事都能很快地拿出自己的办法来,拿出来之后,就希望它成为别人的(上级的)意见去执行的那种人。她所提的办法,多数场合是对的。很少的时候则有狭隘、偏执的地方。许和我则刚刚和毛相反,对于什么问题几乎都不知如何处理,有时要去问毛。记得王任叔某次说许没有领导毛反而被毛领导了。他所说的某一件事是否如此,因为具体事件已不能记忆,未敢断言。但在“三反”前后的某一时期,许确有许多事是问毛的。这样,“三反”前后,可以说毛、许、我三人是个小圈子或宗派。但这小圈子或宗派,并没有被

谁用为拉拢谁,打击谁的工具。它的实际内容,只是那时候,许、毛两人负责社内行政事务较多,我因为住在社内又和毛有点私的感情,所以比较接近而已。那时候,吴菲说社内有三联小圈子,意指许搞小圈子。大家说没有这个小圈子,我也这样说。周延和许、毛都[有]隔阂,我也还未站在许或毛的一边。我觉得这时候要说是小圈子或宗派,还是谈不上的。

楼来了之后,他自己也看重毛,许多事问毛,毛也照样提供她的意见。我则因为本来在香港时就和楼有点熟,又同在一块儿吃饭,和楼也接近起来。我说过,毛曾对我批评方紫的工作态度,我因之而用毛看方紫的看法看方紫,觉得方紫确实有可议之处。毛又说周延总只看到权力之类,而不看到工作——周和许、毛不对,主要地似因他们权力太大。这,我也受到影响,觉得她的话也对。毛的这些意见,大概也影响了楼——毛对楼怎样讲方、周,我不知道,我想她一定讲过的——以致楼曾有一次把周延整得哭(为什么事记不起),又使方紫无法接近楼。加上我曾说过我对方紫的看法,及对周延作出版部副主任问题不满,进而叫别人在评级评薪时对她提意见等等,这时候,毛的意见才发生了大力,成为宗派主义或小圈子。

以上是就我受毛的影响方面而言,另一方面,毛也受我的影响。我从心[里]敬佩毛的忘我工作精神——这精神以“三反”前后为最,楼来后较差,以后身体也越来越坏。我以为她的那种工作精神,在社内无人知道,甚至许亦不完全知道。我曾对她说,她属于活着时别人并不知道她做了多少工作,死后才发现为真正以布尔塞维克精神工作的人,才被号召向她学习的人。这种话,我甚至对别人也讲过,说社里多有几个毛这

种人就好了。这种话被别人听见，很为不满。其次是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几乎无论什么问题问她，她都能立刻拿出办法来。我以为这种能力，不是从她那么年轻的经验中得来的，而可以说是天生的，就是所谓才能。这样的话，我都不止一次地对她讲。这就大大地助长了她本有的自得自满的情绪，使她看不起别人，甚至看不起领导。领导如果不迁就她，她就暗自闹情绪；我虽然也不断地批评她，指出她的缺点，劝她要争取在思想文化方面提高，却很少发生力量；使她自以为再大的事都能拿得起，在社没有得到提拔而是受着委屈；使她在年终鉴定的时候特别感到受不了，而王没有特别重视她，说了一两次“这么年轻不适宜于做人事科长”之类的话，她就干不下去，坚决要走。还有，几年来，我自己也在毛那里树立了一些“威信”。这都属于知人论事方面的。首先是对她本人的心理的了解。常有她不肯对人讲的话，我把它揭露出来，甚至揭露了她还不承认，但过了一个时候，她却认为我说的是对的。这些主要的是属于两性心理方面的，但威信却是由此而建立起来的。琐屑之事太多，现在难以一一想起。比如说，我对毛、许两人说，冯有三个人对他佩服而他也对那三个人也好，如有机会，他会把他们都邀到社来。这话是“三反”前听说周文要来的时候说的，所谓三个人就是周、楼、王。说的时候，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几年之后，到王要来社时，他们就觉得我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有了这种威信，所以到了我说王自己想作社长，毛也信而不疑。于是我的意见也就在这两个人的小圈子或宗派里而发生了作用。

这两人的宗派或小圈子是否包围楼，利用楼来作什么拉拢

打击的活动呢？应该说，我还检查不出来。楼对方、周两人的态度，实际上如何受了毛的影响，我不确知，但决不是受了我的影响。楼对王的态度是否受了我的影响，我也不确知，他们两人貌合神离了许久我才发现，我听见楼对我表示对王的不满，也只是说王是居高临下而已。无论楼对王是否受了我的影响，但其中似乎没有毛的影响，因毛许久并未和王接近。毛和我都有对楼不满之处，也都出于各自的私心。楼对毛说过要她当办公室副主任，实际上并未给她，引起她的情绪波动（这是我的猜测，毛并未向我表示），我也为了毛的缘故，在会议上和楼吵起来。为了稿费办法之类的事，我也觉得楼太紧，对于作者的鼓励不够，甚至说他“农民意识”。我从来没有要楼在任何会议上支持我。倒是楼曾有两次叫我支持他，一次是批评陆风，我照他的意图做了。一次他约我一同向王提意见，我临时未出席会议，在会议上他反而被王提了意见。楼、王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意见，我既未听王说，又未听见楼说，更未在会议上听到，所以至今还是莫名其妙。当上级决定王作社长时，我曾对楼表示，我当然拥冯，但楼、王之间必须择一，我择楼。我觉得楼尽管有时简单，有时粗暴，但表里如一，而王不这样，令人莫测高深。年终鉴定后，楼从外归，我和毛都很热情地告诉他鉴定时的情况，楼和毛和我都比较接近，久别重逢，扯着他讲一阵，似为情理之常。我还有另一意思，鉴定时，楼如在社，极端民主倾向，可能有所措施，不致弄得不可收拾。事实上，极端民主倾向，是毛最先感到，那时群众还未向许、郑、毛等提意见，而是一编室提出改组领导核心，毛就说是极端民主。我因为我不管行政，不便多说，毛自己又和王不甚接近，也不便

多说。如楼在社，情况是可能不同一些，即可能多听毛的意见。又，极端民主倾向，以对毛提的意见过分为主。王因来社不久，未管行政，不接近毛，尚未对毛形成一定的看法，所以采取了听其自然的态度，如楼在社，情况又可能不同，因为楼是比较知道毛的，因此不觉有许多话要说。至于在谈话中，毛和我都表示了对王不满，觉得无能或以暴露过去社的弱点为有利，甚至他自己想当社长。我也说过，但并没有想利用楼替两人宗派做什么的意思，而且社长之类的问题也早已过去了。

我是否利用两人宗派打击赵其文呢？没有。赵的问题是二编室事，与毛无涉。

两人宗派是否拉过牛汀呢？没有。这两人宗派，其实是个排外的东西，除了工作关系，不容许任何人参与的。牛汀和我关系极浅，我喊他和我去吃过一顿饭。我经常临时请人吃饭或临时敲人请客的。他听了王的报告之后，向我反映过一次。此外，我的《杂文选》似是牛汀作责任编辑，他和我接谈过几次。他曾向毛表示对我的印象不错，毛也对我谈过。如何具体谈法，不记得了。牛汀在年终鉴定时，是极端民主的煽动者，后来纠偏时，他在核心会议谈一套，群众会议上谈另一套，成为出尔反尔的两面派。开会时无话说，会后又对王有意见，等等，我都不满。但我确支持把牛汀加入支委改选名单，因为就当时名单看起来，他似乎比个别人还适合一些。王说他是胡风派，我就没有说了。

这两人宗派拉拢过二编室或和二编室的独立王国有什么关系没有呢？更没有。二编室我本来也只接近了舒芜、张友鸾两人，这两人都是一见毛来了就连忙走开的。

因此，我说这两人宗派，是因为年龄悬殊，彼此都有矛盾，问题不能解决，所以成为宗派或小圈子，否则这名词是不相干的。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确曾因为毛的关系打击过周延，毛也确曾同意我对王的想法，还到冯家去反映过一次社内情况，即确发生过宗派主义的作用，有过宗派主义的行动，而且既然两人都不从组织原则看问题，而是从私人角度看问题，把别人也只看成一些单个个人，而两人又有相问的看法，那就无论有没有宗派或小圈子存在，也都会表现为宗派主义的。

检 讨

(1957年11月10日)

一、我和王任叔同志的关系问题

二、在二编室的工作问题

三、替周颖改文章问题

四、结论

五、附录

甲 在反右中写的残稿三页

乙 在检讨中写的废稿四页

共卅六页

一、我和王任叔同志的关系问题

我的错误主要的表现在和王任叔的关系上。起初，我对他并无成见，不过对他不了解。他未到社时，我曾对楼适夷说，不妨考虑王只作副总编，以免将来职权冲突（据楼后来说，我说的这话是对的）。也只不过随时随口说起，便说我和楼较熟，不免有偏向之意，也是很轻微的。他到社之后，曾表示只来半天，半天在家写作。我说要是如此，我要提抗议。他以后就借

我这句话引起，就全天来了。这表示我对他是欢迎的。他一来，看见社内百废待举，我也很佩服他的改进精神。不过微微觉得他有点摆架子，居高临下（这一点，后来楼也觉得）。我和他的直接冲突，是他事先未和我谈起一个字，就直接插手管二编室事，用二编室名义发出一个选目计划，征求社外专家意见。引起不少异议。二编室人向我反映，我去问他，他说是雪峰叫他来和我共管二编室的。我说应该讲一声，选目也该大家商量一下（近来王对我讲，当时雪峰本来叫他来代管二编室，准备把我调走。这恰好是雪峰的作风，一时这样，一时那样，惹出许多纠纷）。这时候，我还对他没有什么反感。几天之后，他在支部〔会〕说我抗拒他，说二编室只有我能领导，党不能领导，我才对他反感起来。我认为他这话是过分的。他也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不应以自己代表党，把我划在党外。由这才想到：他究竟是领导我呢还是领导二编室呢？如果是领导我，则他是副总编，我也是副总编。他兼副社长，主要的是管行政，不应直接兼管业务（意即应通过总编）。即使可以领导，可以管，也应先讲好，分好工。如果是领导二编室，则应先通过我（这种意思，曾对二编室个别人谈过）。此外，王又在一次会上说我很难搞，他未来之前，就在出版总署听说我很难搞。我对这话也很反感。一则，我觉得我并不难搞；二则，觉得他恰好是这样，先听别人意见，而不先作具体了解。现在检查，我还是觉得我毫无把持二编室之意。刚刚相反，倒是屡次说过，要是天上掉下个人把二编室拿去才好咧！这话一定对二编室人说过，不过他们这次交代的材料中没有。此外，其实很少和他正面冲突的地方。他要开门组稿，我也不曾反对开门组

稿,不过我曾告诉他外稿的一些实际困难,如冯至的《杜选》,王汝弼的《白选》,游国恩的《陆选》等等,如何旷日费时,与计划化冲突。希望他组稿时把这些考虑进去。他要求按月完成计划,我也不曾反对。二编室对计划的完成,至少不是各编室中最差的。可找五四年计划进度表出来查查。有一次,《中国诗史》来不及细看而发稿,决定在校对时,编辑室尽可能加工,并得王同意签字,有发稿单可证(计划化与编辑的意外工作或额外工作常相矛盾,如《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之类,现不能一一记起)。这稿子后因作者因《红楼梦》问题发生,怕挨批评,来函要求收回修改,致造成若干损失。他着重劳[动]纪律,搞签到制。我自己不签到,主张稍微迟几分钟,不必计较。又对张友鸾说,如真赶不及按时签到,只要工作上质量好,不会对你像小职员那样要求,你也不应斤斤计较(此语在别人交代材料中词意有小出人)。再就是主张要是自己写文章(前言之类),提出请求,经过批准,可以在家里写。此事亦曾得王同意。签到制有不便处,后废。关于二编室草拟工作定质定量工作细则,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事,王自己也参加,我也认为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见无冲突。而且二编室人有资产阶级思想,首先是我提出的。一次几个人参加加工《红楼梦》额外工作,组织给以加班费。张友鸾坚决不要,说我如要这钱,对不起以前的工作。王问这是什么意思,我就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嫌以前工作做多了,组织未给报酬。附带说一下:二编室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当然早就存在,但还无所表现或很少表现,倒真是“口不言钱”的(口不言而已,心里则另一问题)。自从雪峰灵感似地批给文怀沙《屈原集》一笔钱,适夷决定舒芜的《李白

诗选》抽版税，领导核心决定给《红楼梦》额外工作（其实也是工作时间做的，不过系临时赶工性质而已）加班费以后，就噉噉喳喳，将这比那，喷有烦言了。可见没有制度，就事论事，不考虑全面的领导方式之害。

和王的关系的最大的一件事，是我说王排挤冯雪峰想自当社长。关于这事，王至今屡说周扬同志决定社由他负责（即当社长），曾由适夷告诉我。所以我的话，不但无根据，而且明明知道而有意颠倒是非，破坏他的威信。在我的记忆中，适夷曾对我说过，周扬同志决定社务由王负责，但不知道就是当社长。刚刚相反，倒是看见过周扬、邵荃麟、雪峰三人在一处商议调他别的工作的事。也听见邵荃麟说，周扬的决定（即负责社务），已成过去，现周已不管文化部了（周那时离文化部职）。我破坏了王的威信，但不是明知故昧，颠倒是非。在我的历史上也从无此等事。我说他想自作社长，是何根据呢？确确实实的根据当然没有，也很少可能有。捕风捉影的根据却有几条。一，五四年年终鉴定的极端民主化，我以为王故意坐视，闹得无论多大，他来不久，反正与他无涉，而闹得冯站不住，与他有利。这当然是个极其腐朽的看法，但我也不掩饰，我以为他想自当社长，实是从这儿来的。此外一件事是他对谢素台的事。谢素台是个极老实的女孩子，替雪峰做收发信工作几年，未听见说出过什么问题。王一来，谢也替王收信。一次收到一封有几十块钱稿费的信，谢交给王了，王说没有交钱。谢气得哭，到银行去取款来赔了王。有此一事之后，谢就被调做别的工作去了。必须说明：谢是《远离莫斯科》的译者，一次拿了一万多稿费，一次买公债就是一万（当时是一亿），经组织向她说服，

才降为七千，也仍为全社之冠，有几千块钱存在银行无用处，经常借给社内外的缺钱用的人。她本人[是]极端老实、沉静、拘谨的人，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坐在办公桌前。替雪峰领薪水、收钱的事不知多少次，从未听说有过问题，王一来，头一次关于几十块钱的事，就使一个年轻纯洁的女孩子吃不消，以后调工作，她本人自然乐得之至了。我把这件事（当然未经过详尽的了解，但说谢会中饱几十元，我现在还是不相信的）和上一件事结合起来看，便以为王故意耍手段，调走雪峰左右的人，也与排挤雪峰、想自当社长有关。因此，我以为王是个胸有城府、不择手段的人，我看不起他。《文艺报》问题发生之后，雪峰在文联大会上作了检讨，报上也发表了他的书面检讨。一次支部大会，王自己去请雪峰来参加（雪峰好久未参加支部会了，为什么，现在不记得了），临时叫雪峰作检讨。雪峰检讨了。王不是支书、支委，事先并未向任何人提及，也未向雪峰提及。我便以为是王“逼宫”，想自当社长。另一次，黑板报上有人发表一篇文章，提及雪峰既不能到社办公，就应当让出位来。王在那儿看黑板报，我碰见了，看见他似乎摇头晃脑，甚为欣赏的样子。我问他看什么，他便指这一篇给我看，我更疑心。加之我去问黑板报编辑张琦，这篇稿子是谁写的，张说是赵其文（其实是赵璠，璠这字的音，在张说来，我听来，很像其文二音。后来我从别方面知道是赵璠，再去问张，他还说是赵其文。我问是男是女，他说是女，我才明白是音近而讹）。赵其文接近王，不是王授意，也是赵体王意，王又欣赏，排雪之意实已现于面盎于背了。以上种种，现在看起来，都捕风捉影的。就是使我看不起王的谢素台事，在认为王不择手段

这一点上，也是捕风捉影的。谢、王二人固然都不会赖对方的几十块钱，但也不等于二人绝对不会产生记忆上或别的什么错误。如果是王弄错了，冤枉了谢，固然不好，但是和不择手段，想排冯或冯的人，仍旧是有距离的。我带上这样一副有色眼镜看王，当然看不[见]王有一点好处，所以他一再向我声明他不想干，想搞写作，我也以为是以退为进的手段。因此，我去对雪峰讲，王似想自当社长。雪峰似乎也相信如此，不过叫我不讲。我是好说话的，还是对二编室的个别的人讲了。这在二编室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一直流毒到右派小集团时代。

我和王的关系，就我这方面说是如此。就王那方面说，现在回忆起来，他对我倒是处处委曲求全，想搞好和我的关系，通过搞好和我的关系而搞好工作的。记不起，感[觉]不到的自然无法说，只说这样几点：一、请客几次；二、送我的印尼咖啡和文学论稿；三、邀我和他去文化部看电影（当时未和他去，后来想起不过意，赶去，他不在。这才领悟他不一定真是要[看]电影，而是要和我接近）；四、几次开会（有时是晚会），他看见我去了，总是拍着他旁边的座位，欢迎我和他坐在一块儿，有时甚至是拉着我坐在他旁边；五、几次温和地拍我的背表示亲爱，后来他大概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才不拍了；六、在社务会议上，有些意见若干程度地迁就我。例如，有一次孙绳武提出每周定半天集体办公，汇报各编室情况。王问我的意见，我未发表意见。他说不必太呆，可规定从几时到几时都可汇报，有事则去，无事不去，不去不算缺席。这是迁就我的。关于上班签到问题，他也曾迁就我，但原意不记得了；七、反胡风时，我作报告，他主持，他再三给我倒茶拿烟，报告完了，他

向群众称赞我，并向群众说，现在领导上已积极起来了，大家都应积极起来，故意在群众面前抬高我的领导地位。如是等等，王对于我，可说是仁至义尽的。可是我呢，他越是这样，我越是以为他会耍手段，好耍手段，而不喜欢他。其实是否耍手段，固然难说；即使是手段，只要是为了工作，为了团结同志，正是应该耍的。我不理解，不觉悟，不从工作，不从党的利益看问题，只是错误地以为他城府深，权位观念重，想搞鬼，而对他不合作，反对他（反对他的意见许多都是鸡毛蒜皮，现在连记也记不起了），散布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以致走上了分裂主义的路线，现在检查起来真是痛心！

有一次，我又对适夷讲王的什么，适夷笑起来，他说，恰恰这就是闹无原则纠纷（那时党内正在反对闹无原则纠纷）！我当[时]还不以为然。后来想了很久，觉得也真是如此，就决心以后改掉。也曾在支部或领导核心会议上表示愿意和王、和大家精诚团结，不过没有等到有什么具体表现，我就到井冈山去了。

二、在二编室的工作问题

我在社的工作，主要的是领导二编室。在这个工作中，由于我的业务水准差，看稿不仔细，曾引起工作上的失败，也就是社的荣誉和物质的损失。如《水浒》、《三国》、《红楼》等等的必需改版的事。但这并不是难于检查的地方，难检查的却在于我自以为有应该被肯定的东西在内的问题，即所谓独立王国。我应说，独立王国，在王任叔到社以前，是连影子也没有的。

舒芜材料说，我那时以雪峰为后台，以乔木同志自重，就是说，我对乔、雪都是服从的，有什么独立王国？舒口头又说是对党独立，对党的政策独立。有什么证据呢？难道就因为说过背黑锅、精华糟粕难分，就是对党、对政策独立么？不但王来以前，就是王来了的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也还未必就是独立王国的。这只要看李易、顾学颀被斗了几个月，并未提起独立王国的事，就是舒芜在头几次的发言中，也未提及。舒芜的提及是在王在群众中点了我的名之后。顾、李是在书面材料中，即在舒芜提及了之后，才和舒、张众口一词地说的。这就是说这独立王国，是点名才有，不点名就没有的。其次，独立王国的大小，是很不固定的。现在二编室出了四个右派分子，所以他们是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臣民、走卒，刚好各有头衔。若不幸而出五个六个，怎么办呢？若幸而只出一个两个又怎么办呢？可见所谓独立王国的大小，是以现在的右派分子的多少为转移的。独立王国这名词，最初是张友鸾在我成为肃反对象之后提出的，这又是说，独立王国的有无，是以我是否肃反对象为转移的。是不是我在二编室时的情况，完全不可以说是独立王国呢？不是。刚刚相反，大可以说是独立[王]国。二编室的人，一般说来是相当拥护我；我在的时候，也没有人心思散；在雪峰自动要给文怀沙的钱，适夷决定《李白诗选》抽版税之前，大家是口不言钱的；舒芜、张友鸾起初的工作态度也不坏。舒来了三个月就解决久悬未决的《李白诗选》问题，几个月全勤；张作《水浒》的整理工作，差不多是整天坐在座位上不动的，不但自己工作仔细，还影响黄肃秋（本好闲谈乱走的）也很好地完成了《西游记》整理工作；干部与干部之间的关系也不太坏。

我不能说我用很好的方法领导了,更不能说像一个模范党员那样做了领导工作,但我和他们之间,他们和他们之间,关系都不算太坏。雪峰说我出乎意外地能做组织工作,王任叔也说过我做了组织领导,未做好政治领导。曾几何时,这恰好是我应被肯定的地方,「后来」却是最被否定的地方,因为他实在像独立王国。我不想争辩这个。现在是要检查我自己:我确实没有以高度的原则性、政治性去领导,而是更多的以感情去领导了。不但我在二编室时,使他们和我一道脱离了领导,而且他们后来成为右派小集团,和我当初的那种至少是原则性、政治性不强的领导,是有密切关系的。他们习惯于我的一套,不习惯有原则性政治[性]的领导,当是使他们成为右派分子的根源,虽说他们各自的思想又是他们各自的根源。

二编室的几乎都反王。他们为什么这样,到现在我还没有搞清楚,有些小事已记不起了。他们的反王与我的反王,是有关系的。我的反王,助长了他们,和他们的搞到一起了。但他们反王在前,在工会小组开会时就开始了。那时,即在工会小组反王之后不久,我还召集过会议批评过他们,说他们提的意见,是敌对态度,没有立场。会后,赵其文、舒芜都曾单独向我反映,说我的批评虽对,但太早了,顾学颉就认为民主刚抬头就打回去(这件事,现在赵、舒两人都否认,李易也否认。我想,十几个人开会,总有人记得的。这事可以慢慢弄清楚)。如果后来我自己不反王,能坚持原则,批评他们,说服他们,不但当时没有什么独[立]王国,可能后来的右派小集团也没有。因此,我的反王,即反领导,不但对党,对社,负疚甚深,就是对右派小集团,也是负疚不浅的。因为我是二编室主任,我没有

作好政治领导。

有些具体问题，本来可以不说，与自我检查关系也不太大，但有些似乎一直到现在也并未被领导了解，这回右派分子所交代的材料也未好好讲到。提一下，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二编室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的是张友鸾，其次是汪静之。张友鸾把每一个外稿所花的钱都记下账来，和编辑收入作比较。例如他说《水浒传》的工作者拿报酬一万，等于当时一个编辑七八年的工资；其中标点费三千，等于两年多；校勘费七千，等于五年的工资。而这工作，由一个编辑来搞，顶多不过两年。同时这种工作，并不要什么专家，一个助编就可以做，若以助编工资计，则在十年以上。他又说，公活与私活，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其实也很难说。工作紧张起来，为赶任务，非用非工作时间不可；工作不紧张，工作时间闲着也没事。我社所说的私活，其实也是别社的公活，我社认为不必赶的，别社则认为必需赶。社外专家，在社看来，他们是不拿社的工资的，应该给他们报酬；但在国家看来，他们也是干部，也有岗位工作的工资。归结起来，一个搞文化的人，最好不要搞文化岗位工作，尤其不要当编辑，才好给出版社作约稿对象，被尊为专家，有大量收入。这样想的不止张一人，周汝昌、舒芜、黄肃秋等都有。所以当时他们凑的打油诗有“叩首敬专家”，“两行编辑泪”，“进门低三尺”等句。我没有在这种思想刚刚萌芽时及时制止，是我的错。但这种具体事实，特别是专家收入与编辑工资之悬殊，也太容易引起这种思想，确实是应该好好考虑的——编辑工资和一般干部比较不算低，和教授、专家比较，确实太低。话又说回来，我社的编辑的各方面水准也不高。汪静之

是个最偷懒，最磨洋工，也最反对计划化的人，每次开会，我催大家加油，他总说要慢，要慢，第三个要慢。据他统计，每月工作日，真正能工作的，只有九天到十天。他曾[把]某一个月所开的会和集体活动的时间除去，确实和他所说的差不多。我自己也常有这种感觉，不过不像他说的这么厉害。计划总是按每月二十来个工作日计算来订的，却是用十来个工作日来完成的。要么，工作紧张过度，要么，工作马虎，要么不能完成计划。这也是领导应好好考虑的。据我所知，当时二编室的工作不算坏，不过大家觉得自己做的工作不少，却未被领导理解。所以他们都愿意定定质定量的细则。固然也是想少做工多拿钱，主要的还在于让社的领导了解，如果就一编室当时所定的看稿字数的标准来说，二编室是远远超过的。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把二编室工作情况仔细地耐心地反映给社的领导。我认为王对我有成见，不愿反映。至于起草细则，是他们的情绪的总发泄，是故意那么搞的，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其实不像细则所表现的那么厉害，他们也知道那是不会被批准的，也不在乎批准不批准，只要社的领导知道他们是做了工作的。没有批准，大家也未闹情绪，就是证明。现在他们的检查和当时情况有出人，则是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惟恐不左的说法，是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完全相合的。

另一件事就是为几个人争稿费。这件事本来没有问题，就是因为雪峰无缘无故批给文怀沙的《屈赋注》一笔钱，适夷又决定给舒芜的《李白诗选》抽版税，才引起问题。《屈赋[注]》和《李选》，都没有费什么力。文怀沙的工作态度很坏，工作了几年，除了打杂以外，就作了这薄薄的一本《屈注》，且错误很

多。《李选》只花了三个月时间，以前还是别人打了一点基础的。这两本容易搞的书都给额外报酬甚至抽版税，而费时费力的《水浒》、《三国》、《西游》等书，一点不给，直接领导的非常难处。雪峰他们似乎有一个看法，以为诗、文言文之类的东西难注，小说、白话文的东西好注，所以有上述的决定。具体领导业务的人，知道一般的情况刚刚相反。我一开口，他们都反对。反对不要紧，还似乎认为我是代表干部向组织要钱。我呢，我以为我是代表组织，应该照顾下部的情绪、生活情况及实际工作中的甘苦。被他们否决，心里不服气，为什么你们是代表组织而我是代表干部呢？为什么你们一时高兴，把二编室的秩序打乱了，不想善后办法呢？所以越说越起劲，后来简直就是说我代表干部争稿费，也居之不疑了。再后来就意气用事，谈到这事，理由说不出，先是一头火，以致在会上吵架，并且深恨雪峰不了解二编室实际情况，叫张友鸾到他家里去说。这件事的教训，首先是首长不应一时高兴，随便决定事情，这件事可以与另一件事的办法刚刚相反，以致无事自扰。我应负的责任，是只问意见，不管组织原则，既不管领导被领导，也不管多数少数，一味蛮干到底。不善于说明理由，不耐心说服人，最后是态度粗暴，横冲直闯。另外，还有一种直接违反组织原则的荒谬想法，把工作不当作国家事业来看，而只看见这几个人（指冯、王、楼等）都很熟，都是老朋友，可以随便，可以不顾一切。不但在二编室的工作情况如此，那只问意见，不问组织，老朋友好办事的想法，实贯串在我的一切工作上。

优点与缺点有时是分不开的。这样看，这样谈，是优点；那样谈，那样看，又是缺点。不但如此，明明是优点，不加警惕，

不在原有基础上发扬那优点，优点就会停滞，变为包袱，变为缺点，甚至变为错误的根源。

我不愿做首长，不愿做行政工作，作为党员，这是缺点。因为这与没有进取心，怕负责任，工作积极性不够等等是相连的。但我较少名利或地位观念，与人无争，没有排挤人、打击人的想法。这又可说是优点。但这优点，没有与原则性相结合，没有与党的利益结合，刚刚犯了严重错误。我因为我不争地位、不排挤人，就对于我看来是争地位、排挤人的人深恶痛绝。我没有切实根据，只看见几点迷离恍惚、似是而非的零星现象，便认为王任叔自己想抢社长做，排挤冯雪峰，因而“义愤填膺”，起来反王拥冯，这已经不对。而又在并没有把问题弄清楚的时候，便对二编室的个别的人谈，加强二编室反王的空气，并若干程度地埋下后来二编室右派小集团的根株。而自己恰好变成了与人有争，排斥人并且反领导的人。反对王任叔。

我“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某人材料中语），开诚布公，“不懂的不装懂”（同上），能理解人，体谅人，懂得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的甘苦，即所谓“有人情味”，容易得到群众拥护（落后群众的盲目拥护。冯雪峰也说过我很能做组织工作）。这不是优点么？可是因为无原则性，无政治性，对人对己都无严格要求，工作上也偏于放任自流，过于相信干部，过于为干部争稿费，把争稿费当作代表劳方向资方争福利似的。其实是代表资方（干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向劳方（劳动人民的政权）争果实。终于变成感情拉拢，使二编室只有我能领导，别人不能领导的“独立王国”，而且“阴魂不散”（张友鸾语），我离开了，一部分人还成为右派小集团。

我能钻研业务，几年以来，花了很大工夫研究《水浒》，写了近二十万字的文章，附带也研究了一些别的小说，以致张友鸾说我想当专家，不想当领导。这也应该算是优点。但我又太重视自己的这种钻研，把钻研限于较为狭小的范围（小说），放松了对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甚至也放松了对干部业务的较为严格的监督和检查，以致工作上经常出问题，造成公家的损失。而且自己钻研一种东西，在干部看来就是干私活，助长他们自己也干私活或希望干点私活（如自作注释之类）的倾向，即助长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倾向。二编室的人后来发展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小集团，主要的是从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而来的。这就不能不说和我的专钻研业务在客观上的影响有关。

三、替周颖改文章问题

在肃反运动中，在我反省的初期，我是很恐怖的。本来最初陈克寒部长通知我，说是审查历史，但一两回会开下来，我听出我原来是反革命，而反革命三字，特别是从冯雪峰口里说出的，我缺乏经验，又没有人向我交代政策，以为反革命一定是镇压。又想起周扬过去一次用很奇异的眼光看我，厉声地说：“共产党为什么不杀人！”回想起来，我以为是有所暗示的，更增加了恐怖的心情。贪生怕死自然很可耻，但这里还不是简单地怕死，而是顶着反革命的头衔而死，这比别的死更恐怖。在这样的心情中，我写交代材料，我的历史也真长，真复杂，我这个人也真莫名其妙，处处都觉得交代不了，无法见信于人。

越写越觉得自己像个由国民党或简直由特务机关派来的，因之也就越写越恐怖。这种恐怖心情，持续了两三个月，把材料写完了，心情也比较平静了，再回想我的问题，主要的当是胡风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我犯了严重错误，但要分辨开来，还不是顶困难的。即使分辨不清，也未必就是死。比如胡风本人，就我看见过的材料说，也未必会处以极刑；再，如果我都会死，胡风材料所涉及的人，有几十个，看来都比我严重，难道他们都会死么？胡风问题无论怎么严重，成十成百地死人，总是很难使人相信的，而我至今还未〔被〕逮捕，岂不也是一个证明么？这样想，心情才逐渐安静下来。这个经过，现在写来很简单，当时的具体过程，起落反复，是有许多次，经历的时间很长的。而我确信不死，则是半年之后，一次斗争会上，王任叔说毛主席说过“一个不杀”的时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确实有所提高，暗中感谢党让我自己作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检查。这一方面，与我现在要说的话无关，姑且略掉。

事后，有一次楼适夷问我在反省期间是否相信党，我说，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他说，即使送你去枪毙，你也应该相信党。我说我很惭愧，我就是没有达到这一步。现在特别提起这句话，是想说明，人在不相信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情景。在任何重要问题上，相信党，人就会心平气和，心安理得；不相信党，就会恐怖，贪生怕死，胡说八道，堕入无比的痛苦中。不相信党，在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可怕，但实际内容，在重要关头，却是很可怕的。不相信党，就是以为党是会处置失当的，是无理可喻的，是可能犯错误的，是也有黑暗的。这样一追下去，人的反党思

想或情绪,就会被迫出来。这在个人方面,还不算太严重。严重的是这样一来,立刻也就发现,这以为党如何如何的想法,与客观事实是极不相符的。如果党是这样,这革命的成果怎样得来的呢?几年来种种改革的运动和设施又怎样来的呢?难道所有这些,都是从错误、从黑暗中得来的么?而且这样一来,也立刻发现,自己已置身于党外了,置身于一切成果、一切运动和设施之外了,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了。这距离仇视党,仇视革命,成为真正的反革命,也差得有限了。人的不幸还不止此。更不幸的是这个人本来是相信党,相信革命的,就以我说,尽管我犯了不少严重错误,尽管我敌我不分,无组织纪律,自由主义等等,但在我身上,也有个主导的东西,一个总的方向,是向着革命的,向着党的,是相信人民、人类,只有在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的。这个信仰,个人主义地说,也正是个人思想、个人精神之所寄托,也就是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现在说不相信党,特别是在大问题上,认为党也会犯错误,也有黑暗,自绝于党、人民和革命,那就是自己在思想上、精神上的几十年来的支持一齐崩溃了,人生观、世界观根本动摇了。这一崩溃,在个人精神领域,是一种天翻地覆,天摇地动乃至黑天无路,穷无所归的。这是一种大虚无,也是一种大恐怖,虚无与恐怖在这儿是同义语。冯雪峰说人类是没有希望的,报载某人说活着没有意思。说这种话的心情,我很理解,若对党虚无,必会有这种看法。我从前说过,在反省中,较有系统、较仔细地看了一些书,其中主要的是马列主义的书。应该说,我比自己以前的马列主义水准要提高了不少。尽管这样,还是有一点和实际政治联系

不起来,而且越提高也越痛苦,因为我自己被认为是反革命,而且不知怎样自救。

反省结束,我被宣称为不是反革命,但有严重的历史政治问题,又被支部一致决议开除党籍,虽未批准,但在那时期,心境还是很阴暗的。常想,既然我不是反革命,为什么要我隔离反省呢?难道不可以用其他办法把问题搞清楚么?我总觉得,我[犯]自由主义,犯了严重错误,都可以整我斗我,惟独用反革命这名义斗,我不完全心服,何况还是要开除党籍!我没有从整个肃反运动的伟大意义与成绩方面想,而只从我个人不是反革命这一点想,没有从党想,没有站在党的立场想,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伟大意义的革命运动,这样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它们面前,我个人的事情,不但我犯了严重错误,即使不然,对整个运动、整个党说,都是微乎其微、藐不足道的。特别是没有想到,只要没有这样想,这件事本身就是反党的。思想没有搞通,感情没有出路,觉得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就这样带着反党的然而痛苦的心情,有时是一种空虚的心情,回头去找已离婚了三年多的周颖,又在周颖那碰到何封、骆宾基,这两个人恰巧都是在政治上很落后的,在肃反中都有过问题,都有情绪,而骆的情绪特别坏。他们影响了我。我理解骆的心情沉重的道理,再加上周颖讲到她的几个朋友的问题,而他们都有情绪,这才使我更具体地形成这种意见。这种情况,单独地在各人心里存在的时候,还只是各个人的问题(同时,对于个人也是严重的,例如骆宾基,尽管在思想上,政治上,没有什么可提的,但确是一个有不平凡的写作能力的小说家。他的心情,大大地妨害了他的写作);若把许多这样的个人合起来看,

是这样多的(究竟怎样多,其实不知道)知识分子(那时正在宣扬优待高知)对党闹情绪(本质上是情绪上的反党),对党是很不利的,是党的一个不小的损失。同时,我以为党一定会采取措施来解决这问题,例如,把肃反和审查历史、处分错误之类分别开来。这种意见,去年八九月间,和周、骆在一块儿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流露过。这就是后来周颖在整风发言中把它写出来的主要三点。这一意见本身,不一定就是反党的,但它是反党情绪中的产物,是党外旁观,甚至自以为比党还高明的意见。一个党员,如果自以为自己的意见比党还高明,一这样想,同时就是看轻党,看轻党的领导乃至看轻党的政策,也是离开了党乃至反党。这真可耻可悲。但更可耻可悲的是,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反党,刚刚相反,倒以为是爱党,站在党的立场,维护党的利益,所以有时还想把它写给党的领导。这种意见的形成,除了上述的理由之外,还有些客观条件,如批判斯大林,优待知识分子,提出百家争鸣政策等等,不过那都是外因,不处重要地位。主要的是我在肃反中背上的包袱未能扔掉,所以走上反党的路了。周颖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那里面思想落后或反动的人似乎不少,她在那里听到一些对党不满的话,回来对我也有时谈及,我都没有对那些意[见]提出相反的看法,而是觉得那样的人提那样的意见是不足怪的,而是觉得党也未必完全没有错——具体意见不记得了,大都是关于党群关系的,所谓墙沟之类。这就是说我也受了影响,成了党外意见的俘虏。乃至整风来了,在所谓大鸣大放中,周颖要发言,我没有阻止,她起草了发言稿,要我替她改,我还替她改,我改的恰恰是稿中最恶毒的两段。那发言稿是彻头彻尾的反党的,

我并没有感觉，虽然有点觉得未必正确，也并不实事求是，也以为周颖那样的人，向来又没有什么思想，不过是党外人士，提起意见来，大概就是那样，并不知道那就是向党进攻。甚至后来被指出是向党进攻了，我还没有马上想通，倒觉得周颖有什么要向党进攻的呢？我当然这样想，既然在肃反中背了包袱未除掉，既然还有过自以为比党还高明的意见，既然听到反党意见也并不刺耳，这就说明我许久以来就沉浸在反党情绪中，所差的就只是这替她改稿这样一点反党行为了。我成为反党分子，党内右派分子，一点也不偶然。

附带说一句，《文汇报》曾经再三向我拉稿，要我写杂文，要我谈文艺问题，还说过一些暗示性很强（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企图）的话，我都拒绝了。这也说明一件事，我既然替周颖改过文章，但如果要我自己写，用自己的名字发表那样的文章，我还是不干的。

四、结 论

由我和王任叔的关系这一点说，我犯了反领导、分裂主义的错误；由我在二编室的工作来说，犯了不善于领导、借干部要挟领导甚至[搞]独立王国的错误；由替周颖改稿一事来说，我犯了和党外分子共同反党的错误。所有的错误，都是反党的，因之也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前两者是历史性的，后者是现行的。所有这些都是与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不相容的。我玷辱了这个光荣的称号。感谢党一再地对我大喝大喊，敲起警钟，使我明白我的错误和罪行。

在反右运动中，我听到的报告，看到的文章，凡是左派的言论，没有一个字，是我的思想和它有抵触的，没有一个字不本来就是我的思想，特别是周扬同志在作协的总结报告，其中关于文艺的一些具体问题，更是像从我的心里抠出的一样。听过周扬同志许多次报告，没有一次像这一次这样丝丝入扣，每字每句都心心相印的。这些话，说给群众听，说给青年听，说给不知道我的人听，以我今天的地位说，不问可知，得到的回答，必是一片嗤笑声，认为是胡说八道，冒充什么。但说给领导听，说给知道我的老同志听，效果就不会是同样的。这里举三事帮助说明：一、右派分子萧乾，我香港时就曾给他以批评，反右中对他的洋奴思想的批判，并没有超出我在《有奶就是娘与干妈妈主义》一文的范围。二、我主张文字改革，已廿几年，右派分子对文改的攻击的理由，没有一条不是我曾经批判过的。三、在反右中我曾几次动手写文章，反对章乃器、储安平那些人，虽未完篇，残稿当在。这些都可部分说明，我的思想和左派没有抵触，左派思想正是我的思想。正因为如此，今天我被划为右派或反党分子，要检讨思想，我深深地感到羞耻和痛苦，但同时也感到极大的愉快，因为除了一些表面现象不算，我需要检讨，也就是我的思想的胜利。

没有天生的马列主义者。像我这样小资出身的人，要成为马列主义者，是个长期的自我斗争、自我改造的过程。理智与感情，意志与习性，个人的东西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其实也是阶级矛盾在个人身上的反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马列主义有丝毫薄弱松懈的地方，一定就是反马列主义的东西乘机器张的地方。我认为我的思想，主要的是马列主

义占上风的，尽管马列主义水准低，也只不过说明个人的马列主义修养，永远是个以他自己原有水准为基础的提高过程。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具体问题的实践中，都站稳了马列主义立场、党的立场。刚刚相反，我自以为是一个作者，主要的在著作方面加以警惕（在北京工作期间，我的著作——主要的是《水浒》研究三篇，反俞平伯两篇，反胡风两篇，还未被认为有什么大错），特别是因为过去在写作上也犯过错，警惕性也特别高（也就是群众揭发的：我说过我怕马列主义——原意当是我怕不合乎马列主义）。但在工作方面，特别是关于组织纪律方面，其次是在生活方面，都是没有警惕的。这就是说，我的马列主义是不与工作、生活相贯通的，也就是空谈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二重性，是我最应加以大力改造的地方。

一年多以来，我买了几千块钱的书，其中主要的是旧小说，共搜长篇约三百种，和短篇集一起，近千种。看了长篇近二百种，短篇不计。写了近百条札记，抄了一百几十篇序跋，抄了几十种短篇的目录（这些东西，一条条看，都毫无意思，合起来再分门别类的看，却可以发现许多道理），写了近二十万字的正式文章，主要的是研究《聊斋》，约十万字，尚未完稿。对于我国的旧小说，和以前限于被称为古典小说的有限的几种比起来，和现有的小说史之类的书所提供的材料比起来，要广阔得多，也真有许多始料所不及的收获，有许多新的意见要发表。因此，在旧小说方面，我有满怀信心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专家，而不是只搬材料、不管马克思主义的那种专家。为了这，我觉得我还不算太偷懒。尽管这样一个专家，比之于科学上的专

家,是不值什么的。惟其是现在,我觉得我做古典文学整理工作,要比以前减少许多愧色。我可以做研究工作,也可以做编辑工作,甚至也可以做组织工作、行政工作。我愿意拿起我的笔,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旧小说。如果组织要我放下,我也愿意放下,去做任何程度的自我改造。特别做一个在组织纪律方面,在生活、工作方面,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对自己保持着严格要求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改造。败仗要不止一次地打,才能学会打胜仗;错误要不止一次地犯,才能学会不犯同样错误,少犯他种错误。失败是成功之母,今天犯了反党错误,对于一个党员说,当是犯罪,只要我能自我改造,也会转化为它的对立面,成为捍卫党的利益的战士。

十 月十日

附 录

甲 在反右中写的残稿三页

不止一个人说:把骨头烧成灰了,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

不错,右派的“言论”里面,确实没有“反社会主义”这五个方块字。但说右派反社会主义的人,也没有说右派的“言论”(本文姑且限于“言论”),反了由四个方块字组成、只在字典上存在的“社会主义”这名词,而是说他们的言论,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所反的是社会主义实质。这种反社会主义,真是俯

拾即是，可以信手拈来，决用不着等到谁化骨扬灰的时候，到火葬场去找。

不是有人说么，目前的天下是“党天下”。诚然，这是有功臣思想或特权思想的人所应触目惊心的。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想出“党天下”这一恶谥的思想意识，实际是“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而非一人一家乃至一党之天下也”。本来是一人一家，现在加上了一党。由这位发言人看来，既然一人一家的天下（即“家天下”）是不对的，一党天下，岂不也是不对的么？既然一党天下是不对的，岂不多党天下是对的么？因此，反“党天下”论的实质，是主张多党“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地平分天下。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多党平分天下，就是几个阶级平分天下，打开窗子说亮话，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平分天下。但这样的天下，实际上是没有的。有人向往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是资产阶级专政，并不与无产阶级平分。因此，现在只有两种天下：其一，资产阶级专政，其二，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则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领导，有被领导，并非平均主义地平分。

且不管平分天下的思想是不是完全的空想；也不管平分天下只是资产阶级在目前情况之下所能提出的要求，达到目的之后是不是会变卦，只就平分天下说，固然没有一个反社会主义字样，难道它的反社会主义因素还[要]到骨灰里去找！

又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的根源。不言而喻，要除“三害”，必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即取消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内容。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无所谓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

政权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先进国家虽然在国内消灭了阶级，但只要世界上还有侵略国家即压迫、剥削阶级的国家存在，它就有被侵略的危险。因之不能放弃阶级斗争的工具——国家和政党。不过它的阶级斗争的意义，主要的是在国际间，即对侵略国家了。

由此说来，无产阶级是人类最后的阶级，它的国家和政党，也就是最后的国家和政党。在这样的国家和政党自行消亡之前，必定有一个时期，这样的国家除了这样的一个党以外，再没有别的党——“党天下”（天下作政权解）。不但在一国之内，就是在各个国家，在全世界，也一定有一个时期，只有一个党——天下（世界）党。这是苏联已经走在前面，世界各国一定要跟着走的人类历史的必然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只要懂得这一点，“党天下”也好，天下党也好，怎么还当作恶名来向党进攻！党不正是向这方向走的么？

乙 在检讨中写的废稿四页

我就是以上述的精神状态和认识水平到社来工作的。但有几件事又使我背上更多的包袱。其一，我说我不懂古典文学。冯雪峰说，你还懂文言，比别人还好（这话我后来说过，但被揭露时，则变成“党内只有我懂古典文学”）。冯又说，其实是给你一份供给，让你去好好研究马列主义。后来又说，你花五年十年时间，去研究几种古典小说，如《水浒》、《红楼梦》也好。具体工作，不必管（那时也很少具体工作）。我说我早上起不来。冯说没有什么关系，我也起不来。后来又说，找一个好的副主任，把具体事交给他（这是以后关于我对于副主任问

题被揭发为封官许爵的张本)。其二,最初几天,丁玲曾对我说,冯是不会做行政工作的,蒋天佐有病,劝我做副社长,把行政担负起来,把冯解放出去多做点别的事。我一向就怕做首长和行政工作,当时坚决拒绝了。丁那时是中宣部文艺处长,我如答应下来,是很有实现可能的。就因为这事,后来适夷特别是任叔来做副社长,特别是觉得他们对我行使职权时,觉得他们像煞有介事,觉得副社长有什么希罕,它正是我不肯做的事咧!因之在情绪上产生抗拒他们的因素。我说这些,不是推卸责任,我犯错误,主要地在我自己,这些不过与我的基本情况相适合,发生了若干助长作用罢了。

另一方面,对中国固有文化修养很差。除了“四书”、《庄子》、杜诗、韩文、苏辛词和几部特出的小说以外,可说一无所知。又受了“五四”反文言的影响,看不起文言文,认为文言文不为大众所理解,作品[中]精华、糟粕难分,糟粕多于精华。看不起专家,认为专家多是抱残守缺的落后文人,不懂文学,不懂文学的功用,不懂马克思主义,假如不是封建士[大]夫,也不过资产阶级学者。看不起注释工作,认为注释对于古典文学作为艺术及其思想的理解无帮助,旧注解多只点明出处,而不解决读者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极端片面性的理解,别人以为是对古典文学的虚无主义,其实是由对古典文学的极端无知而来的,虚无主义只处于很次的地位。近几年来,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对古典小说的钻研中,看法已有很大改变,但也未必改到了所需要的程度。

我从小就是个很笨、什么事也不会做的人,连游戏也不会。只会读书,写文章,特别理解的是小说。我受过《庄子》的较深

的影响。不是《齐物论》、《养生主》那样的《庄子》，而是《逍遥游》、《马蹄》、《山木》、《骈拇》那样的《庄子》——其实多数是伪《庄子》。就是说要无拘无束地离开人群；人越无用，越是谁也不采，对他自己越是有利。这种思想和父亲所树立的“好榜样”结合起来，就成为独来独往，与世无争，玩世不恭，口不择言，不积极工作，不努力学习改造的种种特性。后来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结合，更成为无组织纪律，党内党外不分，领导被领导不分，怕做独当一面的首长或行政工作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和马列主义，和革命，和党，和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不是说三十多年来，还是依然故我，毫无改变，而是说那改变，作为一个党员，比起所需要的来相差太远，以致可以说，基本精神还是那一套。

最后全面检查材料

(1957年11月28日)

一、言 行

鸣放期间,自己没有发言,也没有写什么文章。妻周颖在社会主义学院发言的稿子,要我给她看。前两次,我都没有看,她定要念给我听,每次也只念了一段,我在口头上教她作了文法修辞上的改正。第三次,她说《人民日报》要发表那稿子,要我看一遍。我看了。我觉得那稿子偏激,想缓和一点,替改了头一段,也在末段改了几个字,内容几次都未更动。那稿子是反党的,是反对党的肃反运动的。我是党员,知道她要发言,也大致上知道她要讲什么,没有阻止她,即没有认为她的发言会损害党的利益。及至听见她念她的稿子的一段(并有两次),那些话都是很恶毒的,我也没有觉得那就是反党,没有觉得恶毒,并且替她在口头上作了文法修辞上的修改,添加上若干词汇,使那稿子变得更恶毒。也就是同她(非党分子)一起反党了。后来看到全文,虽已觉得恶毒,但因《人民日报》要

发表,麻痹了警惕;虽曾在不相干的地方作了若干修改,但于内容无所变更,当然无济于事。

问题还不止此。那发言中部分意见,约在她发言的半年之前,我自己还讲过,即本来就部分地是我的意见。后来那最恶毒的部分,又经过我的修改,修改得比原文更恶毒。这就完全变成我的意见了。

在鸣放期间,张友鸾、顾学颀、李易等人都曾到我家玩过,我未参与他们发表意见的事。顾去我家,在发言之后。我曾到金满成家玩过,但在他发言之前好一阵子却没有去,我在张友鹤家碰见过他,他已经发言了,他的发言更与我无关。此外,到过冯雪峰家两次,头一次是他约我去的。他谈的话,已写了材料,我没有谈什么。第二次是因为一次在社内碰见他,他说可以帮助我写我对组织给我作的结论的意见(那时,文化部要我写意见),所以去找他,但他说他忘记了曾对我讲过这话,意即不帮助了。没有谈别的。据我事后理解,是这时候他已知自己也有问题,所以就不帮助了。头一次从冯家出来,曾去看过陈企霞。这在我,是件相当偶然的事。去年文怀沙对我说过,陈要去看我,我没有表示欢迎,所以陈也没去。在冯家忽然想起陈家离冯家不远,既到这边来了,何不顺便去看看他?就问冯,陈家可去否?冯说可去。我便向冯问陈的住处。同时,我去找陈,也不完全偶然。我一点也不知道陈的事,想去了解他究竟是什么问题。我和陈很少接近,也不理解他。这回,我出了问题,他也出了问题,彼此有了共同点,倒可以去了解了解,甚至可以从他的问题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到陈家后,陈对我谈了许多煽动性的话,想煽动我对我的问题打翻案。那些话已写

在交代材料里。我听了他的话，一面很欣赏，甚至佩服他很有办法，甚至觉得应该向他学习。但另一面也觉得他所告诉我的一些办法，都很麻烦，是我向来所不愿做的。因之也悟出，他这个人大概与我刚刚相反，我不大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尤其是党所给与的，更用不着锱铢必较。他却一点也不放松。第二次去陈家，是从何封家出来临时想起的。但这回去，却是有意。因为周颖将被斗，感到无路可走，所以想去找他谈谈，看有没有应付办法。及至看见他之后，已觉得没有什么需要问他的，就只接触了一下，未谈下去。他也不像上次积极，要找话谈，所以我就把话岔到《聊斋》上去了。

此外没有和什么右派分子来往。

二、思想

我的主要的错误，在于替周颖改稿。

周颖在肃反运动中，不过受了一点轻微的审查，并未被当作正式肃反对象。她对于肃反，虽然也有多少不满之意，还未形成一定的意见。这时候，假如有进步一点的人，在她表露不满之意的时候，晓以大义，她的不满之意是可以化为乌有的。即使不这样，只要不和我在一起，不听见我说过对肃反的意见，不和何封、骆宾基、向思赓等人来往，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也不会形成她在发言时所说的那样猖狂的反肃反的意见。而这中间，我的意见是主要的——她也在社会主义学院受了旁人的坏影响，但那是更次要的。因此，我的犯罪，并不在于没有阻止她发言，也不在于替她改了稿，而在于在她发言之前，

在党宣布整风之前，在我反省出来之后，在她面前，也在何封、骆宾基、向思麋等人之前，说过大致上如周颖发言稿上的部分意见（特别是后来又经我口头改过的那最恶毒的两段）之类的话。我也受了他们的影响，也听见他们发过一些牢骚，但那是次要的。主要的则是我自己的反党思想浓厚，影响了他们。我比他们年纪大（除了何封），也被认为比他们水准高，又是老党员，对于他们的影响比他们对我的大；对周颖的影响，也是我的比他们的大。周颖的发言，因此，无论她怎样自以为是自己发言，其实是在做我的代言人，我的传声筒；无论我怎样没有叫她发言，客观上却是[在]她背后摇了鹅毛扇。我，一个党员，在非党分子面前散布不利于党的言论，和非党分子一起互相表示不满党——不满肃反，替非党分子改反党稿件，并且把本来恶毒的部分改得更恶毒了。这些，除了说我自己反党，煽动别人反党，帮助别人反党，和别人一齐反党以外，还能得到什么解释呢！

我的反党，虽只是肃反一件事，但恰恰是这件事，是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和我相同或相近的意见的。社内右派分子（二编室）不但普遍地提这件事，还同样普遍地以我为例来攻击肃反，普遍地要替我打翻案。这就说明，我在这一点上，和所有的右派分子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而在社内，和冯雪峰是右派分子的“青天”一样，我也成了二编室右派小集团的进攻肃反的旗帜。面当他们的觉悟提高了之后，就说我是他们的独立王国的“国王”。顺便说说，二编室几个右派分子曾找我玩，我也曾找右派分子金满成玩。尽管我和他们的发言无关，但他们喜欢找我，我喜欢找金，我和他们能够谈得很

融洽，也和前述的何封等落后分子谈得很融洽，却没有什麼左派人物和我谈得同样融洽，这就说明我的精神境界和右派分子或落后分子有很大的一致性，而和左派则没有。何况社内右派分子还有人在会场公开表示他们确有希望我“卷土重来”之意。这都证明我确实是右派分子。在整个右派全面向党猖狂的进攻中，确实也有我的一分东西在。反对肃反，实质上就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党正在领导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消灭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而且基本上已经消灭了。这时候，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不一定是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甘心自己被消灭的。它们要和无产阶级，和党较量，要作最后的挣扎，希望在这一次挣扎中，能够推翻党的领导，哪怕是部分的也好，就在那个所在树立起它们自己的领导，然后以部分为据点，逐步取得更多乃至全部的领导权。这是这次右派猖狂进攻的实际的基本原因。资产阶级右派，实际上并不孤独。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内还有台湾反动政权，大陆上也还有地主阶级的残余分子。他们都密切地注意着人民中国，时时刻刻希望中国内部自行分化，希望党的领导削弱，哪怕是极小的一点分化，极小的一点点削弱，于它们都是有利的。一旦到了分化削弱得他们能够直接干涉的时候，就不客气地直接干涉。不问可知，那干涉当然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右派撑腰，然后实行封、帝、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复辟。资产阶级右派的企图恰恰是和它们的利益一致的。无论是推翻党的领导或削弱党的领导，实质上都是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只有推翻了人民民主专政，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共同统治，才有可能。这时候，对于人民民主专政，哪怕是极微小的一点损害，哪怕只是在家里

和几个人口头上说说,也是于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有利的,也是直接帮助了资产阶级,间接帮助了帝国主义。何况我的反肃反的言论,还不止对一两个人口头说说,而是通过了周颖的发言,在群众中散布了恶劣的影响。

我之所以反对肃反,并不因为别的,而只是因为肃反中我被当作肃反对象,被斗争,被隔离反省,而且受了处分。我对于这些,意识上无所反对,但由此而产生了实际上是反对的种种思想:一、无论我犯了什么错误,党也应该把我和反革命分子分开出来,即随便把我放在什么运动中斗都可以,只要不是肃反。二、像我这样的人不少,这些人都难免有情绪,而一有情绪,就或多或少地损害了党的威信。诸如此类,材料中已写过,不再重复。这就说明,我经不起考验,不曾在任何场合,特别是在关系自己个人利害的场合,都全心全意、死心塌地地相信党的正确。从党的利益设想,从整个运动设想,把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下。而是相信自己,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过党的利益。而一这样,就势所必至地要仇恨党、反党。

我之所以成为肃反对象,主要的[是]因为对胡风泄漏了重要的机密。这,已在反省中写过不少,用不着多谈。一句话,我敌我不分,党内党外不分,机密与非机密不分,无视党的铁的纪律,好像纪律只是为别人而设,与自己无关,也就是自己超然于组织纪律之外,是无可辩解的。至于明知胡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党的,还和他来往,并且对他推心置腹,则是把私人感情和政治感情(阶级感情)分开,也就是没有获得政治感情即阶级感情。这件事,我和右派分子或落后分子很能融洽这件事,恰好是一致的。

如上所述，有一条很清楚的线索：起初，没有阶级感情，无视组织纪律；再就，把个人利益看得高过党的利益；终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我之所以这样，不是偶然的。首先，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带流氓性的封建家庭（这已累次交代过），虽然没有进过什么学校（只进过小学），未受到太多的旧式教育，但是在那极闭塞极落后的小城里长大的，受到了不少的坏影响。离开家后，有很长一个时期（五年）在反动的国民党的首都从事反动工作（伪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伪中央社副主任等），习惯了一种反动的工作作风和生活态度，和不少的反动分子（如特务头子康泽之类）有着较深的朋友关系，养成一种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是公然争权夺利的那一种，而是表面上与世无争，实际则是不肯做有利于人的事，不肯做多负责任的事，而伺察有利机会抓一把的这一种，是不怕穷（解放前的生活都是极穷的），但怕艰苦，怕劳动和拘束的这一种。混进党来以后，实际上并未为党做过任何事情，倒是把稍为艰巨一点的工作都逃避掉了（如党派我到康泽处作情报工作，中南区要我做艺术学院或文联〔工作〕之类）。既然如此，又何必入党呢？人的思想感情都是很复杂、矛盾、微妙的，我还不能很清楚地说明它。但有一点，哪怕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入党是很危险的事，但是是一种精神上得到解放或精神上有所寄托的事，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还是重要的。然而对于真正革命，真正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却也是害怕的。所以最好是取得党员的名义而逃掉那党员应履行的义务，一面既可自我陶醉，一面仍旧无拘无束，何况进步作家、革命作家之类的荣衔，也只有在有了党员这个头衔之后，才保持得最牢固。

总之，我从反动阵营来，中间做了一些轻而易举的投机取巧的文字工作，因为没有真心实意地献身给党，终于还是走到了反动。不过以前的反动，以客观形势为主，和主观能动性还不完全一致，所以还能摆脱；现在的反动，却完全出于主观愿望，非自己所能摆脱，非党来挽救不可。至于当中那一段长期的投机取巧，主要之点，在于对党欺骗蒙混，破坏组织纪律，泄漏重要机密等等，本质上也是反动性的。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过程中，阶级的敌人一定用各种各样的伪装混进革命阵营，混进党来，扰乱革命阵线，削弱革命的力量，在革命阵营里面，在党里面起腐蚀作用。明显的例子，如《联共党史》所说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托派、修正主义者或孟塞维克，都是在各自的程度上的阶级敌人——混进革命阵营，混进党来的阶级敌人。中国的某些著名的叛党分子，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等人，也都可以这样说。我虽然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曾在理论上有什么特殊主张，更不曾有什么重大的叛党行为，但在本质上是属于这一类的。我在我的地位、我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背叛了党，腐蚀了党，而且攻击了党。除此之外，就无组织无纪律这点说，我又是像列宁所说的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

三、改造

改造是件长期的事情，也是一种随时随地的事情。在肃反中，在反右中，我觉得我已经获得若干程度的改造。在肃反中的，以前已写过，这里不提。在反右中的，可以举一个例来说。从鸣放期间的许多右派言论看来，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这样

说,但隐隐约约、闪闪烁烁是认为肃反是部分地把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我对这种意见,虽不完全同意,却也不坚决反对,实质上是若干程度的同意的。经过反右之后,我得到一个很明确的认识:肃反中的部分,反右的全部,是把敌我矛盾以处理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了。这不但是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而且也是感性的,因为在这两个运动中,我都是对象。当然,我有这个认识,是在我确实反省到我是反动分子之后。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是正确的呢?正像《人民日报》和邓小平同志所说过的,因为党的强大,人民政权的巩固,不怕资产阶级右派,不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秀才式的造反。

有了诸如此类的一些提高,是不是可以说已经改造好了,无须再改造了呢?当然不是。刚刚相反,还须大力改造。我需要根本改变立场,站到党里来,受到党的严格的教育,过严格的组织纪律生活,在生活中受到实际锻炼。我向党保证绝对遵守纪律,绝对爱护党,信任党,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绝对不犯同样错误。党把我放在任何岗位,给我任何职位和性质的工作,我都兢兢业业地去做,把它做好,不会的学会。

我缺乏阶级感情,不但是感情落后于思想,而且是感情与思想分裂。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我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自己未参加体力劳动,未接近劳动人民(三四十年前曾接近过农民),我愿意到劳动人民中去,下乡、上山,直接参加体力劳动或做基层工作,以改变感情。

我对组织纪律的观念极其薄弱,不够党员条件。由于我确实未过严格组织纪律的生活,未受过组织纪律的教育,不懂得组织纪律的重要性,不是从感性上具体地切身地懂得它。经过

两次运动,已有所提高。我愿在原有的基础上,把凡关于党的、关于组织纪律的文献,从列宁的著作起,一直到邓小平同志的关于修改党章和整风运动的报告,定下日程,在组织的指示和监视之下,做一次系统的钻研,定期向组织作一次口头或书面的报告,定期写出日记、笔记和总的心得的论文,一直到组织认为无须这样做了的时候。这决不是什么形式的事情。今天的这种学习,和以往的任何时期都不同。以往看这些东西,因为生活上和它的接触不大,总像是隔得很远,与自己无关。尽管也理解它,但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解,那理解是不深刻的。现在这些东西直接和我的生活发生关系了,看起来就不再是一篇篇隔得很远的抽象的文字,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一种力量,一种不问你对它的态度如何,它都要直接干预到你的生活里来,而且丝毫不苟、铁面无私的力量。对于它的理解,也是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例如党章和党章报告,以前在报上看到,并没有什么深切的感觉;这回再读,几乎每一个字都使我触目惊心,毛骨悚然。因此,如果有机会把关于党的文献做一次细心的钻研,对于我还是很有用的。索性多说几句:我感觉党把我划为右派,使我反省,使我照出自己的原形,使我感到党章之类的文字在我面前都活了。不但如此,我近来对于许多文章都觉得不同了,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如毛主席的许多文章,近来的如两大宣言,赫鲁晓夫对美记者谈话,毛主席在苏联的发言,都如有神助似地,在阅读时有着较深刻的,即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的领会,这种领会是以前所少有的。我曾私自庆幸我犯了罪,被划为右派,却在反右派运动中,因为被斗争而使自己有所提高,即在生活实践中,进一步地与马克思主义有了血

肉相关的迫近。像我这样的人，大概必须经过做右派的阶段，才有希望做左派；只有经过了这一阶段的右派，才是真正的左派。因此，我又觉得惟其是现在，我才有资格到党校或同性质的教育机关去学习。也就在这里，在表面上是腆颜，在内心里却不一定如此地请求党给我这样的机会。

此外，请求降低我的级位，减少我的薪给，让我的生活水准和一般劳动人民较近一些。

惭愧，不知道，也想不出还有何种对我有效的具体改造方法。我只能说，无条件地接受党对我施行的任何使我自我改造的措施。

我要长期地、随时随地地自行改造。

以上，不深刻不完备的地方，请指示重写或补充。如我自己有所发现，也请允许我重写或补充。

一九五七、十一、廿八

从改组派说到画册

什么时候开始有改组派，记不清楚了。

二九年下半年光景，我已经知道有改组派，但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只知道有一个名赵惠谟的在南京办过一个小刊物：《夹攻》，那个人是，但我不认识。我不是政治上的活动者，也不是热衷于钻官做的人，对于这件事没有怎么留意。一天，国民党中央训部干事同学杨子福和我上班走在一路了，他当然是有意的，我不知道。他说我很能写文章，有见解，就是不“革命”。我说我愿意“革命”。他就提起叫我加入改组派。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他又说原来和我一同编《党基》的沈苑明也是。他和我一同见沈，沈约我在一个晚上去找赵惠谟。也见着了，谈了些什么话，记不得。并没有什么仪式，这样就算加入了。以后是沈和我保持联系。一直也未开会，也未讨论什么问题，只知道唐健飞（原编《党基》的）也是，再后来知道谷正纲弟兄也是。唐健飞曾经和我谈起过，但谷正纲未曾接触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何汉文，也在《党基》上写过文章的，也是，也未直接谈过。我和谷、何两人没有什么来往。

这年快年底时，我请假回家，沈苑明对我说，如果唐生智拿下武汉，我可留在武汉办报，叫我和杨子福取得联系。杨不知

什么时候,已到武汉去了。到了武汉,和杨子福取得了联系,并由杨[介绍]认识了一个名潘范五的(沈、唐、杨、潘都早死了),后来又认识了一个名刘蔚如的,刘后来似乎当了汉奸,不知下落了。唐生智未拿下武汉。我在武汉玩了两个多月才回南京。这以后,什么事也没有。未开会,未出刊物,我也未写文章。后来王乐平在上海被蒋系刺死了。从此没有人谈改组派,连沈苑明也一次未谈过,我以为已经解散了,恐怕也真是解散了。不过和沈的私人关系还保持着,和未加人前一样。

(这个时期我很苦闷,心理上矛盾很多,总的矛盾是对国民党及其内部派系都感失望,而不知如何是好。)三〇年开始吧,即从武汉回南京之后,在伪中央社的职务由副主任降为编辑了,但同时带编《新京日报》副刊,段梦晖是这时候认识的。因为编副刊而认识金满成,他那时编《新民报》副刊。因为编副刊,需要写点不三不四的小文章,搞来搞去,似乎就不能不谈文学了,于是写诗。政治不懂,文学也不懂,诗更不懂,只有一样算抓住了:分行写!写来写去好像还发生了一点莫名其妙的影响。于是和金满成一唱一和,组织了一“甚么诗社”,出版了一个《甚么诗刊》。参加的还有别的许多人,现在记得的几个人:赵迦德(金和他比较熟)、段诗园、屠凝冰(上两人已死)、巴人(不姓王,亦不知姓名,真在什么报当校对)、张屈光(电车公司卖票员,后来混进康泽系统去了),以及其他更无法记姓名的人。这些人连我自己在内有一个共同点,都不会写诗,而写得出的其实只有我一个。现在想,南京那地方真反动,我们懂得什么革命、文学?但我写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胡说八道,居然被目为“左倾”、“普罗”!本来是想逃避政治,结果逃避不

了，在文学上又碰见政治了。这里有些无聊的和反对者的文字往还，不但记不起，记起也无意思，从略。

这时候，我和胡建文住在鼓楼兴华旅馆。胡和我在莫斯科就很熟，都有点无政府倾向，属于不入流的人。但我们快回国时，他似乎积极起来了。也不知他何时回国，回到何地，总之几年不见，这回在南京看见了，住在一个旅馆里。他在什么地方做事我也不知道，以为他在伪中央党部。在旅馆里他经常骂小资产阶级，无耻、下流、怕死……怎么坏就怎么骂，后来听出，其实他是自己骂自己！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本来如此。我说又何必骂呢，骂有什么用呢？他说他还不算自轻自贱的，他们那儿有一个名“张大汉”的，比他自贱百倍。我好奇，叫他把那人带来玩玩见见。后来他带来了，一个几乎比我高一个头的人。渐渐我才知道他们办公的地方是个秘密机关，里面五六个叛徒，好像都是湖北和武汉的省市委，除张外，另有刘歪嘴、俞瞎子，还有两个人连姓和绰号也记不得了。张似乎名“伯新”，但一直未用眼接触过，不知如何写，似乎是武汉市委宣传部长，破获后集体自首了。伪中组部叫他们在一个地方搞材料，由胡建文为主任（胡是否叛徒之类，我一直未弄清）。这样我才明白他们之所以自轻自贱的道理。后来张常来找我玩，熟了之后，我问我写的文章他看过没有。他说看过。我问他的意见。他起初不说，后来说，写是会写，但是，是随便乱说的，不懂政治，不懂文学，一句话，不懂马列主义！我问马列主义是怎样，他告诉了几点，当然一下子很难领会，但从此对他非常佩服，和他好起来了，写了文章就请教他，他也给讲许多道理，叫我哪些话不要说，哪一类文章不要写等等。我觉

得我的精神上有所变更,开始想离开南京另找出路。

一下子到了“九一八”(这时我和金满成住在一起)。我要对这问题发表意见。张静替我分析问题,告诉我提出什么主张——停止一切内战,联苏、联共、联工农共同反日,并叫我利用副刊组织一个“文艺青年反日会”,在必要时可用这名义发表文章。后来也果用这名义在北京学生到南京去请愿的群众场合散发了一篇以上述主张为内容的宣言。那宣言是他和我共同在极匆忙中起草的,他上班时,我写一段,我上班时他来接着写(伪中央社办公时间和一般办公时间不同)。写好了由我拿去《新民报》印,印了一整夜,天亮交给巴人到学生中去发。这东西一发出去,形势就变了。家里、报馆、社三处都有面生人来找。我首先通知他(原约定一看形势不对就逃走),他逃走了。第三四天,伪中央组织部由潘子农打电话给我,叫我到部谈话。我头也未回,挂上电话就走了。后来知道,张走后,他那地方其他的人也走了。胡建文好像也走了,至少是以后就和伪中组部没关系了。其他人中后来还像有一个人被捕杀了。张是我到上海给他路费离开上海的。我到东京后,还接到过他从香港寄来的信,以后就不知怎样了。巴人也逃走了,也不知怎样了。这事,现在恐怕只有胡建文记得较多,周颖、金满成或记得一部分,段梦晖知道得更少。这也是我在某一时期敢去找胡建文,一去又在他家住着以及段梦晖为什么假公济私地给钱我的原因。

和改组派的关系还有一点可说的。我到上海后没有钱了,写信给沈苑明,叫他替我到伪中央社去取薪水。这事现在看来很滑稽,不合理,既然逃出了,还通知人,还要薪水!但当时确

实是这样做的。而伪中央社也居然发给我薪水了。沈苑明知道我在上海的地址，和杨子福来要我回南京。他们说汪精卫快回国，政局会有大变化，我犯的一点小事不要紧。我动摇了，和他们回到南京，住在沈家。时间长短不能确记，但记得在他家写了一篇介绍苏联文学的文章，那是完全骗稿费的，自己一点不懂，是拿《伟大的十年间》一书照抄的，连观点也是。这篇文章交给沈，沈后来把它在《苏俄评论》上发表了。在沈家住了几天，越想越不对头，汪四不回与我什么关系呢？我跟沈谈，表示要走。他说我要走的路，大家早就明白了，不过他们为我惋惜，至少我这一辈子走不通的。我说不管。他说那就只好由你了。他叫我送他一张相片。我拿相片出来时，他说不要写他的名字，写他女儿沈善的名字。沈善那时十岁，我写了“小朋友沈善：大孩子×××”等字样。这沈善前一两年还碰见，在《电影艺术》工作，她还谈起这张照片。

我和改组派的关系如上述。当然，除了和金满成、张大汉[汗]等人的那一段。这关系其实也是和沈苑明的私人关系搅在一块儿的。三五年，我要到康泽那里去，先找唐健飞写信去问可不可以去，应当包括改组派关系在内，但主要的还是私人关系。我实在早已不知道还有什么改组派。找谷正纲更不是什么改组派关系，不过谷可能知道我曾经是改组派罢了。那时汪已当汉奸，谷已属CC，更无所谓改组派了。

和林柏生可说毫无关系。进《中华日报》的经过完全是由孟十还关系而来，如以前所写，没有什么可补充的。我和康泽、谷正纲、沈苑明、唐健飞等人有关系，一般地说是他们对我有感情，但这些人都是在南京的，林柏生从来没有在南京（三

一年以前),关系发生不起来。在莫斯科时也和他不熟,而且他中途就回国了。至于汪精卫本人那就更天高皇帝远,谈不上关系了,除了他是改组派头子之外。我从在黄埔听过他一次报告之后,永没有看见过他。我在南京的那些年中,他都不在南京。他左右的人我也一个不认识。我是国民党,加入过改组派,再说和他有点什么关系,有什么要紧呢?不过事实确实没有。我不是活动家,也不是热衷分子,在国民党中的所谓“中委”之流,我一共只见过丁惟汾、叶楚傖两人,因为他们是先后的伪中宣部长,是管我的。丁还是挂名伪党校训育处主任,也是管我的,我也只见过两三次。我和国民党的关系除了上述的在南京的一个条件以外,再加上同学年相若、地位相去不远、工作有接触等等,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可以说是和我有关系的。而且那些关系其实都是私人关系或主要的是私人关系。

至于画册,真所谓“时衰鬼弄人”,人到了末日,什么怪事都会为他而凑集起来。这是一种相当普遍发给的东西,《中华日报》的工作人员,许多人都有(同样签名盖章)。这可问问在《中华日报》工作过的吴清友(几年前好像在人民银行什么研究室工作),张谔(蔡若虹一定知道他的下落),看他们是否也有过或看见别人有过。这不算奇,奇的是,在记忆里,我有一本这东西的事,连一点影子都没有。这可以问问周颖,看我是否带回家过。我始终认为我没有过这东西,而这就把一件本来很容易理解的事说得不易理解了,自找麻烦。我知道这样说于我有损无益,但我只能说事实的真相。当然,也许记错了,那就记起了再补充吧。至于这东西的出现更奇。一天,盛家伦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件东西请我看。我去,他把这东西给我看,好像

看的时候还有别人，是否有戴浩，记不清楚了。我问他从哪里得来，他说从旧书摊买来。他和我都说这东西如果“忠诚老实学习”时被当作罪证，可不得了。我把它拿回，认为是件奇事，就给舒芜看了，而且一直放在那儿。这当然可当作罪证，但同时也似乎可证明我无罪。如果我有丝毫内疚，做过自认为是任何反革命的事，害怕一天败露，我还敢保存，还敢给别人看？除此之外，它也应该说明我对于实际政治的严重性一无理解，而我的全部行为都为这无理解贯串着。

附 录

附录一

聂绀弩著作书目

邂逅

1935年9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1942年该社再版。

从白话文到新文字

1936年6月大众文化社初版；9月，该社再版。

语言·文字·思想

1937年6月上海大风书店出版。

夜戏

1940年6月福建永安改进社出版。

历史的奥秘

1941年6月桂林文献出版社初版；1942年该社再版；1947年该社三版；1994年5月河北教育出版社重排再版。

蛇与塔

1941年6月桂林文献出版社初版；2001年1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桂林文献出版社初版重排再版。

早醒记

1942年11月30日桂林远方书店出版。

婵娟

1943年1月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

姐姐(英汉对照文艺丛书,金重英译)

1944年3月桂林远方书店初版;1946年1月该社在沪再版。

关于知识分子

1937年上海潮锋出版社付排,因国难遭损未印;1948年9月该社重排出版。

沉吟

1948年10月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

天亮了

1949年2月香港人间书屋初版;1950年8月香港求实出版社再版。

两条路

1949年7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

元旦

1949年7月香港求实出版社出版。

二鸦杂文

1949年7月香港求实出版社出版。

血书

1949年8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

巨像

1949年8月上海学习出版社出版。

小鬼凤儿

1949年12月上海新群出版社初版；1950年3月该社再版。

海外奇谈

1950年10月香港求实出版社出版。

寸碟纸老虎

1951年3月香港求实出版社出版。

绉弩杂文选

1955年4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聂绉弩杂文选

1977年9月尔雅书业公司出版。

绉弩小说集

1981年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1981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聂绉弩杂文集

1981年3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三草

1981年6月香港野草出版社出版。

绉弩散文

1981年12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散宜生诗

1982年8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山呼

1950年8月香港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天亮了》，刊出

“本书作者其他著作”告示，其中列有《山呼》，并标有“即出”二字，未印行。后编入上海学林出版社所出之《聂绀弩诗全编》。

倾盖集·嗤堂诗

1984年6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山仰止

1984年7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敝宜生诗(增订、注释本)

1985年7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蛇与塔(重编本)

1986年2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脚印

1986年3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聂绀弩诗全编

1990年12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聂绀弩诗全编(增补本)

1999年12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侯井天编注，自费印行。先后有1990年12月第1次印本，1992年4月第1次续印本；1992年12月第2次印本；1996年3月第3次印本；1999年3月第4次印本；2000年3月第5次印本。

附录二

聂绀弩名号录

一、正式名号

姓：聂

乳名：兆年

本名：国桢

字：幹如（干如）

学名：畸

别号：咄堂 散宜生

斋名：三红金水之斋 散宜生

二、笔名

聂国桢	聂琦	聂畸	聂绀羽
绀羽	聂绀弩	绀弩	聂甘弩
耳耶	甘奴	绀乳	甘努
臧其人	周颖	悍膺	萧今度
今度	迈斯	澹台灭闹	
紫晴	盩蜩	二鸦	

三、其他称呼

1. 他人称呼：绿林 托尔斯泰（以上为外号）

绀奴 三耳

2. 其他自称：聂 觶 聂 踦 聂有才 聂衣葛
甘 雨 甘 雨 史青文
肖令雨 弩 朱草衣 草 衣
草 朱布衣 布 衣 疍 弩
疍 翁 甘 草 度 垂老萧郎
萧 郎 萧草衣 聋 耶 耶
老咄庵 牛四信 四 信 长生庚
疍积堂

附录三

聂绀弩生平年表

说明：

1. 本年表著译中的篇目，先按发表时序编排；如未见发表，有具体写作时间者，按写作时序编排；无具体写作时间者，统一置本年度后；发表时间和写作时间均不明者，刊于年表后。

2. 旧体诗词，有的已发表，有的未发表，大多无具体写作时间，一时难以考定，为保持其整体性，未入年表，其篇目见第五卷“旧体诗词”目录。

3. 书信部分，有的写作时间不详，且一时难以考定，亦未入年表，所收书信，见第九卷“书信”目录。

4. 所收“运动档案”部分，见第十卷“运动档案”目录。

5. 标有※者，为资料缺失而未查得正文的篇目，以存目备查。

1903年,1岁

事略

1月28日(壬寅年腊月三十),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十字街一个城市平民家庭。取乳名兆年,本名国棧,字幹如(干如),学名畸。聂氏为当地大姓。曾祖辈经营当铺,甚兴旺。祖父辈个个读书习文。祖父聂大来咸丰年间补恩贡,但一生未中举,不能入仕途;生有四子二女。生父聂平周(1873—1914),读过几年私塾,一生无固定职业,曾贩卖土产,开鞋铺,最后在自家门口开一烟馆;能画,喜唱汉剧。生母张氏(1871—1905),出生于京山县城关的一个书香之家,其父为私塾先生。

1905年,2岁

事略

生母张氏病逝。因叔父聂行周(字为臧,1879—1919)无后,遂过继为其养子。养父虽为读书人,但终未取科;年轻时曾任县自治研究所所长;辛亥革命时,受舅弟申国炬和好友孙铁人(二人皆京山县最早的同盟会会员)的影响,曾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做过云梦县法院书记官;做生意不成,晚年靠“跑契税团”维生。养母申氏(1881—1941),为县内饱学宿儒(清贡生)申子輿之女,略读诗书。

1910年,7岁

事略

2月25日(庚戌正月十六日)发蒙上学。学校为京山县东关国民学校(申家祠堂),系初级小学,名义上是新式“小学”,实际上是私塾性质,只有一个不同程度的混编班,教员为孙铁人(镜)和申先甫先生。下午学国文、算学,上午却完全读经书。一个月读完《三字经》,又一个多月读完《论语·学而》,并能对对子,颇得先生的赏识。读到《先进》不几页放暑假,下学期与高年级学童一起学作文。

1911年,8岁

事略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铁人到武昌军政府监察处工作,只有申先甫一人任教。小学一度停学,遂转至城关梧桐巷栖凤祠从邓炽昌、汪觉非先生读书。后小学请了新老师才复学。

1914年,11岁

事略

1月下旬(癸丑年腊月下旬),生父聂平周患肺结核病去世。初小毕业后,即升入京山县立高等小学。在学期间,屡以作文成绩优秀而受到老师奖励,被同窗戏赠“聂贤人”雅号,并以聂幹如之名与吴奚如、汪慰如有“京山三才子”之誉。

1917年,14岁

事略

高小毕业,因家贫不能去武汉投考中学而失学。有时替父

亲“跑契税团”；但仍不废读，经常去借外祖父家藏书阅读；并从城关益大元商店管事陈海峤先生学作旧体诗词，由是旧学根底日深。

1919年，16岁

事略

旁听由查传弼等组织的京山县“学生联合会”集会活动。6月，养父聂行周患肺结核病去世。

1920年，17岁

事略

因受新思潮的影响，曾与同学合谋，试图离家出走，未果。养母为拴住儿子，安排与外家表亲申小姑成亲（申小姑于四、五年后病逝）。结识潘从先，始知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得读乡人董楚屏（又名锄平，第一批共产党人）所寄《共产党宣言》、《劳动周刊》等进步书籍，开始接触新思想。以本名聂国棧在汉口《大汉报》发表诗词，时任国民党总部代理党务部长的孙铁人偶见后，大为激赏，乃函请赴沪。

1921年，18岁

事略

秋，在孙铁人与大舅父申国炬的帮助下，终得离家赴沪。途经武汉逗留月余后抵上海，又得孙铁人资助人上海高等英文学校（私人补习学校）学习两个多月。此间，第一次了解胡适

之和“文学革命”。

1922年，19岁

事略

年初，回家乡休假，返回上海后，由孙铁人介绍加入国民党；随即被介绍赴福建泉州国民党“东路讨贼军”（讨伐北洋军阀）前敌总指挥部，在同乡何成濬司令部秘书处任录事。从辛亥革命前辈王守愚（原名权一，号玄奕）处听到洪秀全是革命而曾国藩是反革命的说法；接触到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讨论集》；得读郭沫若的《女神》，开始接触新诗。

1923年，20岁

事略

上半年，由孙铁人介绍与汪慰如一起赴吉隆坡投奔鲍慧僧。途经新加坡，滞留了一小段时间，参加了拥护孙中山的《新国民日报》与拥护陈炯明的《南铎报》的论战，撰文站在《新国民日报》一边，反驳《南铎报》的论点。至吉隆坡后，由鲍慧僧推荐到半山巴运怀义学（华侨免费小学）任国文教员三个月，后受到当地“华民政务司”的注意和传讯。秋、冬之际，受已在仰光的鲍慧僧之邀，赴仰光接替被英政府驱逐出境的董锄屏办《觉民日报》，后因与老板有矛盾而被开除，遂寄居朋友处帮助办《缅甸晨报》。先后在两报资料室读到群益出版局出版的《新青年》合订本，并开始涉猎一些自然科学和五四时代关于社会改革的著译。

1924年,21岁

事 略

五六月间,从仰光经槟榔返广州,由鲍慧僧(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干事)推荐,以聂觭之名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二期。此间,与时为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相识,并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多次得到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帮助。

1925年,22岁

事 略

2月,与第二期全体学员作为校长蒋介石(东征主将)的卫队,参加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取道平山、淡水,在淡水等船时,得读《小说月报》上鲁迅先生的《在酒楼上》,久久难以忘怀;后经海丰至汕尾待命。在汕尾帮助国民党第某区党部举行了孙中山追悼会,得汕尾新市长赏识。后被调回海丰,任彭湃同志主办的“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兼政治部科员。半年后,在当地学潮中出任海丰县第一高等小学兼职校长。在海丰期间,经常应《陆安日刊》编辑李谷珍之邀,撰写诗文,以聂觭之名在副刊上发表;并因此结识钟敬文、丘东平、马醒、林海秋等文友。5月,通过钟敬文、马醒等人邀约该县十多位文学爱好者相聚农讲所所在地——龙山准提阁,举行纪念屈原的端午诗会,并为诗会撰写一联云:“悼三闾大夫庆咏端阳;论五月形势讴歌农会。”东征胜利后,又返回广州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年底,毕业后以第三名考取莫斯科中山大

学。不久,从广州乘船出发到达上海;次年元旦后又启航前往海参崴,转赴莫斯科。

著 译

※醒后(诗)

载 1925 年《陆安日刊》,署聂畸。

1926 年,23 岁

事 略

年初,抵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同学中有邓小平、伍修权、谷正纲、邓文仪、蒋经国、康泽等人。学了半年俄文后,即潜心阅读鲁迅、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人的作品和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并自学了许多北京各大学的讲义(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几乎自修了文科大学的全部课程。以专心文艺被同学戏称为“托尔斯泰”。不久,应钟敬文之约,以聂畸、绀乳为笔名,在钟敬文于广州主编的《国民新闻》副刊《倾盖》上发表新诗和散文。钟敬文离开副刊编务后,还将其部分稿件介绍给复旦大学出版的《黎明周刊》及南洋日报社的副刊《椰子集》。

著 译

※列宁机器(诗)

载 1926 年广州《国民新闻》副刊《倾盖》。

※撒旦的颂歌(诗)

载 1926 年广州《国民新闻》副刊《倾盖》。

城下后(诗)

1926年作于莫斯科。初收《聂绀弩诗全编·山呼》。

※龙津溪畔

载1926年广州《国民新闻》副刊《倾盖》。

1927年,24岁

事 略

继续在钟敬文主编的《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发表诗文。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五六月间随第二批留学生从莫斯科被遣回国。抵上海后,与谷正纲、康泽等分配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当训育员,认识女学生周颖(之芹)。在贺扬灵主编的《救党特刊》上发表批判西山会议派的文章,在南京的大小报刊上发表诗文。

著 译

诗译中山悼列宁词(诗)

——译自俄文

在莫斯科译。载1927年3月18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署聂畸。

雪海的窥望(诗)

载1927年3月21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署聂畸。

军阀旗帜下的死者(诗)

1927年2月9日作于莫斯科。载1927年3月26日

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署聂畸。

克鲁泡特金墓上(诗)

1927年5月于莫斯科作。具体发表时间及刊物不详。后载1931年10月1日《苏俄评论》创刊号，署聂绀弩。

摔掉一杆枪(诗)

载1927年6月5日《北新》第1卷第36期，署聂畸。

※与李协和论党争

载1927年《救党特刊》，刊载日期不详。

※共产党的宣传机关——“西山会议派”

载1927年《救党特刊》，刊载日期不详。

1928年，25岁

事 略

下半年，调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不久，任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请假与在杭州工作的钟敬文一起游历上海、苏州、杭州等处。在留苏同学办的刊物《党基》上发表政论性文章，并代主编《党基》的最后两期。

著 译

东南西北的年关

1928年1月某日作于南京。载1928年2月4日至7日《京报》，署聂绀羽。初收初版《脚印》。

大日本对支那贫民问题之最轻便的解决法

——日兵暴行之真凭实据的总算账

载 1928 年 6 月 5 日南京《党基》创刊号，署聂绀羽。

无政府主义者与军阀

载 1928 年 6 月 15 日南京《党基》第 2 期，署绀羽。

面包，怎样略取呢？

载 1928 年 6 月 15 日南京《党基》第 2 期，署绀羽。

时事述评

载 1928 年 6 月 25 日南京《党基》第 3 期，署绀羽。

沙基在哪儿？

载 1928 年 6 月 25 日南京《党基》第 3 期，署绀羽。

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宥电

载 1928 年 6 月 25 日南京《党基》第 3 期，署绀羽。

中国国民党的以党治国

分载 1928 年 7 月 5 日南京《党基》第 4 期，8 月 5 日

《党基》第 7 期，署绀羽。

问与答(通信)

载 1928 年 7 月 5 日南京《党基》第 4 期，署绀羽。

编后(《党基》第 5 期)

载 1928 年 7 月 15 日《党基》第 5 期，署绀羽。

1929 年，26 岁

事 略

年初，与周颖结婚。不久，周颖即以河北公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1930年,27岁

事 略

年前,趁放年假回京山老家探亲。其时爆发了唐生智、石友三的联合反蒋战争,因希望唐生智占领武汉后能留在武汉办报而脱离蒋介石,故意在武汉拖延了两个多月。后唐生智终未拿下武汉,不得已于本年2月返回南京,因逾假受到行政处分,不久,由副主任降为普通编辑。

著 译

※望着我的王妃而叹息(诗)

载1930年《文艺周刊》第3期,署绀弩。

马来的琴歌(诗)

约1928年作。载1930年10月15日南京《文艺月刊》第1卷第3号,署聂甘弩。初收《聂绀弩诗全编·山呼》。

你不该拿走我的腿(诗,后改作为《一只腿》)

载1930年11月15日南京《文艺月刊》第1卷第4号,署绀弩。

1931年,28岁

事 略

在南京中央通讯社工作期间,同时为《新京日报》主编副刊《雨花》,发表抗日文章,常被“封杀”;不久,与在《新民报》担任副刊《葫芦》主编的金满成共同组织“甚么诗社”,诗社成员多至百余人,曾在《南京日报》上附出《甚么诗刊》,并出版单行本《甚么月刊》,主要刊登自作的新诗。这些诗亦被当局视为“左

倾”、“普罗”。“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南京文艺青年反日会”，诗社随即解散；又印制、散发反日传单，与人一起起草并到北京学生赴南京请愿的集会上散发抗日宣言，在《雨花》等副刊上发表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要求停止内战、联苏联共联工农共同抗日的文章，受到国民党中宣部审查。9月下旬，受到当局传询，遂弃职潜逃上海；后又返南京，但未上班。虽有留苏同学沈苑明等一再挽留，仍决定脱离国民党。年底，得周颖信经上海赴日本东京。

著 译

现制度讴歌（诗，又题作《雨花台》）

载 1931 年 5 月 1 日《创作》月刊创刊号。署聂绀弩。

自拷（组诗）

载 1931 年 6 月 1 日《创作》月刊第 1 卷第 2 期，署聂绀弩。

※你不懂，我懂！（诗）

载 1931 年《新京日报·雨花》。

1932 年，29 岁

事 略

在东京，靠周颖一份官费维持生活，边学习边向杭州留苏同学孟十还（斯根）主编的《中华日报》文学旬刊《十日文学》投稿。通过周颖的介绍，结识胡风、何定华、王达夫、楼宪（尹庚）等，并于 2 月由胡风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随即以聂衣葛之名与胡风、何定华、王达夫、楼宪、周颖、杨玉清、

陈建晨等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5月,开始出版油印刊物《文化斗争》(出版两期后改名为《文化之光》,又出了一两期后停刊),宣传抗日,每期印二三十份,免费分送给相识的留苏学生阅读,一直坚持到次年4月。

著 译

高尔基的作家生活四十年([日]秋田雨雀作)

载1932年11月10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聂绀弩译。

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日]藏原惟人作)

载1932年11月20日、12月10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聂绀弩译;又载1934年4月24日—5月10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译。

鲁迅之时代及其作品

1932年11月21日作于东京。载1932年12月20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聂绀弩。

苏联文坛最近的理论斗争([日]上田进作)

1932年11月27日译于东京。载1932年12月30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聂绀弩译。

1933年,30岁

事 略

2月20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书记长小林多喜二被警方刑讯致死;4月,《文化之光》被封,被日本刑厅逮捕,关押于“早稻田留置场”达三个月。6月12日,与胡风、何定华、周

颖等十多人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6月15日回到上海。上岸后由胡风起草,以“留日归国华侨代表团”的名义发表《反日宣言》;三四天后,在四马路中央西菜馆(广东同乡会)由周颖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控诉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爱国留学生的迫害。不久,即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常常一身兼任数个爱国组织的代表,全身心地投入反帝爱国斗争;并与“左联”接上关系,参加“左联”理论研究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委员会)活动,后成为小说研究委员会成员。

著 译

《人与女人》

——谨就正于“第三种人”

1932年12月29日作于东京。载1933年1月10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绀弩。

母亲([日]山内田鹤子作)

1932年11月21日作完。载1933年2月10日、20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绀弩译。

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

——苏联文坛的新创作口号

载1933年2月28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聂绀弩。

文艺批评的基准([日]宫本显治作)

1933年2月6日译于东京。载1933年3月10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聂绀弩译。

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文化运动高压之下产生的一个老英雄

1933年3月12日作于东京。载1933年3月30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聂绀弩。

机器与艺术([日]藏原惟人作)

1933年3月7日节译于东京。载1933年4月10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绀弩。

床上的故事(诗)

1933年2月5日作于东京。载1933年4月20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初收《聂绀弩诗全编·山呼》。

插上一根草标(诗)

1929年3月3日作。载1933年6月1日《论语》半月刊第18期，署聂绀弩，又载1933年7月20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聂绀弩。初收《聂绀弩诗全编·山呼》。

恩格斯论巴尔扎克

1932年12月26日译于东京。载1933年6月21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绀弩译。

电影与现实

——从《现代一女性》说到《我们的生路》

载1933年7月20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绀弩。

通讯员的资格及任务([日]本庄陆男作)

载1933年8月10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绀弩译。

暴君勒罗

1933年9月3日作于上海。载1933年9月11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绀弩。

关于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苏]基尔逊作)

1933年9月18日译。载1933年9月25日、10月2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绀弩译。

有一个乞丐(诗)

载1933年10月23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绀弩。

苏联演剧的方向与任务([苏]卢那恰尔斯基作)

载1933年11月6日、11月13日《中华日报·十日文学》，署绀弩译。

两条路

1933年10月27日作。载1933年11月15日《文艺》月刊第1卷第2期。署聂绀弩。初收初版《两条路》。

1934年,31岁

事 略

3月,经孟十还介绍,受林柏生邀请,征得“左联”同意,受聘于《中华日报》,创办著名文学副刊《动向》,为左翼作家从事文化斗争提供了重要阵地;并请贫病中的“左联”作家叶紫作助编。《动向》于4月11日创刊。因编《动向》的关系,结识了鲁迅、茅盾、丁玲等著名作家,并与鲁迅多次面晤和通信,得到鲁迅中肯的批评和帮助,其短篇小说《金元爹》得到鲁迅的亲自指点。在《动向》上,先后发表了鲁迅20多篇文章;周而复、欧阳山、田间、宋之的、章泯等都是经常投稿者。利用这个阵地,一面积极推动关于采用旧形式和大众语的讨论,一面以

“耳耶”和“臧其人”作为笔名发表杂文，积极投入反文化围剿的斗争。在蒋、汪斗争中，因林柏生受到威吓，聂被迫辞职。《动向》共历时八个月，于12月18日停刊。此间，还通过鲁迅认识了东北作家萧军和萧红，并与丘东平重逢。

著 译

一只腿(诗，由《你不该拿走我的腿》改作而成)

载1934年1月1日《中华月报》第2卷第1期，署聂绀弩。

※第一次讲话

载1934年4月1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

追论京派海派什么的

载1934年4月11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笑与幽默

载1934年4月11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聂绀弩。

杜衡先生还往哪里逃？

载1934年4月12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文坛洗冤录

载1934年4月15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废稿示众(《吹毛求疵》一文的“编者按语”)

载1934年4月15日《中华日报·动向》，署编者。

《怀乡集》的根本态度

载1934年4月17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内容与形式不可分论(即《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第一节)

载1934年4月22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译。

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

载 1934 年 4 月 24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何谓形式？

载 1934 年 4 月 24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没有人谈欧阳山

1934 年 4 月 22 日作。载 1934 年 4 月 25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奴才与环境

载 1934 年 4 月 29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甘奴。

艺术形式受什么东西的规定呢？

载 1934 年 5 月 7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从未来派说到大众为什么不懂艺术形式

载 1934 年 5 月 8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娜拉与现代妇女问题

1934 年 5 月 31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土产”——“接仪”

载 1934 年 6 月 9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苏联的何徐事件”及其它

1934 年 5 月 29 日作。载 1934 年 6 月 19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为白话文敬告林语堂先生

1934 年 6 月 19 日作。载 1934 年 6 月 21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话跟话的分家（即《语言·文字·文章》第一节）

载 1934 年 6 月 22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决心（[日]窪川稻子作）

载 1934 年 6 月 24 日《作品》创刊号，署绀弩译。

话跟文章的分家（即《语言·文字·文章》第二节）

载 1934 年 6 月 25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关于“文言文”的形成跟发展

载 1934 年 6 月 28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关于“白话文”的发生跟成长

载 1934 年 6 月 30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金元爹（又改作《盐》）

载 1934 年 7 月 1 日天津《当代文学》第 1 卷第 1 期，署聂绀弩；又载 1941 年香港《时代文学》第 1 卷第 3 期，署聂绀弩。初收初版《邂逅》。

开快车时候的一个备忘录

一、引言

二、文言文

三、白话文

四、文白争执的本质

五、文白争执的意义

六、大众语的建立问题的提出

七、大众语跟文章内容

八、大众语跟白话文

九、大众语跟土话

十、建立大众语是个实践问题

十一、建立大众语应该避除乐观的放任主义色彩

载 1934 年 7 月 2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金圣叹的意识问题

1934年7月作。载1934年7月10日《申报·自由谈》，署耳耶。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大众语跟土话

载1934年7月26日至7月30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初收《语言·文字·思想》。

这算是我的忏悔录（又题作《我与文学》）

载1934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一周年紀念号特辑《我与文学》，署绀弩。

拥护吴老将军的“大众语万岁”

——参看八月一日《自由谈》

载1934年8月4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初收《语言·文字·思想》。

拥护了吴老将军之后

载1934年8月5日—6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初收《语言·文字·思想》。

穿制服的文学家

载1934年8月9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臧其人。

给叶籁士先生

载1934年8月13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文学无用论与文学不足道论

载1934年8月18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艺术的将来（〔苏〕佛里契作）

载1934年8月19日《中华月报》第2卷第8期，署聂绀弩译。

关于电影跟土话跟拉丁化

载 1934 年 8 月 20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为愚民政策捏一把汗

载 1934 年 8 月 20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臧其人。

道统论

载 1934 年 8 月 31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施蛰存先生好自为之

载 1934 年 9 月 7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臧其人。

零碎话

载 1934 年 9 月 8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答霓璐先生的抗议

1934 年 9 月 13 日作。载 1934 年 9 月 15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谈梅兰芳

载 1934 年 9 月 16 日—17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谈杂文

1934 年 9 月 11 日作于上海。载 1934 年 10 月 5 日《太白》半月刊第 1 卷第 2 期，署耳耶。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论《封神榜》

1934 年 7 月 6 日作于上海。载 1934 年 10 月 20 日《太白》半月刊第 1 卷第 3 期，署耳耶。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伟大的胜利

载 1934 年 10 月 26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臧其人。

为大众语敬告林语堂先生

1934 年 10 月 15 日作。载 1934 年 11 月 5 日《太白》半月刊第 1 卷第 4 期，署耳耶；又载 1935 年 2 月 20 日《文学新辑》第一辑，署耳耶。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我与文学（又题作《这算是我的忏悔录》）

1934 年某月作于上海。载 1934 年 11 月 5 日《太白》第 1 卷第 4 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大众语“决不是含有阶级性的”

1934 年 11 月 5 日作。载 1934 年 11 月 8 日《中华日报·动向》。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论同音字

载 1934 年 12 月 14 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耳耶。

※悲剧之夜（〔苏〕倍兹敏斯基作）

译作，发表于本年，所载刊物、日期及署名不详。

1935 年，32 岁

事 略

二三月间，经吴奚如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到一个月，即被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以获取军事情报（当时康泽在四川任参谋团政训处长，因看到绀弩刚从日本回来时在《十日文学》上的文章，曾邀请聂绀弩去他那里），遂受命于 5 月初去成都找康泽“谋事”。因康泽知其身份，滞留月余后，未有结果被礼遣，先随康泽至重庆，再由别动队长曹勳（小时同

学,在黄埔时同队)陪同至万县,后乘船途经武汉,返回上海。在上海,一度任“左联”上海沪西区大组组长,负责传达“左联”的指示和任务,组织光华等大学的活动,参加一些纪念节日的“飞行集会”等等,从而认识周而复、田间、马子华、王元亨、李励文等人。支持马子华与“左联”同志葛一虹、向思庚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新辑》,以“耳耶”笔名供稿并为他们保存稿件。《文学新辑》仅出两辑即被禁,后按鲁迅先生指示将编余稿件刊于胡风编辑的《木屑文丛》上。

9月,短篇小说集《邂逅》,列为《天马丛书》之一,由上海天马书店初版。

著 译

一九三四年大众语论战回顾

1934年12月5日作。载1935年1月8日《中华月报》元旦特刊。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谈《娜拉》

1935年1月27日作。载1935年2月5日《太白》第1卷第11期,署周颖。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朴列汗诺甫批判([苏]阿里希莫甫作)

载1935年2月20日《文学新辑》第1辑,署臧其
人译。

谈《野叟曝言》

1935年2月5日作于北平。载1935年3月5日《太白》半月刊第1卷第12期,署悍膺。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再谈《野叟曝言》

1935年2月18日作于北平。载1935年3月20日《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1期，署悍膺。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追记

载1935年3月20日《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1期，署悍膺。

阮玲玉的短见

1935年作。载1935年4月5日《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2期，署周颖。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棉裤

1934年12月8日作。载1935年4月20日《木屑文丛》第1辑，署臧其人。

一根棍子(又题作《邂逅》)

1935年4月19日作于上海。载1935年6月1日《文学》月刊第4卷第6号，署绀弩。初收初版《邂逅》。

※林语堂的扯谈

载1935年10月10日《文艺大众》第1卷第6期，署聂绀弩。

关于知识分子

载1935年10月15日《申报·自由谈》，署绀弩。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家

载1935年11月1日《中华月报》第3卷第11期，署绀弩。

《八月的乡村》

载 1935 年 11 月 10 日《读书生活》第 3 卷第 1 期，署
绀弩；又载 1935 年 11 月 10 日《文艺大众》第 1 卷第
6 期，署绀弩。

天文学家是“不为什么”的么？

载 1935 年 11 月 16 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署绀
弩。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人间世——鬼间世

载 1935 年 11 月、12 月《漫画与生活》第 1 卷第 1 期、
第 2 期，署绀弩。

没有青年的国

载 1935 年 12 月《漫画与生活》第 1 卷第 2 期，署绀
弩。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

1934 年作于上海。载上海生活书店 1935 年《太白》
半月刊第 1 卷纪念特辑，署绀弩。初收初版《关于知
识分子》。

一九三五年的中国语文运动

载 1935 年《改造》创刊号，署绀弩。初收初版《语言·
文字·思想》。

“爱智庐”

——川游杂记之一

1934 年 5 月 6 日作于上海。载 1935 年《生活知识》。
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走掉

载 1935 年第 2 期《现代文学》。初收初版《邂逅》。

方块字·别字·手头字

1935 年 3 月 10 日作。载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老子的全集

1935 年 4 月 7 日作。载初版《历史的奥秘》。

邂逅(又题作《一根棍子》)

1935 年 4 月 19 日作于上海。载初版《邂逅》。

1936 年, 33 岁

事 略

年初,左联解散。在鲁迅的倡议和支持下,与鲁迅、胡风、吴奚如、萧军、萧红、周文等共同创办出版《海燕》,以“耳耶”等笔名担任编辑人。《海燕》第 1 期于 1 月 19 日出版,即日即售尽两千册,旋即又重印两次。由于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仅办两期即被反动当局以“宣传普罗文化”的罪名勒令停刊。4 月,建议周而复、王元亨、马子华等创办月刊《文学丛报》,并以萧今度的笔名列为主编之一;组织刊登鲁迅和其他作家的文章,5 月 31 日在该刊第 3 期上发表了根据鲁迅的意见、由胡风执笔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积极拥护鲁迅先生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发表《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等文章投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后接受周文传达冯雪峰的意见而退出论争。在该刊第 4 期上,与茅盾、王任叔、王统照、立波等四十人共同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与鲁迅、茅盾、胡风、巴金等七十七人共同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7 月,与张天

翼(负责)、蒋牧良、胡风、吴奚如、尹庚等共同编辑《现实文学》。8月5日在《文学丛报》出到第五期停刊后,又支持周而复、李励文创办《散文》,并介绍稿件。9月下旬,首次会见冯雪峰,受命护送丁玲赴陕北,后在返回上海途中得悉鲁迅先生于10月19日病逝,遂急忙赶回上海参加治丧活动,与胡风、张天翼、萧军等人扶送鲁迅先生灵柩至虹桥万国公墓。11月,为发行过《海燕》的群众图书出版公司编辑文艺刊物《热风》(仅出两期停刊)。12月25日,女儿海燕出生。年底,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被推举为委员。

6月,语言问题小册子《从白话文到新文字》,列为《大众文化丛书》之一,由大众文化社初版;同年9月,由该社二版。

著 译

大隐在朝

载1936年2月20日《海燕》月刊第2期,署耳耶。

假期([日]小林多喜二作)

载1936年3月1日《中华月报》第4卷第3期,署聂绀弩译。

支那人

载1936年4月1日《文学丛报》月刊诞生号,署聂绀弩。

关于《世界文库》的翻印古书

1936年3月22日作。载1936年4月15日《作家》第1卷第1号,署甘奴。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国语运动史纲》

1936年4月4日作。载1936年5月《新东方》半月刊第1卷第2期，署绀弩。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雨花台(诗,又题作《现制度讴歌》)

1929年2月15日作。载1936年6月1日《文学丛报》月刊第3期,署聂绀弩。初收《聂绀弩诗全编·山呼》。

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

载1936年6月15日《夜莺》月刊第1卷第4期“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署绀弩。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从白话文到新文字

一、起头

二、文言文

三、方块字

四、语文问题

五、五四运动

六、白话文

七、国语统一运动

八、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

九、别字 手头字

十、新文字

十一、收尾

1936年3月作。载1936年6月《大众文艺丛刊》,署聂绀弩。于1936年6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列为《大众文化丛书》(杨东莒主编)第1辑的第22种,以单行本

行世。

国语罗马字呢？中国新文字呢？

——答黎锦熙：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

1936年4月30日写完。载1936年6月《新东方》半月刊第1卷第4期，署绀弩。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创作活动的路标

载1936年7月1日《现实文学》月刊第1期，署耳耶。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十一周年（新闻影片脚本）

载1936年7月1日《现实文学》月刊第1期，署聂绀弩。

冰条（〔日〕平田小六著）

载1936年7月1日《文学丛报》月刊第4期，署聂绀弩译。

怎样统一中国语言

载1936年8月1日《中华月报》第4卷第8期，署绀弩。

文章·语言·文字（该文第一、二节又分别作为《从白话文到新文字》的第一、二节）

1936年7月7日作。载1936年8月1日《现实文学》月刊第2期，署聂绀弩。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父亲

1935年7月8日作于上海。载1936年9月5日《文

学大众》第1卷第1期，署绀弩；又载1936年9月《大众文学》。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关于语言

1936年9月18日作于上海。载1936年10月5日《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3期，署绀弩。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主题的积极性和真人真事和编辑方针(上海《小说家》第一次座谈会记录)

1936年9月20日座谈记录。载1936年10月15日上海《小说家》，署蒋牧良、王任叔、张天翼、周而复、聂绀弩等。

又是关于语言

1936年9月18日作于上海。作者后将该篇与上篇《关于语言》合为一篇，总题为《关于语言》，此为第二节。

酒船

1936年秋作于上海。载1936年10月15日上海《小说家》月刊第1卷第1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夜戏》。

鲁迅的错误

载1936年11月《热风》创刊号，署耳耶。

关于哀悼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逝世后十二日作。载1936年12月1日上海《小说家》月刊第1卷第2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小说家》第二次座谈会记录(题名不详)

1936年10月30日座谈记录。载1936年12月1日上海《小说家》，署蒋牧良、王任叔、张天翼、周而复、聂绀弩、萧军、沙汀等。

新文字和大众文学

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给一本厦门话新文字小册子作的序

1936年5月30日作。初收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语言·文字·思想》自序

1936年9月17日作。载初版《语言·文字·思想》。

1937年,34岁

事 略

七七事变后,送妻女回京山避难。后周颖留在京山国民中心小学执教,只身返回上海。其时,正值八一三抗战全面爆发,即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一队,与马彦祥、宋之的、贺绿汀、塞克等经南京去武汉请示周恩来,准备去抗日战区工作。在南京逗留时,从康泽处募得捐款作路费,于九十月间抵武汉。因演剧队北上,留汉待命。在汉期间,曾主编儿期《新华日报》副刊《团结》;并参加进步文学团体“哨岗社”,成为重要成员;同时,为胡风办的《七月》积极供稿。

6月,语文问题论集《语言·文字·思想》,由上海大风书店初版。9月,杂文集《关于知识分子》由上海潮锋出版社付排,因国难遭损未印。另有两部交印的书稿《瘸子的散步》(文艺论文和杂文集)和《两条路》(小说集),亦在战祸中丢失。

著 译

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诗)

1936年11月作。载1937年1月《热风》创刊号,署
绀弩。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

语言和文字的分家(又题作《话跟文字的分家》,作为《语言·文字·文章》的第三节)

1937年1月18日作。载1937年2月1日《语文》第
1卷第2期,署绀弩。

请莫介绍稿件

载1937年3月1日《热风》第1卷第2期,署萧今度。

旁听

1936年11月6日作。载1937年5月15日《文丛》
第1卷第3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夜戏》。

玛德里曲可不可以唱

载1937年7月10日《自修大学》第1卷第13期,署
绀弩。

※谈是非

载1937年10月16日汉口《哨岗》半月刊第1卷第1
期,署绀弩。

人与鲁迅

载1937年10月16日《七月》第1集第1期,署绀弩。

游吕菊芬

鲁迅先生周年祭日作。载1937年11月1日《七月》
第1集第2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记一个朋友的谈话

1937年12月10日作。载1937年12月16日《七月》第1集第5期，署耳耶。

怀南京(又题作《失掉南京得到无穷》)

1937年12月20日作于汉口。载初版《沉吟》。

把古书怎么办呢?

1937年5月作于上海。

四声论及其他

1937年8月13日以前作于上海。

1938年,35岁

事 略

1月27日,受薄一波同志聘请,与艾青、田间、端木蕻良、萧军、萧红、李又然等人从武汉启程赴山西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途中与塞克、端木蕻良、萧红合作剧本《突击》。抵达后尚未开课,战火便延烧至临汾,旋即随前来慰问的由丁玲和吴奚如率领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经风陵渡,渡黄河到西安。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又和丁玲等人赴延安考察,在延安参加陕北公学开学式,毛泽东邀请其与丁玲、李又然共进午餐。约三个月后又与丁玲一起返回西安。其时因周恩来已去武汉,8月,又至武汉。此间,趁隙回故乡探望女儿和在当地学校教课及参加妇女抗日工作的周颖,并参与主持孙铁人夫人葬礼并写祭文。8月29日,日机三次轰炸京山县城,祖屋部分被炸,所幸其母及妻女幸免于难。一个月后返回武汉,经周恩来介绍去皖南新四军军部。一到新四军军部,就得到叶挺、项英支持,筹备并成立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工作领导小组,计划培训

连队文化教员，教授战士新文字；后因社会上一般人都用汉字，觉得学习新文字用处不大，遂停止。同时，在教导队任教。后参加军部战地服务团创作组，成员还有辛劳、罗涵之（菡子）、林琳（林果）；最后任军部文化委员会委员，编辑了两三期军部刊物《抗敌》和《抗敌》的文艺部分。10月9日，在新四军军部举行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上，作《纪念鲁迅，发扬鲁迅精神》的报告。曾与丘东平、徐平羽（白丁）应陈毅之邀，赴敌后收集写作材料，体验生活，约三个月后又回到军部。

著 译

失掉南京得到无穷（又题作《怀南京》）

1937年12月20日作于汉口。载1938年《七月》第1集第6期，署耳耶。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七月》座谈会记录）

1938年1月16日座谈记录。载1938年《七月》第1集第7期，署艾青、东平、聂绀弩等。

母亲们

1938年1月7日作于汉口。载1938年《七月》第2集第1期，署耳耶。初收初版《蛇与塔》。

延安的虱子

1938年4月18日作于汉口。载1938年《七月》第2集第1期，署绀弩；又载1938年6月25日《文艺》第1卷第2期，署聂绀弩。

※华北的烽火

载1938年2月4日至4月24日《救亡日报》，聂绀弩与艾芜、舒群、张天翼等合作。

突击

载 1938 年 4 月 1 日《七月》第 2 集第 6 期。与塞克、端木蕻良、萧红合作。

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七月》座谈会记录)

1938 年 4 月 26 日座谈记录。载 1938 年《七月》第 3 集第 1 期,署胡风、聂绀弩、吴组湘等;又载 1938 年 6 月 25 日《文艺》第 1 卷第 2 期,署胡风、聂绀弩等。

寂寞的故乡

1938 年母亲节作。载 1938 年 5 月 16 日《七月》第 3 集第 2 期,署绀弩。

《此时此地剧运》补义

1938 年 12 月 8 日作于金华。载初版《早醒记》。

月夜的故事(又分别作为《巨像及其它》第三节、《延安的虱子》第二节)

1938 年 3 月某日作于汉口。载初版《婵娟》。

1939 年,36 岁

事 略

离开新四军,先到金华,跟邵荃麟、骆耕漠等编辑大型政治文艺月刊《东南战线》;后刊物被禁,受托去方岩找第三战区政训处主任谷正纲(原南京中央党校训育处副主任)疏通,未果,但了解到被禁的原因。后再次找谷正纲要求另办一刊物获准,遂出《文化战士》(实际为中共浙江省委刊物),并任主编兼发行人;因反汪仅出两期后遭禁。在金华的几个月,还为《浙江妇女》(葛琴主编)、《刀与笔》(万湜思主编)等刊物写稿。其

间,曾赴温州作短暂逗留,会见中共温州地方组织负责人和部分进步作家,传达陕北、皖南战地和浙江各地的政治及文化信息。

著 译

不死的枪(诗)

——献给画篇《不死的枪》的作者新波

1938年9月作。载1939年1月1日《文艺阵地》第2卷第6期,署绀弩;又载1939年2月28日、3月1日《华美晨报·浪花》,署绀弩。初收初版《元旦》。

山芋

1939年2月2日作。载新四军出版的《抗敌》。初收初版《夜戏》。

圣母

1939年三八节作于金华。载桂林《力报·新垦地》,署绀弩。初收初版《蛇与塔》。

巨像(又作为《巨像及其他》第一节)

1938年12月3日作于云岭。载1939年10月《七月》第4集第3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创作口号及其它

载1939年11月15日《浙江妇女》第5期,署耳耶。

樱花节(又作为《婵娟》第五节)

载1939年11月15日《浙江妇女》第5期,署迈斯;又载1946年8月17日《商务日报·茶座》,署萧今度。

序《捧血者》

载1939年金华《东南战线》第1卷第5期,署绀弩。

“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1939年10月19日作。载1939年11月20日《刀与笔》月刊创刊号，署耳耶。初收初版《高山仰止》。

记周佛海林柏生

1939年12月15日作于金华。载1939年12月20日《刀与笔》月刊第2期，署聂绀弩。

噩梦（又题作《永远地，永远地……》，又作为《〈婵娟〉题记》）

1939年8月23日作。载1939年12月20日《刀与笔》月刊第2期，署耳耶。

我的金言

载1939年12月20日《刀与笔》月刊第2期，署耳耶。

收获的季节（诗）

——为鲁迅先生三年祭作

1939年中秋作。初载1939年《抗敌》，又载1940年8月3日桂林《力报·新垦地》。初收初版《元旦》。

小号兵

1939年1月2日作于金华。载初版《巨像》。

心祭

1938年三八节作于屯溪。载初版《蛇与塔》。

婵娟

1939年3月15日作于金华。载初版《婵娟》。

离人散记（由《婵娟》部分章节组合而成）

1939年3月15日作于金华。后收入初版《脚印》。

物类篇（即《黄牛》、《白兔》、《仔狗》的合篇）

1939年4月2日作于金华。载初版《巨像》。

沉痾(又作为《巨像及其它》第二节)

1939年4月2日作于金华。载初版《婵娟》。

风尘

1939年5月25日作于金华。载《改进》半月刊,初收初版《两条路》。

1940年,37岁

事 略

四五月间,张天翼从桂林写信至金华找人相助,由邵荃麟推荐聂绀弩至桂林,编辑《力报》副刊《新垦地》,一直延续到1943年。其时邵慎之(高旅)亦在编辑部供职。编《新垦地》不久,针对沈从文“妇女回家”的倒退论调,发动了关于女权问题的大辩论,自己也著文参加,次年将双方论战文章结集为《女权论辩》一书出版,并亲为《题记》。与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等创办“野草社”,办刊物《野草》,7月与读者见面,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犀利泼辣的杂文。还在《现代文艺》、《中苏文化》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在鲁迅逝世四周年之际,著《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一文,大力弘扬鲁迅精神,对鲁迅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年底,请葛琴、彭燕郊作《新垦地》助编,介绍邵荃麟任《力报》主笔。

6月,短篇小说集《夜戏》,列为《现代文艺丛刊》之一,由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初版;短篇小说《风尘》,由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收入《改进文库》之四《风尘》一书。

著 译

白兔(又作为《物與篇》第二节)

1939年3月22日作于金华。载1940年1月9日《前线日报》第7版,署绀弩;又载1940年8月20日《野草》月刊创刊号,署绀弩。初收初版《婵娟》。

仔狗(又作为《物與篇》第三节,又为《致生者、悼死者、怀生死不明者》第二节)

1939年4月2日作于金华。载1940年1月30日《前线日报》第7版,署绀弩。初收初版《婵娟》。

夜戏

1939年11月22日作于金华。载1940年1月《七月》第5集第1期。初收初版《夜戏》。

弟弟

1939年12月23日作于金华。载1940年3月1日《东线文艺》创刊号,署聂绀弩。初收初版《夜戏》。

阳光的踪迹

载1940年5月《七月》第5集第3期,署绀弩。

莎士比亚应该后悔

载1940年5月12日桂林《力报·新垦地》。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飞机的用途及其它

载1940年5月14日桂林《力报·新垦地》。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兔与狐(又作为《飞机的用途及其它》第三节)

1940年5月14日作。载1940年5月16日桂林《力

报·新垦地》。

吃鳖的时候

载 1940 年 5 月 20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飞机的用途(又作为《飞机的用途及其它》第一节)

1940 年 5 月 19 日作。载 1940 年 5 月 21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向往(又作为《飞机的用途及其它》第二节)

1940 年 5 月 22 日作。载 1940 年 5 月 23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从汽车节约说到张恨水(又作为《汽油——艺术》第一节)

载 1940 年 5 月 25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从张恨水说到墨子(又作为《汽油——艺术》第二节)

载 1940 年 5 月 27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从墨子说到艺术什么的(又作为《汽油——艺术》第三节)

载 1940 年 5 月 28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汽油——艺术(即《从汽车节约说到张恨水》、《从张恨水说到墨子》和《从墨子说到艺术什么的》的合篇)

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飞机的用途》补遗

载 1940 年 5 月 29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关于幽默

1940 年 5 月 30 日作。载 1940 年 5 月 31 日桂林《力

报·新垦地》。

“莎士比亚后悔”以后

载 1940 年 6 月 1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记周佛海(即《记周佛海林柏生》之一部分)

载 1940 年 6 月 12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架桥者

1940 年 6 月 14 日作。载 1940 年 6 月 15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为一个诗人我拥护宪政

1940 年 6 月 15 日作。载 1940 年 6 月 17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雪的旷野

载 1940 年 7 月 13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关于异小民族的艺术

载 1940 年 7 月 16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幻象

载 1940 年 7 月 24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市场上

载 1940 年 8 月 1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火

载 1940 年 8 月 8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荣誉村

1940 年 8 月 8 日作。载 1940 年 8 月 9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没有脊椎的人

载 1940 年 8 月 19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关于欧阳予倩

载 1940 年 8 月 23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姐姐

1940 年 7 月 1 日改作于桂林。载 1940 年 8 月 25 日《现代文艺》月刊第 1 卷第 5 期，署聂绀弩。初收初版《姐姐》。

《国家至上》公演后，一个看客的独白

载 1940 年 8 月 27 日—30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美的追求者

载 1940 年 9 月 14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历史的奥秘

1940 年 9 月 9 日作于桂林。载 1940 年 9 月 20 日《野草》月刊第 1 卷第 2 期，署萧今度。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信念

载 1940 年 9 月 20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狼狈和主后

载 1940 年 9 月 21 日桂林《力报·新垦地》。

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

1940 年 10 月 8 日完于桂林。载 1940 年 10 月 15 日《中苏文化》半月刊第 7 卷第 9 期。初收初版《早醒记》。

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

1940年10月15日作。载1940年10月20日《野草》月刊第1卷第3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黄牛(又作为《物奥篇》第一节)

1939年3月18日作于金华。载1940年11月1日《自由中国》月刊第1卷第1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婵娟》。

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

1940年11月5日作于桂林。载1940年12月1日《野草》月刊第1卷第4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在汽车上

1940年5月12日作于桂林。载初版《婵娟》。

“确系处女小学亦可”

1940年9月18日作。载初版《蛇与塔》。

永远地,永远地……(即《〈婵娟〉题记》、《噩梦》)

1940年9月18日作于金华。载初版《巨像》。

飞机木刻号

1940年11月15日作。载初版《婵娟》。

胡风的水准

1940年12月1日作。载初版《早醒记》。

偶语

原载1940年《前线日报》，后作为《力报·新垦地》、《野草》补白重刊。

1941年,38岁

事 略

1月,皖南事变爆发,发表散文诗《绝叫》,抒发愤怒的心情。3月,养母申氏在京山老家病逝,因值战乱,未能奔丧。其时,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日严,2月间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被查封,不久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相继被迫停业,在《野草》上发表《韩康的药店》,回击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并为此殃及《力报》。不久,暂离《力报》,由张稚琴推荐作曾养甫秘书,随曾赴重庆,准备接替去香港的胡风续编《七月》。在重庆,承印由胡风编就的《七月》最后一期,后因返回桂林,以致《七月》延误半年未出刊,被吊销登记证。后接替被辞退的葛琴编《新垦地》和她创办的《半月文艺》,并请彭燕郊作助编;又支持彭燕郊主办《半月新诗》。

6月,杂文集《历史的奥秘》和《蛇与塔》,列入《野草丛书》,由桂林文献出版社初版。

著 译

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

1940年12月17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1月1日《野草》月刊第1卷第5期,署耳耶。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从陶潜说到蔡邕

1940年12月27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1月1日《野草》月刊第1卷第5期,署萧今度。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怎样做母亲

1940年12月6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1月1日《野草》月刊第1卷第5期，署绀弩；又载1941年11月《文综月刊》第2卷第3期，署绀弩。初收初版《蛇与塔》。

蛇与塔

1941年1月31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2月1日《野草》月刊第1卷第6期，署耳耶。初收初版《蛇与塔》。

《历史的奥秘》题记

1941年1月25日作。载1941年2月1日《野草》月刊第1卷第6期，署绀弩。初收《历史的奥秘》。

时间的启示

1941年2月2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4月1日《野草》月刊第2卷第1、2期合刊，署萧今度。初收初版《历史的奥秘》。

韩康的药店

1941年2月末作于桂林。载1941年4月1日《野草》月刊第2卷第1、2期合刊，署迈斯。初收初版《婵娟》。

范蠡与西施

1941年3月3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4月1日《野草》月刊第2卷第1、2期合刊，署绀弩。初收初版《婵娟》。

《蛇与塔》题记

1941年三八节作于桂林。载1941年4月1日《野草》月刊第2卷第1、2期合刊，署绀弩。初收初版《蛇与塔》。

装腔作势的男人

1941年3月13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4月1日《野草》月刊第2卷第1、2期合刊，署耳耶。初收初版《早醒记》。

《女权论辩》题记

1941年4月7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5月1日《野草》月刊第2卷第3期，署绀弩；又见《女权论辩》一书。

魔鬼的括弧

1941年8月26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10月15日《野草》月刊第3卷第2期，署耳耶。初收初版《早醒记》。

醜狗记

1941年9月24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10月15日《野草》月刊第3卷第2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婵娟》。

补白

载1941年10月15日《野草》月刊第3卷第2期，署萧今度。

第一把火

—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作

1941年10月某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10月15日

桂林《文化杂志》第1卷第3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天亮了》。

文学创作上的言语运用问题(座谈会记录)

载1941年《文化杂志》第1卷第5期，参加讨论者有绀弩，艾芜，何家槐，荃麟等。

“女神”的邂逅

—为郭沫若先生五十诞辰作

1941年10月10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11月15日《文艺生活》月刊第1卷第3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婵娟》。

给战死者

1941年10月19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12月15日《野草》月刊第3卷第3、4期合刊，署绀弩。初收初版《婵娟》。

东平琐记

1941年11月7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12月15日《野草》月刊第3卷第3、4期合刊，署萧今度。初收初版《婵娟》。

记一个叫做托尔斯山的青年

1941年11月8日夜作。载1941年12月15日《野草》月刊第3卷第3、4期合刊，署耳耶。初收初版《婵娟》。

拥护《忠王李秀成》

1941年2月15日作于桂林。载1941年12月15日《野草》月刊第3卷第3、4期合刊，署澹台灭阔。初收

初版《早醒记》。

梦读天书记

1941年11月22日夜作于桂林。载桂林《野草》月刊第3卷第3、4期合刊，署迈斯。初收初版《婵娟》。

天界(又作为《婵娟》第八节)

载1941年香港《时代文学》第1卷第3期，署绀弩。

妇女·家庭·政治

1941年1月28日作于桂林。载初版《蛇与塔》。

贤妻良母论

1941年2月6日作于桂林。载初版《蛇与塔》。

母性与女权

1941年2月11日作于桂林。载初版《蛇与塔》。

体貌篇

1941年2月14日作于桂林。载初版《蛇与塔》。

绝叫

1941年7月5日作于桂林。载初版《巨像》。

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图》

1941年8月7日作于桂林。载初版《二鸦杂文》。

壁画

1941年12月20日作于桂林。载初版《早醒记》。

1942年,39岁

事略

是年虚岁四十,桂林文友曾设宴祝寿。3月,与从香港脱险到达桂林的胡风会晤。夏,由于受到特务点名威胁,与彭燕

郊一起离开《力报》，一度失业，并复发疟疾，得组织及时照顾。后为远方书店编辑了两期《山水文学丛刊》；与胡风一起帮助骆宾基编辑了两期《文学报》；同时继续为《野草》写稿。

主编的《女权论辩》集由白虹书店出版；短篇小说集《邂逅》由桂林文献出版社再版；11月，杂文集《早醒记》由桂林远方书店初版；《历史的奥秘》由桂林文献出版社再版。

著 译

小雨点

1942年1月8日作于桂林。载1942年2月15日《野草》月刊第3卷第5期，署萧今度。初收初版《早醒记》。

废话

1942年2月2日作于桂林。载1942年3月15日《野草》月刊第3卷第6期，署萧今度。初收初版《婵娟》。

知父莫若女

一个美国绅士的侧影

1942年2月6日作于桂林。载1942年3月15日《野草》月刊第3卷第6期，署耳耶。初收初版《早醒记》。

回信

1942年2月10日作于桂林。载1942年5月15日《野草》月刊第4卷第1、2期合刊，署绀弩。初收初版《早醒记》。

关于《拥护忠王李秀成》

1942年4月8日作于桂林。载1942年5月15日《野草》月刊第4卷第1、2期合刊，署澹台灭闹。初收初版《早醒记》。

早醒记

1942年5月7日作于桂林。载1942年6月15日《野草》月刊第4卷第3期，署萧今度。初收初版《早醒记》。

给鼠辈

1942年5月6日作于桂林。载1942年6月15日《野草》月刊第4卷第3期，署绀弩。初收初版《早醒记》。

探春论

1941年7月6日作于桂林。载1942年9月1日《野草》月刊第4卷第4、5期合刊，署紫晴。初收初版《二鸦杂文》。

盐（由《金元爹》改作而成）

1942年8月8日改作。载1942年10月10日桂林《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署绀弩。初收初版《两条路》。

一秒钟写起的剧本

1942年11月4日作。载1942年12月1日《野草》月刊第5卷第1期，署绀弩。

山城的“五四”

1942年春节前若干日作于桂林。载初版《婵娟》。

兔先生的发言

1942年2月21日作于桂林。载初版《婵娟》。

巨像及其他(即《巨像》、《沉痾》和《月亮的故事》的合篇)

1942年5月作于桂林。载初版《巨像》。

残缺国(又题作《〈早醒记〉题记》)

1942年7月7日作于桂林。载初版《天亮了》。

《早醒记》题记(又题作《残缺国》)

1942年7月7日作于桂林。载初版《早醒记》。

彭燕郊的《第一次爱》

1942年7月30日作于桂林。载《文化杂志》，署绀

弩。初收初版《脚印》。

《婵娟》题记(即《噩梦》，又题作《永远地，永远地……》)

1942年“九一八”于桂林。载初版《婵娟》。

1943年，40岁

事 略

国民党当局对大后方进步民主力量的高压日趋严重，桂林空气紧张，因受到注意而一时难以找到工作和发表文章，遂潜心语言问题的研究，并写出论文《释舅姑》和《广“古有复辅音说”》。替文协桂林分会编辑《二十九人自选集》，于10月28日由桂林远方书店出版。

1月，散文、杂文集《婵娟》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初版。童话集《杜鹃花》由桂林文献出版社列入《文学创作丛刊》(总12种)之一，后未出版，内容不详。

著 译

释舅姑

1942年10月28日作于桂林。载1943年1月10日桂林《文化杂志》第3卷第3号，署绀弩。

广“古有复辅音说”

1942年12月21日作于桂林。载1943年7月《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期，署聂绀弩。

怀曹白

— 作为《呼吸》的读后感

1943年4月28日作于桂林。载初版《沉吟》。

道德一论（又分别题作《论道德》、《强者的道德》）

1943年8月3日作。载初版《二鸦杂文》。

1944年，41岁

事 略

得段梦暉之助，再次离开桂林去重庆，先住北碚周颖工作的慈幼院；约半年后，与邵荃麟、葛琴夫妇，彭燕郊，骆宾基同住文协“作家宿舍”。由冯雪峰介绍，挂名于“文化运动委员会”（张道藩主持，名义上由国民党领导，实在周恩来领导下，主要由非党的进步文化人组成）。6月，经友人介绍，入私立建川中学担任教职，并与同在那里的朱希筹办综合性文艺刊物《艺文志》。

3月，短篇小说《姐姐》由金重英译成英文，列为《英汉对照文艺丛书》之一，由桂林远方书店初版。

著 译

我若为王

载 1944 年 8 月重庆《微波》第 1 卷第 1 期；又载 1946 年 5 月 22 日重庆《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又载 1948 年 8 月 28 日香港《华商报·茶亭》，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辈份·寿命·体格

1944 年 4 月 4 日作。载初版《血书》。

1945 年，42 岁

事 略

1 月 15 日，《艺文志》创刊，冯雪峰等名作家供稿，后因引起审查机关注意，加上经费困难，仅出两辑后停刊。同时亦在邵荃麟编辑的《文艺杂志》和《文萃》上发表文章。五六月间，辞教职，主编《真报》副刊《桥》。该刊坚持揭露蒋管区的黑暗，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办报方针，受到周恩来的肯定。因抗战胜利，仅编了三四期即停刊。后为张稚琴办的刊物《客观》（储安平、吴世昌先后任主编）编《副页》。编至第八期，适逢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新民报》首次刊发了毛泽东所作《沁园春·雪》，轰动山城。《客观》发特刊全文转载毛词和柳亚子、郭沫若等的和词，作《毛词解》评赞注释，并作和词对易君左等的和词予以嘲讽。11 月，在《文萃》上发表反对内战的长诗《命令你们停战》，以不分敌我受到党内批评。

著 译

智人的心算

1944年作。载1945年1月15日重庆《艺文志》创刊号，署萧今度。初收初版《聂绀弩杂文集》。

明末遗恨

1944年作。载1945年1月15日《艺文志》创刊号，署耳耶。初收初版《聂绀弩杂文集》。

怀《柚子》

1944年作。载1945年1月15日《艺文志》创刊号，署绀弩；初收初版《沉吟》。

中国学者的厄运

载1945年1月15日《艺文志》创刊号，署迈斯。

无所谓怎样写杂文？

1944年3月27日作。载1945年2月青年生活社初版《怎样自我学习》，署聂绀弩。

放心，不会被唾沫淹死

1944年作。载1945年3月15日《艺文志》第2期，署盩蛭。初收初版《聂绀弩杂文集》。

诸夏有君论

1945年1月15日作于渝学田湾。载1945年3月15日《艺文志》第2期。初收初版《血书》。

伦理三见

1945年1月14日作于重庆。载1945年5月《文艺杂志》月刊新1卷第1期，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读《在酒楼上》的时候

1942年9月6日作于桂林。载1945年6月25日《文艺杂志》月刊新1卷第2期，署绀弩。初收初版

《沉吟》。

后悔

1945年7月26日作于渝通远门。载1945年8月15日《新华日报》，署绀弩。初收初版《沉吟》。

狗道主义举隅

1945年9月1日作于渝通远楼。载1945年10月16日《文萃》第2期，署聂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乞师

载1945年10月22日《新华日报》，署绀弩；又见1946年1月1日《文艺生活》月刊光复版第1期，署绀弩。

毛遂

1945年9月18日作于重庆。载1945年10月30日《文萃》第4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天亮了》。

您该回去了！

1945年11月1日作。载1945年11月10日重庆《客观》第2期，署绀弩。

命令你们停战（诗）

载1945年11月13日《文萃》第6期，署绀弩。

从《封神演义》扯到佛朗哥

1945年11月25日作。载1945年12月1日重庆《客观》第4期，署绀弩；又载1946年1月1日《文萃》第13期，署绀弩。

感谢与寄慰

1945年11月25日作。载1945年12月1日重庆

《客观》第4期，署绀弩。

给亚美利加的人民

1945年国父诞辰日于渝伤风楼作。载1945年11月上海《民主》第7期，署绀弩。

用不着警惕

1945年12月2日作。载1945年12月8日重庆《客观》第5期，署绀弩。

毛词解

1945年12月25日作。载1945年12月29日重庆《客观》第8期，署绀弩。

颂中国古代的选举

1945年6月6日作于重庆。载初版《血书》。

※陶行知访问记(据回忆录，篇名不详)

载1945年重庆《真报周刊·桥》。

※黄炎培访问记(据回忆录，篇名不详)

载1945年重庆《真报周刊·桥》。

1946年，43岁

事 略

2月，与郭沫若等312人联名发表关于《对时局进言》的签名运动。3月，进陈国良主办的《商务日报》，任副刊《茶座》编辑；后因在报上抗议逮捕周颖（时为全国劳协负责人之一）而招忌，于10月将《茶座》交给张白山接编。不久，应陈铭德、邓季惺之邀，为重庆《新民报》编副刊《呼吸》。10月19日，以《呼吸》全版编《鲁迅先生十周年祭特刊》。至1947年3月21日

止,在《呼吸》上先后发表富有战斗性和文艺性的杂文达五十多篇,触怒了当局,以致编辑部被警备司令部派人占领,要报馆道歉一个月,并立即撵走编辑。4月,周颖进入劳协的重庆工人福利社,8月被捕,出狱后被迫出走香港。

1月,《姐姐》由远方书店在上海再版。

著 译

帽子

1946年元旦作。载1946年1月5日重庆《客观》第9期,署名耳耶。

韩青天

1945年圣诞节作。载1946年1月5日重庆《客观》第9期,署绀弩。

伤风楼自语

1946年作。载重庆1946年《客观》,署绀弩。

论发脾气

1946年1月8日作于伤风楼。载1946年1月12日重庆《客观》第10期,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谈辈份(又作为《辈份·寿命·体格》第一节)

1946年1月12日作。载1946年1月19日重庆《客观》第11期,署绀弩;又载1946年12月11日《新民报·呼吸》,署绀弩;又载1947年7月5日《野草》新第4号,署迈斯。初收初版《血书》。

黄帝的子孙

载1946年1月19日重庆《客观》第11期,署名耳耶。

在西安

1946年1月20日作于重庆。载1946年1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署聂绀弩。初收初版《沉吟》。

萧红一忆

载1946年1月26日重庆《客观》第12期，署绀弩。

上会（又作为《儿时》第二节）

1946年1月25日作。载1946年2月9日重庆《客观》第13期，署绀弩。初收初版《脚印》。

欣闻秦似未死

载1946年3月1日《文艺生活》月刊光复版第3期，署绀弩。

“六鹞退飞”

1946年2月25日作。载1946年3月2日重庆《客观》第15期，署绀弩。

天亮了

1945年11月28日作于渝三十六计楼。载1946年3月2日重庆《客观》第15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天亮了》。

开笔

载1946年3月9日重庆《客观》第16期，署绀弩。

德谟克拉西如是说

1946年2月22日作。载1946年3月11日—12日重庆《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

阔人礼赞

1945年10月10日作于渝三十六计楼。载1946年3月16日重庆《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初收初版

《血书》。

民主的消息(又作为《我愿》的一部分)

载 1946 年 4 月 20 日重庆《客观》，署绀弩。

奇异的人力车

载 1946 年 4 月 22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

《红楼梦》人物列赞

载 1946 年 4 月 23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

《妻》

载 1936 年 4 月 27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

一种对女性的看法

载 1946 年 5 月 4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

茶话(五则)

分别载于 1946 年 5 月 10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1946 年 5 月 14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1946 年 5 月 15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今度。

论“奇天大老爷”

1946 年 1 月 7 日作于重庆。载 1946 年 5 月 15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又载 1946 年 10 月 1 日《野草》复刊号。初收初版《血书》。

论“民主低能说”

1946 年 5 月 26 日作。载 1946 年 5 月 28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

北邙(又题作《鬼谷子》)

载 1946 年 6 月 2 日—4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

月与影

载 1946 年 6 月 3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萧今度。

我愿

1946 年 6 月 14 日作。载 1946 年 6 月 17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

两狼山

载 1946 年 6 月 22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

论反民主

1946 年 5 月 17 日作于嘉陵江边。载 1946 年 6 月 27 日《文萃》第 36 期，署绀弩。

谈《简·爱》

1946 年 6 月 14 日作。载 1946 年 7 月 15 日《萌芽》月刊第 1 卷第 1 期，署绀弩。初收初版《二鸦杂文》。

石头坟

载 1946 年 7 月 18 日《新湖北日报·长江》，署耳耶；又载 1946 年 10 月 26 日《新民报·新民副刊》，署绀弩；1946 年 10 月 31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致生者、悼死者、怀生死不明者

载 1946 年 7 月 28 日—30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

友谊

载 1946 年 8 月 7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

季氏将伐颛臾

1946 年 7 月 20 日作。载 1946 年 8 月 8 日《商务日

报·茶座》，署绀弩；又载1946年10月1日《野草》复刊号。初收初版《天亮了》。

上山

载1946年8月15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2期，署绀弩。初收初版《巨像》。

人的弱(补白)

载1946年8月27日《商务日报·茶座》，署今度。

“丧心病狂！”

载1946年9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第4版。

梦

1942年8月10日作。载1946年10月10日—1946年10月22日载《新民报·新民副刊》，署绀弩。初收《天亮了》。

让我们呼吸吧

载1946年10月16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给夜莺俩

1946年10月15日作。载1946年10月17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论童匪(又题作《童匪猖獗》，又作为《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第一节)

1946年10月16日作。载1946年10月18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鲁迅正传》

载1946年10月19日重庆《新民报·呼吸》(鲁迅先生纪念特刊)，署绀弩。

孔聂短筒

载 1946 年 10 月 21 日《新民报·新民副刊》，署绀弩。

给臭虫(诗)

1946 年 10 月作于重庆。载 1946 年 10 月 22 日《新民报·新民副刊》，署绀弩。初收初版《元旦》。

论女儿国(又作为《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第二节)

1946 年 10 月 21 日作。载 1946 年 10 月 22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又载 1947 年 1 月 1 日《野草》新 3 号，署绀弩。

论刺客

载 1946 年 10 月 23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强者的道德(又题作《论道德》、《道德一论》)

载 1946 年 10 月 23 日《新民报·新民副刊》，署绀弩。

熊猫骨

载 1946 年 10 月 24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论道德(又题作《道德一论》、《强者的道德》)

载 1946 年 10 月 27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女子教育一文献

1946 年 10 月 26 日作。载 1946 年 10 月 28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初收初版《二鸦杂文》。

论莲花化身

1942 年 10 月 20 日作于重庆。载 1946 年 10 月 29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星夜(又题作《往星中》)

载 1946 年 10 月 29 日《新民报·新民副刊》，署绀弩；

又载 1946 年 11 月 5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
绀弩。

人物描写的一苦恼

载 1946 年 10 月 30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论拍马（又作为《人与非人》的第一节，又题作《人怎样变成
非人》）

1946 年 11 月 2 日作于重庆。载 1946 年 11 月 4 日
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给裸体的人们（又作为《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第
三节）

1946 年 11 月 4 日作。载 1946 年 11 月某日（星期
一）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又载 1946 年 11
月 14 日《新民报·新民副刊》，署绀弩；又载 1947 年
7 月 5 日《野草》新 4 号，署萧今度。

论申公豹

1945 年 5 月 1 日作于重庆。载 1946 年 11 月 6 日重
庆《新民报·呼吸》；又载 1948 年 7 月 19 日香港《华
商报·热风》，署绀弩。初收初版《二鸦杂文》。

西饼论

1946 年 1 月 15 日作。载 1946 年 11 月 7 日重庆《新
民报·呼吸》。初收初版《二鸦杂文》。

乐观（又作为《友谊》的一部分）

载 1946 年 11 月 9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官

载 1946 年 11 月 11 日《新民报·新民副刊》，署绀弩。

论乌鸦

1946年11月作。载1946年11月12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又载1947年1月1日《野草》新第3号，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偶感（又作为《友谊》的一部分）

载1946年11月13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又载1946年11月24日《新民报·新民副刊》，署绀弩。

论国是（又分别题作《论时局》、《山径》）

1946年11月作于国共和谈破裂声中。载1946年11月15日重庆《新民报·呼吸》；又载1946年11月20日《新民报·新民副刊》，署绀弩。

论肥胖

载1946年11月16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又载1947年7月5日《野草》新4号，署绀弩。

往星中（又题作《星夜》）

1946年10月作于重庆。载1946年11月20日《野草》新2号，署绀弩。

再论乌鸦（又作为《论乌鸦·下》）

1946年11月18日作。载1946年11月20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毛泽东先生和鱼肝油丸

1945年9月3日作于渝通远楼。载1946年11月20日《野草》新2号，署绀弩。

哪吒

1945年10月20日作。载1946年11月20日《野草》新2号,署绀弩。

古时候的公务员

1946年9月30日作。载1946年11月20日《野草》新第2号,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人怎样变成末人?

载1946年11月22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女性的名字

载1946年11月23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更夫

1946年11月23日改抄旧作。载1946年11月25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初收初版《巨像》。

对目前语文运动的意见

——答上海语文周刊社问

1946年8月16日作。载1946年11月26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骆驼(诗)

1946年3月29日作于重庆。载1946年11月27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初收初版《元旦》。

奇遇

1946年11月28日作于重庆。载1946年12月1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又载1947年9月《文汇丛刊》第3辑,署绀弩。初收初版《天亮了》。

末人一恣(又作为《官》中的一部分)

载1946年12月5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乡愚

载 1946 年 12 月 11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林冲杨志合论

1946 年 11 月 2 日作于重庆。载 1946 年 12 月 13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又载 1948 年香港《野草文丛》第 9 期，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论关羽

载 1946 年 12 月 14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西班牙人有福了

载 1946 年 12 月 15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乡愚”一解

1946 年 12 月 19 日作。载 1946 年 12 月 21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争具文不迂

载 1946 年 12 月 23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向伟大的行列致敬”(诗)

——题借某报论题为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而作

1946 年 3 月 15 日作于重庆。初收初版《元旦》。

克利史马史

1946 年作。载 1946 年 12 月 25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初收初版《沉吟》。

乡下人的风趣

1946 年 7 月 7 日作。载初版《血书》。

山径(又题作《论国是》、《论时局》)

作于 1946 年国共和谈破裂声中。载初版《巨像》。

记周颖

1946年8月20日晨作。初收初版《沉吟》。

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即《论童匪》、《论女儿国》和《给裸体的人们》的合篇)

1946年12月1日作于重庆。载初版《血书》。

1947年,44岁

事 略

上年12月24日“沈崇事件”发生后,立即投入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运动,对沈崇的不幸受辱表示极大同情,对歧视沈崇者严加谴责。1月2日,与重庆文化界人士何其芳、艾芜、孟超、力扬等一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呼吁抵制美货、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废除不平等的《中美商约》;1月6日,参加重庆市大中学生一万多人的示威游行,被国民党反动报纸《新华时报》公开点名为“共匪”。3月7日和9日,中共代表团被迫分批撤离重庆,《新华日报》被封,18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3月,《呼吸》因刊登一篇揭露国民党兵扰民害民的杂文《无题》,招致国民党兵痞围攻报社闹事,乃被迫离开《新民报》;《呼吸》亦于3月21日出最后一期后停刊。四五月间,与孟超一起就任西南学院专职教授,讲授《中国通史》;第二学期,赶上闹学潮,又告失业;并被列入“六一”大逮捕黑名单,因未在学院宿舍而幸免于难。自此处境日益困难,遂于九十月间离开重庆,后经万县到武汉。此间,回故乡一次,了解养母病逝情况,并卖掉部分房产。武汉形势紧张后转长沙暂避,不久即转赴广州,与南方党组织领导人方方取得联系。此时,周颖特从香港抵穗,

接其赴港。

《历史的奥秘》由桂林文献出版社三版。

著 译

论时局(又题作《论国是》、《山径》)

载 1947 年 1 月 1 日《野草》新 3 号,署绀弩。

童匪猖獗(又题作《论童匪》,作为《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第一节)

载 1947 年 1 月 1 日《野草》新 3 号,署迈斯。

女儿国(又作为《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第二节)

载 1947 年 1 月 1 日《野草》新 3 号,署绀弩。

误人父兄

1945 年 10 月 25 日作于重庆。载 1947 年 1 月 1 日《野草》新 3 号,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不刊稿示例

1947 年 2 月 16 日作。载 1947 年 2 月 16 日《新民报·呼吸》,署“编者”。

技艺之繁

载 1947 年 3 月 3 日《商务日报·茶座》,署绀弩。

文娼

载 1947 年 3 月 8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绀弩。

论通天教主

1945 年 4 月 30 日作于重庆。载 1947 年 3 月 9 日重庆《新民报·呼吸》,署聂绀弩;又载 1948 年 7 月 27 日香港《华商报·热风》,署绀弩。初收初版《二鸦杂文》。

德充符(又题作《一个残废人和他的梦》)

——演庄子义赠所亚

1947年4月2日作于重庆。载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天亮了》。

鬼谷子(又题作《北邙》)

1946年3月8日作于重庆。载1947年3月13日—19日重庆《新民报·呼吸》；又载1947年7月5日《野草》新第4号，署绀弩。初收初版《天亮了》。

沈崇的婚姻问题

1947年2月21日作。载初版《二鸦杂文》。

从《击壤歌》扯到《封神演义》

1947年5月6日作于重庆。载初版《血书》。

西班牙改为君主国(诗)

1947年5月22日作于重庆。载初版《元旦》。

再论申公豹

1947年7月8日作于香港。载初版《二鸦杂文》。

萤(诗)

1947年7月20日作于南温泉。载初版《元旦》。

※ 歌词

载1947年重庆《新民报·呼吸》，日期不详。

1948年，45岁

事 略

抵港后，作为家属住在周颖的工作地点——中国劳协（九龙梭亚道15号）的一个小楼梯间。正式恢复了组织关系后，与

以群(党小组长)、张天翼、沈力群、孟超、楼适夷等在同一党小组参加活动。在香港集中学习了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如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文选(两卷集)》等)。与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一起编辑《野草文丛》，并担任编委。在《小说》(编委会以茅盾为首)上发表小说作品；同时为秦似主编的《野草》和《华商报》副刊撰写杂文。7月，《血书——读土改文件》脱稿，这是一篇讴歌全国农村土改的长篇报告文学力作。此间，还为香港新创刊的《文汇报》撰写社论，应罗孚之邀，为《大公报》连续撰稿。

9月，杂文集《关于知识分子》，列为《文学者丛书》之一，由上海潮锋社重排初版；10月，散文集《沉吟》，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初版。

著 译

春日(由《致生者、悼死者、怀生死不明者》部分章节组合而成)

载1948年2月14日香港《野草文丛》第8集，署绀弩。

论白俄(又题作《论白华》)

1948年4月20日作于香港。载1948年4月10日香港《野草文丛》第9集，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自由主义的斤两

1948年3月15日作于香港。载1948年4月10日香港《野草文丛》第9集，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诗人节怀杜甫

1948年诗人节前五日作于九龙。载1948年6月20

日香港《野草文丛》第10集，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强与弱

载1948年6月20日香港《野草文丛》第10集，署迈斯。

隔篱呼取尽余杯

载1948年6月20日香港《野草文丛》第10集，署迈斯。

论娼妓

载1948年6月20日香港《野草文丛》第10集，署耳耶。初收初版《二鸦杂文》。

论怕老婆

1948年4月29日作于九龙。载1948年6月20日香港《野草文丛》第10集，署绀弩。初收初版《二鸦杂文》。

有奶就是娘与干妈妈主义

1948年4月15日作。载1948年7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3辑，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血书

——读土改文件

1948年7月23日作于香港。载1948年8月20日香港《野草文丛》第11集，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记康泽

1948年7月31日作于香港。载1948年8月20日香港《野草文丛》第11集，署绀弩。

上岸(又题作《在新加坡上岸》)

1948年8月13日作于九龙。载1948年9月1日香港《小说》月刊第1卷第3期,署绀弩。初收初版《脚印》。

天门

——中秋节写给我的女儿

载1948年9月18日香港《华商报·茶座》,署绀弩。

论武大郎

1948年9月29日作于香港。载1948年9月30日、10月1日、10月2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二鸦杂文》。

天壤

1948年11月27日作于香港。载1948年12月1日香港《小说》月刊第1卷第6期,署绀弩。初收初版《两条路》。

独夫之最后

1948年10月14日作于香港。载1948年香港《野草新集·论肚子》,署绀弩。初收初版《天亮了》。

打倒爸爸

1948年12月20日作于香港。载1948年香港《野草新集·论肚子》,署耳耶。初收初版《血书》。

过海记

1948年7月20日作于香港。载初版《巨像》。

1949年,46岁

事 略

春,与夏衍、邵荃麟同任《周末报》(冯英子主办)编委,并协助集资和撰文。6月,赴北京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17日大会闭幕后,赴东北新解放区参观访问。9月,发表长诗《山呼》,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并与家人团聚。后应林路邀请去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在汉期间,参加纪念鲁迅的活动,并发表讲话。年底,受中南局统战部张执一指示,再返香港开展统战和策反工作。

2月,散文、杂文集《天亮了》,列为《人间文丛》之一,由香港人间书屋初版。7月,短篇小说集《两条路》,列为《群益文艺丛刊》之一,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初版;7月,新诗诗集《元旦》,由香港求实出版社初版。8月,杂文集《二鸦杂文》,列为《求实文艺丛刊》,由香港求实出版社初版;8月,杂文集《血书》,列为《群益文艺丛刊》,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初版;8月,杂文集《巨像》,列为《红星文艺丛书》(萧金主编)第一辑第二卷,由上海学习出版社出版。12月,剧本《小鬼凤儿》,由上海新群出版社初版。

著 译

论元旦(诗)

·为一九四九年元旦作

1948年除夕前二日作于香港。载初版《元旦》。

《巨像》序

1949年元旦作于香港。载初版《巨像》。

追悼

载 1949 年香港《野草新集·追悼》，署绀弩。

由萧军想起的

1949 年 1 月 20 日作。载 1949 年 1 月 23 日香港《华商报·笔谈》，署绀弩。初收初版《二鸦杂文》。

《天亮了》初版序

1949 年 1 月 28 日（四十六岁生日）作于香港。载 1949 年 1 月 31 日香港《华商报·笔谈》，署绀弩。初收初版《天亮了》。

人与非人

1949 年 2 月 3 日作。载 1949 年 2 月 7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音乐牛谈

1949 年 2 月 11 日作。载 1949 年 2 月 14 日香港《大公报》，署绀弩。

一九四九年如是说

载 1949 年 2 月 15 日香港《华商报·笔谈》，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论行李

载 1949 年 1 月 16 日香港《华商报·笔谈》，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三人坐

载 1949 年 2 月 21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礼貌篇

1949 年 2 月 27 日作。载 1949 年 2 月 28 日香港《大

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血书》。

迎骆宾基

1949年儿童节作于香港。载1949年4月7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二鸦杂文》。

一九四九年在中国(诗)

载1949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6辑《新形势与文艺》，署绀弩。初收初版《元旦》。

山呼(诗)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歌

由《论元旦——为一九四九年元旦作》和《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两篇改作而成。初收《聂绀弩诗全编·山呼》。

小鬼凤儿

1949年6月13日作。1949年12月由上海新群出版社以单行本行世。

《小鬼凤儿》序

1949年6月14日作于香港。载上海新群出版社初版《小鬼凤儿》。

论“亲读”

1949年2月17日作于香港。载初版《血书》。

《血书》序

1949年三八节作于香港。载初版《血书》。

《元旦》题记

1949年3月29日作于香港。载初版《元旦》。

鱼水篇

1949年4月1日作。载初版《二鸦杂文》。

一九四九,四,二一,夜

1949年4月22日作于香港。载1949年香港《大公报》(日期未详),署绀弩。初收初版《二鸦杂文》。

渡江渡江渡江!(诗)

1949年4月22日作于香港。载《聂绀弩诗全编·山呼》。

《二鸦杂文》序

1949年5月10日作于香港。载初版《二鸦杂文》。

×公桥牌

载初版《血书》。

1950年,47岁

事略

离港后的半年间,香港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民主进步人士大量北上,而反动文化人在港汇集,遂以杂文为武器,在《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开辟《二鸦日谈》专栏,批判各种怪现象、怪理论,宣传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在旧关系中开展统战工作。七八月间,以总主笔名义人香港《文汇报》,初去的任务是疏通各方面的关系,团结同仁,实现改版计划,使版面更适合香港的一般读者。邀请桂林时的同事高旅入《文汇报》为主笔。此间,正值朝鲜战争爆发,遂连续发表新闻短评《编者的话》和一些杂文,严厉谴责美国侵略者的罪行,受到读者欢迎,部分文章后编为《寸磔纸老虎》。

3月,剧本《小鬼凤儿》,由上海新群出版社再版;8月,散

文、杂文集《天亮了》，由香港求实出版社再版；10月，杂文集《海外奇谈》，由香港求实出版社初版。

著 译

我们过的还是旧年

载1950年1月1日香港《大公报》，署绀弩。

三嫂子

1949年“耶诞后一日作”。载1950年香港《文汇报》元旦增刊，署绀弩。

嫖客与鴉母

1950年1月10日作。载1950年1月12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海外奇谈》。

战斗与悲悯

1950年1月24日作于九龙。载1950年1月25日香港《文汇报》，署绀弩。初收初版《海外奇谈》。

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

1950年1月26日作。载1950年1月29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海外奇谈》。

从桃色太子看旧中国

1950年2月1日作于九龙。载1950年2月4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海外奇谈》。

晤对李凤莲

——《从一个女人看两个世界》的楔子

载1950年2月11日、12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乌金记(又作为《儿时》第一节的一部分)

载 1950 年 2 月 25 日、26 日、27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脚印》。

论李逵

1950 年 3 月 5 日作。载 1950 年 3 月 6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径赛

载 1950 年 3 月 7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字的省籍

1950 年 3 月 5 日作。载 1950 年 3 月 9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拥护爱人

1950 年 3 月 8 日作。载 1950 年 3 月 10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光头本纪》

载 1950 年 3 月 11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中国奴隶制度(又分别作为《“中国奴隶制度”及其它》和《由“中国奴隶制度”想起的》的一部分)

1950 年 3 月 10 日作。载 1950 年 3 月 12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论“南无阿弥陀佛”

载 1950 年 3 月 14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关于《光头本纪》

1950年3月12日作。载1950年3月15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两个比蒂葛拉宝

1950年3月14日作。载1950年3月16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怀韶

载1950年3月17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气死影评家

1950年3月15日作。载1950年3月18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论霸王别姬

1950年3月16日作。载1950年3月19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而今篇

1950年3月17日作。载1950年3月20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我是有学问的人

载1950年3月22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北京旅行见闻》先序

1950年3月20日作。载1950年3月23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关于广告

载1950年3月24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

绀弩。

论我自己

载 1950 年 3 月 25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过海度周末

载 1950 年 3 月 26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论第一百零九条好汉

载 1950 年 3 月 27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社论三部曲

载 1950 年 3 月 28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徒托空言”的时代过去了（又作为《由一篇“社论”引起的》第一节）

1950 年 3 月 26 日作。载 1950 年 3 月 29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拿证据来！（又作为《由一篇“社论”引起的》第二节）

载 1950 年 3 月 30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论开馆子

载 1950 年 3 月广东《文艺生活》穗新版第 2 号，署绀弩。

先赏“反攻必胜论”两记耳光

载 1950 年 4 月 1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论黄色文化

1950年1月15日作于香港。载1950年4月1日香港《文汇报》。收1986年2月北京三联重排版《蛇与塔》。

“大陆数亿同胞所共切望！”

载1950年4月2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是之谓“至仁”

载1950年4月3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初收《海外奇谈》。

仁与苛（又作为《由一篇“社论”引起的》第五节）

载1950年4月4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人民相率而迁移”（又作为《由一篇“社论”引起的》第三节）

载1950年4月5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论“中国之大患”

1950年4月16日作于九龙。载1950年4月6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海外奇谈》。

技痒篇（又作为《语文七札》第六节）

1950年4月7日作。载1950年4月8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中国奴隶制度”及其他（即《中国奴隶制度》《由“中国奴隶制度”想起的》合篇）

1950年4月11日作。载1950年4月10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海外奇谈》。

《大树王子》

1950年4月10日作。载1950年4月12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羊和妓女和“相率而迁移”的人民（又作为《由一篇“社论”引起的》第四节）

载1950年4月13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骂人者和他所吸的香烟牌子

载1950年4月14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在岗位上》外序

载1950年4月15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论万里长城

1950年4月15—19日作于香港。载1950年4月16日—20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海外奇谈》。

论“诗曰……”

1950年4月4日作于九龙。载1950年4月21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海外奇谈》。

由一篇“社论”引起的（即《“徒托空言”的时代过去了》、《拿证据来！》、《“人民相率而迁移”》、《羊和妓女和“相率而迁移”的人民》的合篇）

1950年3月24日作于九龙。载1950年4月21日

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海外奇谈》。

反动派谈言微中

载 1950 年 4 月 23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反动到底的“底”到底伊于胡底？

1950 年 5 月 5 日作于九龙。载 1950 年 4 月 24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海外奇谈》。

江浙为赌及赌具发祥地说及其他（又作为《语文七札》第二节）

载 1950 年 4 月 25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论猴把戏

载 1950 年 4 月 26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论钱穆的“借箸一筹”

1950 年 4 月 28 日作。载 1950 年 4 月 29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海外奇谈》。

一种把戏

载 1950 年 5 月 3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论中国人的喉咙似乎特别容易发痒

载 1950 年 5 月 5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傅斯年与阶级斗争

1950 年 5 月 7 日作于九龙。载 1950 年 5 月 7 日、8

日、9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初版《海外奇谈》。

由“中国奴隶制度”想起的（即《“中国奴隶制度”及其他》的一部分）

载1950年5月11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纱巾

载1950年5月13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蒋经国的孝道

载1950年5月14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喉咙发痒的阶级性

载1950年5月16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天亮了》再版序

1950年5月15日作于香港。载1950年5月18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初收再版《天亮了》。

《一个下贱女人》里的几个方言字（又作为《语文七札》第五节）

载1950年5月19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关于笑

载1950年5月21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

绀弩。

谈“你当”

载 1950 年 5 月 28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蒋介石与气节

载 1950 年 5 月 30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姓

载 1950 年 5 月 31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奥本浩先生的花园

1950 年 3 月 18 日作于九龙。载 1950 年 5 月广东《文艺生活》穗新版第 4 号，署绀弩。初收初版《海外奇谈》。

又关于笑

载 1950 年 6 月 2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论关羽

载 1950 年 6 月 5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语文札记

载 1950 年 6 月 7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关于颁布婚姻法和封闭妓院枪毙万恶领家的一些冗谈

1950 年 6 月 14 日作。载 1950 年 6 月 16 日、17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谈“喝饭”（又作为《语文七札》第七节）

1950 年 6 月 17 日作。载 1950 年 6 月 19 日香港《大

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几个用语的来源（又作为《语文七札》第三节《闻人和名流及其他》）

载 1950 年 6 月 22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手和脑和创作

1950 年 6 月 23 日作。载 1950 年 6 月 27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论悲哀将不可想象

1950 年 7 月 3 日作于九龙。载 1950 年 7 月 6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署绀弩。

失眠的猫头鹰（诗）

1950 年 6 月 20 日作。载 1950 年 7 月 8 日香港《周末报》，署绀弩。

把王老二的年朝两头过

1950 年 7 月 22 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秧歌颂（诗）

载 1950 年 7 月 23 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署绀弩。

“少女国”

1950 年 8 月 4 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笑话·漫画·照片

1950 年 8 月 7 日、8 月 18 日、11 月 1 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我们要和平！”

1950年8月12日、10月16日、1951年1月11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再次释放纳粹战犯

1950年8月19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1950年8月23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何谓侵略？

1950年8月27日、9月6日、1951年1月11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自由与人权

1950年9月17日、10月21日、10月22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血

1950年9月21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敲敲艾奇逊的门

1950年9月23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天安门

载1950年10月1日香港《文汇报·特刊》，署绀弩。

侵朝一动机

1950年10月13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白蛇传》三人物

载1950年10月23日香港《周末报·今日随笔》，署
绀弩。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11月5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其言多甘，其心必苦

1950年11月9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何处是天堂

载1950年11月11日香港《周末报·今日随笔》，署
绀弩。

洋大人和中国农妇合影

1950年11月17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关于雷峰塔

载1950年11月25日香港《周末报·今日随笔》，署
绀弩。

《浮士德与魔鬼》

1950年11月26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中国人民不反美”

1950年11月29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侵略”

1950年11月30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华尔街的失策

1950年12月1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美帝的“最后”来何速也

1950年12月2日、12月5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鲁智深断片

载1950年12月2日香港《周末报·今日随笔》，署
绀弩。

麦克阿瑟晚景凄凉

1950年12月3日、12月12日、1951年1月18日香
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
老虎》。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1950年12月6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一种抗议书

1950年12月3日作。载1950年12月9日香港《周
末报·今日随笔》，署绀弩。

“姑息”

1950年12月10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仇恨

1950年12月14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两种武装

1950年12月15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宣布紧急

1950年12月16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感讪

1950年12月11日作。载1950年12月16日香港
《周末报·今日随笔》，署绀弩。

杜鲁门说

1950年12月17日、1951年1月10日、1月11日、1
月28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
《寸磔纸老虎》。

论狗娘养的

1950年作于香港。1950年12月20日香港《文汇
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无知的十五岁的孩子”

1950年作于香港。1950年12月22日香港《文汇
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嘘！

载1950年12月30日香港《周末报·今日随笔》，署
绀弩。

香港打波地之夜

1950年作于香港。初收初版《脚印》。

茫然

1950年6月6日作于九龙。载初版《海外奇谈》。

睦邻篇

载初版《寸磔纸老虎》。

关于伍修权将军

1950年作。载初版《寸磔纸老虎》。

1951年,48岁

事 略

3月,离香港返回内地,先到武汉参加中南文教会议,并列席中南军政委员会会议。回北京后,应冯雪峰之邀,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二编室)主任。此间,香港《文汇报》曾一再挽留,但终未再回香港。同年,被选为中国文艺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同时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整理注释《瞿秋白文集》的同时,着手筹划整理注释《水浒》等古典文学名著。

3月,杂文集《寸磔纸老虎》,由香港求实出版社初版。

著 译

世界主要语言中没有中国语言

1950年作于香港。1951年1月3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论如丧考妣

1951年1月5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傅斯年死了

载1951年1月6日香港《周末报·今日随笔》，署绀弩。

斥艾森豪威尔

1951年1月14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科学与政治制度

1951年1月18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朕即联合国

1951年1月19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怎样“对付”联合国？

1951年1月20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一天的消息

1951年1月21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美帝与台湾

1951年1月23日香港《文汇报》一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尼赫鲁、狄托、亚阿十二国等

1951年1月24日香港《文汇报》·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毛柳沁园春

载1951年1月27日香港《周末报·今日随笔》，署
绀弩。

试验原子弹

1951年1月29日香港《文汇报》·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殖民主义终结

1951年1月31日香港《文汇报》·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两个阵营，两种声音

1951年2月18日香港《文汇报》·版《编者的话》。

初收初版《寸磔纸老虎》。

春天不是用兵天

载1951年3月1日香港《文汇报》副页，署绀弩。

论虚无主义（又作为《天地鬼神及其它》第一节）

1951年3月1日作。载1951年3月3日香港《文汇
报》副页，署绀弩。

死生亦大矣

1951年3月3日作。载1951年3月5日香港《文汇
报》副页，署绀弩。

为辛赐卿而写

载 1951 年 3 月 15 日香港《文汇报》副页，署绀弩。

论“素患难行乎患难”（又作为《天地鬼神及其它》第二节）

载 1951 年 3 月 23 日香港《文汇报》副页，署绀弩。

天地鬼神及其它（即《论虚无主义》、《论“素患难行乎患难”》和《论天地鬼神》的合篇）

1951 年 3 月 24 日作于香港。

1952 年，49 岁

事 略

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文学出版工作，与《人民日报》记者徐放一起到苏北兴化等地调查《水浒》作者施耐庵的材料，并赴南京、扬州等地重游。2 月，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整党开展后，即开始检查思想，并写出万余字检查材料。

1953 年，50 岁

事 略

主持并组织编辑室张友鸾、顾学颉、舒芜等专家，先后重新整理校订和注释《水浒》、《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重新校订和注释的《水浒传》（七十一回本），年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版本《水浒传》的出版，是建国后整理古典文学遗产的开创性尝试，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出版时，《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短评表示祝贺。开始撰写《水浒》论文；并应邀在北京图书馆主讲《〈水浒〉是怎样一部小说？》的学术报告，该报告

中引用的有关资料后由北京图书馆汇编成《〈水浒传〉及其参考资料》。6月，参加屈原逝世2230周年纪念大会。9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

著 译

《水浒》是怎样写成的(又作为《〈水浒〉五论》第一节)

载1953年6月《人民文学》第6期，署聂绀弩。初收初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水浒》的影响(又作为《〈水浒〉五论》第三节)

载1953年7月《文艺月报》第7期，署绀弩。初收初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1954年,51岁

事 略

应邀担任《光明日报》社编委。在报刊上陆续发表研究《水浒》的论文，影响很大，先后被邀请赴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扬州等地许多学校和单位作关于《水浒》的报告达五十多场次。结合工作收集旧小说约三百种，加上短篇近千种，写出札记上百条；抄了一百几十篇序跋和几十种短篇的目录，准备编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后未能实现。7月，胡风向中央提出《关于解放以后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在此前后，开始被审查与胡风等人的关系，但与胡风两家之间仍保持正常交往。不久，开展对“《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论”的批判。开始深入研究《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并陆续发表论文。

著 译

论宋江三十六人名单的形成

——《水浒故事的发展》的一节

载 1954 年 4 月 26 日《光明日报》，署聂绀弩。

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又作为《〈水浒〉五论》第二节）

载 1954 年 5 月《人民文学》第 5 期，署聂绀弩。初收初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关于《水浒》的人物和故事

载 1954 年 6 月 5 日天津《大公报》，署聂绀弩。

《水浒》的繁本和简本（又作为《〈水浒〉五论》第五节）

载 1954 年 7 月 5 日《光明日报》。初收初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论钗黛合一论的思想根源

载 1954 年《文艺报》第 21 期，署聂绀弩。

1955 年，52 岁

事 略

年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在全国文化艺术界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5 月，应江西省文化局和省文联之邀，作《关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学术报告；不久，赴井冈山、瑞金等地参观访问。7 月，“肃反运动”开始，被从江西紧急召回。因受左联介绍人胡风（其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入党介绍人吴奚如（其时被定为“叛徒”）的牵连，加上个

人历史和社会关系复杂,又偶藏有汪精卫题签的汪母遗像册作物证,被隔离审查,反省三个月。反省结束时,虽未定为“胡风分子”,但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被支部一致通过开除党籍(后改为“留党察看”),并被“撤职”,在出版社做一般的编辑工作。

4月,《绀弩杂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旋因作者受审查而停止发行。

著 译

论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辨伪存真”

载1955年1月《人民文学》第1期,署聂绀弩。

《绀弩杂文选》序言

1955年3月18日作于北京。载初版《绀弩杂文选》。

1956年,53岁

事 略

“肃反”受到处分后,情绪一度低落,偶尔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肃反对象”或被“反革命”帽子压得抬不起头来的人。优待高级知识分子和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后,曾期望“肃反”中的偏差和消极影响能得以纠正。11月10日—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宣布准备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1957年,54岁

事 略

整风中周颖(时任邮电部劳动工资处处长、“民革”中央委

员)正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参加鸣放,谈了“肃反”扩大化问题(涉及其老友胡风、骆宾基),成为“反右”斗争对象。绀弩虽在本单位未有任何言论或行动,但因替周颖的一份报告作过修改,也被牵连成为“反右”斗争对象。

著 译

武则天四大奇案(《旧小说偶介与或评》之一)

载 1957 年 6 月 3 日《文汇报》,署聂绀弩。

“十五贯”两种(《旧小说偶介与或评》之二)

载 1957 年 6 月 4 日《文汇报》,署聂绀弩。

笔记之笔记

艺术与非艺术

“两世缘”与“借尸还魂”

王荆公

死算生

身外身

载 1957 年 6 月 4 日—20 日《文汇报》,署聂绀弩。

屠楼外史(《旧小说偶介与或评》之三)

载 1957 年 6 月 22 日《文汇报》,署聂绀弩。

1958 年,55 岁

事 略

年初,与周颖被定为“右派分子”。周颖仍为全国政协委员,虽降职降薪仍有工作。聂于 7 月被遣送北大荒密山农垦局 850 农场(在虎林县境)4 分场劳改垦区劳动改造。刚去时在 2 队参加各种劳动,如种地、伐木、推磨、搓绳以及放牛、牧马、担

水、掏厕等等；中秋后，强劳力入山伐木时，转入 5 队参加积肥和修水利。时逢“大跃进”、“全民写诗”，作长、短篇古风多首，开大量创作描写劳动的旧体诗之端。冬，因烧炕不慎失火，被怀疑故意破坏，天天挨批判斗争，后以“反革命纵火罪”关进虎林监狱，但久不被提审。

著 译

槛房杂记

1958 年 1 月 20 日作于北京。初收初版《脚印》。

1959 年，56 岁

事 略

2 月 7 日（旧历除夕），周颖得聂托人寄的信，带着全国政协秘书长张执一的介绍信至虎林探视，促进审判，结果“判刑一年，缓期执行”，于关押两个多月后出狱，回 850 农场转入 7 队劳动。约 10 月被调至牡丹江农垦局《北大荒文艺》编辑部，与画家丁聪等共事，经常乘小火车奔波于虎林的编辑部和密山的印刷所之间。

1960 年，57 岁

事 略

1960 年春，牡丹江农垦局又将已在机关的“右派分子”组成生产队劳动。全国政协开常务会时，张执一向周恩来反映了周颖了解的北大荒“右派”劳改的情况，促成流放北大荒的“右派分子”得以全部回京。冬，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住西直门半

壁街 25 号邮电部宿舍。复得老友张执一之助，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任文史专员。因无具体工作，承在农场作诗的余绪，开始认真学诗和做诗；钟敬文、陈迥冬等老友常为家中座上客，一同谈诗唱和。从追忆北大荒生活和感恩赠答开始，集中创作了一批以七律为主的旧体诗。

1961 年，58 岁

事 略

1961 年 5 月，开始和在香港的高旅通信，交流和切磋诗艺，在精神和物质上互相关怀。秋，原单位通知摘掉“右派”帽子。

1962 年，59 岁

事 略

3 月，编成旧体诗集《马山集》（收旧体诗 40 首），手录于一印谱空页中，从未示人，“文革”中曾散失，后在山东被人偶然发现；约同时编成《北大荒吟草》，初为二十余首，后不断增补至四十余首，陆续以手抄本形式分赠亲朋好友（包括仍在东北的丁玲、在香港的高旅和在武汉的朋友）。6 月间，得邵荃麟帮助，在陈翔鹤主编的《文学遗产》（《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研究《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的论文，并获得较高的稿酬以解决生活困难。10 月，至武汉访友，游览长江大桥，临东湖瞻仰屈原像，均有感赋诗。

著 译

林嗣环抄袭金圣叹的文章

载 1962 年 6 月 24 日《光明日报》，署聂绀弩。

读《聊斋志异》（又题作《漫谈〈聊斋志异〉的艺术性》）

以《林四娘》作比较

《聊斋志异》的画龙点睛与画蛇添足

对话

化腐朽为神奇

奇想

文章从矛盾中出来

向题材追索作品所需要的东西

载 1962 年 7 月 22 日、7 月 29 日、8 月 19 日、12 月 2 日《光明日报》，署聂绀弩。初收初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1963 年，60 岁

事 略

值曹雪芹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潜心撰写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同时作咏《红楼梦》人物组诗。前此亦有咏新、旧小说的诗多首，其中多有真知灼见，发前人所未发；且隐指现实，存有深意，少数曾托高旅在香港发表。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本为《文学遗产》所写，因《文学遗产》暂停，未得发表。

1964 年，61 岁

事 略

4 月 19 日起离京南游，历时两个半月。先至广州、海丰、

返回时经南昌、洪湖、京山、武汉。先后参观了红宫、红场；拜访了龙津溪畔的彭湃烈士纪念馆（彭湃故居）；拜见了彭母周凤老太太，并与之座谈，题诗题词，一起回忆大革命时的往事。又前往梅陇马福兰村访丘东平故居，拜见丘母；还游览了汕尾渔港，参观渔民新村。在广州，祭扫了萧红墓，并探望了战友。后回故乡京山会见亲友，参观访问。原还计划往皖鲁两省，寻访《水浒》人文历史古迹，但未实现。8月17日，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身份赴西安参加“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担任评比委员；因重游西安，感念当年同至西安又同遭北大荒而此时仍滞留东北的丁玲，复成咏史诗多首。年底，托人向香港的高旅赠“萧红遗像”（尹瘦石画，聂绀弩作诗，陈迥冬题字，诗书画三绝，现存香港中央图书馆），以谢高旅请作萧红传之意。

1965年，62岁

事 略

是年较沉寂，思想则更见深沉，开始研读先秦诸子及《史记》、《汉书》。作诗《与海燕公园看牡丹，以其意成一绝句》，记与女儿同游的天伦之乐，以其难得。8月，外孙方瞳出生。

1966年，63岁

事 略

1月，胡风回京候审，聂偕周颖前往探望，一起谈论古典文学，谈论诗词等；旋胡风被押往四川，聂以诗幅“武乡涕泪双雄表”送行，并反复寄诗多首。手抄类编杜诗中有关政治的篇

什。在研读古籍中深有心得。不久，海燕夫妇赴邢台“四清”，绀弩夫妇在家照顾外孙。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预示“文化大革命”将在全国展开，随即被两次抄家。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

1967年，64岁

事 略

预窥风雨将临，两次去信嘱胡风毁去赠诗，自己也将赠诗撕毁。1月13日，中央颁布《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者即以“现行反革命”罪惩办。1月25日晚，在东直门外新源里寓所“现行反革命”罪被捕，投入北京功德林第二监狱。逮捕具体原因不详，并因无正式法律手续，家人很长时间无法知其关押地点。

1968年，65岁

事 略

冬，由功德林第二监狱转北京半步桥第一模范监狱。在半步桥监狱时，曾夜间行动跌倒，鼻破血流满面；进餐很少，以致身体十分瘦弱；又曾患肺炎两三个月，透视七次，不能走路，由同监背负就医。同号十人，有七名高级知识分子，如巨赞、梅洛、徐迈进等。与老友徐迈进自发组织青年狱友学习《毛泽东选集》。

1969年,66岁

事 略

10月19日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布加强战备的《林彪副主席第1号令》,当即由北京监狱被押送至山西临汾第三监狱,解晋途中,与曾任北京市政协秘书并在北京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书画家包于轨同铐。

1970年,67岁

事 略

4月,由临汾转押至山西稷山看守所,仍与包于轨同号,互相切磋学问。在狱中作《武汉大桥诗》近四十首,被搜去,后忆得十余首发表,辞旨新奇瑰丽,气象雄浑开朗,反映出在极端困苦环境中坚定达观的精神状态。

1971年,68岁

事 略

有诗赠包于轨,包于年内瘐死狱中。稷山看守所新所长苏步云给犯人购得一些马列书籍,遂组织和帮助狱友学习《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资本论》。在晋狱中近七年,精读《资本论》数遍,并作许多眉批和大量读书札记。

1972年,69岁

事 略

在狱中逢七十(虚岁)生日,自寿诗有句云:“死灰不可复燃

乎？戏把前程问火炉。”

1973年，70岁

事 略

在狱学习之余，常倚被而坐，默诵诗词。特别努力回忆北大荒诸作，回忆不起来的则重作，反映出对这些呕心沥血之作的珍视。

1974年，71岁

事 略

春，曾在山西法院工作的友人朱静芳陪同周颖，前往山西稷山看守所探监。4月底，接到北京市高院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书，罪名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书写大量反革命文章”，因不服，提出上诉。不久，因稷山县看守所大翻修，临时转至新绛县看守所。10月底，上诉被驳回，随即送往临汾第三监狱正式服刑，编在“老残队”。

1975年，72岁

事 略

周颖得知情况后，曾先后给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写信为聂申诉。申诉信通过胡乔木批转给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华国锋，华国锋作了批示。其时，因林彪垮台，北京高院遂研究从原定罪状中减去“污蔑林彪”一项，将无期徒刑改为十五年有期徒刑。但改判的判决书因故一直未能发出，聂本人及周颖

直至逝世亦不知晓。8月7—12日，周颖再次在朱静芳陪同下，到临汾第三监狱为之解脱奔走，监禁条件始得有所改善；朱并与旧日同事杨孔珍监狱长及其夫人狱政科长彭元芳磋商，以先生年老体衰为由，希望能争取减刑和保外就医，以求生还北京。继年初“特赦”全部在押战犯之后，12月15日—18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宽大释放大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警特人员一律释放，并给予公民权。山西省有七八百名有关人员释放（包括著名的“大右派”葛佩琦），而聂仍不在其内。

1976年，73岁

事略

在特赦国民党党政军警特人员查漏过程中，始得列入名单；于9月20日的裁定书中得到“宽大释放，并予以公民权”。9月25日得到通知后即速函告北京，周颖得信后迅即由戴浩陪同，亲赴山西迎接，11月2日回到北京新源里家中。先生得以生还北京，克服了两大障碍：一是“现行反革命”不在特赦之列；二是除少将以上高级人员外，赦后不得返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此实为杨孔珍夫妇仗义冒险施救所致。回京不久，北京高院才与山西监狱联系改判，因人已提前释放，山西高院例行公事，向北京高院作了原则答复。但北京高院仍迟迟未撤销原判，因此，政治上仍无自由。后几经周折，始报上临时户口，得以每月从朝阳区公安局民政科领取十八元生活补助金，作为惟一生活来源。在回京前一个月，女儿、女婿先后自杀。

1977年,74岁

事略

2月,因牢役多年,疾病缠身,以至举步维艰,但仍由旁人扶持,与姜牙子(黎丁)同往探望病中的阿英。以后,逐渐恢复与友人的诗词赠答,年内诗作颇多。积极着手整理杂文、小说等旧作和创作新作品,回忆并从友人处搜集诗词旧作,争取发表。

9月,《聂绀弩杂文选》,由香港尔雅书业公司出版(未经作者授权)。

1978年,75岁

事略

历经“文革”之阻隔后,恢复与高旅通信,并得高旅从香港抄回大批诗词旧作。整理旧作新篇,先后编辑《北荒草》、《赠答草》和《南山草》,开始以油印本在友好中流传,获得好的反响。应香港方面邀请,为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著长文纪念,体力脑力均消耗甚大。

著译

我在《文汇报》工作时的一点回忆

1978年6月23日作于北京。收1998年1月团结出版社初版《聂绀弩自叙》。

一个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话

……为纪念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作

1978年8月18日作于北京。

1979年,76岁

事 略

回京后多次申诉,仍久拖未决。直至本年3月10日,在某些高层领导人的过问下,北京高院才撤销原判,宣告无罪。4月7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改正错划“右派”,恢复党籍、级别、工资、名誉,并聘为该社顾问。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在文代会上,与李何林、吴奚如等请求已出狱并任四川省政协委员的胡风参加会议,因遭文艺界某负责人反对未能实现。香港友人罗孚提出愿帮助在港出版《三草》合集。

著 译

略谈《红楼梦》的几个人物

载1979年11月《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署聂绀弩。初收初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1980年,77岁

事 略

自监狱归家后即因肌肉萎缩而艰于离床榻,复为老年疾病所困,曾多次住院。初夏,再次入北京邮电医院就医。此次入院延续至次年。在病床上与人谈话,仍精神高昂,并奋力写作不辍。时胡风夫妇自四川归京,与胡风、萧军及他们的家人聚会、合影。冬,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 译

略谈《聊斋志异》的反封建反科举精神（又作为《〈聊斋志异〉三论》第一、二节）

载《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署聂绀弩。初收初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七十年前的开笔

1980年春作。载1980年《文汇报增刊》第3期；又载1981年3月14日香港《大公报》，初收初版《脚印》。

从男性红娘说到挽陈帅诗

1980年7月8日作。载1980年8月6日香港《大公报》，署聂绀弩。

从《狂人日记》谈到天门县的人民（原题作《读〈啊，父老兄弟〉》）

——为鲁迅先生百年诞辰作

1980年12月5日作于北京。载团结出版社初版《聂绀弩自叙》。

1981年，78岁

事 略

整理编辑旧作及新作，结集多种，于年内陆续出版。旧体诗集《三草》（收诗一百九十余首）得以在香港正式出版。自注有云：“我诗曾全失去，若干年后始陆续搜得其小半，除极少数外，均忘其作年，故其次序无意义。”是以诗集分类编辑而不系年。9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本拟将上年底应北京鲁迅研究室之邀写成的杂文力作《读〈啊，父老兄弟〉》更名为《从〈狂人日记〉谈到天门县的人民——为鲁迅先生百年诞

辰作》发表,但因怕再惹“文祸”,被亲朋劝阻而撤回,遂代之以《为鲁迅先生百岁诞辰而歌》旧体诗二十二首。7月,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1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绀弩小说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3月,《聂绀弩杂文集》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初版;6月,旧体诗集《三草》由香港野草出版社(托名,实为同人集资出版)初版;12月,《绀弩散文》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著 译

《中国古典小说论集》自序

1980年1月21日作。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绀弩小说集》序

1980年4月20日作于北京。载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绀弩小说集》。

《聂绀弩杂文集》序

1980年4月22日作于北京。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初版《聂绀弩杂文集》。

序《萧红选集》

——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1980年8月15日作于北京。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的《萧红选集》,又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初收初版《高山仰止》。

怀监狱

1981年7月作。载1981年8月17—20日香港《大

公报》，署聂绀弩。初收初版《脚印》。

《散宜生诗》自序（又题作《我与诗》）

1981年10月16日作于北京。载初版《脚印》。

《绀弩散文》序

1981年3月末作于北京。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绀弩散文》。

《水浒》五论（即《水浒是怎样写成的》、《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水浒〉的影响》、《论〈水浒〉的版本斗争》和《〈水浒〉的繁本和简本》的合篇）

载初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关于鲁迅先生百岁诞辰

1981年9月15日作于北京。黎丁藏稿。署聂绀弩。

故乡·故乡的语言·儿歌之类

1981年2月28日作于北京。周健强藏稿。署聂绀弩。

1982年，79岁

事 略

《散宜生诗》在北京出版，为《三草》增订本，体例相同，而多分出一辑《第四章》，共收旧体诗二百二十首。胡乔木为之作序，《胡序》云：“希望一切旧体诗新体诗的爱好的爱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葩——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8月，友人高旅自香港赴京探视，卅载睽隔，一朝相见，彼此甚为珍重。高旅一直为香港《文汇报》主笔，对《文汇报》建设有重要功绩，因不满“文

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而于 1968 年愤然掷笔，而“文革”后却一直未得落实政策，经绀弩夫妇多方努力，终于争取到胡耀邦的专门批示。

8 月，旧体诗集《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著 译

我与诗（又作《〈散宜生诗〉自序》）

载《文汇月刊》1982 年第 6 期，署聂绀弩。

侠女·十三妹·水冰心

1982 年 5 月 9 日作。载《读书》1982 年第 8 期，署聂绀弩。初收重编本《蛇与塔》。

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

1982 年 1 月 23 日作于北京。载 1982 年《新文学史料》第 3 期，署聂绀弩。初收初版《脚印》。

我爱金圣叹

载 1982 年 11 月 2 日《光明日报》，署聂绀弩。

华民政务司

1982 年 12 月 1 日作于北京。载初版《脚印》。

1983 年，80 岁

事 略

6 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散宜生诗》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遂计划出版增订、注释本，为此增作《后记》，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对自己的诗做了评价。

著 译

《诗刊》的几首诗

1982年10月5日作。载1983年《读书》第1期，署聂绀弩。

编第一个日报副刊

1982年9月25日作于北京。载1983年1月《新闻研究资料》第17辑，署聂绀弩。初收初版《脚印》。

语文七札

一、方字

二、江浙似为某些赌具发祥地说及其他

三、闻人和名流及其他

四、而今篇

五、《一个下贱女人》里的几个方言字

六、技痒篇

七、谈喝饭

八、后记

1983年3月24日作。载广西《语文园地》1983年2-3期，署聂绀弩。

文理十斟

1983年作。载《语文园地》1983年第4期，署聂绀弩。

怀或本《水浒》

载1983年5月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署聂绀弩。

《散宜生诗》后记

1982年旧历端午节作。载《散宜生诗》。

《吴奚如小说集》序言

1983年6月18日作于北京。载初版《吴奚如小说集》，又载初版《脚印》。

从《吴虞文录》说到《花月痕》

载1983年《读书》第9期，署聂绀弩。初收1986年2月北京三联重排本《蛇与塔》。

《山呼》自序

1983年9月6日作于北京。载《聂绀弩诗全编·山呼》。

神仙也封建

1983年5月5日作于北京。周健强藏稿。署聂绀弩。

王安石的两句诗

1983年5月18日作于北京。周健强藏稿。署聂绀弩。

1984年，81岁

事 略

继续写作回忆文章、文艺评论和序跋。赠诗谢“左联”战友周而复登门探望。

6月，九人诗合集《倾盖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初版，其中《咄堂诗》系绀弩自选旧体诗集，选编时间与《三草》大致相同，共收诗词八十首。7月，论及鲁迅的文章合集《高山仰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著 译

“板”琴

1984年1月10日作于北京。载1984年上海《文汇报月刊》第7期。初收初版《脚印》。

我和伍禾

载1984年《长江》文学丛刊，署聂绀弩。初收初版《脚印》。

谈《金瓶梅》

1984年2月10日作。载《读书》1984年第4期，署聂绀弩。初收重编本《蛇与塔》。

读书篇（又题作《谈读书》）

载1984年《中国青年》第2期，署聂绀弩。

《语文半世纪》序

1984年3月1日作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藏稿。

且说《三国演义》

1983年11月19日作。载1984年《文史知识》第3期，署聂绀弩；又载2001年9月岳麓出版社初版《三国演义》。

《水泊梁山英雄谱》外序

——怀孟超

1984年4月4日作于北京。载孟超著《水泊梁山英雄谱》；又载1984年《读书》第7期，署聂绀弩。初收初版《脚印》。

《历史哲学》·《玉娇梨》·文字改革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稿，发表刊物、时间不详，署聂绀弩。

小红论

1984年5月12日作。载1984年《读书》第8期，署聂绀弩。初收1986年2月三联重排版《蛇与塔》。

《脚印》序（又题作《我的“自学”》）

1984年10月作。载初版《脚印》。

礼与红楼

载1984年《晋阳学刊》第6期，署聂绀弩。

曹操形象

1984年4月1日作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藏稿。

语言·文字·文章

一、话跟话的分家

二、话跟文章的分家

三、话跟文字的分家

据中国现代文学馆藏稿《语文半世纪》目录。

1985年，82岁

事 略

老友冯伯恒于3月逝世，不敢使闻，8月偶然得知，即作诗悼念。6月，胡风逝世，即作悼诗，刊于《人民日报》。秋，病情持续恶化，拒绝住院，准备写《贾宝玉论》而未能完成。11月，手写《雪峰十年总》诗二首。病重期间，作为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仍牵挂文字改革事业。

7月，《散宜生诗》（增补、注释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二版，共收诗词二百六十二首。

著 译

三上红楼

载 1985 年《语文园地》第 1 期，署聂绀弩。

我的“自学”（又题作《〈脚印〉序》）

1984 年 10 月作。载 1985 年《读书》第 1 期，署聂绀弩。

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

《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杂文卷》序

载 1985 年《书林》第 1 期，署聂绀弩。

读《读孟尝君传》

载 1985 年 3 月 1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 2 期，署聂绀弩。

《徐冬冬诗画集》跋

1985 年 12 月 8 日作。载《徐冬冬诗画集》，署聂绀弩。

1986 年，83 岁

事 略

1 月，应邀口述《我与杂文》，由何满子整理成文。3 月初，病情渐重，但头脑清楚，拒不吃药。24 日入院，26 日于北京协和医院安详谢世。4 月 7 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全国政协、民革中央、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侨联、中国作协、黄埔军校同学会、国家出版局，以及湖北省京山县委和县政府也献了花圈；习仲勋、邓力群、朱学范、杨静仁、屈武等领导人

和首都文艺界、新闻出版界人士六百多人出席了告别仪式。

2月,妇女问题论集《蛇与塔》(重编本)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初版;3月,回忆专集《脚印》,列为《新文学史料丛书》之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7月,《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著 译

《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举隅

初收初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聊斋志异》在妇女问题上的矛盾(又作为《〈聊斋志异〉三论》第三节)

初收1986年2月三联版重编本《蛇与塔》。

《聊斋志异》三论(即《略谈〈聊斋志异〉的反封建反科举精神》、《〈聊斋志异〉在妇女问题上的矛盾》的合篇)

载初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谈鸩母(由《嫖客与鸩母》删节而成)

1950年1月10日作。载1986年2月北京三联版重编本《蛇与塔》。

《蛇与塔》(重编本)自序

载1986年2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重编本《蛇与塔》,署聂绀弩。

我与杂文

1986年1月作。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青年文学手册》。

儿时(即《〈乌金记〉和买〈聊斋〉》、《上会》和《咸茶与闲书》的合篇)

初收初版《脚印》。

以下篇目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及周健强所藏作者手稿，未注明写作时间：

寓言

潘赞化

读瞿钢诗《三棒鼓今昔唱》

咸茶与闲书（又作为《儿时》第三节）

从《红楼梦》说到恋爱与婚姻

“银样镞枪头！”

论《金瓶梅》的黄色

《花柳深情传》

十美图

有两种本子的三种旧小说

断片五则

明清小说与阶级斗争（提纲）

文字游戏

创造简字与创造成语

“日”音

附录四

篇目笔画索引

说明：

索引按《全集》所收作品篇目首字笔画顺序排列。《首字笔画检索表》中各字后的数码，系指以该字为首字的篇目列入“篇目索引”中的页码，如“小(461)”，即为首字作“小”的篇名始列于本卷的第461页。《篇目索引》中所列篇名后的数字分别为该篇在《全集》中的卷次与页码，如①129，则为第一卷第129页。

首字笔画检索表

一画

一(459)

二画

人(459) 八(460) 十(460) 又(460) 二(460)

×(460) 七(460) 儿(460)

三画

大(460) 马(460) 上(460) 山(460) 小(461)
飞(461) 女(461) 广(461) 乞(461) 上(461)
乡(461) 冫(461)

四画

无(462) 中(462) 艺(462) 文(462) 从(462)
为(463) 开(463) 天(463) 方(464) 支(464)
父(464) 月(464) 不(464) 巨(464) 心(464)
风(464) 幻(464) 火(464) 历(464) 毛(464)
六(464) 友(464) 孔(461) 元(464) 气(465)
反(465) 手(465) 少(465) 仇(465) 水(465)
土(465) 日(465)

五画

东(465) 母(465) 电(465) 奴(465) 记(465)
四(466) 圣(466) 白(466) 市(466) 用(466)
石(466) 让(466) 古(466) 对(466) 打(466)
由(466) 礼(466) 北(466) 失(466) 世(466)
斥(466) 尼(467) 且(467)

六画

军(467) 在(467) 问(467) 自(467) 机(467)

而(467)	关(467)	有(468)	论(468)	伟(470)
朴(470)	再(470)	阮(470)	老(470)	创(470)
冰(470)	延(471)	此(471)	收(471)	阳(471)
吃(471)	妇(471)	回(471)	早(471)	伦(471)
后(471)	伤(471)	红(471)	西(471)	争(471)
向(471)	血(471)	过(471)	字(471)	光(472)
先(472)	华(472)	死(472)	杂(472)	

七画

克(472)	时(472)	沙(472)	你(472)	苏(472)
社(472)	床(472)	两(472)	杜(473)	怀(473)
何(473)	没(473)	我(473)	走(474)	玛(474)
把(474)	抗(474)	序(474)	沉(474)	弟(474)
汽(474)	补(474)	体(474)	更(474)	技(474)
沈(474)	迎(474)	社(474)	纱(474)	麦(474)
吴(474)	花(474)			

八画

诗(475)	废(475)	金(475)	拥(475)	国(475)
雨(475)	现(475)	夜(475)	姐(475)	范(475)
贤(475)	知(475)	兔(475)	明(476)	放(476)
狗(476)	命(476)	欣(476)	奇(476)	妻(476)
季(476)	丧(476)	官(476)	林(476)	鱼(476)
径(476)	姓(476)	其(476)	姑(476)	试(476)
绀(476)	武(476)	侠(476)	板(477)	

九画

城(477)	面(477)	南(477)	追(477)	娜(477)
穿(477)	给(477)	施(477)	怎(477)	语(477)
突(478)	宣(478)	架(478)	荣(478)	美(478)
信(478)	胡(478)	绝(478)	荼(478)	星(478)
哪(478)	骆(478)	误(478)	鬼(478)	独(478)
音(478)	战(478)	是(479)	骂(479)	眉(479)
侵(479)	洋(479)	香(479)	茫(479)	科(479)
春(479)	故(479)	钟(479)	神(479)	

十画

高(479)	恩(479)	通(479)	笑(479)	谈(479)
家(480)	爱(480)	酒(480)	请(480)	旁(480)
莎(480)	狼(480)	读(480)	盐(480)	诸(480)
颂(480)	致(480)	秧(480)	浮(480)	朕(480)
笔(480)	聂(481)	徐(481)		

十一画

雪(481)	假(481)	寂(481)	婵(481)	略(481)
黄(481)	偶(481)	蛇(481)	第(481)	梦(481)
探(481)	您(481)	萧(481)	萤(482)	晤(482)
脚(482)	曹(482)	聊(482)	银(482)	断(482)

十二画

编(482)	鲁(482)	插(482)	道(482)	答(482)
棉(482)	游(483)	确(483)	韩(483)	装(483)
彭(483)	释(483)	辈(483)	智(483)	帽(483)
阔(483)	童(483)	强(483)	隔(483)	渡(483)
傅(483)	蒋(483)	喉(483)	奥(483)	殖(483)
散(483)	寓(484)			

十三画

新(484)	零(484)	感(484)	睦(484)	盛(484)
--------	--------	--------	--------	--------

十四画

摔(484)	熊(484)	嫖(484)	敲(484)	嘘(484)
槛(484)	漫(484)			

十五画

暴(485)	醢(485)	德(485)	潘(485)
--------	--------	--------	--------

十六画

邈(485)	壁(485)
--------	--------

二十画

魔(485)

篇目索引

一画

- 一只腿(诗) ⑤497
- 一九三四年大众语论战回顾 ⑧ 92
- 一九三五年的中国语文运动 ⑧107
- 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诗) ⑤347
- 一秒钟写起的剧本 ②176
- 一种对女性的看法 ②219
- 一九四九年如是说 ①457
- 一九四九年在中国(诗) ⑤321
- 一九四九年,四,二一,夜 ①291
- 一种把戏 ②350
- 一种抗议书 ③229
- 一天的消息 ③190
- 一个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话——为三联书店成立三十
周年作 ⑧266

二画

- 《人与女人》——谨就正于“第三种人” ③258
- 人与鲁迅 ②136
- 人物描写的一苦恼 ③412
- 人怎样变成末人? ②258

人与非人(含《论拍马》)	①451
《八月的乡村》	③312
十一周年——新闻影片脚本	⑥600
“十五贯”两种	⑦558
十美图	⑦601
又关于笑	②373
《二鸦杂文》序	⑨45
×公桥牌	①436
七十年前的开笔	④211
儿时(即《〈乌金记〉和买〈聊斋〉》、《上会》和《咸茶与 闲书》的合篇)	④198

三画

大日本对支那贫民问题之最轻便的解决法——日兵 暴行之真凭实据的总算账	②26
大众语跟土话	⑧54
大众语“决不是含有阶级性的”	⑧85
大隐在朝	②128
“大陆数亿同胞所共切望!”	②335
《大树王子》	③414
马来的琴歌(诗)	⑤390
“土产”——“接仪”	⑧293
山芋	⑥81
山城的“五四”	④60
山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歌(诗)	⑤431

《山呼》自序	⑨ 92
小号兵	④ 184
小雨点	① 129
小鬼凤儿	⑥ 520
《小鬼凤儿》序	⑨ 47
小红论	⑦ 463
飞机的用途及其它(即《飞机的用途》、《兔与狐》、 《向往》的合篇)	① 77
飞机木刻号	④ 40
《女权论辩》题记	⑨ 24
“女神”的邂逅	④ 55
女子教育—文献	① 299
女性的名字	② 261
广“古有复辅音说”	⑧ 218
乞师	② 184
上山	④ 188
上岸(又题作《在新加坡上岸》)	④ 226
乡愚	② 262
“乡愚”一解	② 270
乡下人的风趣	① 407
三人坐	② 286
三嫂子	⑥ 409
三上红楼	⑦ 492

四画

- 无政府主义者与军阀 ② 38
- 无所谓怎样写杂文? ③ 398
- “无知的十五岁的孩子” ③ 182
- 中国国民党的以党治国 ② 71
- 中国学者的厄运 ② 180
- “中国奴隶制度”及其它(含《中国奴隶制度》、《由“中国奴隶制度”想起的》) ③ 15
- “中国人民不反美” ③ 151
- 《中国古典小说论集》自序 ⑨ 56
- 艺术的内容与形式 ⑧ 384
- 艺术形式受什么东西的规定呢? ③ 296
- 艺术的将来 ⑧ 438
- 文艺批评的基准 ⑧ 405
- 文坛洗冤录 ② 108
- 文学无用论跟文学不足道论 ③ 305
- 文章·语言·文字 ⑧ 44
- 文学创作上的言语运用问题 ⑧ 319
- 文娼 ② 274
- 文理十斟 ③ 434
- 文字游戏 ⑧ 366
- 从未来派说到大众为什么不懂新艺术形式 ③ 298
- 从白话文到新文字 ⑧ 3
- 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 ① 96

从陶潜说到蔡邕	① 60
从《封神演义》扯到佛朗哥	② 187
从《击壤歌》扯到《封神演义》	① 410
从桃色太子看旧中国	③ 102
从男性红娘说到挽陈帅诗	③ 425
从《狂人日记》谈到天门县的人民——为鲁迅先生 百年诞辰作	② 415
从《吴虞文录》说到《花月痕》	⑦ 585
从《红楼梦》说到恋爱与婚姻	⑦ 500
为白话文敬告林语堂先生	⑧ 64
为愚民政策捏一把汗	② 114
为大众语敬告林语堂先生	⑧ 69
为一个诗人我拥护宪政	② 163
为辛赐卿而写	② 410
开快车时候的一个备忘录	⑧ 49
开笔	④ 393
天文家是“不为什么”的么？	① 231
天亮了	⑥ 456
天门——中秋前写给我的女儿	② 277
天壤	⑥ 305
《天亮了》初版序	⑨ 40
《天亮了》再版序	⑨ 50
天安门——追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	④ 447
天地鬼神及其它(即《论虚无主义》、《论“素患难行乎 患难”》和《论天地鬼神》的合篇)	② 20

方块字·别字·手头字	⑧100
支那人	⑥390
父亲	① 49
月夜的故事	④ 25
月与影	④398
不死的枪——献给画篇《不死的枪》的作者	
新波(诗)	⑤369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③232
巨像	④178
《巨像》序	⑨ 38
心祭	④ 13
风尘	⑥286
幻象	④364
火	④370
历史的奥秘	① 55
《历史的奥秘》题记	⑨ 17
《历史哲学》·《玉娇梨》·文字改革	⑧246
毛遂	⑥207
毛词解	③403
毛泽东先生与鱼肝油丸	④424
毛柳沁园春	③420
“六鹤退飞”	⑧340
友谊(含《乐观》、《偶感》)	②239
孔聂短简	②248
《元旦》题记	⑨ 44

气死影评家	②310
反动派谈言微中	②344
反动到底的“底”到底伊于胡底?	③ 83
手和脑和创作	③416
“少女国”	③138
仇恨	③174
《水浒》五论(即:一、《〈水浒〉是怎样写成的》、二、《论 〈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三、 《〈水浒〉的影响》、四、《论〈水浒〉的版本斗争》、 五、论《〈水浒〉的繁本和简本》)	⑦ 1
《水泊梁山英雄谱》外序——怀孟超	⑨ 98
王安石的两句诗	③441
“日”音	⑧374

五画

东南西北的年关	④257
东平琐记	④ 48
母亲——制为电影的高尔基的著名小说	⑧397
母亲们	④ 5
母性与女权	① 16
电影与现实——从《现代—女性》说到《我们的生路》	③268
奴才与环境	②110
记一个朋友的谈话	④322
记周佛海林柏生	②146

记一个叫做托尔斯山的青年	①202
记周颖	④123
记康泽	④428
四声论及其他	⑧180
圣母	④ 1
白兔	④ 37
《白蛇传》三人物	②389
市场上	④366
用不着警惕	②196
石头坟	⑥407
让我们呼吸吧	④418
古时候的公务员	①403
对目前语文运动的意见——答上海语文周刊社问	⑧343
打倒爸爸	①447
由萧军想起的	①269
由一篇“社论”引起的(即《“徒托空言”的时代过去了》、 《拿证据来!》、《“人民相率而迁移”》、《羊和妓女和 “相率而迁移”的人民》的合篇)	③ 25
礼貌篇	①381
礼与红楼	⑦472
《北京旅行见闻》先序	②317
失眠的猫头鹰(诗)	⑤507
世界主要语言中没有中国语言	⑧282
斥艾森豪威尔	③224

尼赫鲁、狄托、亚阿十二国等等	③ 184
且说《三国演义》	⑦ 508

六画

军阀旗帜下的死者(诗)	⑤ 466
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文化运动高压之下产生的一个 老英雄	② 102
在汽车上	④ 18
在西安	④ 134
《在岗位上》外序	⑨ 48
问与答(通信)	② 96
自拷(诗)	⑤ 488
自由主义的斤两	① 344
自由与人权	③ 135
机器与艺术	⑧ 409
而今篇	⑧ 350
关于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驳卢那恰尔斯基在 组委会第二次大会的报告	⑧ 419
关于“文言文”的形成跟发展	⑧ 295
关于“白话文”的发生跟成长	⑧ 298
关于电影跟土话跟拉丁化	③ 307
关于知识分子	① 226
关于《世界文库》的翻印古书	⑧ 149
关于语言	⑧ 255
关于哀悼鲁迅先生	① 211

关于幽默	②158
关于异小民族的艺术	③376
关于欧阳予倩	③379
关于《拥护忠王李秀成》	①120
关于《光头本纪》	②307
关于广告	②319
关于笑	②364
关于颁布婚姻法和封闭妓院枪毙万恶领家的一些 冗谈	②376
关于雷峰塔	②395
关于伍修权将军	③156
关于《水浒》的人物和故事	⑦404
关于鲁迅先生百岁诞辰	②431
有一个乞丐(诗)	⑤495
有奶就是娘与干妈妈主义	①334
有两种本子的三种旧小说(那:一、《觅莲记》、三《美 人书》)	⑦597
论《封神榜》	①125
论同音字	⑧305
论发脾气	①427
论“青天大老爷”	①423
论“民主低能说”	②229
论反民主	②223
论刺客	②251

论莲花化身	① 368
论申公豹	① 255
论乌鸦(含《再论乌鸦》)	① 327
论肥胖	② 255
论关羽	② 266
论时局(又题作《论国是》、《山谿》)	② 8
论通天教主	① 253
论白俄(又题作《论白华》)	① 442
论娼妓	① 314
论怕老婆	① 302
论武大郎	⑦ 376
论元旦——为一九四九年元旦作(诗)	⑤ 311
论行李	① 439
论“亲读”	① 431
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	③ 20
论李逵	⑦ 386
论“南无阿弥陀佛”	② 305
论霸王别姬	② 312
论我自己	② 321
论第一百零九条好汉	② 326
论开馆子	② 337
论黄色文化	② 12
论“中国之大患”	③ 43
论万里长城	③ 55
论“诗曰……”	③ 36

论猴把戏	②348
论钱穆的“借箸一筹”	③ 66
论中国人的喉咙似乎特别容易发痒	②352
论关羽	⑦506
论悲哀将不可想象	② 16
论狗娘养的	③132
论如丧考妣	③179
论“素患难行乎患难”	②412
论宋江三十六人名单的形成——《水浒故事的发展》 的一节	⑦391
论钗黛合一论的思想根源	⑦431
论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辨伪存真”	⑦446
论《金瓶梅》的黄色	⑦532
伟大的胜利	②125
朴列汗诺甫批判	⑧454
再谈《野叟曝言》	⑦548
再论申公豹	①257
再次释放纳粹战犯	③125
阮玲玉的短见	① 39
老子的全集	① 88
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	③319
创作活动的路标	③325
创作口号及其它	③373
创造简字与创造成语	⑧370
冰条	⑧473

延安的虱子	④338
《此时此地剧运》补义	①159
收获的季节·……为鲁迅先生三年祭作(诗)	⑤351
阳光的踪迹	④348
吃鳖的时候	②156
妇女·家庭·政治	①23
回信	①165
早醒记	①105
《早醒记》题记(又题作《残缺国》)	⑨28
伦理三见	①370
后悔	⑥126
伤风楼自语	④422
《红楼梦》人物列赞	②217
西饼论	①311
西班牙人有福了	②268
西班牙改为君主国(诗)	⑤381
争具文不迁	②271
“向伟大的行列致敬”——题借某报论题为暴徒捣毁 《新华日报》而作(诗)	⑤374
血书——读土改文件	①462
《血书》序	⑨43
血	③119
过海记	④195
过海度周末	②323
字的省籍	⑧345

《光头本纪》	②303
先赏“反攻必胜论”两记耳光	②332
华尔街的失策	③168
华民政务司	④246
死生亦大矣	②408
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中国新文学大系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杂文卷》序	⑨115

七画

克鲁泡特金墓上(诗)	⑤471
克利史马史	④132
时事述评	② 59
时间的启示	① 67
沙基在哪儿?	② 66
你不该拿走我的腿(诗)	⑤479
苏联文坛最近的理论斗争	⑧391
苏联演剧的方向与任务	⑧425
“苏联的何徐事件”及其它	③301
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苏联文 坛的新创作口号	③263
社论三部曲	②329
床上的故事(诗)	⑤409
两条路	⑥258
两狼山	②236
两个比蒂葛拉宝	②309

两种武装	③237
两个阵营,两种声音	③242
杜衡先生还往那里逃?	③287
杜鲁门说	③208
《怀乡集》的根本态度	③289
怀南京(又题作《失掉南京得到无穷》)	①235
怀曹白——作为《呼吸》的读后感	④140
怀《袖子》	①244
怀韶	④445
怀监狱	④311
怀或本《水浒》	⑦413
何谓形式?	③294
何谓侵略?	③121
何处是天堂	②393
没有青年的国	①214
没有脊椎的人	④376
我与文学(又题作《这算是我的忏悔录》)	④115
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	③316
我的金言	④344
我若为王	①386
我愿(含《民主的消息》)	②231
我们过的还是旧年	②288
我是有学问的人	②315
“我们要和平!”	③202
我在《文汇报》工作时的一点回忆	④469

我爱金圣叹	⑦ 418
我和伍禾	④ 299
我与杂文	④ 480
走掉	⑥ 18
玛德里曲可不可以唱	② 133
把古书怎么办呢?	⑧ 191
把王老二的年朝两头过	③ 234
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记录	③ 337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③ 153
序《捧血者》	⑨ 10
序《萧红选集》——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⑨ 71
沉疴	④ 29
弟弟	⑥ 115
汽油——艺术(即《从汽车节约说到张恨水》、《从张恨水说到墨子》、《从墨子说到艺术什么的》合篇)	① 82
补白	④ 389
体貌篇	① 35
更夫	④ 186
技艺之累	② 272
沈崇的婚姻问题	① 318
迎骆宾基	① 283
纱巾	② 355
麦克阿瑟晚景凄凉	③ 216
《吴奚如小说集》序言	⑨ 90
《花柳深情传》	⑦ 594

八画

- 诗译中山悼列宁词——译自俄文 ⑧377
- 诗人节怀杜甫 ①352
- 《诗刊》的几首诗 ③427
- 废稿示众 ②109
- 废话 ⑥448
- 金元爹 ⑥ 30
- 金圣叹的意识问题 ⑦401
- 拥护吴老将军的“大众语万岁” ⑧ 76
- 拥护了吴老将军之后 ⑧ 79
- 拥护《忠王李秀成》 ①115
- 拥护爱人 ⑧347
- 《国语运动史纲》 ⑧118
- 国语罗马字呢？中国新文字呢？——答黎锦熙：
 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 ⑧131
- 《国家至上》公演后，一个看客的独白 ②165
- 雨花台（又题作《现制度的讴歌》）（诗） ⑤404
- “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② 1
- 夜戏 ⑥106
- 姐姐 ⑥223
- 范蠡与西施 ⑥443
- 贤妻良母论 ① 19
- 知父莫若女——一个美国绅士的侧影 ①149
- 兔先生的发言 ⑥196

明末遗恨	②	5
明清小说与阶级斗争(提纲)	⑦	613
放心,不会被唾沫淹死	②	6
狗道主义举隅	①	358
命令你们停战(诗)	⑤	503
欣闻秦似未死	②	204
奇异的人力车	②	215
奇遇	⑥	188
《妻》	①	322
季氏将伐颛臾	⑥	214
“丧心病狂!”	②	242
官(含《末人一恣》)	②	254
林冲杨志合论	①	414
林嗣环抄袭金圣叹的文章	③	422
鱼水篇	①	275
径赛	③	301
姓	⑧	353
其言多甘,其心必苦	③	159
“姑息”	③	177
试验原子弹	③	196
《绀弩杂文选》序言	⑨	53
《绀弩小说集》序	⑨	67
《绀弩散文》序	⑨	78
武则天四大奇案	⑦	555
侠女·十三妹·水冰心	⑦	573

“板”琴 ④217

九画

- 城下后(诗) ⑤396
- 面包,怎样略取呢? ②46
- 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宥电 ②68
- 追论京派海派什么的 ②107
- 追记 ⑦553
- 追悼 ②279
- 娜拉与现代妇女问题 ②112
- 穿制服的文学家 ②116
- 给叶籁士先生 ⑧301
- 给一本厦门话新文字小册子作的序 ⑨3
- 给战死者 ④43
- 给鼠辈 ①110
- 给亚美利加的人民 ②192
- 给夜莺俩 ②244
- 给臭虫(诗) ⑤385
- 施蛰存先生好自为之 ②123
- 怎样统一中国的语言 ⑧309
- 怎样做母亲 ①3
- 怎样“对付”联合国? ③193
- 《语言·文字·思想》自序 ⑨7
- 语言·文字·文章(即《话跟话的分家》、《话跟文章
的分家》、《语言和文字的分家》的合篇) ⑧164

语文札记	⑧ 356
语文七札(即《江浙为赌及赌具发祥地说及其它》、 《而今篇》、《〈一个下贱女人〉里的几个方言字》、 《技痒篇》、《谈喝茶》等的合篇)	⑧ 284
《语文半世纪》序	⑨ 95
突击	⑥ 610
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 一座谈会记录	③ 354
宣布紧急	③ 171
架桥者	④ 358
荣誉村	④ 373
美的追求者	④ 380
美帝的“最后”来何速也	③ 165
美帝与台湾	③ 145
信念	④ 384
胡风的水准	① 152
绝叫	④ 159
茶话(五则)	② 220
星夜(又题作《往星中》)	④ 419
哪吒	② 181
骆驼(诗)	⑤ 389
误人父兄	① 362
鬼谷子(又题作《北邙》)	⑥ 177
独夫之最后	⑥ 502
音乐牛谈	② 282
战斗与悲悯	③ 3

是之谓“全仁”	③ 40
骂人者和他所吸的香烟牌子	② 342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③ 227
侵朝一动机	③ 140
“侵略”	③ 161
洋大人和中国农妇合影	③ 148
香港打波地之夜	④ 308
茫然	③ 95
科学与政治制度	③ 245
春天不是用兵天	② 406
故乡·故乡的语言·儿歌之类	④ 472
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	④ 273
神仙也封建	⑦ 487

十画

高尔基的作家生活四十年	⑧ 379
恩格斯论巴尔扎克	⑧ 414
通讯员的资格及任务	⑧ 416
笑与幽默	③ 283
笑话·漫画·照片	③ 142
谈梅兰芳	② 120
谈“喝饭”	⑧ 360
谈《娜拉》	① 28
谈《野叟曝言》	⑦ 533
谈杂文	③ 308

谈《简·爱》	③407
谈“你当”	②367
谈《金瓶梅》	⑦523
家	⑥375
“爱智庐”——川游杂记之一	①217
酒船	⑥ 52
请莫介绍稿件	②131
旁听	⑥ 67
莎士比亚应该后悔	① 74
“莎士比亚后悔”以后	②161
狼狈和主后	④386
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图》	①262
读《在酒楼上的时候》	④148
读书篇(又题作《谈读书》)	②428
读《读孟尝君传》	③443
读瞿钢诗《三棒鼓今昔唱》	③453
盐	⑥243
诸夏有君论	①376
颂中国古代的选举	①379
致生者、悼死者、怀生死不明者(含《春日》)	④399
秧歌颂(诗)	⑤513
《浮士德与魔鬼》	③214
朕即联合国	③187
笔记之笔记(一、艺术与非艺术;二、《两世缘》与《借 尸还魂》;三、王荆公;四、死算生;五、身外身)	⑦564

《聂绀弩杂文集》序	⑨ 68
《徐冬冬诗画集》跋	⑨ 118

十一画

雪海的窥望(诗)	⑤ 463
雪的旷野	④ 361
假期	⑧ 468
寂寞的故乡	④ 328
婵娟(即《樱花节》、《天界》等的合篇)	④ 69
《婵娟》题记(含《噩梦》，又题作《永远地，永远地……》)	⑨ 34
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	③ 382
略谈《红楼梦》的几个人物	⑦ 351
黄牛	④ 33
黄帝的子孙	② 203
偶语	② 153
蛇与塔	① 1
《蛇与塔》题记	⑨ 20
《蛇与塔》(重编本)自序	⑨ 119
第一把火——为鲁迅先生五年祭作	⑥ 134
梦读天书记	① 188
梦	⑥ 488
探春论	⑦ 424
您该回去了!	② 185
萧红一忆	④ 391

萤(诗)	⑤387
晤对李凤莲——《从一个女人看两个世界》的楔子	②290
《脚印》序(又题作《我的“自学”》)	⑨102
曹操形象	⑦518
《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举隅	⑦287
《聊斋志异》三论(即一、反封建统治;二、反科举八股; 三、在妇女问题上的矛盾)	⑦295
“银样镞枪头!”	⑦503
断片五则	⑦606

十二画

编后	②100
编第一个日报副刊	④285
鲁迅之时代及其作品	③249
鲁迅的错误	②129
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	①171
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	①91
《鲁迅正传》	②245
鲁智深断片	⑦388
插上一根草标(诗)	⑤402
道统论	①222
道德一论(又题作《论道德》、《强者的道德》)	①260
答霓璐先生的抗议	⑧303
棉裤	⑥350

游吕菊芬	① 43
“确系处女小学亦可”	① 32
韩康的药店	①194
韩青天	②200
装腔作势的男人	①137
彭燕郊的《第一次爱》	③387
释舅姑	⑧206
辈份·寿命·体格	①394
智人的心算	② 3
帽子	②198
阔人礼赞	①389
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即《论童匪》、《论女儿 国》和《给裸体的人们》的合篇)	①417
强与弱	②275
隔篱呼取尽余杯	②276
渡江渡江渡江!(诗)	⑤415
傅斯年与阶级斗争	③ 73
傅斯年死了	②402
蒋经国的孝道	②358
蒋介石与气节	②370
喉咙发痒的阶级性	②362
奥本浩先生的花园	③108
殖民主义终结	③199
《散宜生诗》自序(又题作《我与诗》)	⑨ 80
《散宜生诗》后记	⑨ 85

寓言	③446
----------	------

十三画

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	③292
新文字和大众文学	⑧127
零碎话	②118
感谢与寄慰	②190
感讣	②398
睦邻篇	③128
蜃楼外史	⑦561

十四画

摔掉一杆枪(诗)	⑤476
熊猫骨	②247
嫖客与鸨母(含《谈鸨母》)	③ 90
敲敲艾奇逊的门	③221
嘘!	②400
楹房杂记	④293
漫谈《聊斋志异》的艺术性(又题作《读〈聊斋志异〉》 即:一、以《林四娘》作比较;二、《聊斋志异》的画 龙点睛与画蛇添足;三、对话;四、化腐朽为神奇; 五、奇想;六、文章从矛盾中出来;七、向题材追索 作品所需要的东西)	⑦257

十五画

- 暴君勒罗 ③278
醜狗记 ⑥427
德谟克拉西如是说 ②206
德充符——演庄子义赠所亚(又题作《一个残废人和
他的梦》) ⑥148
潘赞化 ③450

十六画

- 邂逅(又题作《一根棍子》) ⑥ 3
壁画 ①140

二十画

- 魔鬼的括弧 ①134

后 记

在纪念聂绀弩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十卷本《聂绀弩全集》终于编定付梓了。这是他的作品首次全面结集出版，这对于抢救中国现代文化遗产，对于推动聂绀弩研究，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在全集即将面世之际，应特别鸣谢本书的顾问和编委们，他们是：梅志、舒芜、何满子、谢蔚明、彭燕郊、牛汉、绿原、冯英子、舒乙、黎丁、侯井天、王存诚、朱正、吴福辉、周健强、姚锡佩、郭隽杰、罗孚、张晓风、方瞳。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倾力支持和倾心指导，本书的顺利出版是不可能的。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我们虽无法一一细述详情，但在这里，我们愿再一次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和谢意。著名作家曾卓生前在病重之际，一直关心和支持着全集的编辑工作，他因病不幸去世后，其夫人薛如茵女士一如既往地给予了编者无私的帮助。著名作家、画家黄苗子应约为本书题写书名。编者还参阅了侯井天、王存诚、费万龙、许豪炯的部分研究成果。方涓涓、李良志、林东海、刘屏、阮忠、张晓钟、常隆兴、郭朝红等给予了编者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另外，还要鸣谢给予编者查阅资料之便或及时寄送相关文献材料的下列机构：中共中央档案馆、国家图书

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图书馆、香港中央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中文系资料室、中山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南民族大学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桂林市图书馆、广东汕尾市档案馆、湖北京山县政协、京山县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等。

本书的资料搜集和编纂工作，由武汉出版社组织实施。执行编辑组在社长、总编辑彭小华的直接领导、指导下工作。刘昌钊统筹编辑组日常事务，并执笔拟订了全集编纂方案，审阅了部分书稿，承担了附录部分的整理。邹德清协助处理编辑组日常事务，承担了1—4卷的编选。李杏华进行了6—8卷的编选。吕植壮进行了第5卷、第9卷的编选，其工作得到了王存诚、侯井天的指导。第10卷“运动档案”部分的材料由周健强提供并初步整理，朱正编定。何金松、胡水清、潘长胜、李晓玲、刘理忠、陈木保参与了部分审订、校对工作，特此说明。

编者

2003年12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聂绀弩全集 (第十卷) 运动档案 附录

作者 =

页数 = 4 8 8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运动档案

个人主义初步检查（1954年5月22日）

历史交代（1955年6月25日）

- 一、参加革命工作以前
- 二、在日本的时候
- 三、上海时期以及和康泽的来往的终始
- 四、和谷正纲、卓衡之的来往
- 五、和曾养甫的来往
- 六、见过一次张道藩
- 七、从重庆出来的路上
- 八、在香港的一件事
- 九、整个略历及在香港的几件事

历史补充（1955年6月26日）

历史材料重写（1955年）

- 一、胡风问题
- 二、康泽问题
- 三、谷正纲问题
- 四、张道藩问题
- 五、曾养甫问题
- 六、从重庆到香港的经过
- 七、姜斌问题

补充材料（1955年7月20日）

历史交代再补充（1955年7月25日）

- 一、从东京到上海
- 二、和康泽来往部分的补充
- 三、在桂林
- 四、重庆一事
- 五、从重庆到香港
- 六、又一次到香港

致陈克寒、戈矛的信（1955年9月10日）

我和反革命的关系及其危害性（1955年12月）

三十万字和猖狂发言（1955年）

和姜斌在香港

曹和江（1955年）

两个鬼影（1955年）

叫回来为什么不回来？

在香港时的“阔”和贪污

在香港和哪些人来往

在党内关系的不正常

王国和政策（1955年）

检讨（1955年12月）

追溯我和康、谷的关系（1955年12月29日）

愿意或能够做什么工作

致党支部的信（1956年2月）

对于反省的看法

对支部大会决定的意见（1956年5月24日）

关于黄若海（1955年6月26日）

关于彭燕郊（1955年6月26日）
关于周颖的发言
关于周颖的发言稿
关于冯雪峰（1957年8月17日）
关于到矿业学院去（1957年8月17日）
关于陈企霞（1957年8月18日）
关于和社内几人的来往（1957年8月18日）
关于和某些人来往（1957年9月23日）
关于宗派主义（1957年）
检讨（1957年11月10日）
 一、我和王任叔同志的关系问题
 二、在二编室的工作问题
 三、替周颖改文章问题
 四、结论
 五、附录
 甲 在反右中写的残稿三页
 乙 在检讨中写的废稿四页
最后全面检查材料（1957年11月28日）
 一、言行
 二、思想
 三、改造
从改组派说到画册
 附录
附录一 聂绀弩著作书目
附录二 聂绀弩名号录
附录三 聂绀弩生平年表
附录四 篇目笔画索引
后记